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6期 2022年12月



專題論文

- 對位解讀下的聲音：重讀李金銓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兼談資訊流通與國家自主
- 文人與侍從：李金銓的新聞史研究
- 《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的美麗意外：只有中道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
- 台灣解嚴前後之傳媒盛事的觀察者：李金銓為言論事的驚異奇航之旅（1982-1999）
- 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

研究誌要

- 臺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新聞與民主的警訊

歷史與現場

- 當代公共知識分子：杭士基（Chomsky）座談會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22年12月 第十六期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政治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新加坡國立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上海)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編輯委員會

主編	羅世宏	中正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執行編輯)
	馮建三	政治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洪貞玲	台灣大學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目 次

编辑室报告:i

专题论文

对位解读下的跽音:

重读李金铨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兼谈信息流通与国家自主
...唐士哲/1

文人与侍从: 李金铨的新闻史研究.....黄顺星/25

《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的美丽意外:

只有中道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陈志贤/53

台湾解严前后之传媒盛事的观察者:

李金铨为言论事的惊异奇航之旅 (1982-1999)程宗明/87

传播、民主与媒体环境的期待:

从李金铨〈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谈起.....管中祥/115

研究志要

台湾报纸受平台科技影响: 新闻与民主的警讯.....林照真/139

历史与现场

当代公共知识分子:

杭士基 (Chomsky) 座谈会.....傅大为、冯建三、李泳泉、李行德、
汪宏伦 (与谈)、郭力昕 (主持) /165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编辑室报告：

对话、辩诘、反思、批判是理论知识解构、重构与创新的重要历程。该历程，体现了知识工作者在理论体系结构中，勇于挑战，任性突围的本真；及透过滔滔论述的交锋与批驳，不忘传承；在相知相惜中，不断创新与突围的本色与价值关怀。当大学校长的遴选，募款能力成为指标；受制于评鉴，大学师生关系与学术研究，质变成近乎市场管考机制时，这种来自于学术本真的反思与批判，仿如空谷足音，声声清澈响亮，令人动容。

是以，为了向这群任性、坚持，回归学理对话；滔滔举证、辩诘又具延伸理论回韵，不断创新开展研究视角，回归学术本真的学者们致敬。本期的专题与历史与现场，期刊有幸企划并留下藉由先进后学，对影响台湾传播学门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李金铨老师，与当代思想巨擘杭士基（Chomsky）大师的精采学术反思、对话，所产出的实证数据与座谈记录。该数据与记录，除留下世代交融文献与令人动容的精采词组外；更期盼透过这样的内容，向大师的原典著作与理论文献致敬。

专题有五篇，第一篇是由唐士哲老师所撰写的〈对位解读下的跽音：重读李金铨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兼谈信息流通与国家自主〉。该文取径萨依德（Edward Said）的对位解读，聚焦李金铨关于信息流通的相关讨论，并对照当代全球信息流通的现状，提陈大师洞烛机先的论点，十分精采；第二篇是由黄顺星所撰〈文人与侍从：李金铨的新闻史研究〉，就李金铨老师之侍从报业体制，析论知识分子在第三世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检视行动者在结构中的限制与能动性；第三篇是陈志贤所撰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的美丽意外：只有中道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乙文，该文回顾李老师在传播研究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聚焦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阶级、数字科技与平台、媒体专业主义与劳动的看法和评价，及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研究的启发与影响；第四篇则是程宗明所撰的〈台湾解严前后之传媒盛事的观察者：李金铨为言论事的惊异奇航之旅（1982-1999）〉乙文，该文以亲身经验，论述在台湾走向解严开放的历史脉络中，对当时就读传播科系大学

生的他，如何受到李老師於 1982 年所著《大眾傳播學》的啟蒙經驗，以提陳該書對於傳播學群研究與個體在社會行動中的影響；第五篇是由管中祥所寫的〈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則以李金銓老師〈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一文為起點，擴及其在 1987 年出版的《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傳播帝國主義》三本著作，及 1993 年李金銓表於澄社出版的《解構广电媒體：建立广电新秩序》中的總結文章〈台灣廣播電視藍圖〉，了解李金銓對「傳播」的基本界定與主張，並在這樣的基礎上，討論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的關連；反思媒體操控除了政治勢力，資本集團的壟斷，對言論之壟斷，傷害更大，更應規範。五篇文章，篇篇精采，除了有大師的理論回韻外，更有承先啟後的創新視角，值得細讀。

本期的研究志要，則是由林照真所寫的〈台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新聞與民主的警訊〉，該文針對國內三家綜合性報紙《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進行資料搜集與訪談，其研究發現說明了原本扮演台灣新聞主要提供者的傳統報紙，出現地方新聞人力、國際外派新聞人力嚴重衰退現象，影響國內言論市場的多元性；台灣報紙數字廣告成長 616%，傳統紙版廣告則衰退九成以上，廣告收益已難維持優質內容；台灣報紙網絡新聞半數以上（52%-58%）流量，來自 Google 和 Facebook 平台導流，其依賴程度，令人堪憂。該實證數據除具引用價值外，該文更咸盼政府與民眾，能關注報紙沒落的现象，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以挽救台灣的新闻與民主。

如同前述，本期的歷史現場，完整再現一場由當代公共知識分子討論杭士基（Chomsky）學理與論點的座談會內容。該座談由郭力昕主持，集學界難得齊聚的大咖學者：馮建三、李泳泉、李行德、傅大为、汪宏倫與談；更難得的是迎來令人驚艷的學者朱元鴻、盧倩儀、张小虹、蔡維天、楊儒賓、方念萱、許家馨、黃正德等，參與響應與討論。正所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內容十分精采豐富。是以，我們完整實錄了該座談的內容，深怕錯過或遺漏了過程中的只字詞組。原因無它，只因這是近年討論有關杭士基（Chomsky）學理與論點，最豐富與精采的一場座談會。字里行間，除了觀點的啟發，也有更多值得延展的研究視角與論點，句句吸睛洗腦，令人佩服。

如同该计划主持傅大为所述，俄乌战争以来，杭士基多年来对国际政治与美国世界霸权的分析，更形重要。本期有幸留下这么精采的座谈内容，感谢在这动荡、不确定的时代里，仍让我们感受到学术热情不死的希望，能怀着这样的学术温暖，有动力续行的这群可敬又可爱的学者先进们，表达由衷的感谢。

《传播文化与政治》编辑委员会

2022年12月19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对位解读下的聲音：
重读李金铨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
兼谈信息流通与国家自主

唐士哲*

本文引用格式

唐士哲 (2022)。〈对位解读下的聲音：重读李金铨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兼谈信息流通与国家自主〉，《传播、文化与政治》，16:1-23。

投稿日期：2022 年 9 月 5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 作者唐士哲为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e-mail: shihjet@gmail.com

《摘要》

李金铨于 1980 年出版英文专著《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在当时信息自由流通与文化帝国主义论辩对峙下，李金铨主张两方说法各自成理，却也各有偏差。他强调理论上折衷取两方之优，但证据先行，应对各国的传统与现状，以及内、外条件作个案的综合分析，并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自主构画传播政策。本文取径萨依德 (Edward Said) 的对位解读，聚焦李金铨关于信息流通与个案复杂性的相关讨论。对相隔了四十多年后，当前全球信息流通现状，本文探讨李金铨早期的立场，如何一定程度上仍起烛照现状的作用。

关键词:李金铨、对位解读、信息流通、媒介帝国、传播政策、主权

壹、前言

对于台湾大多数成长于 1980 至 1990 年代的学子而言，「李金铨」这个名字既遥远又熟悉。近半世纪的学术旅程中，李金铨的教学现场横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却唯独没有在台湾的大学里教过书。一直要到 2019 年，透过母校政治大学的推荐，李金铨出任教育部玉山学者，终于在他教学生涯的末端，站上母校的讲台。

虽然大半辈子在台湾的大学课堂里缺席，李金铨却仍是桃李满天下。不同世代在大学就读的学生，包括笔者，都是透过他的《大众传播理论》被引进传播研究的领域里。媒介学的倡导者德布雷（Regis Debray）曾说，传播是一时一地的，传承却是生生不息，但前提是必须倚靠特定的传播技术或行为。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传播现场在希腊城邦的市场角落，但真正传世的，却是后学柏拉图（Plato）的记载、传抄，乃至后来印刷书的大量流通。印刷在人不在场时不断延续思想的感染力，传播因此成了「传承」（transmission）的一个面向（Debray, 2000 / 刘文玲译, 2014）。当不同世代的传播学术工作者书架上都有《大众传播理论》，这似乎注销了李金铨在本地的缺席！在传承的意义上，他也成为两岸三地与北美华语传播研究圈里的共同语汇资产。

透过学刊、规划以学术人为名的致敬专题，似乎无法抽离在「李老师」著作的字里行间，寻找学术人在不同学思阶段的身影，或者回溯来时路。本文即便不脱离这个主轴，但我认为时代机缘下的每个发声，都是在既存的论述、学派或说法中寻求栖息处或介入点，作为一位于 1970 年代「留洋」的传播学术工作者，李金铨也不例外。因此，即便本文论述的主角是李金铨，但我采用的策略是「挪用」，在方法上挪用一个李金铨近期治学仰慕对象的阅读路数，来重读李金铨。

这位仰慕对象即是后殖民学者扎伊尔德（Edward Said）。透过扎伊尔德发展出来的「对位解读」，我希望重读李金铨早年的媒介帝国主义专著，并藉此突显一个国际传播研究里声音不绝的关键词，即「信息流通」。这个字眼衍生出的理论、概念与论辩，某种程度定位了国际传播在不同历史脉络下

的发展。李金铨于 1970 年代末期，躬逢其盛地参与了因为这字眼掀起的论辩，也成为 C. C. Lee 为西方学界所认识的关键起点。

什么是对位解读？又为何透过对位解读，探索李金铨早期著作中关于政策研究的立场？容我在下一个章节说明。但聚焦在信息流通上，因为这个字眼在不同历史场景里，成了理解国际关系与国家主体性的关键要素。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流通快速、广泛，但有些国家却视境外流进的信息为洪水猛兽。信息流通带来了理念、文化的交流，却无法脱离其社会力量，以及扎伊尔德所说的「权力轮廓」(configurations of power) 问题 (Said, 1978 / 王志弘等译, 1999, 页 7)。信息流通但非对等地交流，是李金铨近期对于国际传播研究缺乏真正多样与宏观的国际视野提出的批判。回顾学术发展的历史，当国际传播研究被美国的特定政治或经济旨趣所垄断，展现出的便是以西方狭隘且抽象的普遍性原则，强加于全世界的「区域研究」(李金铨, 2022, 页 317)。因此，国际传播的研究如何真正是「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如何使得区域知识真正由区域长出，并整合为有意义的理论框架，成为李金铨在近年关切的重点 (同上, 页 333)。在《「国际传播」国际化》里 (2022, 原书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集众家之言，重构区域比较研究的认知论与方法，显然便是希望在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许多国度里保护边陲弱势族群的专有名词之余，也让多元的精神解放国际传播研究的「区域研究」视野，真正拥抱世界。

因此以「信息流通」作为石蕊测试，对早期李金铨著作进行对位解读，我希望在本文以他对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原初解剖中，突显国家自主的传播政策如何与信息流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关系。当时对比时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在科技条件、市场型态与地缘政治冲突日趋复杂的脉络下，国家的传播政策面临什么样现势的挑战。这些挑战，皆突显在该书缮写的时空里，李金铨处理一个近似方法论的企图，即对于个案的综合分析，如何显露出全称性理论的偏差，以及跨出国际传播的区域研究宿命，关照全局的地区研究为何至关重要。

貳、关于「对位阅读」

扎伊尔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灵感来自音乐。乐理创作的对位法,追求的不是旋律进展过程中,音部之间和谐的纵向发展,而是横向的、不同旋律同时发声但彼此融合的技术。李金铨曾主张对位阅读作为方法,可以修正、发展、延伸,甚至淘汰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媒研究文献中的理论概念(李金铨,2022,页343、344)。

但怎么样算是对位阅读?简单来说,即是对脉络的联想。扎伊尔德主张:当每一个英国家庭餐桌上的糖罐子成为生活必需品,这便可以同时联想到海外英属殖民地的甘蔗庄园。任何文学文本的阅读,皆不应被框限于文本形式上的历史起点与终点,阅读也同时包含联想到任何可能与文本指涉的意涵有所牵连的层面。扎伊尔德的读法,是由西方的文学经典中,扣连到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脉络。就像西方近代的文学典律,除了是欧、美现代性的缩影,也蕴含了受西方帝国主义宰制社会里杂多异质且沉默的底层大众。对位阅读试图容纳那些曾经被拒斥在文本之外的事物,因此也是一种抵抗的策略(Said,1993,pp.66-67)。

即便适用范畴有别,萨依德的对位阅读与阿图赛的「征兆性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同样透过挖掘文本表象没有浮现的深层意义,来扩大文本解读过程涵盖的社会或文化范围。因此,指认文本的意识形态潜能,成为联想、扣连读法的策略目标。信息流通在李金铨等身的著作里,或许不是从一而终的关怀,但在早期步入西方学术界时,却是他为西方学术界所认识的关键词。1970年代以前,信息流通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显学;而这个关键词也成为走过1950年代的发展主义思维后,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社会的新左派回头反思与批判的重点。信息流通该是无条件地自由流通,还是有条件地限缩在国家自主的传播政策下「自由且均衡地流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图透过宣言、揭示文化为全球传播政策的关键词。李金铨在当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对于这个字眼针锋相对时,选择以折衷的角色,主张个案认定,或者套用他的说法,「取精用宏」。

以下的讨论,将是以「信息流通」为关键词眼,检视李金铨在1980年代两本论述媒介帝国主义的专著里,关于信息自由流通与国家自主两种对立价值的讨论。本文「对位」之处,在于将早期李金铨对于流通与个案复杂性

的论述立场，对照相隔了四十多年的信息流通现状，看看早期的立场，是否一定程度仍起诠释现状的作用。对位阅读是本文采取的阅读策略，但重点并不摆在加持或臧否个人，而是透过文本显现的一些征兆，对其采取对位思考，以扎伊尔德的企图而言，便是发掘「帝国」意涵的意识形态潜流。然而，如果扎伊尔德的对位式阅读有西方对比于殖民世界文化空间的对等性，本文的「挪用」则是突显跨时、断点的对等：对位阅读「信息流通」于 1980 年前后，以及相隔四十年后的今天，思索国家制定传播政策的自主性，面临什么样的权力轮廓的转变。

参、为什么谈流通？特别是「信息流通」？

「信息流通」成为一个扰动意识形态潜流的关键词，首见于联合国成立之初。在美国主导，但美、俄对峙的国际论坛氛围下，信息的自由流通成为检视人权状态的主要指标（Hamelink, 1997）。1948 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十九条规定：「任何人皆有意见表达的自由权利；这项权利包括不受干扰地持有意见，以及可无视国界的限制，藉由任何媒介搜寻、接收、分享信息与观念。」（The United Nations, 1948）但规定是否要附上但书，引发自由与共产两大阵营的盟主激烈辩论。以美、英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视信息自由流通视为人权的表征，不因个别国家或社会的差异而打折。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则强调，第十九条中明示的权利，保障的不只是使用信息的个人，更是经营与贩卖信息的传播机构。信息自由无异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企业家所代表的民主」，极有可能沦为西方少数资本主义企业的「商品输出自由」，因此极力主张国家管制的重要性（唐士哲、魏玟，2022）。

这个字眼成为联合国论坛对决的关键词的第二回合，发生在 1970 年代中期。由南半球国家发起的重建「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简称 NWICO），透过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委员会与宣言，希望正视南、北半球日益严重的信息落差。这种落差反映

在南半球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缺乏、既有传播的机构沦为外资控制，以及传播内容再现文化与社会的西方观点偏差等。因此南半球国家要求透过政策介入，建立国际间信息流通的新秩序。关于 NWICO 的经过与成败，国际传播研究相关书籍已是汗牛充栋，本文便不赘述。

提到联合国关于信息自由流通的两回合论辩，用意在于突显这个「价值」成为国际组织明文保障的宣言或报告时，总是掀起自由流通与其对立面的激辩——即国家对于信息治理的主权。两个回合的论辩里，强调国家在信息流通上的角色扮演，指涉的对象颇为不同。许多参与第二回合论辩的成员，在美、苏对峙的第一回合时，不是尚未独立建国，便是刚刚由殖民地状态脱离出来。这些多半位居南半球的「新兴民族国家」，在经历 1960 年代的非结盟运动后，成为自外于自由、共产阵营的「第三世界」。除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仍在起步阶段，第三世界与「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共同反映出国家在解殖、迈向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如何受到种种外来的，以及传统在地的权力宰制，与社会、文化、经济乃至个人心理等自我调适的过程。在法农 (Franz Fanon / 陈瑞桦译, 2007)、南地 (Ashis Nandy, 2009) 等人的书写中，皆可以感受到这种新、旧社会交杂，内、外势力夹攻下，新社会转型与个人认同意识再造的复杂性。如法农在新兴国家的去殖民过程中，看到殖民时侥幸存留的权势团体如何与前殖民势力里应外合、操纵对立来进行国族主义的斗争。南地笔下的殖民后印度社会里，即便西方的统治者随着解殖而离开印度，帝国意识 (imperial consciousness) 却仍旧萦绕在已然西化的常民阶级脑中。

这个通称「后殖民」的书写，在 1980 年代以后也回向至欧陆与美国的学术界，成为开启对于第一世界启蒙二元思维的批判 (Spivak, 1988; Bhabha, 1994)。本文并不在此细数这种历程，而是藉这个片段，引出「第三世界」所触发的一个关键词，即「帝国主义」。这个字眼在十九世纪出现时，便与当时的媒介生态有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电报搭配海底电缆，使得国际通讯社的信息、新闻流通范围括及全球，也象征欧洲殖民形态的转变。电报的快速，使得殖民的意义不再仅等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榨取便宜的原物料、劳工来源，以及倾销过剩的商品等经济掠夺行为，而是欧洲帝国统御制度的对外延伸、向外输出，落实了文化、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宰制。1870 年，

西方三大通讯社路透、哈瓦斯与沃尔夫社「瓜分」了全世界的采访范围，三家垄断事业同意互不竞争，分享报导。国际通讯社的跨域新闻采访、交换，加上国营的越洋电报网络延伸，使得通讯社的影响力跨越国界，远披至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实时的讯息传达统合了帝国范围内的视听，通讯社也成了中介商业与政治势力的要角。凯瑞 (James Carey, 1989, p. 212) 主张，此时「帝国」或「帝国主义」成为流行的语汇不是巧合，因为越洋电缆的铺设、启用，不仅克服了讯息传递的时差，更具体的意义是打造了「帝国资本」，即调和帝国与边陲间的政治、军事，以及商业等多方势力。因此，电报与电缆透过海洋的力量 (sea power)，将殖民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一个帝国的中心不再仅是被动响应边陲，而是主动发号施令的治理体系。

传播媒介与帝国的关联，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更加密切。即便欧洲殖民帝国开始步下历史舞台，但帝国主义所指涉的对于一地的垄断性控制与权力不对等，仍在经济与文化上牢牢地掌控这些国族国家世界系统的新成员。在历经解殖、独立建国的历程，新兴民族国家关切的重点不再仅是建国初期的国族整合以及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而是国族文化表现的自主性。随着传播科技带来信息流通的渠道日趋多元，现代化成为国家发展、进入世界体系的诱因，包含报社、通讯社、电影院、收音机广播等象征西方现代化的媒介，陆续进入新兴民族国家。透过这些媒介带来外来的信息，「境外」从此不再是地缘关系上的「疆界以外」，而是跨越文化认知障碍的讯息互动。

即便流通创造活水，是一地文化得以延续、创造的关键，但是一旦跨越国界的流通是单向的流通，却没有对等的信息回流，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带动的信息流通，成为既有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关系位阶的复制。「主权国家」对于这些外来的讯息、机构，乃至广告强销的商品消费，该行使什么主权意识，实行什么管制措施，便交杂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考虑，包含统治阶级政权的维系、满足与平衡市场营利的需求，乃至各种组织或利益团体的结盟，推动的扫盲、疾病防治，农耕技术改良等 (见 Katz and Wedell, 1977, p. 9)。

电视无疑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电视技术在设置初期是花费高昂的投资。包含电视机的生产与转播系统的设置，以及开播后节目内容来源，林林总总

加总起来，使得电视对于许多国家（包含第一、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未必实惠的设置。因此，电视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的新兴民族国家而言，是「国策」层次的问题，背负了国族整合、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及文化传承等使命（Katz and Wedell, 1977）。电视事业在台湾的兴办，背负了执政者建设「自由中国」模范的意志，以及不能落后中国大陆的压力（见程宗明，2002年11月）。此外，电视也被期待成为散播现代社会消费意识的代理者。柯裕棻研究电视的引进对于台湾在1960年代时的社会与经济意涵，便主张电视被赋予的文化功能，除了不断与当时的中华文化复兴、反共复国的政治意识型态扣连，另一方面也反映一种科技拜物的情结，即强调电视可以促进市场的开发，是现代化消费生活的表征（柯裕棻，2012）。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可以试图彰显信息流通与国家政策的自主性的复杂互动关系，而李金铨正是试图由国家内、外条件的复杂性入手，作为构思国族自主传播政策的起点。

肆、重读《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ation of Television Culture（中译《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电视文化的同质化》，以下简称《再商榷》）原先出自李金铨于197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经过两年的改写、筹备，于1980年由圣者（Sage）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论点经汇整、改写，于1987年在台湾由久大出版社发行《传播帝国主义》。

根据李金铨于〈跋 传播纵横 学术生涯五十年〉一文（2019，页573-616）的自述：他以此书参与了自由多元派的「信息自由流通」和激进派的「传播帝国主义」的辩论。在分述流通论者正面看待媒体利伯维尔场的运作机制，以及文化帝国主义论者的批判立场，他主张各国的处境与条件不同，因此两方说法各自成理，以辩证的角度，「信息自由流通」与「帝国主义」论述合起来缺一不可（同上，页587）

然而，书名既曰「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显然在当时信息流通的世界系统里存在于国与国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国际影视流通的霸权结构，

是立论关切的重点。左翼学者如许勒提出「文化帝国主义」，受到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影响，主张世界的风貌依照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路径，已被区分为核心、半边陲与边陲地区，且彼此发展出不同层面的依附关系，而文化 / 传播的发展为这种依附关系提供合理的文化条件。因此，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透过这些过程，特定社会被吸纳进现代世界体系内，且这个社会的主控阶层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屈就于居核心位置且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Schiller, 1976)。

李金铨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优点，在于能简约地解释国内与国际权力结构的紧密联系，以及「中心」与「边陲」的动态关系。但他也强调不应一味以外因作为解释，国际权力结构里，对应经济表现的影视文化产品输出 / 输入，或者影视制度的复制，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影视环境的依附处境，虽然显得斑斑可考，但各国的情势有别，不能一概而论。他论及 1970 年代的伊朗建立了第三世界最强大的传播系统 (在美国多国企业的协助下)，却仍旧敌不过保守宗教领袖何梅尼的传单，传统或原始的传播方式其力量仍不容小觑 (李金铨, 1987, 页 85)。

因此，他倾向使用「媒介帝国主义」，而不是「文化帝国主义」，来考察一些较具实证意涵的电视发展面向，如节目的进出口、媒介组织所有权控制、广播制度的公共意涵与商品化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观对于接收国造成哪些生活面向的影响等。他呼应坦士多 (Jeremy Tunstall)、卡兹与魏多 (Elihu Katz & George Wedell) 等人的分析，也就是必须细察各国的历史条件与状况的殊异。外因固然重要，内在因素如政府的态度，因应广电媒体的引进而进行国内各种资源的调配，乃至如何将广电系统调整为适应当地的社会情况等，皆有可能翻转依附的情势。他主张即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跳不出外力的依附圈，有些国家却在一定范围内凝聚内在力量，抵御外来压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景况不尽然是宰制经济结构的复制。即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行的是利伯维尔场的体制，未必表示其媒体文化上也必然充斥外来影视产品的影响。

李金铨以 1970 年代的台湾为例，说明这种经济结构与媒体文化的不对称性。他主张台湾虽然基于政经考虑引进美国的商业电视制度，但文化的自

主权并未就此沦陷。1970年代的台湾,虽然经济表现已是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但统治阶级并没有松手对于文化主权的掌握,这反映在当时电视节目的自制率高,且媒体经营权结构的外资占比低。他因此强调台湾当时面临的文化依附困境,主要来自于内部的政治因素:政府纵容媒体过度商业化发展,却又在政治意识型态上紧握着大中国统一论,造成强压多元的在地语言与生活文化。与台湾这个发展中经济体相较,加拿大显然成了李金铨笔下一个强烈的对照组。地缘关系上,加拿大虽然位居第一世界阵营,但英、法殖民的过往,以及与美国为邻的语言、文化重迭,却注定使得这个国家成为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其媒介制度的发展,必须纠结于复杂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现实中。电视节目的「依附」情况是包裹在包含电影、杂志与有线电视的媒介帝国主义现象中(Lee, 1980, 见第四、五章讨论)。

即便强调信息自由流通与帝国主义论述各自成理,也各有偏差,但主张缺一不可、取精用宏的同时,他也「左右开弓」,左批新左派的经济决定论疏忽了各国内在的情势差异,右批信息自由流通独尊自由主义市场逻辑,把国家当成自足的分析单位,却看不到国际间权力结构的倾轧(李金铨, 1987, 页 142)。他检视在当时颇流行的「产品生命循环」论(product lifecycle),指出这个为信息自由流通辩护的说法即便有启发价值,但一方面文化产品不似工业化产品,产业升级与取代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在当时美国强势主导电视节目外销的国际市场里,产品生命循环论在发展中国家并未能找到任何相应的案例(1980, p. 49)。而他赞同文化帝国主义论突显在国际间权力关系失衡下信息流通的宰制意涵,并强调理论与政策应互为表里,但他对于新左派提出的「解方」,即政策上「走社会主义路线」,全然由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撤走,也深感不切实际。免除国际依赖的同时,并不能够保证本土的文化经验不会免于国境内的政治依赖(1987, 页 64)。

在意图辩证信息自由流通与文化帝国主义两者互斥、但并非无交集可能的前提下,李金铨主张应让个案的证据说话。他强调非科学主义的实证性,反映在他以「例外」的个案突显理论的片面性:

我主张要具体分析各国的传统与目前的综合状况,以衡量其内在

与外在因素的交互运作，最后才能定夺那一种理论可以成立（李金铨，1987，页 142）。

日后，当李金铨于《国际传播国际化》（2015/2022）中重启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他再次强调不以理论的全称性套用至解释个案复杂性的立场。他引用斯帕克斯（Collin Sparks）的一个核心提问，来解释他对于理论与个案实证的态度。斯帕克斯不钟意「文化帝国主义」或「媒介帝国主义」等词，宁愿以结果论断，理解国际传播是帝国主义所产生的「文化后果」。李金铨强调斯帕克斯的观点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保证分析关照全局（holistic），又不陷入全称命题（totalistic）的泥沼？关照全局、不把社会的有机整体碎裂化；而如果坚持全称命题，使得分析未能对应到社会整体面貌，且牺牲了个案释出的差异面向，仅是成就了抽象、本质化的理论全称命题（页 34-35）。

今天重读李金铨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两本专著，可以发现他对于理论的折衷立场，同样反映在理论之所为用，纯然因时因地制宜的实用路线。对他而言，媒介政策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历史与当前景况的差异。就像他主张国际传播组织的所有权、市场与资源，以及利润，各个产业别的表现各有不同，不能够一概而论（李金铨，1987，页 103-4），理论为现象服务，且现象有其无法被归因的复杂性。他赞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将理论与政策视为表里如一（李金铨，1987，页 143），在当时美国仍是行为科学当道的传播研究里，他强调为第三世界国家应追求自给自足的传播政策，但并非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分歧中二择一。对他而言，商业化的传播制度并非一无是处，与其激进地鼓吹革命，一步到位，他更强调要渐进地改革。他主张采取中庸之道，「既争取文化主权的独立自主，也不能放弃信息的合理畅通。」（李金铨，1987，页 64）

以构画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研究的动机而言，透过「个案」对于当时擅场的全称性理论产生质疑，显然是他立论最突出之处。构成他分析的内、外因素，他主张应多元检视包括文化传统、资源、语言、地理分布、人口、菁英份子的眼光或决策，乃至社会力量的结合、政治经济结构的因素，寻求

这些历史、文化与社会景况的解释（李金铨，1987，页 142）。就像在讨论台湾的媒介发展时，他以「两个台湾」破题，并援用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的「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说法，来带出夹杂在虚幻的大中国传统文化想象以及务实的市场经济营运的电视政策。

在地状况的综合分析作为政策分析的起手势，意图在信息自由流通与媒介结构宰制两派分立下，寻找中间值，理论的折衷主义倾向不免意图左右逢源。对照 1980 年代以后的国际传播景况，当时的特性在于跨国信息流通仍处于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类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这些大众媒介，在频道、内容，以及通路相对集中的环境中，国家政府对于信息的流出与流入，仍具有主导的权力。然而，当时以例外的个案，彰显两个理论典范的缺漏，却叩合了 1980 年代以后的媒介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例外」以其对于既定认知、构念或说法界线的挑战、差异的突显、幽微意义的探索，但仍寄居于既有理论的认识架构下打游击，成为一种务实的文化政策批判。

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情势，个例状况的综合分析预示了接下来历史舞台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由英、美的经济政策到席卷全球的私有化与商品化风潮，冷战结束后加速的全球市场整合，传播与计算机科技带动更快速、多面向的跨国信息流通，以及这些资本主义市场与科技的动因所造成的全球社会结构变迁，皆使得「例外」成为常态。为了突显这个常态，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将李金铨主张的内、外因素作为一个参照的架构，来检视自那个写作的时间点以后，国际传播局势的变化。

伍、例外的常态化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动的世界局势变动，相当程度改变了国家在传播政策上扮演的角色。如果信息的自由流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自主权曾经是针锋相对的价值，面临全球化过程中强大的世界市场整合趋力，以及信息传播科技无远弗届的渗透力，两者之间似乎已难是河井不犯，国家对于疆界内、外信息流通的掌控力显得倍受挑战，但也亟思突破，既有守势也有攻势。

以传播科技的进展而言，从 1980 年代的有线电视、1990 年代的国际直

播卫星、2000 年以后因特网的盛行，乃至近期网络平台所驱动的数字经济形态，每一种新的科技形式皆带来信息流通与管制不同的问题。每一种科技形式的出现，加上既有科技形式的质变，使得国家政府难以单纯透过政策阻挡的方式，将此科技形式防堵在外。有的仅是以对等的手段，在国内复制一个自主的媒介科技体系。

当影、音、信息、数据跨越地理界线的流动串起了国家与世界体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过往以政府做为决策主角的国际传播舞台上，涌现更多分享或瓜分决策权力的新起要角：跨国媒体集团、大型科技公司、各种跨政府或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协议，乃至人权机构，皆可能在变动诡谲的国际传播生态中，进入权力的角逐场。

与 1980 年代以前相较，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媒介形式与渠道日渐多元，信息的自由流通虽然仍是西方跨国媒体集团行走全球市场的护身符，但它也有可能成为非西方国家或组织扩张国族或区域认同的手段。九 0 年代中期以后，拜直播卫星之赐，产生像 CNN、BBC World 等代表英语世界观点的全球卫星频道，随着 CNN 打造的 7 / 24 新闻模式在全球各地被复制，卫星频道也成为许多非西方世界的传播组织或机构触及特定文化或族群意识的管道。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南方电视台 (teleSUR) 分别象征泛阿拉伯与泛拉美的跨区域观点，透过卫星传送，走向全球的收视群，挑战国际新闻的英美霸权。总部位于伦敦的库德族卫星频道 MED TV，则以散居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德族人为目标收视众，并以倡导建国 (库德斯坦) 为终极目的 (Price, 2002)。这些前第三世界的地区、或曾经是第三世界国度里倍受剥削、排挤的族裔，如今也懂得利用卫星作为呈现另类观点，或倡议特定区域认同的利器。图苏 (Daya Kishan Thussu, 2007) 依此主张：卫星讯号赋予的不再仅是由西方流向其他世界的信息流通，而是多方位的「逆流」(contra-flows)，这些跨国或有地缘文化意涵的逆流一定程度平衡了欧美主控的国际视听。即便它们的经济规模与影响性仍无法与全球流通的「顺流」匹敌，但国际的话语霸权型构因此更形复杂 (Thussu, 2016)。

这些国际传播的发展，皆对信息流通空间的「地上主权」，也就是各国政府，形成挑战。半岛电视台的出现，不仅让美国头痛，也同样不见容于阿

拉伯世界里的一些国家 (Seib, 2005)。土耳其则竭尽所能, 阻挡 MED TV 讯号在境内落地 (Price, 2002, p.21)。诚如学者普莱斯 (Monroe E. Price) 强调, 因应国际间信息流通的日益多元、复杂, 各国政府为维护国族的「认同泡泡」 (bubble of identity), 显得费尽心机。国族认同向心力的维系, 关乎一地政府能否主导信息流通的空间, 同时也关乎国家的对外形象塑造或国力展现, 能否利用信息流通的优势。国家在国际传播所采取的政策或作为, 因此交杂于信息「流入」 (inflows) 与「流出」 (outflows) 的多重考虑中 (Price, 2002)。

一方面, 国族国家的政府相较于过往, 更加处心积虑地维护疆域内的信息空间主导权, 抵御强势的外来文化影响。包括保障本地产业环境、支持有助于彰显国族认同的传统或新创文化、维护国家安全的信息环境, 以及强化公民权利的认知等, 皆成为政府管制境外流入的信息的合理声称。政府的「守势」, 包括运用科技的阻挡手段 (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以电波干扰阻挡短波收音机讯号、马来西亚以限制直播卫星接受碟的尺寸意图控制卫星讯号下炼的范围), 进口管制 (如法、韩两国在电影进口上采取配额制以及以赋税补贴国内的制作产业), 查缉境外内容的非法流通渠道, 乃至动用非正式的外交手段或商业谈判手段, 阻绝特定境外内容的引进 (如新闻集团于 1990 年代欲进入中国市场, 交换条件是其卫星服务不得提供中国认为对其不友善的 BBC 频道, 以及土耳其以支持恐怖组织为理由, 要求英国不核发执照给 MED TV), 上述种种手段, 皆是以维护国家的信息主权为理由, 阻挡外来信息的流入 (Price, 2002, pp. 18-23)。

另一方面, 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开始反守为攻, 透过改变或影响疆界以外的信息空间, 扩张国族或文化认同可及的范围。所谓自主的信息空间, 不再像过往广播、电影或电视等大众传播时期的媒介, 仅是包含在国土疆界范围的「容器」中。透过更灵活的经济与文化外交, 使得一国的影、音或出版品得以打开国外的通路, 手段日趋多元, 包括: 利用资金行走全球的特性, 以合资、并购等方式进入他国市场; 以灵活的文化外交手段, 在他国设立文化机构, 让标榜国族文化的内容流向全球; 搭上全球资本的势力, 使得一国的产制能力与全球的产业炼接轨。这些手段皆使得国族文化的目的, 不只对内

形塑认同，更增添了对外展演的意涵。文化象征的建构，从此掺杂了复杂的国际发行与宣传考虑 (Croft, 2000)。包括近年来强势的韩流，以及中国 CCTV 的大外宣，皆可看到政府在信息流出上，或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所谓「软实力」一说，强调信息的输出作为扩张一国外交或市场影响力，打的算盘便是当一国的可以成功撩动其他国家对其的仰慕或想望，这个国家便有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影响这些国家内政的优先级 (Nye & Owens, 1996)。

如果将上述这些信息流出与流入现象，笼统解释为全球化过程对于民族国家信息空间的「穿透」，或许不算言过其实，然而，相较于 1980 年代以前，这些透过经济或科技条件所赋予的机会或限制所突显的差异在于，今天已难用「国内媒体」(domestic media) 这个清楚的指涉，来对应构成「国家信息主权」的概念 (Price, 2002, p. 19)。如果文化帝国主义原初的论述，在于「抗拒」外来势力的影响，维系一国国内信息环境的自主，当前信息流通的现象、乱象交杂，治丝益棼，在制度上全然抗拒谈何容易！在施行民主体制的社会里，国家政府面对信息边界的模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葛兰西霸权论的实践者，即文化条件的创造，需结合文化的实践与政治的运作，串起不同群体利益或社会需求，以在特定的时局里成为代表「民族全民」(national popular) 的意志或文化的国家。因此，信息主权的伸张与让渡，时不时在国内媒体范围之下或之上合纵连横，商业势力、政治势力或民间势力，皆可能成为霸权创造或维系过程可资运用的筹码。

而另一方面，所谓信息自由流通所独尊的利伯维尔场价值，早已随着全球资本企业的攻城略地而信用破产。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而言，开放国内的影视文化市场，有时是牺牲文化以换得其他产业区块的产品的输出，有时可能是在主权不及的状况下的无奈（例如国际串流平台由境外提供数据库下载影音内容，但实则行境内放送之实）。利伯维尔场与国家自主的价值分立，已随着现状的不断改变所造成的信息主权的含糊，而难再清楚划分。哥伦比亚传播学者荷苏斯·马丁巴贝罗 (Jesus Martin-Barbero, 1987) 审视拉丁美洲在引进电视后，电视为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便强调国家并非一个理性的决策单位，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场域，文化认同在这个场域里恒常处于协商的状态。

李金銓呼吁，发展中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该自主设计适合自己的传播方向，并且掌握自己的媒体未来的传播政策，四十多年后，这个主张一定程度上兑现在少数信息流出或流入主导权的「上升」国家上。全球化过程对地方的穿透，对多数国家是危机，却也可能为极少数国家带来机会，促使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弹性、使用的手段更多元。这相当程度地反驳了一些全球化将使国家的角色更式微，或地理界线从此无法限制网络世界来往自如的个体使用者的主张（Negroponte, 1996; Ohmae, 1995）。例如中国由建立网络防火墙，到近期互联网力推主导 5G 技术标准，在在希望透过软、硬件设施的布建，打造一个自主但封闭的信息空间；相较而言，南韩则是在攻、守兼具的影视音文化政策下，意图打入向来称霸的英语世界全球流行文化场域。然而不管展现科技锐实力或文化软实力，这些窜起的上升国度毕竟极为少数。整体而言，不论采攻势或守势，是步步高升、原地踱步或节节败退，国家为了确保信息空间的自主所下的决策，皆无法不去考虑来自境外的枝节影响，并与之互动。国与国之间，已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多所交迭。而强国与弱国的阵营，也可能因为不同的经济、政治乃至科技条件而重组。

然而即便国家的政策手段可攻可守，显然早已不再是大众传播媒介时期的美国一国独大，迫使全世界国家皆采守势的景况，这并不意味「帝国」作为一种突显世界体系里的权力失衡的认知论不再具有解释力。反倒是传播科技形式的进展，使得近期信息流通的世界生态，颇为诡谲地像是历史处境的倒带回放：

因特网所驱动的数据经济，在表象上看似信息的流通更自由，也更彰显国家采取的管制角色必须更趋灵活。当行动装置如手机、平板计算机等联机装置使得用户透过上网产生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搜集、传输、储存与处理，落入全球少数以提供无偿使用服务而窜起的平台业者的手里。一方面，美式企业如 Google、苹果、亚马逊、脸书、微软仍是主导全球资通讯产业的「守门」业者，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华为、腾讯、百度等业者则窜起，成为挑战势力。

基于当前全球数据经济的维系，倚靠的是这些守门业者透过服务所榨取的用户数据，当美、中两强成为这些全球数据企业的宗主国，这两个国度也

占据了绝佳的位置，得以取用、开发数据价值，乃至成为网络各种增值服务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这种数据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与过往的资本运作型态最大的差异，在于数据自由流通所衍生的外溢效应：除了掌握谁是使用者、消费者，开发新的商品或服务，也在于透过通讯基础架构或基础设施的设置或营运，将各个不同的国度整合入数据经济的价值炼。因此，流通涉及的权力意涵，不再仅限于文化认同或社会意义的塑造，也包括掌握网络科技的通路，榨取日常生活的使用者样态，并量化为数据，以进行各种运用程序的开发。这些资料既可打包贩卖，获取利润，也可作为全社会监控的利器。

这也使得表象上看似弹性的信息流通上，究其实并无法自外于平台经济所打造的资料生态系。当全球的网络消费者与数据生产散居不同国度，但榨取与处理数据的权力，仅由两大掌握信息锐实力的国家垄断，基于资本化动因所转化的国际系统的信息失衡，正在上演因为传播技术与市场化过程所造成的「依附」现象。对此，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便警示，当全球发展中国家沦为资料经济的「原料」（数据）提供者，因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形成了国际关系里新的中心与边陲模式，且位于中心的仅有美国与中国，其余世界各国皆沦为资料经济的新边陲（UNCTAD, 2019）。

这种科技型态的中心与边陲，使得近期「数字殖民主义」之说浮现（Avila, 2020; Quijano, 2007; Couldry & Mejias, 2018）。跨国科技公司除了提供平台服务，也透过提供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如线缆服务、软硬件设施，或者协助发展教育的云端环境等，介入一个特定国家的资通讯环境。UNCTAD 警告，由于这些总部设于美国与中国的全球的数字平台掌控了通路，发展中国家将更沦为受宰制的地位，因为它们成为用户原始数据的无偿提供者，但同时必须支付运用这些客户数据开发出来的智能装置或程序软件（2019, pp. 76-78）。

即便物换星移，但站在网络冲锋陷阵的浪头上，「数字殖民主义」重现了 1980 年代直播卫星时期的「电子殖民主义」说法，只是这次的输家不仅是南方国家，而是捐输了大量资料的全球数位子民。我们也正面临一个信息流通不变的议题，即「帝国」现象的翻新，即便内涵与过往我们对这个字眼的认知已全然改变。史巴克斯（Sparks, 2022）主张，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不

再只有单一中心，而是若干大小强弱不一的国家相互竞争、冲突。但不变的是，竞争的戏码，仍是强国争夺对弱小、欠发达国家的控制权，其背后既有经济考虑，也涉及地缘战略。今天建立帝国主义理论，应该与这些现实经验契合。帝国的维度，取决于国家的在场，而不是相关文化产品的性质。真正值得探索的，是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中，国家权力和文化权力如何交织为用（2022，页 264-267）。当前网络数据流通所驱动的数字经济里，或许交织为用的，更应加上透过对于通路与基础设施的布建所掌握的科技权力。而这些交织为用的势力，如何在全球的信息流通版图里，影响各个不同的国家或社会，成了亟待更多在地状况的综合分析的历史节点。

陆、结论

在《再商榷》一书的结论章节，李金铨曾经针对国家的传播政策自主，提出以下的看法：

第三世界各国都应力求独立，权衡内在的情况与外在的压力，谋求最有创造性的制宜方案。当务之急是制定明确的传播目标，并依目标做出关键选择。它们要不就满足全球信息流通的现状，要不就不甘区于现状，且寻求解方以弥补缺憾（Lee, 1980, p.183）。¹

在历经四十年后，对照目前世界多数国家面对的信息流通现状，国家面对的似乎已不再能够是二选一的选择题。随着计算机信息与网络平台科技的扩张，以极短的时间造成人类各个层面生活的骤变，今天信息的流入与流出为国家带来的，不再仅是思想或意识上的影响，或者世界观的提升或改造，而是实际生活或工作型态上的转变。信息流通所链接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较 1970 年代时复杂许多。当全球信息流通的现状，恒常处于浮动的状态，满足现况的除了是掌握资本与科技优势的强国，对于其他多数国家谈何容

¹ 引文的翻譯，參考中文版傳播帝國主義，頁 74；因中文版做了一些文義上的調整，所以本段引文的後半部份仍為筆者翻譯自英文版文句。

易!

但浮动变化中仍有不变之处，即便「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独立于第一、二世界的指涉已成为历史名词，但七 0 年代的时空里，第三世界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种种发展的问题与依附的状况，并未从当前的世界里消失。在 1970 年代，当国际传播的学术与政治罕见地产生交集，而有重建传播与信息新秩序的要求时，李金铨便提醒了各国自主制定传播目标、政策的重要性。信息自由流通或者抗拒媒介帝国，不应是传播政策内涵的二择一选项，各国应该衡量内外情势、历史与现况，在国家传播政策上务实地走自己的路。李金铨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诊断，以及以折衷、务实的理论态度，对位于今日的全球的政治经济局势，成了一种具启示的预言。

参考书目

- 王志弘、王淑燕、庄雅仲、许富基、游常山译（1999）。《东方主义》。台北：立绪。（原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李金铨编着（2022）。《「国际传播」国际化》。台北：联经。
-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台北：联经。
- 李金铨（1987）。《传播帝国主义》。台北：久大。
- 柯裕棻（2012）。〈电视事业发展初期的社会条件与消费状况〉。《中华传播学刊》，22: 3-18。
- 程宗明（2002 年 11 月）。〈对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前瞻：四十年的荒原旷野的呼声〉，「台湾电视四十周年回顾与前瞻研讨会」论文。台湾，台北。

- 唐士哲、魏鈞 (2022)。《國際傳播：全球視野與地方策略》(修訂二版)。台北：三民。
- 弗朗茲·法農著；陳瑞祥譯 (2007)。《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
(原文：Fanon, F. [1971].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Editions Du Seuil.)
- 科林·斯帕克斯 (Sparks, C.) (2022/2015)。〈重啟國際傳播「帝國」的維度〉。
收錄於李金銓編著，《「國際傳播」國際化》，頁 245-276。台北：聯經。
- 劉文玲譯 (2014)。《媒介學引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原作：
Debray, R.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aris, FR: PUF.)
- Avila R (2020, September). Against Data Colonialism. In Muldoon, J. and Stronge, W. (eds.), *Platforming Equalit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pp. 47-57). Autonomy Research Ltd, Crookham Village.
-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Carey, J.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ouldry, N., & Mejias, A. U. (2018).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4), 336-349.
- Crofts, S. (2000). Concepts of national cinema. In J. Hill & P. C. Gibson (eds.), *World cinema: Critical approaches* (pp. 385-39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elink, C. J. (199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market and morality. In A. Mohammadi (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p. 92-118). London, UK: Sage.
- Katz, E., & Wedell, G. (1977). *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C.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Sage.
- Martin-Barbero, J. (1987).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London, UK: Sage.
- Nandy, A. (2009).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groponc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UK: Vintage.
- Nye, J. S. & Owens, W. A. (Mar./April, 1996).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72(2), 20-36.
- Ohmae, K.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UK: Free Press.
- Price, M. E. (2002). *Media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S: The MIT Press.
- Quijano, A. (2007).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Cultural Studies* 21(2-3), 168-178.
-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Schiller, H.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est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 Seib, P. (2005). Hegemonic no more: Western media, the rise of Al-Jazeera, and the influence of diverse voi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7(4): 601-615.
- Spivak, G. (1988). *In other word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hussu, D. K. (2016). Contra-flow in global media: An Asian perspective. *Media Asia*, 33(3-4): 123-129.
- Thussu, D. K. (2007). Mapping global media flow and contra-flow. In D. K. Thussu (ed.),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pp. 11-32). London, UK: Routledge.
- UNCTAD (2019).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9.II.D.17. New York and Geneva.
- United Nations (194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On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 Contrapuntal Rereading Chin-Chuan Lee's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Shih-che Tang

In 1980, Chin-Chuan Lee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ation of Television Culture*. In the wake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iberal-pluralist's rhetoric of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Neo-Marxist assertion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Lee proposed a middle way solution, unveiling the fallacies of both perspectives while seeking for a proper synthesis of their benefits. He suggests that the media imperialism thesis be empirically built upon verifiable indicators. And a creative synthesis of policies weighing internal dynamics against external constraints, convention with the status-quo, is key for the Third-World nations to control their own media destin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Lee's discussion of information flow and complexity. By way of contrapuntal reading created by Edward Said, the article reviews Lee's argument, raised forty years ago, against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global information flows. It argues that Lee's initial refusal to "take side" theoretically and his recognition of case complexity has, to a great extent, cast light on the status quo of information dis/orders.

Keywords: Chin-Chuan Lee, communication policy studies, contrapuntal reading,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media imperialism, national sovereignty

*Shih-che Tang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shihjet@gmail.com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文人与侍从： 李金铨的新闻史研究

黄顺星*

本文引用格式

黄顺星 (2022) 。〈文人与侍从：李金铨的新闻史研究〉，《传播、文化与政治》，16:25-52

投稿日期：2022 年 8 月 28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10 月 15 日。

* 作者黄顺星为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舍我研究中心研究员， 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

《摘要》

李金銓近年以文人論政作為詮釋中國新聞史的核心概念，固然精確掌握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時代精神與集體心態，難免過於強調主體行動力並且過度浪漫化民國時期的辦報條件與環境。而李金銓早期以侍從報業體制解釋台灣媒介從威權轉型到民主的過程，則提供從結構層面出發的歷史分析視野。透過李金銓著作的爬網，本文認為對行動者的關注，始終是李金銓的關懷所在。侍從報業體制雖然偏向結構層面的解釋，但李金銓已注意到知識分子在第三世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也成為近期李金銓投注心力於民國文人論政的研究主題。雖然李金銓未提出明確的歷史論斷，但從他對文化物質主義的詮釋中可以發現融合結構與行動二元論的折衷研究取向。

关键词:侍從報業、文人論政、另類媒介、媒介體制、新聞專業

壹、李金铨的历史关怀

2002 年李金铨教授任职香港城市大学后，分别于 2007 与 2009 年，召开两届「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会中所发表的论文，于 2008、2013 年集结出版为：《文人论政：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与《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两本论文集甫一出版，引起华文学界的热烈反应。一方面，所辑论文一反堆积材料、流水账式的主流中国新闻史书写方式（李金铨，2019a，页 566），强调以问题意识主导的社会科学、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探究自由主义对民国报人与报刊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剑指海德堡汉家学们硬将公共领域、全球化等概念，强行套入民国报业的分析及文本解读，忽略民国报业的产业现实与读者的多元面貌（李金铨，2013a，页 25）。

李金铨自谦两场研讨会与主编论文集，仅是搭建平台促使新闻史与史学界相互交流。但在两本论文集中，李金铨亲自执笔或与人合着，都展现其所欲的新闻史研究该当如何的企图。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干、陆铿、刘宾雁为个案〉（李金铨，2013b）一文，即开宗明义地陈述该文的问题意识：

提出记者与时代的命题，其实就是要回答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原动体」(agency) 和「结构」(structure) 之间是如何交涉 (negotiate) 的？就组织内部关系来看，记者是原动体，报馆是结构；就组织外部关系来看，报馆是原动体，权力中心是结构。简单说，国共政权如何制约报馆的运作，而报纸能发挥多大的能动性？报馆如何制约记者的运作，而记者又能有多少作为？反过来说，记者对于报馆的角色和时代的脉络起什么作用？（李金铨，2013b，页 403-404）。

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结构与行动」¹处理的是如何「证成人作为行动

¹ agent/agency，亦可譯為「施為／施為者」，臺灣社會學界多以「行動／行動者」翻譯，故以「行動／行動者」代之。

主体的自主与主愿能动性」(叶启政, 2000, 页 336)。根据 Anthony Giddens (1984, p.25) 的结构化理论: 结构与行动并非彼此独立的二元论, 而是互相影响的二元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社会实践的媒介也是成果, 结构并非外在于个人, 而是作为记忆痕迹而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结构在此意义上是内在于人, 不应将结构等同于限制, 结构固然限制行动者但也使行动者得以行动。

「结构与行动」究竟是独立二分或一体两面, 并非李金铨在意之处, 而是透过新闻人物的个案研究探讨: 「个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够发挥什么专业能动性? 这个能动性的边界伸展到哪里为止? 记者和报馆在历史上又扮演什么角色?」(李金铨, 2013b, 页 405) 正是对个人能动性的鲜明关切, 构成《文人论政》与《报人报国》两本论文集所以卓然独立于众多新闻史论著的基础, 因为:

中国向有「立言」的传统,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 知识人企图通过报刊重新进入政治中心, 想要对政治有所影响, 这便造就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与风气, 论政的主题自然牵涉到民族存亡和救亡图存, 这是他们精神世界最基本的底色(李金铨, 2019b, 页 553)。

救亡图存, 作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以投身政治、社会改造乃至步上革命的原始动机乃至「时代精神」, 殆无疑义。但对个别报人的强调, 不免过度浪漫化个别报人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而这样的新闻史论述也可能沦为 Hanno Hardt (1995) 所批判的少数权势者的权力传记。但若不以近期李金铨对民国报业的研究为限, 将时间往前推进, 早年李金铨对台湾媒介环境的批判性研究, 则提供另一种截然不同, 从结构层面出发的历史分析视野。或许由于兴趣转移或历史档案文献取得困难, 李金铨始终未能将两种分析途径予以整合, 并发展出完整的新闻史论述。本文即以此出发, 尝试将侍从报业与文人论政整合为诠释台湾与中国新闻史的分析架构。首先论述李金铨对台湾报业侍从体制的分析, 其次梳理李金铨对文人论政传统的理解, 最后说明究竟李金铨如何看待这两种分别从结构与行动出发的分析视角, 以及李金铨可

能的诠释。

贰、发展传播与侍从报业

1993年首先以英语发表 (Lee, 1993)，之后收录于《超越西方霸权》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湾报业与民主变革的崎岖故事〉，是「以历史眼光来诠释台湾争取新闻自由的轨迹，特别关注政论杂志以小制大。逐渐对抗、颠覆国家严控的大媒介（报纸和电视台），突围其所建立的言论罗网。」（李金铨，2004a，页 135）同书所收录的另一篇论文：〈国家控制，科技颠覆，文化自主：台湾有线电视政治〉，则论述台湾解除报禁后，党国体制「继续垄断广电媒介，不肯开放给公民社会公平竞争，因此又衍生了另一场节外生枝的有线电视斗争。」（李金铨，2004b，页 185）若将这两篇论文予以串连，所分析的是自 197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台湾媒介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的转型过程：

台湾从威权统治到形式民主的崎岖路上，威权政体前后三次遭遇媒介游击战的反叛：首先是党外政论杂志（1976-1986），其后是统称为第四台的有线频道（1990-1993），以及后来的地下无线电台（1992-1995）。主流媒介与党国威权政体建立侍从结构，把意理霸权自然化，使严密的社会控制转为看似天经地义的共识。而游击媒介处于社会边缘，资源贫乏，成本低，规模小，科技条件粗糙，却和党国审查制度及主流媒介缠斗，挑战其意理霸权（李金铨，2004b，页 200-201）。

一、侍从报业体制

根据 Eisenstadt & Roniger（1984, p.48-49）的界定，所谓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或侍从主义（clientelism）具有下列特征：1.恩庇侍从关系通常是特殊主义与扩散性的；2.保护主与侍从的互动是基于各类资源

交换，一方提供工具、经济与政治资源，另一方提供互惠、团结与忠诚；3. 资源交换是包裹交易（package-deal），无法分割交换；4. 恩庇侍从关系建立在无条件的付出与长时间的信任；5. 恩庇侍从关系具有强烈的责任、义务；6. 恩庇侍从关系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与契约而是根据双方的非正式理解，且通常与官方法律对立；7. 原则上恩庇侍从关系是自愿性的；8. 恩庇侍从关系是由个人之间或个人网络间的垂直链接所构成，通常导致对水平链接的团体组织或团结造成伤害；9. 保护主与侍从间的权力存在强烈的不平等与差异。

就台湾而言，以侍从主义作为分析架构，主要起自吴乃德（Wu, 1987）的贡献。吴乃德认为国民党政权来台后，一方面希望稳定政权，抑制反对运动；另一方面又企图以地方选举，取得统治正当性。于是采用「中央—地方分隔的双重菁英结构」，分别以「官僚侍从主义」与「选举侍从主义」，在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威性的资源分配而稳定统治（王金寿、翁立紘，2019）。此后，侍从主义成为解释台湾地方政治、派系变化的主导分析架构。尽管王金寿指出，国民党的侍从主义能够顺利运作是基于：台湾不存在反对党、党内没有派系竞争、可控制的司法、全面渗透的情治机关与受限制的媒体自由（王金寿、翁立紘，2019，页 129）。但在李金铨于 1993 年发表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前，台湾新闻传播学界从未有学者以侍从主义的角度分析台湾媒介变迁。之后，林丽云（2000）大量运用国民党党史会、文工会的档案文献，以历史途径考掘戒严威权统治时期台湾报业体制的挑战与转型后，侍从主义成为现今理解台湾媒介体制的重要坐标。

Hallin & Papathanassopoulos (2002, p.184) 认为，以侍从主义分析媒介体制的长处在于得以超越自由主义与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二分法。因为对自由主义而言，媒介体制的民主化就是如何排除国家干预的问题；对批判政治经济学来说，主要具焦于私人资本对媒介机构的影响。但政治与经济体制绝非分离且独立发展，侍从主义对资源权力持有者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关注，适足以填补空缺。因此，在 Hallin & Maccini (2004) 于《比较媒介体制》区分的三种媒介体制中，就强调因各国政治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差异，使得媒介体制将因倾向于法理型权威或侍从主义（传统型权威）而有不同的发展。在前者，

公共媒介机构相对独立于政府、政党与特定政治人物的影响，也由于对正式程序、信息公开及公众近用的要求，成为新闻专业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相对地，在侍从主义主导的国家中，无论公私媒介都被高度的工具化，例如公共媒介的人事任命主要根据政治忠诚而非专业能力；私营媒介的经营者往往具有政治连结，不但藉此获得政府契约或广电执照，媒介更成为经营者与政治社会菁英谈判交易，乃至介入政治、获取权力的工具。同时，由于侍从主义的权力交换、协商是由上而下的垂直交换，容易破坏社会既有的水平连结，新闻专业的发展程度也相对低落。

约略在 Hallin 做上述主张的同时，李金铨在〈媒介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比较两种媒介政治经济学取径的异同时，就指出必须关注国家的角色：

激进派学者始终未曾严肃分析过「专制政体」……。我敢断言，开发滞后的国家由专制政权全面支配政经和文化资源，不仅掌握关键的新闻喉舌，建立整套新闻检查和政治高压的制度，并收编私有媒介到侍从关系去（李金铨，2004c，页 29）。

李金铨认为同样处在右翼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统治下的台湾与南韩，都在 1980 年代前后爆发血腥镇压群众的重大政治事件，两国也因而开启前仆后继的民主化运动，但激进派学者对此一现象与民主转型却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因为激进派学者对「国家角色的解释往往失之片面，而且顶多一笔带过」（李金铨，2004c，页 28）。李金铨（2004b）认为戒严时期党国体制，与其他发展迟滞的第三世界国家雷同，是处在「官僚威权政体」（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的统治下，以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的方式协调经济发展，无法以私人与跨国资本对经济政策的介入与控制视之。反映在媒介政策上就是：

使用收编政策，既镇压又笼络。台湾和南韩的新闻界是辅助政府和依赖政府的言论工具，而非严格意义的喉舌；他们在政治上纵然服

从政府，在非政治领域却保留活动的空间（李金铨，2004a，页 138）。

1987 年 4 月，在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前夕，李金铨于《文星》杂志为文呼吁，即便开放报禁意味报业市场得以自由竞争，但若无公平的竞争环境，自由竞争只怕沦为报团整并垄断市场的借口。文中首先批评因为报禁政策，不但阻碍有意办报者无法办报，更因报纸登记证奇货可居而洛阳纸贵，甚至一卖再卖、不断转手的怪异现象。导致在报禁开放前：「两大报系寡头垄断了七成的市场，老板俱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取得权力核心圈的发言权。孰因孰果，耐人寻味。」（李金铨，1987a，页 153）。到了 1993 年的 *Sparking a fire* 中，将这种「耐人寻味」的报业体制，视为侍从关系的展现：

两家民营报纸逐步收购报纸登记证，渐渐建立报系，掌握了台湾报纸发行总量和广告收入的 2/3。这种寡头垄断的结构是在 1970 年代形成的，报纸与国家建立了政治学家所说的侍从关系，政府给两个报系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两报系发行人均被吸纳纳入国民党中央常会（李金铨，2004a，页 138）。

于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国家控制，科技颠覆，文化自主〉这两篇向西方学界介绍台湾如何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论文中，李金铨就以侍从主义作为台湾报业体制的结构，说明戒严时期台湾的媒介体制：一方面，党国体制挹注大量资金补助党公营媒体，形成庞大的官方宣传机制；另一方面以由上而下的垂直利益分配与特许，使两间民营报社逐步整并扩大形成报团。透过这样的方式，党国体制不但收编媒介舆论机构，更形成庞大的宣传教化网络，灌输党国意识形态，稳固统治。但这看似稳固的侍从报业体制，何以产生变化？

二、大 / 小媒介的辩证

在《大众传播理论》（李金铨，1982，页 102）论述传播科技与现代化

发展时，李金铨提醒读者注意，1950、60年代如 Schramm、Lerner 等人将现代传播技术，视为第三世界朝现代化发展的关键，但这些以美国为主的现代化理论学者，所期盼引进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财政上难以负担且技术复杂的「大媒介」。相反地，价廉物美的「小媒介」，则能因地、因时制宜，反而更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灵活使用。在创新传布的初期阶段，大众传播媒介的确能够扩大认知效果，但越到后期人际传播反而更具说服力。第三世界国家资源有限，传统人际关系根深蒂固，应当灵活运用，新 / 旧、大 / 小媒介，不应有所偏废。

但在之后李金铨论述大 / 小媒介时，除了考虑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外，更纳入新闻媒介的公信力问题。在《新闻的媒介，媒介的新闻》这本时论集中，李金铨（1987b，页 XI）认为：「新闻媒介的第一性到底得反映权力结构的基本利益与观点，但它的第二性又必须在体制内发挥自主性与制衡的力量。」²所谓第一性指的是媒介始终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环，第二性则是媒介以新闻专业发挥相对自主的力量而与国家相抗衡。媒介的这两种特性，反映在社会中所存在性质不一的大 / 小媒介：

主流媒介假如反映社会冲突，主要是因为权力结构内部爆发斗争；除非主流媒介受到另类媒介严重的挑战，主流媒介通常不会主动响应边缘化的声音……。被压迫的或边缘化的声音无法攀上主流媒介发言，只好退而以小媒介、地下媒介和另类媒介来替代。扩而言之，大媒介通常代表主流的意见，与既有秩序结合；小媒介支持抗议团体，在社会边缘促进变革（李金铨，2004b，页 187）。

李金铨所以做出不同于主流现代化理论的主张，乃是接触 Herbert I.

² 李金铨（1987c，页 10）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大致已挣脱政治势力的直接控制，媒介内容制作的過程在第一性雖仍以權力中心馬首是瞻，在第二性則形成多元社會的一般制衡力量；西方媒介主要的威脅來自資本的集中壟斷。若以 Bourdieu（林志明譯，2002）的場域（field）概念理解，作為次場域的新聞場域，始終受制於外在的權力場域；但新聞場域又以自律與他律的程度，佔據場域內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Schiller 著作后的反思。Schiller 认为「媒介不但不能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而且根本就是西方（美国）帝国主义的延伸。」（李金铨，1987d，页 139）。被视为有助培养移情、同理现代化人格的传播新科技，「是美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合伙用来控制第三世界的手段，传播科技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利益的表征。」（李金铨，1982，页 94-95）无论现代化理论或新左派如何看待媒介在传播与发展中的功能与角色，李金铨（1987d）认为两派理论都有所不足。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把国家当作自足的分析单位，忽略国际政治复杂的权力结构；新左派以国际资本主义为分析单位，对内着重阶级分析，对外延伸为「中心 / 边陲」的依赖关系，孰轻孰重，争论不休。因此在面对第三世界是否应接纳传播新科技，如何避免为传播帝国主义所宰制时，李金铨采取的是多元的文化解释。

Schiller 主张，第三世界若要摆脱传播 / 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唯有全面自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撤出。但李金铨（2019d，页 123）认为，摆脱文化帝国主义不意味着文化独立，关键是如何理解、梳理帝国主义的「文化后果」：媒介内容、媒介制度、科技转移，以及最广义的「生活方式」。文化后果具有多重结构，涵盖各种关系及其互动，必须不断接受斗争和挑战，这些要素如何有机的安排与分析，是必须详细探讨的。

在〈电视文化何处去？处在大陆政治与海洋经济的夹缝中〉（李金铨，1987e），即以台湾的电视文化为例，说明尽管在经济上台湾是高度对外依赖，但在电视节目的产制上却有着极高的自制率，避免了普遍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依赖困境。究其因在于党国体制存留的大中国意识形态，因而对「文化侵略」的戒慎恐惧。除了透过《广播电视法》限制外国节目上限为 30%，更不断减少母语方言节目的播出时间，形成内在殖民。另一方面在台湾官资商营的电视体制下，以商业利润为导向的三家无线电视台，除了以最低标准的文化品味，粗制滥造大量庸俗化节目迎合市场外，更在新闻报导的立场上与由政府控制的官股立场一致：

电视已成为统治意理机器，也成为政治运动的众矢之的。上自主权结构的垄断，下至新闻政策的操纵，电视不能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呈

现旺盛的民间社会，总是以有色眼镜看台湾意识。以简单的意识教条丑化扭曲民间社会素朴的意愿，只能使两结³矛盾愈陷愈深，两极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整个新闻媒介倚重倚轻，断章取义，相信片面之词，导致公信的低落（李金铨，1987e，页 206）。

1986 年年底，被列为黑名单，不许入境的许信良闯关返台，爆发警民激烈冲突的机场事件。三家无线电视台及党公营报社，皆以民众攻击警察的片面陈述与画面报导事件。所幸《自立晚报》的记者及利用轻便的 ENG、大量纪录解严前台湾社会运动的「绿色小组」在场，呈现与主流媒介完全不同的事件始末。《自立晚报》的版面、「绿色小组」的画面，迅速在党外候选人的竞选总部间公开播放流传。如同 1980 年的选举，选民以选票还给美丽岛受刑人公道；1986 年的选举，选民同样以选票给予刚创党的民进党立足之地。这样的结果，对处在侍从报业体制下的新闻界来说，讶异的不仅是《自立晚报》与绿色小组《机场事件》录像带的畅销，还有读者对主流报业公信力的不信任与挑战。

三、游击媒介的兴衰

由于党国体制对大媒介的迷信，加上官僚威权国家「容许媒介在非政治领域争取较大的自主空间，但对任何威胁政权的力量必无情镇压。」（李金铨，2004b，页 186）虽然台湾于 1988 年开放报纸登记，但广电资源依旧由党国体制牢牢掌握，不肯释出。但早在 1970 年代起，即有部分业者在收讯不佳地区，利用既有小区共同天线，结合录放机、同轴电缆等简单技术，经营起实为有线电视的「第四台」生意时，当局采取的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消极取缔工作。

但至 1980 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要求美国著作物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并在 1992 年扬言祭出「301 条款」制裁侵权行为后，台湾行政当局

³ 此處指的是「中國結」與「臺灣結」，即統獨爭論。

方启动《著作权法》修法及《有线电视法》立法工作。此举严重影响既有第四台业者的生计，部分与民进党理念契合的业者，与民进党政治人物结合，以「民主台」的名义，对抗当时仍被党国体制所垄断的三家无线电视台（冯建三，1995）。

另一方面，在电视新闻报导上，反对党不但无法获得公平客观的报导，甚至连购买时段播放竞选广告也不可。先是 1989 年尤清于台北县长选举时，以偷渡走私而得的发射机播送电视讯号；后有知名台语广播主持人吴乐天于 1992 年 1 月对华视晚间新闻，进行讯号遮蔽干扰的盖台行动（翁秀琪，1993）。1992 年张俊宏于立法委员选举期间，架设「全民广播电台」公开播送广播讯号后，此后数年间地下电台成为反对党宣传理念、政治动员的利器。

论述台湾这三波媒介游击战的起落时，李金铨一方面透过媒介技术，解释大媒介如何藉侍从主义垄断媒介市场，进而维持意识形态霸权；另一方面指出当局轻忽小媒介相对简易的技术及低廉的成本，使小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得以如火燎原，撼动政权。例如冯建三（1995，页 154）即指出地下电台惊人的政治动员力量，在于「解决了印刷媒体（杂志）的发行问题，亦无须听众额外花费就能够接收其广播内容。」黄顺星（2022）以近期开放的政治档案说明，尽管查禁比例极高，但当年党外杂志所采用的备胎登记、异地印刷等策略，不但技术上可行且机动性高，在成本上也足堪因应。

除了媒介技术上的便利与弹性，使游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得以躲避新闻审查外。李金铨更将阅听人对信息的渴求及新闻公信力的上下，视为游击媒介所以冲击主流媒介，乃至引发后续政治变革的原因：

媒介为社会公信之所寄，如果它蒙蔽真理的追求，则社会沟通必须找新的出路，所以必然会衍生一些不正常的小道消息（耳语、传单、黑函）。小道消息灵活机动，就地取材，虽然质地粗糙，在社会变局中却往往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何梅尼当年取得政权，系以传单和录音带逼使伊朗废王手里强大的传播机器全面瘫痪。总之，媒介公信不伸张，社会是非无由建立，小道消息也会跟着

猖獗泛滥（李金铨，1987c，页 10-11）。

「大媒介通常代表主流的意见，与既有秩序结合；小媒介挑战主流媒介所界定的支配性现实，整个言论的光谱得以扩张，最后连主流媒介都得跟着扩大言论范围。」（李金铨，2004b，页 187）但「讽刺的是激进媒介可能是民主化的第一个牺牲者：民主化解开了主流声音的禁忌，天下没有独裁政权要抗争，人们对政党政治转趋淡漠，甚至觉得民主力量阻碍他们世俗的追求，激进媒介完成历史使命遂退出舞台。」（2004d，页 288）。

在李金铨写作时，受限于档案开放程度及白恐阴影仍未远离，仅能以《自由中国》、《公论报》、《文星》、《大学》等游击媒介的多舛命运，说明言论内容一旦违逆保护主，甚至结合、组织群众后即遭封闭、主事者身陷囹圄。但根据近年的研究可以看出，党国体制所新闻专业人士的镇压，实际上遍及党营报社，且不限于宣扬反对运动的游击媒介。

例如在杨秀菁（2016）的研究中就指出，战后初期由台湾省政府掌握的第一大报：《台湾新生报》，是如何透过历次的人事改组，成为服膺党中央的宣传机关，而丧失原先在报业市场中的领先地位。陈百龄（2019）则是爬网已开放的政治档案后发现，在 1949~1972 年间有 16 位《台湾新生报》的员工，被以匪谍罪嫌重刑处置。而且，言论获罪者不限于基层员工，1970 年代的李荊荪，被捕时是《大华晚报》董事长，早年曾任《中央日报》总编辑、中广副总经理的高层人士。显然党营报社及其成员，不因献出忠诚而免于监控考核，甚至成为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的对象。

参、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

李金铨对「大 / 小媒介」的关注，出自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可能与他出身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背景相关，亦即必须思考台湾如何在寻求政治、经济发展之际，又不落入文化殖民或文化保守主义的窘境。李金铨（1982，页 297-299）指出第三世界追寻国家发展时，势必面对几种吊诡：（一）如何在

稳定与动力、均衡与变迁、保护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允执厥中；（二）专制性控制媒介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如何获得协调；（三）知识分子如何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媒人，并从世界文化撷取精华，丰富本国文化？如何充任文化先锋而不堕落为独裁政权的御用帮凶；（四）第三世界能够抗拒现代传播科技多久？

学者论述现代化发展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摆脱依赖困境时，多从国际政经局势着手，少有论者将知识分子的角色纳入考虑，甚至将知识分子视为中介「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文化的重要关键。对人、行动者的关注，在《大众传播理论》中特辟两章专论「守门人」的角色即可见端倪。书中引入「中立者」与「鼓吹者」两种新闻专业意识形态时，更将「鼓吹者」的新闻专业意识形态比附为中国新闻记者的实践：

中国人认为记者的行业「为民喉舌、为民耳目」，精神上与这种意理颇为接近。在专制时代，新闻记者希望站在老百姓这边，反抗帝制的剥削与侵袭。我国在文人办报时期，有些知识分子在反抗军阀胡作非为，其风骨为后世写下了光辉的史页（李金铨，1982，页46）。

一、文人论政的特征

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通常认为起自1874年王韬于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之后由梁启超、革命党人的报刊继承。民国成立后，以胡适为核心所创办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及1941年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赠最佳报纸的《大公报》为文人论政的第二次高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第三势力人士如：徐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观察》杂志，呼吁国共停止内战，鼓吹宪政民主法治则为第三次高峰。文人论政的传统，在1949年后于中国灰飞烟灭，虽有雷震、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中国》于台湾隔海延续，但至1960年也告中断（黄顺星，2009）。

驱动文人论政、文人办报的关键，是中国近代以来与西方世界接触后的回应：「百余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

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李金铨，2008a，页 1）「莫不希望建立现代的『道统』，促进和监督权力中心的『政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李金铨，2008a，页 27）。将救亡图存视为文人论政的核心，也存在于其他学者的论述，例如王洪钧（1998：48）认为：「大体是指着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家战乱频仍，忧患迭生之际，以独立之思考，超然的地位，大公的精神，创办报刊，造成舆论，以匡政治，而济民穷之谓。」赖光临（1998：234）也持相近观点：「所谓士人，是指具博学宏识的造诣，抱匡时济世的襟怀的知识分子。由这批士人所办之报，是为士人报业。」为何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有如此强烈经世救国的企图？李金铨认为（2004e，页 63-64）：

儒家把知识分子理想化，认为他们应该秉持良心，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自然而然利用报纸鼓吹改革和现代化……。文人论政充满了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焦灼，强调国家意识形态，揉合西方自由主义，谋求救亡图存之道。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文人论政莫不以赶上欧美为主旋律。

分析近代中国新闻媒介的演变时，李金铨（2004e）将文人论政视为「儒家自由主义模式」，而与「毛泽东模式」及「共产资本主义模式」两种模式区隔。黄宗智（Huang, 1972）将文人论政的代表者：梁启超，视为「儒家自由主义者」，李金铨沿袭这样的立论，并比较受专业主义影响下的西方新闻实践间的异同。就言论自主性而言，西方专业主义相信经济独立才是摆脱党派势力影响的专业自主基础；文人办报则相信言论的独立来自知识分子的良心。就角色认定而言，西方专业主义以专业人士自许并与读者受众平等；文人办报，则自视为启蒙大众的文化菁英，以指导影响舆论为期许。虽然梁启超深谙英美报纸的影响力，相信报纸启迪民智的潜能，但游历欧美后对西方民主深感失望，转而提倡开明专制。真正贯彻自由主义，并将文人论政模式实践为民国报业典范的是张季鸾主持下的《大公报》。

《大公报》获颁密苏里大学「最佳外国报纸」时，张季鸾（1979，页

582-583) 在〈本报同仁的声明〉一文中, 指出中国报业的特色正在文人论政:

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 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 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 但也可以说是特长……。而我们同仁都是职业报人, 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 并且不求名。我们以为不求权、不求财, 是士人常行, 容易办, 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因为办报都希望人爱读, 读者越多越喜欢, 名声越大越高兴, 而危机也就在这里。因为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采, 有时要犯严重错误, 甚至贻祸国家。

李金铨 (2004e, 页 67-69) 认为《大公报》, 具有四个特征: 1. 《大公报》强调「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 自诩为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工具; 2. 《大公报》的新闻理念貌似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但其专业准则系立基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对市场的作用多持疑虑; 3. 《大公报》比过去乃至同时代的报纸同业更重视新闻报导; 4. 《大公报》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 展现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

从张季鸾的声明及李金铨的归纳可以看出, 《大公报》或儒家自由主义的新闻模式, 是由一群怀抱传统士人经世治国的知识分子, 经营着必须仰赖大众消费认可的现代新闻事业。虽然以近似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 维系日常新闻工作, 但究其根本仍是基于儒家重义轻利、公而忘私的教条。不但以菁英读者为主要受众, 也连带否定市场自由经济机制所可能带来以读者大众为基础的新闻出版自由, 也忽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背后的基本预设。

二、文人论政的根基

李金铨 (2019c) 以美国为例说明新闻专业兴起的脉络, 首先是市场经济勃兴、中产阶级抬头等因素, 促成事实与意见分离的客观报导, 其次

是美国进步运动的遗绪。美国媒介专业意识形态背后蕴藏一组恒久价值，如种族中心主义、利他性民主、负责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等，都是进步运动的产物。倘若社会缺乏基本共识，恒久价值不断受到挑战，新闻专业也将无从落实。正如 Jean K. Chalaby (1996) 的观察，当下主流的新闻概念与论述，是 19 世纪中后期在英美两地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关于新闻为何，与何谓新闻专业的论述。新闻才成为显著不同的文本，并发展出独有的新闻论述、规范与价值。目前习以为常、以事实为导向的现代新闻于此时现身，也才逐渐与文学和政治场域产生区隔。

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以及交通运输与传播技术的进步普及，使报业成为大量生产的文化产物。为求利润极大化，现代新闻专业所标榜的客观中立准则，才逐渐落实而奉为圭臬，新闻记者也才成为西方从事新闻事业者的身份认同。Jams W. Carey (1997) 更指出，现代社会出现在讯息来源与阅听人间，专责传递的专业传播者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但记者与公关营销人员的差别在于记者必须独立、不偏颇地在讯息来源与阅听受众间运作，这种专业传播者的独立性也就体现为新闻业之于社会的公共性，并且以新闻专业意识形态确保。

清末中国自西方所引进的报纸、新闻事业，对中国来说是纯然的新事物，固然有传递讯息的功能，但普及西学新知才是报人心之所系。而且西方新闻业初期的新闻记者多出自社会底层，中国却不然。许纪霖 (2008, 页 7) 观察到：「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其职业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李金铨也不将「报人」局限在供职于报纸、媒介机构的个人，而是泛指从事报业相关的人士：

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士、学者、报人往往是角色交叉混杂，文士、学者在报刊论政或兼职，报人在大学教书，都非常普遍，不像现在西方专业化报刊的角色那样泾渭分明……。直到《申报》中期、《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虽然开始了报人职业化的势头，加强新闻采访面，但言论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阶，报人首先追求的还是言论「一言

九鼎」，主笔地位始终高于记者（李金铨，2013a，页 1-2）。

主笔高于记者，评论重于新闻的状况，也曾出现在英美早期重视党派言论而非新闻编采的党派报时期。无论是英国的基进报刊或美国的党派报，新闻从业人员的身分认同是政论家（publicist）而非记者（journalist），这些人从不标榜客观公正，更在意说服大众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Schudson, 2003）。但当英美报业经历便士报革命后，广告成为报纸主要收入来源，报纸即以平民大众为主要受众。为争取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广告，在新闻写作上以两面并陈、客观中立的报导方式避免显著的政治立场。而且西方新闻事业的新闻评论者，不介入所评论的人事物中，也不期待当权者是否采纳，出言批评纯以理性批判论述于公共领域中发挥监督功能。

李金铨（1982）将新闻记者角色类型中的鼓吹者，模拟为中国新闻记者的实践。鼓吹者的专业意识型态，希望记者积极参与实际政治，鼓吹特定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不以纯粹做个旁观者而满足。相对地，中立者的角色重视专业技术，强调事实与意见分离的客观报导，记者的职责在于反映现实，做冷眼旁观的纪录者。英美报业在客观报导的兴起与制度化后，使作为专业传播者的记者，更倾向于中立者的立场。这与为帝王师、为国士的文人论政的期许，完全不同。

就文人论政的产业化程度而言，民初报人成舍我（1973，页 2）回忆 1924 年创办报纸时的报业状况：「文人办报时期，既然没有大资本，人事方面自然也极其精简，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工作，以《世界晚报》来说，总共就只有三个人。」声誉正隆的《大公报》当然不可能如此精简人事，但其所遍布的新闻网仍不足以覆盖广大的中国。类似地，林语堂讽刺上海最老的《申报》和销路最好的《新闻报》，一个编得很烂，一个根本没编。陈荣袞发表于《知新报》上的〈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批评当时的报纸「不刻图像、不加句读，行数太长而不分数格，门类太简而不多标题。」陈荣袞所提虽然都是枝微末节的问题，但都造成作者与读者沟通的障碍。「文人办报也许能写出一流的文字，却疏于编辑学这门学问。编辑学看似形而下，实际上却是将报纸的主体由作者转移到读者之关键环节。」（余杰，2009，页 417）

从新闻事业内部的发展来看，无论就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与专业实践理念，或者从产业化、专业化的程度来看，民国时期的文人论政远远落后于西方报业。而从影响新闻事业的外部因素来看，儒家自由主义者「普遍有国族倾向，深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致把自由民主当成救国图存、强兵富国的工具，而非终极价值。」（李金铨，2008a，页 10）因此当中国面临内战或外敌侵略时，知识分子纷纷抛弃自由民主的信念支持专制独裁，更甚者投入新闻检查工作，更使需要充分新闻自由的新闻专业无立足之地。

中国自由主义何以早夭殒落，李金铨（2004e，页 72-73）认为：1.中国从未经历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中产阶级不够厚实，民主政治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2.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单势薄，缺乏组织，如乌合之众；3.徒有抽象理念而无具体的主张与运动策略，政治要求与平民大众脱节；4.文人诤谏传统缺乏法律制度保障；5.中国文人缺乏西方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始终期待成为国士或为当权者垂青。由此观之，文人论政在中国所以灰飞烟灭，固然与外在政权递嬗与政治压迫有关，但内在问题仍在于儒家自由主义的新闻模式，无法顺利接轨英美的新闻专业主义。

三、专制威权政体下的文人

1949 年后的中国新闻界，在毛泽东党性高于一切的新闻政策下，滞留中国的报人，不是背弃新闻专业理念，就是徒留遗憾的离世。流亡来台的雷震，原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终因不满蒋介石以反共复国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而与之决裂，但也付出《自由中国》停刊、系狱十年的下场。极权政权与威权政权终究有别，前者企图掌控社会生活所有层面，后者严控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事物，市民生活领域只要不威胁统治基础即放任发展。但这些非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事项，也绝非完全开放，而是以原始的侍从主义从事资源交换与支持。

对待从主义的关注，主要来自人类学与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对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去殖民化过程中，如何打破传统权威的研究兴趣。侍从主义被视为分配社会资源的特殊方式，由控制资源者即保护者输送给侍从者以交

換各種形式的服從與忠誠 (Roudakova, 2008, pp.48-49)。國民黨在台灣維繫長期威權統治的基礎就在以侍從主義的資源分配，籠絡中央官僚與地方派系。而侍從主義能夠順利運作則基於：台灣不存在反對黨、黨內沒有派系競爭、可控制的司法、全面滲透的情治機關與受限制的媒體自由。當台灣解嚴、政治民主化後，國民黨繼續維持侍從主義的交換成本過高而衰退。

就台灣的侍從報業體制而言，國民黨政權以報禁與控制广电資源使得媒介成為稀有資源，一方面以國家預算大量補貼黨公營報社，一方面以特權交換的方式使經營民營報社有成者，得以收購整並經營不善的報社形成報團，兩者形成龐大的官方宣傳網絡，鞏固統治意識形態。但新聞管制與言論控制，終究存在細縫與不滿，無法在主流媒介發聲的個人或團體，起而以成本低廉、技術簡單的小媒介暗地倡議。

從德國的 Hans Ensenberger 到拉美的 Paulo Freire，都深切體認到：社會的主流媒介通常跟國家權力結構合流，以中產階級為要求對象；而抗議團體位居社會弱勢，資源匱乏，必須時刻躲藏當局的迫害，故只能利用小媒介搞邊緣戰鬥。Downing 聲稱激進媒介製造反霸權的論述，划破沉默，抵抗謊言，提供真實，給人們一種新的方法質疑霸權。這個論斷代表另一種美化弱勢團體的左派浪漫情懷。其實，弱勢團體使用小媒介，往往是接觸不到主流媒介，為情勢所逼，別無其他途徑，迫不得已罷了 (李金銓, 2008b, 頁 396-397)。

左派學者是否過度浪漫化弱勢團體使用小媒介進行反霸權論述，容或有討論空間，但小媒介揭穿謊言、提供真相的成就則無庸質疑。所謂真相，無須上升至另類世界觀或階級視野，單單小媒介傳播為官方所禁止的新聞信息，就足以威脅統治意識形態。台灣反對運動與另類、游擊媒介的經驗，提供李金銓反駁激進派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由多元主義過度重視國家與媒介的關係，而忽略私有化對媒介生產的影響。因為無論在極權或威權體制下，國家總是掌握社會資源分配的最後仲裁者。

而且，在台灣反對人士對抗侍從報業的經驗中，看到的不僅是反對人士

应时、因地制宜的选用小媒介从事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工作，小媒介的成功也在于所传送的新闻内容，不断地冲击主流媒介的新闻公信力。侍从报业体制下的新闻媒介固然得服膺党国意识形态，但新闻媒介也不能以充当传声筒存活，新闻媒介还必须以新闻专业面对市场受众。在这个层面上也替新闻的专业自主留下些许生存空间，毕竟报纸所贩卖的是事实真相，报纸内容若与真实生活经验脱节甚多，不但销售不佳，新闻公信力势必屡遭挑战，终究为市场读者淘汰。

论述亚洲媒介与民主化的时候，李金铨（2004d，页 287）认为：「市场力量是正面的，让政府以外的其他声音听得到。市场竞争促进媒介多元和专业主义，开创意识形态的空间，抗衡赤裸裸的独裁政权。」这番论断，是受到台湾与南韩从威权转型民主体制过程中，媒介所发挥的积极效果所得到的启发。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重启改革开放，传播媒介也是其中一环。

自由主义经过几十年的打压，毕竟犹如一盏幽暗的灯火，只要条件许可，环境改变，它总会死灰复燃……。在九十年代市场自由化的场域下，以残缺的媒介专业主义面目复活。它经过党的话语武装和包装，既满足记者个人的英雄浪漫情怀，又促进媒介的市场利益，一举两得（李金铨，2004e，页 86）。

2000 年前后有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介，将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路线，融合市场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的方式，以「异地监督」等阳奉阴违的抵抗策略，创造言论空间。此时中国民间正兴起怀旧的民国热，欣赏民国时期自由多元的文化，厦门大学谢泳教授对民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专书与专栏，以及由李金铨所编着的《文人论政》等，都试图在逐渐市场化、统制弱化的中国威权体制下召唤曾有的传统。但当习近平继任并将实现中国梦定调为总体发展路线，有限短暂的言论空间逐步压缩。2013 年初《南方周末》以〈中国梦，宪政梦〉为题刊出的新年献词，遭官方宣传机构的事先审查删改，《南方周末》编采人员虽在社群媒介揭露原委，但仍遭禁言。2016 年习近平发表「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谈话，仅存些微的新闻专业空间不复存。

当前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弱者的抵抗」，类似 1980 年代台湾主流报社记者不满编辑政策，私下以匿名、笔名的方式供稿给党外杂志；或将敏感文字与议题刊登于报系另创刊物（《时报杂志》、《中国论坛》）或海外版上。康宁祥的《八十年代》出版四册《自由中国》选集，让被禁绝的文字重新问世；《自立晚报》、《夏潮》、《台湾文艺》则以策划专题、出版专书等方式，带领读者回顾被掩盖的殖民地知识分子反抗史。这些游走边缘的挑战行为，当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乃，不但查禁书刊行动日益激烈，连同在北美发行的美洲《中国时报》，也以外汇管制的方式令其资金周转受挫而停刊。

李金铨指出文人论政的缺憾之一是知识分子缺乏与大众的连接，言论倡议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改革行动。因此一旦知识分子尝试与大众结合、付诸行动时镇压随至。《自由中国》如此，《美丽岛》亦然，但 1980 年代台湾的社会情势已截然不同。累积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于此时爆发，同时滋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党外人士虽然屡挫屡败，仍持续透过党外杂志宣传理念与组织动员，加上美国以人权外交之名频繁施压，终而促成解严与解除报禁。

肆、结语

李金铨在学术生涯早期论述传播与发展时，已经注意到：「知识分子如何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媒人？如何充任文化先锋而不堕落为独裁政权的御用帮凶。」在引介守门人研究时，主张鼓吹者的新闻专业意识形态近似中国文人将「为民喉舌、为民耳目」视为现代报纸的功能，而文人办报时期对抗专制政权的事迹，更是历史上显目的一页。但璀璨耀眼的文人论政为何难以持续？一方面，中国的法制与经济落后，且缺乏数量足够的中产阶级支持；另一方面，文人论政单打独斗，未曾思考与平民大众结合，而且始终期待当权者的垂青，缺乏知识分子真正之独立精神，一但为当权者所不容，随遭扑灭，难以延续。

台湾与中国两地的不同发展，说明国家仍是分析专制威权政体的关键。李金铨（2004a, 页 159-160）认为中共把民间社会政治化，巨细靡遗地干预

民间生活的所有层面；国民党则把民间社会非政治化，鼓励民间远离政治，致力于经济发展。起初以追求经济繁荣需要政治安定为由，说服大众接受公民自由的限制，但「经济富裕最终会促使公民社会成长，要求相对独立的报业和更多的政治参与。」台湾争取新闻自由的历程符合上述论述，但也如李金铨与其他许多论者所指出的，解除报禁、开放广电媒介的自由化政策，不意味着新闻自由的实现，此后面对的是更复杂、弹性化的全球资本逻辑。

台湾自 1988 年开放报禁，1996 年电信事业民营化后，不分媒介形态，出现大规模的整并潮。相较报禁时期，《联合》、《中时》两大侍从报业集团累积数十年心力，方从报纸、印刷本业，逐步扩大到营销、零售通路的整合；1990 年代后台湾的媒介整并风潮不但迅猛，更延伸至通讯基础设施的跨媒介垄断。表面上是本土财团与国际资本的竞合，但若逐一深入分析个案，仍可见地方派系对系统业者的影响力，迫使国际资本让步以频道代理商为中介而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因收视习惯转变，导致传统媒介营收日益下滑的困境中，媒介经营者若非承接政府部门的宣传采购案，就是大量置入商品以营生。倘若真有不计盈亏的媒介，所图者乃是以媒介影响力交换当权者的青睐，以谋其他经济领域的特许。换言之，解禁后台湾的媒介环境，依旧高度的工具化，成为当权者与媒介经营者谈判交易的筹码，侍从主义仍是分析当前台湾政媒关系不可或缺的视角。

公民社会与市场，是李金铨论述文人论政能否过渡为现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李金铨在许多段落中提醒，不应将民国时期的文人论政浪漫化，因为文人论政是民国新闻报业在尚未透过市场取得自主性的社会结构下，将西方新闻专业比附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论述。文人论政的知识分子单打独斗地向权势者建言，而非凝聚成集体力量以公民社会中的独立专业群体，对政治体制形成制度性的监督与批判力量。同样地，李金铨也认为不应高估充满传奇色彩的党外杂志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因为若非结合台湾公民社会的组织化集体行动，党外杂志等另类、游击媒介将是狗吠火车。

倘若文人论政是值得追忆的传统，就不应只是对个别新闻英雄人物的推崇与缅怀，而应将其视为本地文化在特定时期中，对新闻专业、新闻伦理所萌生的在地化实践与想象。同时也不应将文人论政的理念，成为诉诸于培养

新闻从业者之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的道德呼吁：「单单以个别工作者道德自律为对象的要求，在政经结构束缚下难达成效。受到政经力量压制，再进步的专业规范词汇，往往也成为压迫公民传播权的手段。」（刘昌德，2007，页 140）例如，在当前台湾舆论极端对立及假新闻横行的情境下，若新闻媒介食古不化地坚持两面并陈的客观新闻理念，不但无法扮演提供社会完整图像、辨明真假的「专业传播者」的角色，新闻只会加深对立分化的社会裂痕。

侍从主义的幽灵依旧盘旋在中国与台湾的天空之上，在中国转换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台湾则披上新自由主义的外衣，继续放任权贵阶级在新闻媒介领域寻租。如此一来，新闻专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只会不断恶化，不但无法产制完善的内容，也弱化公民社会对新闻报业的需求。新闻史研究的意义应在于指出被视为落伍过时的残余结构，是如何绵延并持续影响至今；同时在主导结构的限制下，行动者如何遭遇结构、又如何创造改变结构的机遇。正如李金铨（2019d，页 124）对 Raymond Williams 文化物质主义的诠释，认为基础结构并非决定（determine）而是中介（mediate）了上层建筑的形构。这些过程极其复杂，在在需要细致的历史分析而澄清当下新闻专业实践的困境。

参考书目

- 王金寿、翁立紘 (2019)。〈追求地方政治研究的新典范〉，《台湾民主季刊》，16: 127-140。
- 王洪钧 (1998)。〈综论〉，王洪钧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页 1-74，台北市：远流。
- 成舍我 (1973)。〈新闻老兵六十年〉，《新闻学报》，页 1-5。台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编采学会。
- 余杰 (2009)。《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北：联经。
- 李金铨 (1982)。《大众传播理论》。台北：三民。
- 李金铨 (1987a)。〈没有公平环境，怎么自由竞争？——解禁后报业垄断的规范〉，李金铨着，《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页 151-165。台北：圆神。
- 李金铨 (1987b)。〈代序〉，李金铨着，《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页 III-XVI。台北：圆神。
- 李金铨 (1987c)。〈热线与冷语—沟通·传播·民意〉，李金铨着，《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页 3-11。台北：圆神。
- 李金铨 (1987d)。〈国际传播的挑战—现代化乎？依赖乎？〉，李金铨着，《传播帝国主义》，页 135-151。台北：久大。
- 李金铨 (1987e)。〈电视文化何处去？处在大陆政治与海洋经济的夹缝中〉，李金铨着，《传播帝国主义》，页 179-210。台北：久大。
- 李金铨 (2004a)。〈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湾报业与民主变革的崎岖故事〉，李金铨着，《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页 135-16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04b)。〈国家控制，科技颠覆，文化自主：台湾有线电视政治〉，李金铨着，《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页 185-204。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04c)。〈媒介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李金铨着，《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页 25-4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04d)。〈超越东方主义话语：扎伊尔德、亚洲媒介、民主化〉，李金铨着，《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页 277-290。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04e)。〈从儒家自由主义到共产资本主义〉，李金铨着，《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页 62-93。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08a)。〈近代中国的文人论政〉, 李金铨编, 《文人论政: 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 页 1-32。台北: 政大出版社。
- 李金铨 (2008b)。〈自由化, 而非全面民主化: 台湾的游击媒介与政治运动〉, 李金铨编, 《文人论政: 民国知识分子与报刊》, 页 395-412。台北: 政大出版社。
- 李金铨 (2013a)。〈报人情怀与国家想象〉, 李金铨编, 《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 页 1-45。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13b)。〈记者与时代相遇: 以萧干、陆铿、刘宾雁为个案〉, 李金铨编, 《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 页 403-463。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19a)。〈我这代台湾学人对于历史多少是有兴趣的〉, 李金铨着, 《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页 561-571。台北: 联经。
- 李金铨 (2019b)。〈民国知识人办报以图重返政治中心〉, 李金铨着, 《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页 551-560。台北: 联经。
- 李金铨 (2019c)。〈论《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 李金铨着, 《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页 437-445。台北: 联经。
- 李金铨 (2019d)。〈国际传播的国际化〉, 李金铨着, 《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页 109-130。台北: 联经。
- 林志明译 (2002)。《布赫迪厄论电视》。台北: 麦田。(原书 Bourdieu, P. [1996]. *Sur la television suivi de L'Emprise du journalisme*. Paris: Liber-Raisons d'Agir.)
- 林丽云 (2000)。〈台湾威权政体下「侍从报业」的矛盾与转型〉, 张笠云编, 《文化产业: 文化生产的结构分析》, 页 89-148。台北: 远流。
- 翁秀琪 (1993)。〈台湾的地下媒体〉, 郑瑞城等合着, 《解构广电媒体: 建立广电新秩序》, 页 441-496。台北: 澄社。
- 张季鸾 (1979)。《季鸾文存》。台北: 台湾新生报社。
- 许纪霖 (2008)。〈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许纪霖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页 1-16。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百龄 (2019)。〈报业政治猎巫: 1950-80 年代《台湾新生报》政治案件〉, 政治大学图书馆特藏管理组编, 《未完结的战争: 战后东亚人权问题》, 页 51-101。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
- 冯建三 (1995)。《广电资本运动的政治经济学: 析论 1990 年代台湾广电媒体的若干变迁》, 页 123-173。台北: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社。
- 黄顺星 (2009)。〈模糊的文人、相异的实践〉, 《新闻学研究》, 100: 297-306。
- 黄顺星 (2022)。〈进行一场游击战: 政治档案中的党外杂志〉, 《新闻学研究》, 151: 43-110。

- 杨秀菁 (2016)。〈战后初期《台湾新生报》的发展与挑战 (1945-1972)〉, 《传播研究与实践》, 6(2): 55-86。
- 叶启政 (2000)。《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 台北市: 三民。
- 刘昌德 (2007)。〈媒体伦理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资本与新闻专业规范的流变〉, 《中华传播学刊》, 16: 111-153。
- 赖光临 (1998)。〈中国士人报业的特质与精神〉, 王洪钧编, 《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 页 233-272, 台北市: 远流。
- Carey, J. W. (1997).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E. S. Munson and C. A. Warren (Eds.), *J.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128-143).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laby, J. K. (1996). Journalism as an Anglo-American inven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nd Anglo-American journalism, 1830s-1920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3), 303-326.
- Eisenstadt, S. N., & Roniger, L. (1984). *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 Hallin, D. C., & Mac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 Papathanassopoulos, S. (2002).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the media: 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 175-195.
- Hardt, H. (1995). Without the rank and file: Journalism history, media workers, and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In H. Hardt & B. Brennen (Eds.). *Newsworker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 (pp.1-2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uang, P. (1972).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ee, C. C.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 1-37.
- Roudakova, N. (2008). Media-political clientelism: Lessons from anthropolog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1), 41-59.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Y: Norton.
-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s and Clientelism: C. C. Lee's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Shun-Shing Hu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 C. Lee has used the literati cum political commentators to discuss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Although he has accurately grasped the spirit of the epoch, it is inevitable overemphasize the power of agent and romanticize pres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n the early days, C. C. Lee explai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media system, providing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Meanwhile he has notice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third world, and it has become the subject of C. C. Lee recent research on literati cum political commentato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lthough C. C. Lee did not put forward a clear historical judgment, but from his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we can find an eclectic research orienta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dualism of structure and agent.

Keywords: patron-client press, literati cum political commentators, alternative media, media system,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 Shun-Shing Huang is Research Fellow at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un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的美丽意外： 只有中道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

陈志贤*

本文引用格式

陈志贤 (2022)。〈《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的美丽意外：只有中道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文化与政治》，16:53-86。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31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 作者陈志贤为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教授，e-mail: viking@nkust.edu.tw。

《摘要》

约四十年前，李金铨老师的一本传播理论教科书意外地点燃台湾传播学界师生对左派观点的兴趣，开启往后台湾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此书有关传播帝国主义的左右两派理论反复辩证，在那时极端右倾的政治气氛与学界环境中，仿佛打开一扇往左看的窗。李老师博学多闻，著作等身，《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只是他丰富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如果这个起点是台湾传播学界向左看的契机，也许值得顺着他的眼光继续探索左派在其视野中的可能与不可能。本文将回顾李老师在传播研究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聚焦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阶级、数字科技与平台、媒体专业主义与劳动的看法和评价，最后班门弄斧地提出仍未获其青睐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与值得关注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国家、阶级、新闻专业主义

不少传播学界的师生是因为 1981 年政大新研所出版的《大众传播学》，或 1983 年三民书局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而认识长年任教国外的李金铨老师。在当时信息相对匮乏的环境下，上一本拓荒且影响力十足的理论中文教科书（徐佳士，1966）已经沿用十多年了，施兰姆（Wilbur Schramm）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托的英文著作仍旧被奉为经典，这本书的出现不仅拉近了台湾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典范的距离，还在解严前夕蠢蠢欲动的八十年代，透过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引介与批判，而「偷渡夹带」了彼时被禁言或被扭曲污名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依赖理论，让井底之蛙如我者意识到，原来费心苦读拥抱的现代化理论早已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连串的「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争辩中遭到围剿。拉美国戮力探寻经济发展迟滞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根源，并质疑传播媒体所扮演的美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马前卒，似乎也唤醒许多深受三民主义与国父思想反共亲美课程洗脑者，逐渐认知到左派思想不是如制式应考答案那般陈旧不堪，它可以反用来看穿当年党国体制、并提供另类观点与解方。一本教科书意外地点燃台湾传播学界师生对左派观点的兴趣，开启往后台湾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李老师也很清楚这本教科书的学术价值虽然不如他的专门著作，却在两岸三地知者最众、对青年学子影响力最广（李金铨，2019，页 591）。除了升学考试必读与文采流畅之外，此书精彩之处其实不在爬梳传播理论流派的本体，而是出格地融入作者有关传播帝国主义的博士论文研究，广泛搜集的实证资料与反复辩驳左右两派的理论厘清，为本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教科书添上贴近在地呼吸的血肉精神。在长夜将尽的八十年代初读此书或将惊艳于作者一视同仁地介绍左右学派观点，既不偏好主张信息自由流通的自由派，也不菲薄控诉媒介帝国主义的激进派，尝试结合营造「自由而公平」的国际信息新秩序（Lee, 1980）。也许作者无心，也许点评不见得人人同意，也许以台湾为传播帝国主义「例外」的研究宣称有所争议，但是在那时候极端右倾的政治气氛与学界环境中，如此的做法等于是为左派观点平反，打开一扇往左看的窗。有多少学子因此而好奇地啃读《思与言》学术期刊上译介的 Andre G. Frank 和 Fernando H. Cardoso 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

与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理论 (world system theory)，更在往后的几年内陆续捧读关怀社会底层的《人间》杂志与引进各式左派新思潮的《当代》杂志？

对戒严时期的读者这是特殊的阅读经验，对解严后脱离该时空脉络的读者则需要不同的解读角度。在新世纪回望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或许更能清楚看到那刻急于借左派启蒙、勤于以社运建构足以对抗国家机器的公民社会，往往低估晚期资本主义的变形再生能力、高估反对阵营面对利益与权力的免疫力。媒体改革尽管开始注意到经营与所有权等政经结构问题，局限在优先打破党国体制的执念，促成力主松绑的自由派与批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左派之间的奇妙合作，也诱使问题的对策一度简化为党政军退出媒体。

实际上，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未能深化为对商业媒体产权的规范，也一直无法落实为壮大公共媒体的强力后援，其中一个原因即是它的迟到与早退。台湾传播学界于八十年代初期终于迎来姗姗来迟、意外现身的左派观点，它却又匆匆地在解严后的九十年代淹没于目不暇给的各式舶来解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中。甚至在台湾所谓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常指称的是往文化研究倾斜、「均服膺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PEC)，分类时也常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等同共置 (冯建三，2003，页 106、110)。套句通俗的话说，左派观点中的政治经济学派，特别是被误解为经济化约论的老马克思主义取向，在台湾还没真正走红就已经过时了。

欧美的新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包含许多对旧左派的反省与批判，尤其点出过度关心物质条件与劳动生产等下层结构、忽略文化的相对自主性等论述盲点，自有其矫枉必须过正的理论脉络。然而台湾传播研究的语境迥异于欧美，长期缺乏看穿资本积累逻辑硬道理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立足未稳，何来矫枉过正之需？尚未完全了解媒体产业结构，就已经夸夸其言地赞颂阅听人能动性，甚至率尔否认政治经济分析必要性者所在多有。如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左派与自由派联合对抗党国体制的偶然合作，新世纪或许也将看到某些新左派与新右派在赋权阅听人/消费者与支持认同政治上奇特的汇流。

相较而言，四十年前李老师就已将重结构的文化帝国主义与偏个别选择的信息自由流通两说「视为互济的悖论 (paradox)，而不是水火不容的异端」，进而以比较性的个案分析，具体罗列条件的异同与影响选择的差异 (李金铨, 2019, 页 48)。而且他也发现：「在批判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学者追求的旨趣、关怀和取向截然不同，显然有物质基础的差异。」 (李金铨, 2019, 页 117) 学术并非跟风追流行的买办，不同的历史脉络有不同的处境与挣扎，研究者介入也当有不一样的轻重缓急与偏颇取舍。第一世界的左派学者也许不会关心文化生产的国际分工体系，仅专注于其国内的文化政治与诠释斗争，但是第三世界的左派却很难有余裕不去面对跨国而来的政军工复合体。问题是，冷战时期反共的氛围中，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格外、难以或不可能进入台湾的学术传承」 (冯建三, 2003, 页 106)。除了媒改社与传学斗成员的论述，迟到又早退的老左派导致台湾的传播研究没有太多的结构分析，多数人尚未详细踏查文化帝国主义的单行道，就飞奔拥抱全球化的文化高速公路。

吊诡的是，《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完笔于英美新右派崛起之际，正反辩证、注重各自社会条件与文化后果、追求中层理论 (middle range theory) 的持平再商榷会不会也无意间地加速老左派整体结构分析的谢幕？无心插柳地为世纪末歌咏权力去中心化、有为者亦若是的全球化理论铺路？或者反而被所谓的中国或非西方传播模式挪用为对抗美式文化的论述基石？李老师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保证我们的分析关照全面 (holistic)，又不陷入全称命题 (totalistic) 的泥淖」 (李金铨, 2019, 页 122)，反抗西方霸权的同时，「也痛绝文化民族主义的闭门造车」 (李金铨, 2022, 页 347)。他也以具体的研究展示如何留意同与异、常与变交织的社会现象，并优雅地走理论钢索，跨越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绝对与相对等二元对立的学术陷阱。

李老师博学多闻，著作等身，《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只是他丰富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如果这个起点可能意外点燃台湾传播学界向左看的契机，也许值得顺着他的眼光继续探索左派在其视野中的可能与不可能。不揣浅陋，本文将尽量回顾李老师在传播研究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聚焦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阶级、数字科技与平台、媒体专业主义与劳动的看法和评

价，最后班门弄斧地提出或许仍未获其青睐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与值得关注的研究取向。

壹、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

不清楚赴美留学之前李老师是否接触过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根据他的学术生涯五十年自述，首次出现的左派影响是念博士班时读了 C. Wright Mills 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启发他关怀公共议题与具备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由于博士论文所需，他开始接触 Herbert I. Schiller 之类的美国左派政治经济分析，再扩及拉美激进学者的依赖理论（李金铨，2019，页 583-584）。在美教学初期，英国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于授课内容，但是被誉为「没有他，就没有传播政治经济学」（Wasko, Mosco, & Pendakur, 1993, p.10）的 Dallas Smythe 却少见其谈论，而同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创者的 H. Schiller 更被贬为僵化教条（李金铨，1981，页 303）。台湾由于冯建三（1992）的引介，对此一老左派取向并不陌生，有趣的是，一方面中国竟然晚至新世纪初才等到郭镇之的相关撰文介绍，而且迄今「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极少」（陈世华，2017，页 70）。而另一方面，在 1970 年代依附美日、自制率却很高的台湾电视产业，一度被李老师视为媒介帝国主义的否证，1990 年代以后国外影视大举入侵，昔日的例外反而成为支持左派批判的例证（敦诚，1992；冯建三，2003）。

虽然常提及传播政治经济学，李老师评论左派内部路线时，似乎较偏向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取向，而非他一再批评过于经济决定论的老马派（Murdock & Golding, 1977; Golding & Murdock, 1991）。他主张经济和政治并不完全对应，经济也只是文化力量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李金铨，2019，页 123）。因此，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派坚持上层建筑「说到最后」（in the last instance）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强」决定论，他较接受只「说到最前」（in the first instance）、仅设限加压、没有最后保证（without final guarantee）的「弱」经济决定论（Hall, 1983; Miliband, 1977; 李金铨，2019，页 124）。而如此的偏好又反映在他区分「经济的政治经济学」（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 与「政治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前者采由上至下的分析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媒体市场体制，强调不大刀阔斧进行结构改变，不处理资源不均、资本集中、与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便无法建置理想的媒体系统；后者则是由下而上的取向，优先排除国家压迫的政治力干扰，制度化保障媒体工作者的劳动自主与个人自由，再由其逐渐摸索适合的媒体生态模样 (Lee, 2000a, p.571)。尽管李老师一贯主张平等与自由并重，没有最后保证 (without final guarantee) 的「弱」经济决定论导致他重后者而轻前者，毕竟从他看来，经济结构改变无法保证民主性媒体的运作，但是免于国家暴力却肯定多少能让媒体专业的火苗存活。基于中、港、台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转型时遭逢的实际困难，他建议先提倡市场自由化，并以政治改革保障消极自由，确立此基础再追求物质条件的公平性、培育积极自由。换句话说，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李老师构连左右两派的黏着剂，不过它只是工具罢了。不同于 Wallerstein (1999, p.99) 援引自由主义以补充结构批判、企图促成属于左派「具公平性的自由」(egaliberty)，李老师选择利用淡化结构影响的政治经济分析，藉以强化自由主义的民主深度。

对左派欲迎还拒的戒慎态度特别表现在他一篇直接谈论社会理论如何解放赋权中国新闻业的论文 (Lee, 2000a)。李老师分别阐述自由多元主义、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老左派、与1990后的激进批判新左派等三大理论的利弊得失，发现它们皆同意中国党国体制民主化的重要性，主要差别在于对经济自由化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不同：自由多元主义相信遵从市场机制能确保新闻业的消极自由，新左派却不满文化的庸俗与异化、反对媒体商业化、另寻社会主义的新闻模式，改革的老左派则选择性引用马恩列毛思想，希望在国家必要时可以介入矫正市场的情况下，某些程度内接受反映民意、不盲目屈从党意的新闻自由。

不知为何，批判劳动剥削、商品拜物化、与产业集中的政治经济分析在老左派的讨论中缺席了，而且尽管这篇论文主旨是探讨社会理论的解放潜力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文章的评比与结论却是以当时落实接纳的现况为依据：老左派因路线斗争被打压，随天安门镇压而没落，新左派反对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呼吁将媒体视为对抗意识形态宰制的斗

争场域，反倒正对党国官僚的胃口，可能无限上纲地引狼入室、以浪漫且抽象化的人民为名，让国家与民族主义借尸还魂，合理化干预媒体的暴行。至于自由多元主义的成败也全系于党国的容忍度，所谓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给予若干的新闻自由，也透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收编不少市场势力，更因缺乏新闻专业义理，而使得辛苦得来的新闻自由容易被滥用或操控。如此具体脉络化的分析固然不打高空，但只着眼当下的兴衰起落，会不会抹杀理论另类构造改变契机的潜力？或可能凭添难以改变的悲观色彩？

其次，乍看「务实」的分析也透露了论文避开左派的立场，虽然三项社会理论迄今都无助于理想中国新闻业的建立，李老师却认为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重平等而轻自由，党机器持续发展庞大、渗透各层级的宣传工具，不接触都不行，因此反驳赵月枝对新闻市场化出现信息不均的忧虑（Zhao, 1998）。他直言与其锦上添花期待党国再多出手保障积极自由，还不如为苦于无法免于国家干预的消极自由与新闻自由雪中送炭（Lee, 2000a, p.563）。此言用心良苦，他也清楚中共对新闻业的控制不会松手，实际做不到还是忍不住说。他也意识到中共不再视国家与市场为互相对立的概念，宏观调控将市场纳入党国体制，在党政军工媒综合体中市场审查与自我审查都令新闻自由、甚至所谓的公民社会变得微妙吊诡，专业主义不是媒体人说了算，但是仍然忍不住再三呼吁。只是如此不信东风唤不回苦心并未同等付诸于新旧左派想做却达不到的理想上，三项社会理论皆有实然的悲哀，仅有自由多元主义获得李老师应然的青睐。即使如此，他在二十一世纪初期观察到的三项中国新闻自主迹象：国家权力节制并容许新闻专业独立性、似左似右精神分裂的编采手法与营销实验、自唯命是从的党国喉舌转为利益交换的公关机构（Lee, 2000a, pp.561-562），或者三种香港报业因应政治审查与自我审查的「策略仪式」（strategical rituals）：拼贴并置、编辑分工、与中性报导（Lee, 2000b），是否仍能在大权集中、清朗打假、高揭共同富裕中国梦、习近平统治下的当今中国持续茁壮？

严格来说，这篇论文少谈新旧左派的社会理论，多半谈的是环境局限下中国左派的实际妥协与折冲，阵营的路线斗争远多于哲学论证的思辨。而中

国左派与西方学术理论的左派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口头（不得不）宣称的左派又常与实际的主张作为有颇大的落差，中国一些所谓的左派在二十一世纪里几乎成了保守主义与亲近当权的同义词：反西化、反普世价值、推崇 Carl Schmitt 的国家主权、主张走中国自己的路（张泰苏，2019，页 238-239），甚至被形容为藉民族主义以维护党国利益的「爱国贼」（马得勇、张曙霞，2014，页 88-90），和台湾一般理解的站在权力对立面、批判现况之左派似有天渊之别。李老师只以绑手绑脚、「实际存在于中国的左派」来验证其解放潜力，并未援引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商品与劳动观点处理媒体集中、资本积累、贫富不均等中国走资后的现象。不只老左派政治经济学分析无端缺席，标榜阅听人能动性、与消费民主的后现代主义更被简单几句话而嗤之以鼻（Lee, 2000a, p.570），这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理论观点选择：强调「说到最前」的「弱」经济决定论认为阅听人与消费者受限于一一定的物质条件，而没有最后保证的「弱」经济决定论却凸显新闻记者或文人论政办报相对自主性与发展专业主义的可能。厚此而薄彼，不相信主动阅听人但相信专业报人，不喜欢结构决定论但对政坛商场的操纵扭曲、尔虞我诈如数家珍。拒绝左派大论述的李老师曾自承，「从未忘情于新闻」、偏爱「在『学术界』看『新闻圈』」（李金铨，2019，页 459），难怪他的政治经济分析充满许多新闻人与金钱、权力周旋迂回的精采轶事与多样演绎，理论观点偏好上，其实韦伯比马克思更得他的心。

贰、隐为背景的国家与阶级

从李老师的观点看来，经济下层结构只是设定物质条件的限制，文化与传播发展保有相对开放自主性，因此他较在意媒体具体产制过程中人与事/势的碰撞相遇与历史夹缝中介入权力结构的各种姿态：可能因缘际会，可能因势利导，也可能身不由己（李金铨，2019，页 432）。这观点看似 Stuart Hall 之类的新马文化研究，由上至下从结构限制看其中的能动性，实际上较接近韦伯式强调脉络了解（verstehen），由小见大从行动与行为洞悉制度与社会结构。例如在中国报人研究中（李金铨，2008 & 2013），他透过一手文献与

生命史赋予左中右派报人不同行动 (act) 了解式的意义, 将之转化为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行为」 (action), 再循着历史累积的轨迹彰显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的行为, 以韦伯式理想类型 (ideal-types) 分类制度行为, 形成社会结构比较的基础 (Weber, 1978)。他的分析中, 历史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比抽象命题推演多得多, 因此所谓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打散渗透至报人与媒体于历史转折点进退取舍时感受的可能与不可能, 没有身外强加的冷冰冰机制逻辑, 只有身处其中的犹豫与抉择、偶然与必然、机会与局限。

也因为如此, 李老师很少进行缺乏行动者的结构分析, 鲜少真空抽离地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形构与角色。一方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还无法全面了解中国记者的出身、意识、阶级和社会流动这些基本问题」 (李金铨, 2019, 页 413), 另一方面则是他反对将结构抽象化, 宁愿采取韦伯方法论的路径, 所以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影响只有在与人交会时, 才会展现力量与模样。韦伯与马克思观点孰优孰劣, 见仁见智, 不过赋予行动意义、促成制度化的个人, 一直是镶嵌于特定的权力脉络中, 某些杰出报人报国之际固然透露了政经结构的作用力, 却只是折射某部分的面向, 文人与报人自有其阶级、性别、与族群等局限, 他们看到、感受与展现的结构不见得相仿于其他人, 有时当局者迷, 反而凸显出因结构位置而产生的盲点。当然更多的异质个案累积、增加脉络性与条件性可能让结构的复杂面貌逐渐清晰, 但是大方向的结构投影与绘制, 或许更有助于行动者的定位、校正、搜寻他者、想象另类关系模式与改变契机。

虽然多次推崇 Cardoso 的依赖理论动态分析拉美国家、在地资本、与跨国资本之合纵连横, 李老师却不太直接谈论阶级关系与国家角色。他讨论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如 James Curran 和 Myung-Jin Park (2000) 般泛指社会关系里的权力、控制与全球/在地影响 (Lee, 2001a), 而不是直探表层底下独立外在的资本逻辑、阶级斗争或国家机器的治理管制战略, 于他的论著中, 阶级通常仅是新闻工作者的身分背景描述 (如: 李金铨, 2013)、媒体关注的不同对象 (如: Lee, 2003)、或者西方媒体霸权有待超越的局限 (如: Lee, 2015), 而所谓的国家则往往于政权交替 (Lee, 2000a)、民主化转型 (Lee,

1993, 2001a)、或既有体制内的政治路线倾轧时(李金铨, 2008 & 2013), 才容易辨识与现身。他经常援引 Edward Said 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批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带有西方偏见, 忽略跨国差异,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威权的脉络(Lee, 2001a & 2001b)。因此, 他熟悉阶级与国家理论, 却不爱套用。尽管缺乏严谨的阶级与国家角色分析, 政治经济学的敏感度丰富了他的批判性自由主义, 从而反对媒体中心主义与媒介决定论, 苦心呼吁将媒体的反抗或驯服皆安置于内外政经势力竞逐的权力场域中, 以获得更具社会学观点的脉络理解(杨冰柯, 2015)。

一篇探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媒体与国家、资本关系的论文是少数的例外(Lee, 2000c), 李老师借用政治学界的侍从体制(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分析党国对媒体有时高压强制、有时怀柔收编的双手策略, 于非关政治的内容产制上容许有限的表达自由, 但要求政治表达的忠诚, 利用商业利益换取媒体的驯服, 故彼时的媒体既身受其害, 又为虎作伥。他明确指称解严是国民党从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走向软性威权的转型, 以前政权垄断大量的国家资本, 并扶持效忠于它的私人资本, 解严后逐渐只能利诱民营媒体, 无法威胁支使, 市场竞争的影响力开始多过于政治干预。而另两篇论及当代中国传媒如何于政经双重压力下运作的研究中, 他则名之为「党与市场的统合主义」(party-market corporatism), 以党国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相对强弱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 又区分为上海式的侍从主义关系、广州式之政治管理的市场化、北京式之市场的政治吸纳等三种模式(Lee, He, & Huang, 2006, 2007)。不管是台湾或中国的模式, 历史的描述仍多于结构的分析, 李老师并未进一步挖掘统合主义转型的阶级/族群组合变化、资本竞合与官僚特许的新管制问题、以及限制性公民参与的合法性霸权建构等问题, 更未就台海两岸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后, 资本主义媒体生产体制、劳动条件、与劳资关系多置一词。国家与阶级在李老师的研究里, 多半是解释媒体处境的自变项, 而非有待深究的依变项。

虽然早期马克思主义低估国家理论, 倾向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用以维护资本积累、克服经济危机、与掌控阶级斗争, Georg Lukács 与法兰克福学派诸君已经逐渐担忧国家角色的物化(reification), 害怕它反客为主,

由手段变成目的，一如德国法西斯政权原本是垄断资本企图极大化剩余价值剥削的理性化工具，到头来却养出极权的巨灵怪兽 (Clarke, 1991)。Louis Althusser (1971) 则更进一步强调武力压制与意识形态操弄的国家机器 (the repressive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并指出国家机器与物质条件下层结构既相连又分离的多元决定 (over-determination) 结构型态，除了保护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也致力于自身运作逻辑的再生产。1970 年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利润率下降等经济危机，国家必须同时因劳工抗拒剥削与公民要求自由平等保障之资本积累与合法性双重危机，又迫使左派学者重新检视国家的功能以及亲左政权入主的可能与限制 (Habermas, 1975)。为推迟经济危机而寻求全球市场，以增加各式各样资本主义空间 (如: 国际分工生产链、投机的土地与房地产、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文化艺术创意领域)，来克服无法更为加速的资本积累时间 (Harvey, 1989)，则让布尔乔亚国家不得不以民族国家形式进行新型态帝国主义扩张，带头帮资本在新的空间攫取原始积累机会，并建立有利于资本跨国流通的法律制度，但也激起其他地区民族国家形式的反扑 (O’Kane, 2014)。

左派认为国家与阶级一直在危机中相生相克，政治与经济根本没有清楚分界线，其中的霸权构造与结构性紧张关系较少在李老师的研究中彰显。中国的统治阶级属性并不清楚，口头上尊工农阶级，实则走资，勒控资本阶级时，常又祭出民族主义，甚至展露「为人民服务」 (for the people) 的开明专制父权式威权，地区之间则因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而有不同的主导阶级与阶级组合所形成的不同霸权集团 (hegemonic bloc)。广州、上海、与北京三种统合主义模式，李老师认为是政经势力较劲议价的结果，从 Antonio Gramsci (1971) 的观点看来，这只是「运动战」 (war of maneuver) 正面出击的表面短暂结果，并非「阵地战」 (war of position) 挑战国家「堑壕」后面已经像「永久性防御工事」般屹立着的市民社会。这三都市的媒体顶多只是趁势见缝，利用相对优势的筹码，让国家默许某些新闻报导，但是对国家权力核心真正所在的市民社会，以及其中领导同盟与统治敌对的霸权构造，却未见提出新的「共识」或「常识」进行长期霸权挑战。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式媒体固然难免冲撞国家的决策，然而对孕育它们茁壮、让它们赚钱的市

民社会「共识」或「常识」往往媚俗袒护的很。Gramsci 直言批评，国家与社会分离或对抗是自由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一个强大稳固的政权决不会只用国家机器强制服从，统治的重兵其实早布署在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欲夺国家者必先夺市民社会，Gramsci 如是说。媒体的政治经济分析因此不等于政治分析加经济分析，也不能只着眼于商业性媒体以市场对抗国家，以免因小失大，忽略市场或市民社会本身的政治性与霸权建构。

参、党与平台的统合主义

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中国很讽刺地将大批农民工送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链的工厂剥削中，加入 WTO 后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出口导向的世界工厂自居。原拟保障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由于跨国企业的游说与撤资威胁，最后通过的版本删除解雇超过五十人须征求工会同意的规定，也放松对长期受雇劳工提供正式契约的要求 (Cheng, 2007)。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增加工作机会的重要性远大于劳动正义，其中劳工需求量最大的莫过于信息传播科技产业 (ICT)，因此这些以外资或合资为主的跨国企业降低劳动成本的声音总是特别入耳，连广州将最低工资调到全中国最高，也不到平均市民收入的三成 (Mo & Liao, 2011)。官方宣称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学者却认为它其实是有别于西方「自由菁英资本主义」的另一季生体：「政治/威权资本主义」，两者都汲汲于追求利润与资本积累，差异只在于民主或效率、法治或人治/党治的倾向强弱而已，资本主义于是变成当前世界唯一的政治经济体制 (Milanovic, 2019 / 陈松筠、孔令新译, 2020)！从这观点看，中美竞争实际上是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左派观点不只适合批判欧美，也如回力镖一样，同样适合回头严格检视走资的中国。

中国版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分工出口模式经过 2008 金融危机的震撼，暴露它过度倚赖外在市场的脆弱与不稳定性，国际需求疲软加上中国土地成本高涨与劳工跳楼抗议的压力，逼得中国寻求新的经济策略。一方面将沿海出口模式转到内陆二三线城市，吸引农民就近上工，既解决地区发展不均的问

題，又繼續滿足跨國企業對低廉生產條件的需求；另一方面則鼓勵製造業出走的沿海都會改發展創意與數字科技產業，不僅創造更好的工作機會，還有助中國產業升級與文化輸出。晚近川普與習近平之間的中美貿易戰，更讓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定調經濟雙循環戰略，強化內需市場、自給自足，擴大外銷出口、從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智造/創造，內循環減少中國對世界的依賴，外循環則加深世界對中國的依賴，內外相輔相成，而電信與數字科技是當中的制高點（何丹、徐鑫，2021）。為避免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資本積累與合法性雙重危機，中國打算運用雙循環宏觀調控形成資本積累與合法性的雙重保證，傳播產業正是成敗的關鍵。

在後 2008 時代，數字傳播被視為中國經濟再結構的主要杠桿，排除外來競爭的巨大內需市場圈養出足以與矽谷匹敵的平台巨獸，努力提高研發能力，掌握關鍵技術，更是希望後發先至，超車歐美，搶占未來發展先機，于可能改組的國際新分工秩序中奪得優勢主導位置，建立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的數字資本主義」（cyber-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usssu, 2018）。中國全國人大於 2016 通過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將數位創意列為五項「十兆級」新興支柱產業之一，目標除了擴張中國文化與媒體的軟實力與鼓勵科技創新，更企圖利用中國強大的數字科技生態系統（ecosystem），轉守為攻，以基礎建設相關的技術規格與平台網絡優勢，控制全球科技與文化的發展。換句話說，透過黨國的決策、投資、指揮、與誘導，科技發明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幫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躍入虛實整合的平台經濟與算法世界，並主導帶動科技採用與文化消費（Flew, Ren, & Wang, 2019）。如此「網絡加文化」（Internet Plus Culture）的數字科技生態系統是中國新的霸權「共識」或「常識」建構，企圖讓政治經濟力量隱形退居二線，彷彿一切的信息鏈接、排序、與過濾是純粹技術運作的結果。長久處於單一生態系統，算法甚至能使人們潛移默化地順着「媒介化」（mediatization）邏輯建立自我認同、社群關係、與世界觀。屆時，國家的鷹爪就不只是公安與網軍而已，自動自發的小粉紅在在Online下之市民社會為統治階級興風作浪，才是統治意志利用新科技打贏「陣地戰」的關鍵。橫眉冷對國家、却俯身屈就市場的自由派媒體恐怕搞錯了戰場。

李老師偏好從人看事物，較少聽他談論科技對人與歷史發揮的作用，如果「黨與市場的統合主義」慢慢轉成「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party-platform corporatism)，統治的政治經濟協商競合就可能蛻變為科技的文化治理，在符合黨國意志或黨國扶持的平台生態系統中，政權合法性與營運生意經交融、互為表裏，國家與市場的潛在緊張關係是否將被「河蟹」成有志一同的訂閱數與聲量追逐？打賞帶貨爭搏眼球的網紅、大V、與網絡創業者是否將取代忧心忡忡戮力報國的文人、報人、與數字行動主義者？中國打造的跨國平台（如抖音）與全球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如華為的5G技術）能否視為傳播帝國主義的反轉？看似去政治性的數據演算會不會成為邊緣化異議者最狀似無辜的幫凶？也許，對「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而言，數據即訊息(Data is message)，李老師關懷的論述與框架，不論是多元或單一、對立或協商，在平台的演算下，大塊文章或新聞報導皆消逝於虛擬的虛空中(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拆解為1與0的鏈接選擇以及排列組合。

奧韋爾式反烏托邦穩固之前，中國仍不放心完全放手讓數據說話，因而「黨與市場的統合主義」分析目前依然大有可為。2018取消限期期之後，習近平開始抓緊意識形態的控制，影視、新聞、出版的管制整合於黨的宣傳體制，強化大外宣，並且公開宣稱，文化產業只能姓文，不能姓錢。騰訊集團立即呼應黨的指示，下架只顧打造IP賺錢的「泛娛樂」(Pan-entertainment)概念，改升級為「新文創」(Neo-culture creativity)戰略構思，管束在內內容符合黨國規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接連發起的清朗運動，連政治性低的電玩、動漫、直播、視頻與群聊論壇都管，大力整肅娛樂圈與飯圈。支持者認為不必被高流量牽著鼻子走，內容創作可以回歸文化質量，而反對方則擔心所謂的文化價值，其實是言論思想審查與意識形態控制的代名詞(Flew, Ren, & Wang, 2019)。

中國不只謹慎馴服商業市場，令經濟為政治服務，還小心翼翼地嘗試將創意產業關進利潤的囹圄，誘使創意唯經濟是從，能賺錢的才是好創意。從工具論出發，中國只想要創意帶來的產業好處，拒絕隨創意而來的民主多元要求(Keane, 2013)。相較於創意產業一詞，中國官方更偏愛文化產業的名稱，特別是走資較慢、偏重內需、強調政治維穩的內陸地區又比沿海資本發

达的都市更重文化而轻创意，这当然与文化的保守性与创意的出格不受拘束有关，也多少因为这些地区产业结构仍仰赖第一、二级产业，推动文化产业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需求。而且党国钟爱科技独角兽的创新远胜于艺术家桀傲不驯的创意，因此前者归商务部或工业与信息化部管辖辅导，后者则属文化与旅游部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筹审查 (O'Connor & Gu, 2019)。一放一收，兼顾市场获利与思想规训，形成具中国色彩的文创产业，即使是采用创意产业的沿海都市，卖力追求的也多是去掉政治棱角、无伤大雅却能赚满荷包​​的创意。只是不管名称是文化、创意、或创新产业，内容工作者与用户、甚至高科技业者都得如履薄冰、拿捏分寸，深怕不知何时与为何踩到红线。

更棘手的问题是，未来「党与平台的统合主义」是否可能透过复杂如黑箱般的科技生态系统中​​介运作，默认党国理念与利益于基础设施、硬件标准规格、零件设计组​​装配置、软件程序编码、算法撰写、与参数设定之中，化干预操弄于无形，将可见的一时打压转为难辨的长期涵化，无须劳驾党国老大哥出手，异议杂音「自然」地被消失封锁、被不推播连结、被隔于同温层之外，即使偶尔不小心露出渗入，也难逃假讯息的卷标，甚至根本难以获得久处其中的网民青睐与认同？李​​老师心系免于国家干预的消极自由与新闻自由，背后的假设是多元的媒体能帮助独立自主的个人做出最佳或最信息充分的决策，但是在平台生态系统里，主体是镶嵌于数据运算网络之间的终端机主体 (terminal subjectivity; Lazzarato, 2014)，数字科技的中介取代国家或帝国的直接干预，所谓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公共领域终究沦为人工智能建构的信息节点罢了。或者更讽刺地说，是人与科技物共谋妨碍了消极自由与新闻自由。媒体的接触与个人的选择都是基础建设中介的结果与回馈的再强化 (Hesmondhalgh, 2022)，如此环境下，或许解药不是意见利伯维尔场或媒体专业主义，而是数字匿名 (anonymity)、漫游 (flâneur)、与介入软硬件、重写算法的参数政治 (parametric politics) (Zehle & Rossiter, 2016)。

肆、专业主义掩盖下缺席的劳动分析

李​​老师著作最精采者当属民国初年的新闻史爬梳，见微知着，藉由报人

的言行与进退，投影出报界、知识界和政界错综复杂关系，甚至勾勒中国何去何从的轨迹。虽舞剑于现代中国报业发展，实则意在中国大历史的转折，有识者赞之为「中国现代史的另一读法」（李公明，2008年12月28日）。他也自我期许结合内证（文本理路）与外证（语境与脉络的联系），「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从种种直接和间接证据旁敲侧击，还原历史，真实呈现人与事在历史场景下交织演出的一场戏」，并奉劝「学子切勿一下子就跳到『史论』，史实贫瘠，赘论满篇，事情没有搞清楚就『微言大义』起来了」（李金铨，2019，页341）。

舍近求远、放言泛论一向是李老师谆谆告诫期期以为不可之恶，可惜我不懂新闻史，因此改由另一基本踏实的面向切入，选择具体的传播劳动分析，讨论他最挂心的当代中国媒体工作者与专业主义。

改革开放前，中国媒体一直以党国喉舌自居，预算与人事也都由党控管。直到1980年代以后，广告逐渐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媒体的运作越来越像商业机构，虽然仍维持政治路线的忠诚，日常的组织和营运早已涵盖许多营利分支事业。后2008在强化内需市场的氛围下，媒体更肩负起创造消费社会、鼓励都会新兴中产阶级追求生活风格（而非政治民主）的战略使命。国家与市场的齐力支持帮助媒体跃升为中国第四大产业，仅次于制造业、观光业、与电子信息业，中国也在2013一举跃升为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Hong & Wang, 2016）。

钱景改造了中国媒体的风景，迎合大众需求、提供快餐讯息和八卦娱乐的晚报、周刊、与都会报纸，为媒体集团赚进大把钞票，晋升为市场要角，原本重心所在的全国性党营报纸，转型为产官学菁英取向的小众型「质报」。前者无所不用其极追求利润，不务本业地将内容生产买卖扩及非新闻或类新闻领域，后者则更坚定地 toward 中央看齐，以领导舆论风向自豪。改变中被牺牲的是为弱势族群发声的地方性与草根性媒体，在前述所谓质报与量报的夹杀下，广告与订阅收入锐减，官方补助又不足，加上城乡差距恶化、人力往都市外流，掏空这些媒体生存的基础，少数幸存者也得面临低薪与低迷的工作前景，连报导内容都难以避免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的同质庸俗倾向（Liu, 2012）。

媒体积极推动内外双循环战略、塑造伟大中国梦，除了牺牲农民工与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一般媒体工作者其实也很难享受「共同富裕」的好处。上世纪末的媒体慷慨荣景让位给新世纪锱铢必较、严格控管成本的资本杀戮战场，所谓的弹性化（flexibility）变成殆危不定的存在（precarity），新闻工作者不仅多半低薪、多任务、长工时，专职的工作还经常被非典型雇佣、甚至无薪的实习生所取代。新闻职场两极化，少数明星记者与名嘴名利双收，其他绝大多数从业人员薪资收入停滞，却必须面对「共同富裕」带来的房价与生活消费水平高涨（Hong & Wang, 2016）。中国崛起了，出名的文人报人媒体人随之飞黄腾达，一般新闻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往下沉沦，这让她/他们情何以堪？

即使有媒体既不畏政商权贵打压，又不屈从流行媚俗，敢于引领舆论、监督当权，例如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崇的《南方周末》，对它们孤军奋斗的赞美更证明了常态下的市场导向媒体是完全另一个样貌。由例外彰显规则，李老师寄予厚望的市场自由化，迄今实践的结果似乎寻租（rent-seeking）远多于批判，每出现一则《南方周末》敢说真话的报导，同一传媒集团内就有更多的《二十一世纪网》收贿丑闻。事实上，商业操作的媒体偏爱与权力共生，疏于挑战既得利益。李老师谈论近代中国文人办报的阶级性，指涉的是媒体定位与报导取向，不是媒体工作者切身的劳动条件与生产关系，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张季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原则的知识人良心，却难以了解《大公报》旗下记者在「文人论政的企业」里如何享有薪资福利、参与决策、或掌握工作自主性（李金铨，2019，页 437-445）。以当下中国情况观之，被迫哗众忙于博取眼球青睐，却自身难得温饱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奢望其展现知识分子风骨？如果报人报国折射出彼时文人的理想、分歧、与失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精神分裂则透露了现今餬口饭吃的新闻劳工无法掌握生产工具与合理分享利润之悲哀。

《大公报》在李老师心中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李金铨，2019，页 437），衍生的理想新闻专业内容是为国为民、事实不容歪曲，专业态度是不忤不求、说大人则藐之。典型在夙昔，左派政治经济学者虽心向往之，更关心《大公报》第一线新闻工作者的劳动条件，好奇文

人论政背后倚赖的新闻信息是如何搜集与生产，办报的文人对待内部底层校对排版印刷派报者是否一如对外般的公正公平公开。根据 Marx 对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 的批判，或许不该目眩于《大公报》生产出的文本论述商品，而忽略这些商品背后真正价值来源的新闻劳动，文人论政是表面，新闻人做工才是底蕴。文人执笔褒贬春秋之际，如何为（或不为）五斗米折腰？怎样布建新闻网与维持采访关系？容不容许员工异议、组织工会、参与工运？如何担心（或不担心）下笔得罪内部或外部的高层？阶级、性别、与族群的背景又如何影响媒体的运作与内容？自由主义所谓的新闻专业可能不只是一套「客观的策略性仪式」 (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 Tuchman, 1978)，也是许多有意或无意的特权累积。

更有甚者，依李老师的看法，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两大历史动力，十九世纪初的市场经济与二十世纪初的进步扒粪运动，近代中国都不具备，因此《大公报》的新闻专业是以儒家为体、西方自由主义为用的「儒家自由主义」，强调良心、气节、报恩、重义轻利（李金铨，2019，页 439），而四不原则源于儒家道德观，与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互相发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李金铨，2019，页 442）。实际体用结合运作的细节与问题不得而知，不过，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是社会结构矛盾硬道理逼出来的，《大公报》的新闻专业却是「凭良心说话」存乎一心。何况君臣父子之差序格局与非礼勿言的礼法规矩似乎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竞争与言论自由相扞格，报社内外容许或视为理所当然的特权恐怕只会更多。办报者自勉「不想赚太多钱，怕受到金钱的污染」当然值得「大书特书」（李金铨，2019，页 441），但是放在今日激烈竞争的媒体市场，不进则退、赢者全拿的残酷压力下，就显得太过迁阔了。

受限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高层知识人所办的《大公报》难免与当时广大的乡村农民与工人等劳动阶级脱节，即使有此自觉，《大公报》还是只能从特定的结构位置认知世界、说他们认为的真话。尽管如此，后见之明不足以抹杀《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李老师就认为「文人论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闻专业化是不可逆转的道路」，而保持儒家精神的媒介专业主义正可以补西洋同辈之不足（李金铨，2019，页 445）。相较于左派改变结构的论调，

李老师相信媒介专业主义虽不完美，仍是当前众多批评阵营都能接受的底线，只是原本利用事实意见分离与客观平衡报导等技术，监督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专业主义，却反而被资本主义运用来掩饰或合理化既有优势（李金铨，2019，页 64-71）。李老师身为批判性自由主义者，提醒第三世界不必将媒介专业主义「定于西方一尊」，他因此殷切盼望儒家「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天下为己任、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能够帮助媒介专业主义扩大格局、反败为胜，重建「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李金铨，2019，页 66,70, 445）。

「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胸怀固然伟大，舍我其谁的传统儒家文人自信或傲慢，在当今歌颂业余乡民的数字年代里倒有些格格不入。后真相的虚无主义与怀疑论使得媒介专业主义的信任度降到历史低点，李老师的解方却不是往左转，寻求更激进多元的民主参与，反倒往传统里钻，寄望高风亮节的道德菁英。只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真话与良心，于其他人的眼耳中可能是假信息与阴谋，为人民服务（for the people）的无私奉献恐怕会换得强加价值观、自以为是的奚落。更危险的是，随着中国崛起而从心性儒学转型再生的政治儒学，宣称理想的天下是「体现礼乐精神、王道理想、大一统智慧、三世学说以及天子一爵等儒家思想的政治体制」（蒋庆，2003，页 126），甚至批评普世价值，要将自由民主人权还给西方，改由政治儒家制定新的普世价值，「以夏变夷」，中国的价值就成了天下的价值（葛兆光，2021，页 194-196）。如此夺权侵略式的新儒家天下观，搭配内外循环战略与「党与平台的统合主义」，中国不光企图建立入吾彀中的经济与传播生态系统，最终还向往远近大小若一、万民仰望、万邦朝圣、由中国主导的「天下与王道」（梁治平，2021）。二十一世纪还憧憬张季鸾与《大公报》如李老师者，肯定会失望于如此的发展，担忧此般变质的儒家精神，不是救渡奄奄一息的媒介专业主义，而是临危补刀、葬送新闻自由的未来。

伍、如果从左派重新再商榷

James Curran（1991）认为媒体与民主的自由派概念（liberal conceptions）已与当代现实多所脱节，应该准备为其送葬（a decent funeral），

尽管承认自由主义问题重重，李老师仍反对 Curran 的悲观，他始终坚持启蒙精神的传统，希望能彰显中道的开明自由派特色，相信只要威权政权持续肆虐，自由主义的传播概念就大有可为 (Lee, 2001a, p.3)。壮哉斯言，不过，对抗威权、捍卫传播自由的并非是自由主义者的专利，历史唯物论批判媒体产权集中与传播的生产条件控制，同样抗拒市场与国家的宰制压迫 (Macnair, 2009)。左派不一定是教条式决定论者，也不全然都爱天花乱坠的大论述，一样可以进行中层分析，彰显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多种可能后果 (Meehan & Wasko, 2013)。

在李老师眼中，也许马克思主义难脱决定论的僵化，然而崇尚辩证法与整体观的左派只是偏好从经济切入，探讨劳动过程内外相关的具体影响因素，多元决定的特质并不预设所有传播工作者会有一致的遭遇、认知、感受、行动与结果，反而凸显传播劳动过程中利用、协商、抗拒、或改变自我认同的诸多样貌。自由主义者往往误将「制约」(conditioned) 解释为「决定」，令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分析不白地蒙上机械化约论的骂名 (冯建三, 2003; Murdock & Golding, 1979)。鉴于自由主义鲜少质疑个人主体性的社会建构与权力运作，普遍忽视劳动经验、性别权力关系、与多种认同交织，本文最后尝试顺着李老师的美丽意外，进一步再往左看，援引当代劳动过程理论作为概念架构以分析传播中物质条件与文化意识的相互影响，探究左派走中道、做中层分析的光景与启示。以下由巨观到微观，试着铺陈不同于李老师的左派理论概念与「非决定论」分析的可能性。

传播产业的劳动现场有各自不同的技术、工具、控制、组织等组合而成的生产体制 (production regime)，这些生产体制交叉运用不同程度的「同意」与「强迫」力量，驱使人们做工。Marx 的政治经济批判只揭发巨观结构逻辑下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忽略微观劳动现场形成之「生产时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可能低估结构限制中的能力，而劳动过程理论 (labor process theory, LPT) 就是企图弥补此疏漏的中型理论 (middle range theory) 尝试。

Harry Braveman (1974)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重新诠释 Marx 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想从生产取得剩余价值，必须控制劳动过程，

特别是设法克服专业工匠的抵抗并扩大产业后备军，因此垄断资本经由占有现代科技与生产流程设计，而将工匠「去技术化」(de-skilling)，也区隔出构思劳心的管理阶层与执行劳力的工人阶层，再由前者实际掌控后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步骤，两者的关系遂从合作转为从属、对立。原子化的劳工难以认识集体的处境，劳工内部甚至分裂、无法团结抗争，自动化科技更加深工人的劣势，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得以循环顺畅。

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否真帮了资本积累的大忙？回顾历史，面对资方繁琐的科学管理，工人与工会的抗争实则层出不穷，劳工还传阅泰勒主义(Taylorism)流派管理相关文章以求知己知彼、思考反制措施。当劳工身后拿码表监督的员工开始被殴打驱离时，资本家为了资本积累无碍，不得不发展柔性的控制技术，也被迫在劳动过程做出妥协，以「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 consent)的工厂霸权(factory hegemony)取代高压强迫的市场专政(market despotism) (张晋芬, 2011)。

Braveman 开启了劳动过程的研究，生产控制转变的争辩则在 1980 年代形成第二波的理论建构，随后因解构、后现代等思潮影响，劳动过程理论出现典范的挑战与反省，加入身体、情绪、认同、空间、流动等议题与分析面向。当代的劳动过程理论不仅认为资本积累结构下的劳动过程拥有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可以缓冲调适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紧张矛盾，帮助「掩饰与取得剩余价值」，还主张劳动现场形成之「生产时的关系」虽受结构性「生产关系」的限制，却可能因具体时空而新生的(emergent)经验，回馈引发「生产关系」的改变(Burawoy, 1979; Thompson & Smith, 2010)。例如：大众传媒中阶主管会因劳动现场与第一线媒体工作者的实际关系，决定采取资方/统治者或劳方/被统治者的立场身份；自媒体或社群媒体的工作者也会因现场协做或群众参与，而改变他与其他工作者的部分「生产关系」。另外，政府的管制措施、资源分配的政治介入、不同媒体部门之间的生产政治斗争、劳动自主性的多寡、与工会参与经营决策的深浅都可能影响「生产关系」。劳动过程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原本只是补其不足，采纳多元决定论后，如今已自成一家之言。

劳动过程理论流派虽多，但是核心概念不变，都是衍生自资本积累逻辑

辑下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不确定性与危机管理，主要论点有四（Thompson & Vincent, 2010, 48）：

（一）利用劳动产生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关键，因此劳动现场的劳资关系是分析焦点。

（二）虽非完全的经济决定论，资本家仍受资本积累逻辑的结构限制，影响资本家组织、授权、奖惩劳工的意愿与能力。

（三）有时单凭市场机制无法顺利转化劳动力为劳动，因此资本家必须利用许多控制手段以系统地管理劳动的不确定性。

（四）剥削与控制势必造成劳资冲突，为了顺利夺取剩余价值，资本家有时也要依劳动现场需要而妥协、合作、让步、转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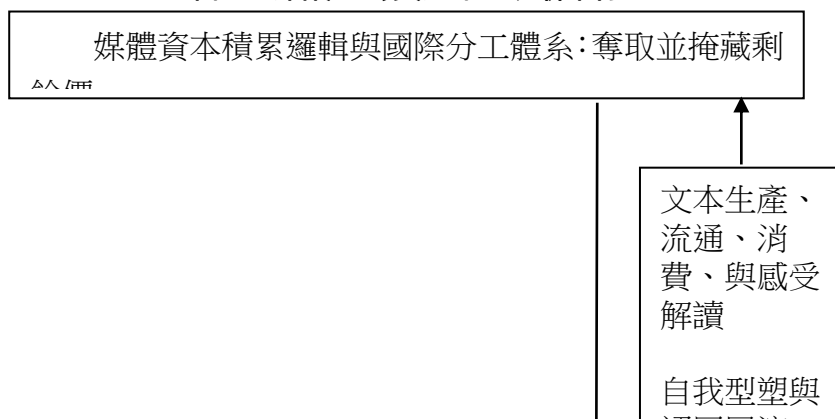
响应解构、后现代与新经济等论述，当代的劳动过程理论更注意劳动的各种弹性变形，也更细致地处理流动场域与多重认同之间的劳动控制与抵抗。可惜台湾劳动过程研究很少触及传播领域，多环绕在 Michael Burawoy 的论述上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呼应或质疑生产体制的安排与劳工「志愿性服从」的机制（柯志明，1993；谢国雄，1990, 1997,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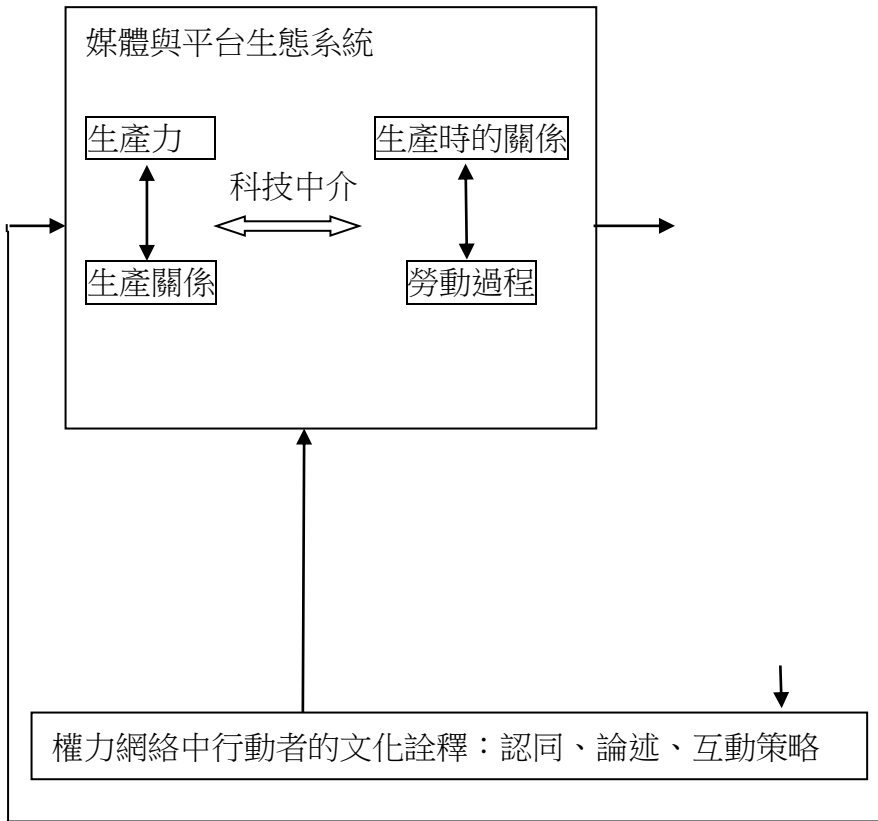
当代劳动过程理论聚焦于劳动现场各式各样的阶级斗争形式，也正视抗拒、收编、甘愿、压迫等斗争结果，拒绝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与单一性，但也反对后现代主义有关阶级斗争没落、意识型形态终结的天真宣言。目的是发掘正式制度下隐藏的非正式关系与冲突，藉此描绘与比较不同场域的实际劳资竞合样貌，并分析性别、族群、国家等与阶级相关、交错的影响，提供未来团结、动员劳动阶级、建立正义社会的基础。综合言之，图一是初步建议的分析架构。

如今资本积累战场已经从工厂职场扩张到身体、情感、私领域、亲密关系、与数字沟通层面，一方面原本互相分享与自我表达的在线行动被商品化为可交易买卖的劳动力，而且一如女性家务劳动，这些新战场的劳动帮助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却被视而不见与低估（陈志贤，2017, 2018）；另一方面，这些商品化与劳动力转为劳动的过程常常破绽百出、启人疑窦，无法

完全掩饰剩余价值夺取的冷酷无情，反而引发反感、掀起抗拒 (Skeggs, 2010)。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新经济的核心不再是具体的劳动 (embodied labor)，而是不具体的情感 (disembodied affect)，私密身体情感交流互动属于道德经济范畴，不合乎资本积累运作逻辑。情感的投资、维持、扩张、实现、与认可自有一套规则，不同于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这套另类规则已经在一些文化场域中实践，更在网络生产性消费者 (prosumer) 身上体现 (Arvidsson & Colleoni, 2012)。因此，传播工作者的劳动过程分析不能只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也要探索另类劳动、互动、与认同的限制与可能 (Fuchs & Mosco, 2012)。

图一：媒体产业劳动过程之分析架构





除了劳动过程中劳资互动的行动中中介外，资本积累的结构样貌还必须透过结构中行为者的文化诠释方能具体展现（谢国雄，2013）。Braverman自限在客观劳动条件的分析引发随后劳动过程理论圈是否该弥补主观条件的争议，虽然劳工在劳动现场的怠工摸鱼、自创工作方法、与情况的自主裁量判断都已经展现主观因素的作用，真正重视认同，视之为规范控制策略，主要是源于 Michael Foucault 与英国 Manchester School 劳动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影响（Marks & Thompson, 2010）。分析劳动现场中认同建构与归因的各种方式，有助于了解劳动过程的文化与经济特征，更能深入探究结构限制与

改变的可能。

利益与认同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在各劳动现场以不同的方式纠结交错, 有时和谐一致, 有时矛盾冲突, 有时优先级明确, 有时互相建构影响。劳动阶级由身处的利益位置发展认同, 也常透过认同的眼光以定义自身的利益, Marx 认为价值由劳动决定, 但是什么是劳动还是得依赖文化诠释, 只有综合利益与认同才能了解劳动现场的行为与互动 (Marks & Thompson, 2010)。劳动过程理论衍生的认同分析因此是社会性与物质性的观点, 视认同为争取、挪用象征性资源的一项工作 (identity work), 而非心理主观的抽象状态。

受 Foucault (1977, 1978, 1980) 影响, 劳动过程理论也认为, 认同是多元、流动的战场, 是论述规训与自我反身 (reflexive) 思考诠释的拔河角力结果。不管是宣扬人力资本投资的新自由主义或是高唱新中国梦的爱国主义, 统治阶级常以某一认同加诸劳工身上, 遮掩剩余价值的萃取, 以避开劳资对立。有些媒体工作者拥抱劳动体制, 以「认份」或「男尊女卑」来解释利润分配不公与职场歧视, 或以「顾全大局」合理化新闻专业的妥协弃守。但是其他人仍可能在结构矛盾、制度破绽、多样主体位置的缝隙中察觉、看穿劳动剥削与政治宰制, 甚至透过工会、社运、另类媒体等建构对抗性或协商性认同论述。媒体工作者的认同包含复杂的象征性与物质性资源, 反映个人生命史、集体经验、与反身性忖测计算, 与劳动过程既相关又独立, 分析媒体的劳动与互动, 不能忽略其中的行动者如何看自己、说自己, 更不能不注意认同的自我叙述与再现对劳动与互动的影响。

认同是一项工作、一个战场, 意味着个人必须持续主动经营、做出因应现实资源的抉择。尽管认同可以是多元流动的, 某些时空与行动现场条件限制下, 行动者会反身性地思考如何在公众之前呈现自我的认同较为适合。当代劳动过程理论援引 Erving Goffman (1959) 有关自我呈现的印象管理论 (impression management), 将劳动现场当成「前台」 (the front), 具体分析劳动者经常扮演的角色与戏码, 如何演给自己看、演给其他劳动者看、也演给资本家与者看。透过这些表演, 演出者与观看者一起定义所面临的情境 (defining the situation), 也经由情境定义的破坏与纠正恢复, 劳动现场的

游戏规则再次获得确认。不按剧本演出或随意即兴表演，轻则尴尬、丢脸，重则接受责备、惩罚，甚至隔离、排除。劳动现场「前台」的意外反而透露政经关系不对等的常态（Ashforth & Kreiner, 1999）。

认同是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叙说、再现，在传播工作者的劳动与互动中，认同展演既是手段、亦是目的，既是前台、亦是后台，既是自我抵抗结构的基地、亦是结构驯服自我的利器。当前劳动过程的控制逐渐由旧有强调企业文化、组织认同的规范控制，转向鼓励差异、欢乐、自我的新规范控制（neo-normative control）（Boltanski & Chiapello, 2017）。与其强制要求来自各地、背景各异的弹性组合劳力变成标准化的媒体人，当代的资本控制利用劳动者职场外既有的价值、特色与认同，顺势利导使其配合组织目标，自动、甘愿地完成劳动要求。以往被视为后台的情绪、欲望、身体、性、亲密关系、生活形态等因素，总遭排挤压抑以免阻碍前台工作，如今媒体与平台管理者张臂拥抱传播工作者个人特质，引诱她/他们以「做自己」（be yourself）的方式快乐自由地劳动，资方袖手旁观、等待收割成果，成本更低，生产力却更高，劳资皆大欢喜（Sturdy, Fleming, & Delbridge, 2010）。劳动现场的旧规范控制只明白规训劳动者的前台表演，而新媒体情境的规范控制将不知不觉地延伸包含前台与后台，传播者全身上下里外皆投入工作成了新世纪资本积累的福音。

新自由主义经济下传播产业要求工作者一人多任务，动员自己的社交网络找新商机与协力完工，运用数字社群平台进行互动以表演自己与推销作品。传播工作者从事的不只是生产传播商品的劳动，还有无数衍生劳动，包含：分享劳动、情绪劳动、身体美貌劳动、自我形塑劳动等等，为了累积自身的象征性资本，甘愿、甚至乐在其中地工作。

传播工作并非纯然人与事/势的交会与选择，而是镶嵌在资本主义、父权体制、政治意识形态中不断更新改变生产力的过程，即使如此，结果仍非事先命定，需取决于媒体生产时的控制、抵抗、与甘愿，交换时的社群共识、互信、与操弄，互动时的认同、论述、与戏码。以上不自量力的野人献曝，仅是尝试再往左看，寻找可能走中道的左派观点。博学的李老师长期耕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然走出一条属于他的传播研究途径。典范在前，崇

敬之余更形汗颜。相较而言，台湾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分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基础的工作要做，而这些知识雏形的萌芽或多或少都要感谢四十年前他带来的美丽意外。回顾李老师的所来径，期盼与他甜蜜交会的左派，也能学习他务实勿虚、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参考书目

- 李公明（2008 年 12 月 28 日）。〈文人论政 – 中国现代史的另一种读法〉。
《时代周报》（广州）。
- 李金铨（1981）。《大众传播理论》。台北：三民。

- 李金铨主编 (2008)。《文人论政: 知识分子与报刊》。台北: 政大出版社。
- 李金铨主编 (2013)。《报人报国: 中国新闻史的另一读法》。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李金铨 (2019)。《传播纵横: 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台北: 联经。
- 李金铨 (2022)。〈在地经验, 全球视野: 国际传播的文化性〉。李金铨编着, 《「国际传播」国际化》。台北: 联经。
- 何丹、徐鑫 (2021)。《中国基本盘: 双循环下的经济新空间》。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柯志明 (1993)。《台湾都市小型制造业的创业、经营与生产组织: 以五分埔成衣制造业为例》。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 徐佳士 (1966)。《大众传播理论》。台北: 正中出版。
- 马得勇、张曙霞 (2014)。〈中国网民的「左」与「右」〉。《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42: 86-103。
- 陈世华 (2017)。《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志贤 (2017)。〈新盲点辩论与赛伯人商品生产: 数字用户的劳动、剥削与抵抗〉。《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 63: 65-129。
- 陈志贤 (2018)。〈数字媒体与社群平台使用者之劳动分析〉。《信息社会研究》, 35: 13-50。
- 梁治平 (2021)。〈想象「天下」: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陈宜中编, 《大国的想望: 天下主义、强国主义及其他》(页 77-184)。台北: 联经。
- 张晋芬 (2011)。《劳动社会学》。台北: 政大出版社。
- 张泰芬 (2019)。〈比较法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法治史研究》, 36: 213-248。
- 敦诚 (1992)。〈再思考“传播帝国主义再思考”〉。《当代》, 78: 98-121。
- 冯建三 (1992)。《信息、钱、权: 媒体文化的政经研究》。台北: 时报。
- 冯建三 (2003)。〈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台湾的发展〉。《新闻学研究》, 75: 103-140。
- 葛兆光 (2021)。〈异想天开: 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要求〉。陈宜中编, 《大国的想望: 天下主义、强国主义及其他》(页 185-228)。台北: 联经。
- 杨冰柯 (2015)。〈评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新闻研究导刊》, 6(7): 183。
- 蒋庆 (2003)。《政治儒学》。北京: 三联书店。
- 谢国雄 (1990)。〈黑手变头家: 台湾制造业中的阶级流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2): 11-54。
- 谢国雄 (1997)。《纯劳动: 台湾劳动体制诸论》。台北: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 谢国雄 (2013)。《港都百工：商品拜物教的实践与逆转》。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 Milanovic, B. (2019 / 陈松筠、孔令新译, 2020)。《只有资本主义的世界》。台北：商周。[Capitalism, 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rvidsson, A. & Colleoni, E. (2012). *Value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ociety*, 28(3), 135-150.
- Ashforth, B. & Kreiner, G. (1999). How can you do it? Dirty work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2), 413-434.
- Boltanski, L. & Chiapello, E. (2017).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Brave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g, Y. (2007). Labor contract law: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hina Labor*, 7, 6-9.
- Clarke, S. (1991). The state debate. In S. Clarke (Ed.), *The state debate* (pp. 1-6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urran, J. (1991).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82-117). London: Arnold.
- Curran, J. & Park, M. J. (eds.) (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Flew, T., Ren, X., & Wang, Y. (2019).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 The digital turn. In S. Cunningham and T. Flew (Eds.), *A research agenda for creative industries* (pp. 164-178).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Y: Pantheon Book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Random House, Inc..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By C. Gordon) Brighton: Harvester.
- Fuchs, C. & Mosco, V. (2012). Introduction. In C. Fuchs & V. Mosco (Eds.), *Marx is back: 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oday* (pp. 127-140). TripleC: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http://www.triple-c.at>) 10(2), 127-632.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Golding, P., &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1), 15-32.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bermas, J.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ll, S. (1983). For a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Australian Left Review*, 1(84), 38-43.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esmondhalgh, D. (2022). The infrastructural turn in media and internet research. In P. McDonald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industries* (pp. 132-142). London, UK: Routledge.
- Hong, Y., & Wang, W. (2016). Embracing communication: China's post-2008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abor. In R. Max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pp. 107-118). London, UK: Routledge.
- Keane, M. (2013).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Lazzarato, M. (2014).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translated by Joshua David Jorda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Lee, C. C.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ee, C. C.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38, 1-38.
- Lee, C. C. (2000a).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4), 559-575.
- Lee, C. C. (2000b).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C. (2000c). State, capital, and media: The case of Taiwan. In J. Curran and M. J.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pp. 124-138). London, UK: Routledge.
- Lee, C. C. (2001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8 (4), 81-102.
- Lee, C. C. (2001b). Beyond orientalist discourse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Asia. *Javnost-The Public*, 8 (2), 7-20.
- Lee, C. C. (2003).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1-31.
- Lee, C. C. (2015).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6).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4), 581-602.
-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3), 21-42.
- Liu, Z. X. (2012).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rural broadcasting content in China. *Youth Journalist*, 30, 25-28.
- Macnair, M. (2009). Marxism and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37(4), 565-577.
- Marks, A. & Thompson, P. (2010). Beyond the blank slat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at work.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316-33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eehan, E. R., & Wasko, J. (2013). In defence of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Javnost-the public*, 20(1), 39-53.
- Miliband, R. (1977).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 R., & Liao, J. (2011). Wage increase: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ina Labor*, 7, 7.
- Murdock, G., & Golding, P. (1977).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pp. 12-43). London: Sage.
- Golding, P., & Murdock, G. (1979). Ideolog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M. Barrett, P. Corrigan, A. Kuhn, & J. Wolff (Eds.), *Ideology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pp. 198-224). London, UK: Croom Helm.
- O'Connor, J., & Gu, X. (2019). Creative milieu in China: 'Disjunc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L. Lim and H. K. Lee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Asia* (pp. 177-19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O'Kane, C. (2014). State violence, state control: Marxist state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iewpoint Magazine*, 1(4), 72-98.
- Skeggs, B. (2010). The value of relationships: Affective scenes and emotional performances. *Feminist legal studies*, 18(1), 29-51.
- Sturdy, A., Fleming, P. & Delbridge, R. (2010). Normative control and beyond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113-13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hompson, P. & Smith, C. (2010). Debating labor process theory and sociology of work.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11-2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hompson, P. & Vincent, S. (2010). Labor process theory and critical realism. In

-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47-69).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hussu, D. (2018).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a: The global context. In D. Thussu, H. de Burgh and A. Shi (Eds.), *China's media go global* (pp. 17-33). London, UK: Routledg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Wallerstein, I. M.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sko, J., Mosco, V., & Pendakur, M. (Eds.)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Westport, CT: Praeger.
- Weber, M. (1978).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oration. In W. G. Runciman (Ed.),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pp. 111-131).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ehle, S., & Rossiter, N. (2016). Mediations of labor: Algorithmic architectures, logistic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black box politics. In R. Max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pp. 40-50).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he beautiful accident of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Marxism walking the middle way without guarantee

Chih-hsien Chen

ABSTRACT

The interest in the leftist approaches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aiwan was sparked accidentally by Professor Chin-chuan Lee’s publication of a textbook o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forty years ago. Since then, this textbook had fermented analyses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debates around media imperialism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illustrated in his book were so rare to be seen in the atmosphere of anti-communism of the early 1980s that such a simple textbook had turned out to be a precious window to the view of the Left. For an erudite scholar like Professor Lee, this textbook as well as his PhD thesis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are nothing but a beginning of a productive career. However, given that there was only negative image of Marxism before, it may be worth following Professor Lee’s vision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possibilities and impossibilities of the Left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aper thus reexamin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rofessor Le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the focus upon his evaluation of Marxism, state-and-class relationship,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platforms, media labor and professionalism. In addition to that, taking the risk of attempting too much, some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theoretical potentials revealed by the Left but downplayed by him are tentatively highlighted.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Marxism, the state, class, media professionalism

* Chih-hsien Chen,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viking@nkust.edu.tw

台湾解严前后之传媒盛事的观察者： 李金铨为言论事的惊异奇航之旅（1982-1999）

程宗明*

本文引用格式

程宗明（2022）。〈台湾解严前后之传媒盛事的观察者：李金铨为言论事的惊异奇航之旅（1982-1999）〉，《传播、文化与政治》，16:87-113。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31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11 月 2 日。

本文曾发表于 2022 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专题在线座谈(2-3A)：李金铨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与在地化，6 月 18-19 日。

* 作者为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研究员，e-mail: RND6156@pts.org.tw。

《摘要》

本文以亲身观察，论述台湾出生的领导性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之影响力。时间刚好扣合李氏本人论说，进入台湾校园的起点。就是 1982 年其著作《大众传播学》被台湾出版机构所刊行，同时列入大学教科书。以该年入学之大一生而论，因必修的体验，产生惊异奇航的教育过程。此虽为早熟的研读，但对台湾民主抗争逐渐高涨的局势来说，该书反而在各种不同学以致用用的环境，散布出难以言喻的影响力。

李氏的时代之眼，又为台湾解严前后发展留存强大纪录，冲撞此一时代框架。经过一番沉潜，以中英文论述，以台湾为例，作为东亚传播民主化过程一个重要个案，分别从报业与杂志、小众传播录像带、第四台与有线卫星电视、及公共电视，表达他自博士论文写作以来，关心台湾传播问题之时潮下的淑世心声。

关键词：传播理论、解严、有线电视、公共电视

壹、时代的揭幕

1983年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外销出口的导向，成功数年后，遇上经济的低迷，又遭逢劳基法立法通过，当时的景气令人灰心，但是还不至于绝望。此外，台湾面对党外政治势力之崛起，现有国民党威权政府仍执着于意识形态的治国建构，在政治立场上坚称万山不容一溪奔流，只见对峙态势逐步高升，难测未来的对抗局势是否会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新闻学系教育，如何与这种号称「自由中国」又管制新闻与思想自由的校园，来取得价值平衡，这真是一个极为受震荡的局面，随着时日发展，逐渐冲撞。当时，置身于大学教育的氛围中，成长主要分成两大走向：「认真读书，入党国，平步青云」；另一种就是「逸乐导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保证财富人生」。取其外一条路而行者，几乎在人生的福华与校园的嘉许预期下，都陷入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与理工、哲学、文艺、与体育科系比较，大众传播类同于政治学之黉宫论世一般，随时可以质问统治当局带给国度如何的远景，而且是一种随学研日深、越得晋升批判之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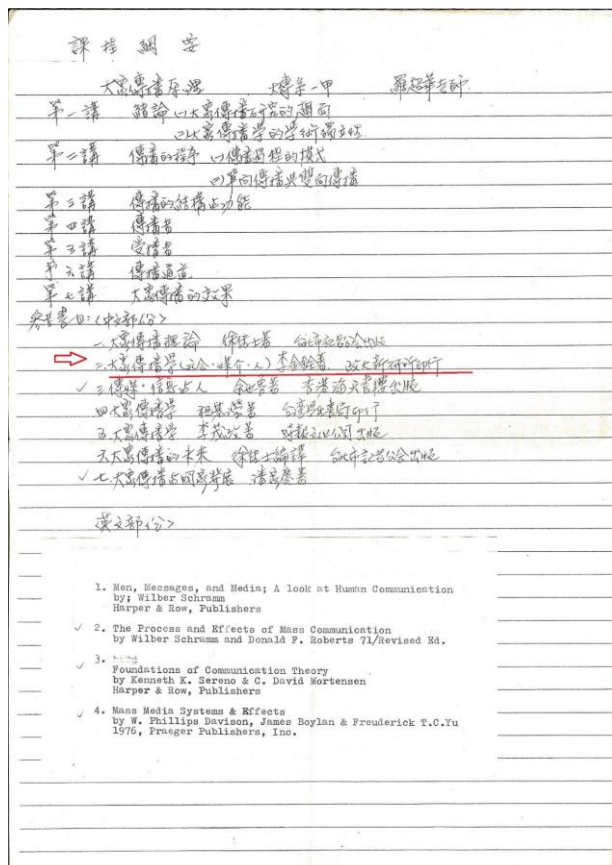
1982年至1983年间，台湾的传播教育已经形成「九校联谊」之规模，排除了南部，充分展现威权时代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分配思维，不会注重「南北平衡」而复制内在依附发展 (dependent development)，让台北的国立大学，特别是政治大学新闻学系之资源，放射状地提供资源给私校的大众传播学系体系，当时以刚成立的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个案。

延续既有模式，当年政大老师输出的核心课程，均会使用在党国体制中可被见容的美国行为主义 (behaviourism) 与行政学派 (administrative school) 为宗旨的各种改写或翻译的传播理论文献，举例来说：李茂政之《传播学》、郑贞铭之《传播原理》、祝基滢的《大众传播学》及祝振华翻译《大众传播学》(以上仅是几个范例，当然源生来看，都难超越徐佳士所著《大众传播理论》)。

本文作者，在这个历史时刻，十分特别的际遇，与学者李金铨学思产生

对话之关系。1983 年入学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由于前任教师潘家庆，因不能认同大一学生研习理论基础课程而请辞，于是系方临时聘请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的讲师罗超华（刻在新闻局服务），担任执教者。罗超华以研究所的历练为准（罗本身为文化大学新闻学系毕业），选择了当时李瞻主编的政大新闻丛书出版的系列，推荐了李金铨的《大众传播理论》作为大一教科书，这今日来看实在为一个大胆的实验教法，对于无尚社会科学基础与程度的私校大一新鲜人，是一种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的效果。本文，由此出发。

图一：1983 年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原理》课纲



貳、从主流论述的场域开打

在仍强烈驯化的 1980 年代左右，一般高中的教育鲜少给予社会组批判的思考空间，但是校园却容有一群比较异议的份子，会去阅读鲁迅、巴金、胡适、殷海光等论著，不过以当时大学联考分四组而论，这类人也多追寻丁组的法政而去，能留在乙组文史类之青年甚少。因此，这本传播学理论的新取向，如何刻印在一群白纸的「白色恐怖」影响下的世代，其实很值得存疑。

那个时代，初接触到《大众传播理论》一书，可谓天书般的腾空之作。的确，当下阅读应该就是一种中文的思想游记，多半坠入玄虚之中，但是好如「长尾」理论的意义，每每在日后不同学期有来自其中印象下的回响。

这本书引述进入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传播理论是美国的，而且引领我到一個很不熟悉的世代，似乎黯淡中经济大恐慌、欧洲的反犹太移民浪潮、罗斯福新政的翻转，这个一组三元素的拼贴，认识到传播理论开山的四大始祖。但是第五大才是更决定性，就是宣伟伯 (Wilbur Schramm)，当时我也念过台湾其他论著，应该被称为施兰姆，两者都是相当陌生的翻译名词。直到三年后，读了 Todd Gitlin 的名作“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这些人的故事才跃然纸上，这就是李金铨本书之后效的写照典型。

不过这本书，相当讶异的从一开场，就把目光移到「传播者」自身的研究，第二章概论「守门人」的专业意理，就不断进入眼帘，好像对我们一种新闻魂的招唤，从此对于记者的憧憬多了一份自负。同时，在这番的讨论中核心的议题，就是「中立者」与「鼓吹者」两者身分，从这里揭开「客观理性」与「介入改变」两种专业意理的长期辩论，特别是往后数年，在校外风起云涌的民主争取，而校内各种刊物实习发声的串连下，成为最实际的激辩立论所在。

另外一个专有名词为「新闻室的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 in newsroom)，装备一种对未来的职场处境的抽离眼光，可以处于其中，又腾乎其上的参与式研究观点 (participatory approach)。这方面的论述，也在同期政大《新闻学人》与政治作战学校的黄新生论著中持续出版与讨论。

接续的内容以传播组织、体系、传播科技革命一系列展开，本书在这里对于传播的理念探讨，锁定机制与系统 (institution and system) 观点作为发扬，实属少见。但是，这方面讨论，其实是本国忽略了社会、经济、经营、

技术等角度考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李文的超眼光与其说标新立异，倒不如说帮台湾井底开天窗，更进一步说这些都属于政治性 (politics) 与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的社会建构指针，探讨此类话题，其实也非威权当局所好与所支持，李氏在香港的居住隔离事实，还是有一种大胆论述之意图。

李氏的教科书在当时大专院校使用同时，与其在他领域发表论著可相得益彰的效果，举例而言，1984 年 1 月 6 日，联合副刊推出居安思危十日谈系列，第七帖就是请李金铨对谈〈当前大众传播的危机〉。这篇文章，用较短篇幅，浓缩了传播理论前五章与后三章之精义，保留第六章受众效果而未论。

图二：传播理论出版后在联合报的首次受访



他先举出，台湾在现实上即将面临的传播科技挑战，含有线电视（骤失生机，拖延十年）、录像机（无惧关税而普及）、计算机（五年后突然猛进发展）、小众媒体（五年后突破性扩张境界）。同一脉络而论，他认为传播科技的本质虽为中立，但是因为使用者的私心，所以创造出的问题比解决问题还多，李氏论点就是科技进步的黑暗面，必须高度警觉，不能一厢情愿拥抱之。

此外，他继续表达传播权的控制 (control) 问题更须关注，引述 Herbert I.

Schiller 的研究观点, 所谓 500 家大公司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垄断了信息的生产与分配, 警示大家必须对于「信息世纪」概念作条件性考察与接纳。话锋一转, 李金铨在访问的最后, 回到电视问题。他虽说没有长期在国内, 但是仍以制度面考察为衡, 说出几句核心诊断:

- (一) 缺乏电视的主张
- (二) 形成最可议的寡头垄断 (三台)
- (三) 内容脱离现实、蒙蔽人生、标榜浮华奢糜
- (四) BBC 为榜样很理想, 基于文化背景差异不容易在台湾实行, 不知香港电台 (RTHK) 作法不落俗套可否参照

这一篇文章, 几乎就是他的理论书的浓缩精华, 而且最后这四点建议, 几乎等同对「威权政权的电视政策」之宣战。这里可以看出, 当年发表报纸文章的社会化作用, 比较快速与精准。另外, 海外身分比较可以提出政策建言, 而不被安全单位 (警备总部) 所骚扰。李氏对三台的批评, 等同「操作型定义」当时党外杂志对于台湾电视的批判, 所谓营造「逸乐取向」的愚民策略。如果这是在课堂上, 进行实地讲授的言论, 难保不受到学校人二部门的约谈。

撇开政治性的意义诠释, 李氏著作在第十二至十四章的最终教导上, 的确有开天辟地的国内教学效果。以「帝国主义」这词, 最具破坏力。的确这三章虽然谈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恒常三十年的研究辩论, 但是前者四字最为吸睛, 甚少出现在偏右意识形态的保守学府殿堂之上, 相关内容, 所引发的重大思想冲击之先声 (早先于其他基础社会科学之教育), 有以下数项:

- (一) 中心与边陲 (出自华伦斯坦学说, 属于社会学领域)
- (二) 第三世界 (属于国际关系领域)
- (三) 文化侵略 (美日影响的攻防, 左右两派各自逢源之理论)
- (四) 移情能力 (empathy, 心理学)
- (五) 完形心理学 (社会整体大于个体的总和, 心理学)

(六) 信息自由畅通 (Transborder Data Flow, TDF 之研究热潮)

(七) 产品生命循环 (product life cycle, 研究所之国际经济发展的相对利益之说)

(八) 军事—工业结合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近代地缘外交与政治经济批判)

李氏在这本教科书的最后, 安排了「政策」一章, 显然寄寓学生研习之终, 能爬升到「规划」面 (design) 的高度, 他以第三世界吊诡为结语, 似乎不比一般逐渐兴盛的政治运动来得直接, 如推翻国民党专政、追寻台湾文化主体性、回到本土在地研究典范、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等, 但是指出知识分子的关键角色、传播科技的辩证演进、动员群众对民主参与之间的矛盾, 论者似乎期待一场政策运动, 相形之下就是一种温和渐进的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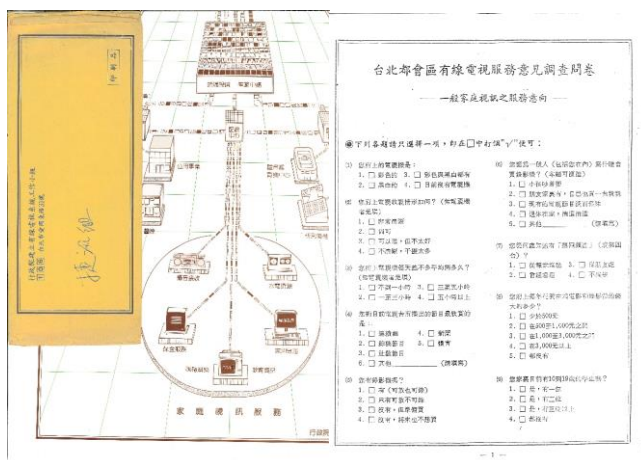
究竟, 这种温和改良 (incrementalism) 建言, 在当时抗争将云涌前夕, 视为「狗吠火车头」的痴人梦呓, 还是一种「积极的反叛」但必须逃躲「威权」的锁定追杀的遁术, 在当时应该看法颇为两极。不过, 李氏在此「匠心独具」提出, 台湾电视问题应该只保存一家「公共电视公司」, 下设商业与文教两台, 做良性与互补竞争合作, 这种建议, 似乎有一点迹象, 直指 2000 年后改革趋势的必须选项之雏形。

这一场思想生动的一学年课程 (大众传播原理), 也促兴了两次观察台湾传播动态的现场, 一个为选举的心理动力模式的考察, 全班以「1983 年增额立法委员选举」为例, 直接至政见发表会现场观察与访问, 了解人际传播 (政见发表会、政见单张) 与大众传播 (报纸) 在劝服上的效果比较; 这次除了党外势力逐渐成长与曝光度, 选后国民党在台北市大获七席全胜 “7up”, 而党外因为「鸡兔同笼」的内哄, 导致只有一人 (江鹏坚) 选上, 成为一个选举历史的著名事件。

另一次场域观察, 则是 1984 年春, 拜访传播机构。经选定以「有线电视与今日社会」为题, 做文献分析的报告, 该作业并且要求配合主题执行一次小型问卷调查 (survey); 经过讨论与研析, 决定前往位于交通部电信总局在爱国东路之办公室, 与「建立有线电视系统工作小组」接洽, 并索取他们

设计的调查问卷「台北都会区有线电视服务意见调查」。携回后，从同学的家户与亲戚中做立意抽样调查。这次经验更为宝贵，以当时政治气候来论，大学生与官方机构之往来甚有门坎。结果，难得之交会，因该小组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费骅直接督导成立，纳编在电信总局的专业技术团队下，态度开明与进取，促使学生与该小组往来获得善意回应，很快就取得基本资料与问卷，这是原理课程实现了一次历史上难得之研究兴趣交会。从李氏大众传播专书的教育下，显然「心理动态模式」藉由政治选举传播的测试，形成一个恒常的辩论议题，直到解严前达到高潮；另一方面，李氏说法中的传播科技与社会政策之建构，引导掌握到「有线电视」这个关键，它承载了解严前必须开放或政治反对势力巧妙挪用的社会资源，也就是产官学的焦点，让大一新生快速地与当前传播力目光结合，进入有线电视彰显台湾在地传播生态的管窥，这应是早读李金铨之书，意外地大幅进步论政能力之所在。

图三：有线电视系统工作小组是课堂作业接触的第一个政府传播单位



参、海外学术建言的脉络冲撞本地政治门事件

带着《大众传播理论》所内化的一些角度与未能深切理解的观点，持续接受传播科系的进阶教育。李金铨在后续三年，仍是不能在台湾课堂上见到

与亲炙的老师，但是著作论说的流传，更大开展。

1986 年李金铨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副教授，不同于很多早期留美的博士人才，都尽皆入了「政治大学」，他的落点很有策略的高度。简言之，当年国内是否有真有学术自由，其实仍是一个问号？言论的红线处，似乎可以画出但也无从保证不挪移。之前，社会科学部门有政治领域的黄尔璇、心理学领域的蔡式渊被赶出学术圈，而经济与报业实务领域的陈玉玺，经年无法回国任教。当然，如果参加了党外政治运动的学者，必然无法论足于专任教职。早已有成的国立大学教授，虽可涉猎党外政治，但是要去大学做演讲活动上，仍受百般刁难（如李鸿禧）。这都属学术界的「政治门」事件。

图四：联合报所附照片以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屋宇为背景



对于李金铨的位置而言，短期内不用操烦以上安全顾虑。似乎，于此他也逐步自然地介入了政治的议论，成了传播事件的主要评论者之一。这时李氏自嘲，为南港看台湾的时代。但是反过来看，李氏加入了这场战局，对于台湾的传播学子来说，更为一种瞩目的介入性因子 (intervening factor)。从 1980 年以来，在传播问题论坛上，也不乏有自由派人士，站在国际水平或者

美国观点下，提出对政府应有的「建言」，但识趣地并未直指「认同」危机之层次，包含台湾关押与监控为数甚多政治犯、台湾打压所有本土文化的意识发扬、以及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攻复国之荒谬性。李氏言论，如果快速响应以上范围，安全体制的围剿至少要做出战事，甚至危及国内的教职。

李金铨如何回避以上致命的袭击，但是仍衷于原本在教科书中的意旨之传扬，很有观察价值。李氏在自己著作《政治的新闻 新闻的政治》曾有回顾剖析，他认为这一年当中（1986-87），分成三个阶段参与了政治评论。第一阶段谈论了台湾大学的「大新事件」；第二阶段谈论「选举期间媒体公信力」；第三阶段谈论「报禁与开放」。本文认为，第二阶段的李氏言论，最为时代冲撞留下关键轨迹。

图五：桃园中正机场事件后慎重地指出当时媒体的问题



正如他本人在〈是重建媒介公信的时候了——为迎接民主政治进一言〉这篇文章的提议（发表于中国时报 1986 年 12 月 25 日行宪日特刊），等同他对于实体政治的积极参与之指标。这篇文章，以大媒体的公信力衰减为题，将 1986 年底增额立委与国代选举时期中发生的「中正机场」事件，列入检讨。这次事件，几乎是 1978 年「美丽岛」事件的翻版，就是事后应该有集中火力铺天盖地的「暴民、滋扰、打警察」媒体报导，导致政治反对运作再

一次全面敗退。但是剧本未如这样编写，其中有「自立晚报」现场完全不同的报导，还有 ENG 绿色小组场拍画面，在各「为民服务中心」日以继夜公开播送，让人民知道了与主流媒体完全不同的「事实」。而且法务部调查员陶秀洪案演出，更是让电视媒体公信力完全破灭。

图六：自立晚报在机场事件一战成名后紧接着请专家评论



李金铨在此一事件之后，出现在几个关键发言场合。除了前者中国时报的专文，将此一事件列入关键的大小媒体抗争事证，且还需要厘清真相之后续；另外在 12 月 19 日一场自立晚报邀约的「新闻报导公正性／客观性之探讨」座谈会上，李首先表示机场事件各种媒体偏执一辞，电视新闻处理更是失职；第三是于一个月后的《中国论坛》登场，本期以主题〈民主要向下扎根〉邀稿谈媒体的信度，李在话题与回响之设计中于二月登场，补充之前潘家庆与林东泰的评论意见。他的想法有几处对「强化主流媒体」的驳论：

(一) 必须先提出关照事件的具体状况，否则谈论守门行为、组织运作与媒体环境之分析将会虚空化；

(二) 自立晚报的不同报导观点，为何卖出高达四十万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问题应该已经凸显出来；

(三) 评论对此次主流媒体刻意掩饰宪警打人之事，并无不妥，反而是要求评论者一定也要批评群众破坏警车，才是无由之对等强求。

图七：在《中国论坛》的媒体与选举问题专辑中发表关键性的评论



第四处，就是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人间》杂志，于1987年1月号的专刊〈大众传播的龟裂〉中，以媒体反叛为名，访问各界评论者，李再次以学术界与专业界身分受访。他强调小众媒体出现的价值与象征意义，是一个社会共识的架构崩解的表征，所以事后定要再形成一个以人基本价值为本的共识基础，才能使民主健康前行。

图八：在替代性媒体《人间》发表看法实属少见



这些立论，今日来看可能无甚「新奇与反动」之处，但是以当年媒体学术当道为「国民党威权」所掌握，李以中研院的研究员身分，又是「传播理论」的教育者，频频对台湾反对政治运动给予新定位，以及肯定媒体反叛的时代意义，又出现在异议性媒体，殊为先行者（政大人中也属少见）。

不过，又非只有努力在政治评论层次，同一时间，1987年5月，将近中研院客座满一年前，李金铨发表另一篇杂志评论，名为〈传播理论与新闻实务之间〉于《中国论坛》之上。这篇文章颇有「红海回澜」之势，厘清我们一些对于传播学术的想象。文章中一系列的探讨，其实响应了当时传播教育浮现的一些争议，如：

- (一) 传播学的独立性
- (二) 传播效果致力于内心机制的解构
- (三) 传播教育的超然性
- (四) 传播学者能够理解大传媒实务吗
- (五) 传播学本土化的中国或西方取向

简单说，李文对于前三者给予否定的论证，但是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批

判性的解读」。第四点，则是大为鼓励传播学者，无须自囿于媒体实务人揶揄，深入地理解 (verstehen) 才是解明的答案。李的解析，直指很多传播名著的作者，都受个人成长背景影响了切入的角度，这种从人的生命史角度看见「学术的脉动」，在那个时候十分罕见与传神。第五点，似乎就是回应台湾当代的学术悸动。

当年无论是「中国文化的民主实验场」、「社会科学本土化」等这种「中研院」的语言，的确也是至高层级的讨论目标。其实落实中国化同时，还有本土化的挑战 (indigenous)，而当代了解台湾社会行为论者，是否都由实证资料基底，演绎到西方理论架构做了一个他类模式 (alternative)，结果更被学术自主性所嘲讽，这些都是一时之间难以挣脱的议论 (exogenous vs. endogenous)。李的文章，提出这些至为关键的议题，随手也提供了局内人与外人的世界，以及陈寅恪的治学之道，一时之间，突然让读者向往传播知识论的博大精深。这真是，当年一个期待转变的传播思维指引。与其说，李老师有先知先见，不如说他跟许多认真耕耘传播研究思维在地化的我们，共享语言、共笔发扬。

而紧跟着五个月后，另外一篇〈电视文化何处去？处在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夹缝中〉，也在同一处发表。当时解严后的台湾，所获致的自由出版，已经开始将集中火力，对准电视媒体开始批判，这算是一个「结构化」的序曲。与其说作者认为出自原本 1980 年的博士论文改写，倒不如说结构依旧但是内体更新。这篇文章确认「官控商营」的电视弊病化的制度，也以少见的依附性发展为台湾电视经济行为诠释（同一期还有黄新生的博士论文也这样匡列）。

对于很多当时已有的电视批评文献，李金铨将其放在中国与台湾两种结丛 (complex) 来透视，可算一种基底 (radical) 的批判。对于当时，身处于青年阶段的传播世代，这个架构很传神，因为我们眼见两种新血脉进入三家电视台：第一种「外省人、国语优势、官方意识形态传承」；第二种「本省人、地方仕绅、大中华涵化的顺从」，他们象征的构成，显然让电视公司架构出在台湾仍有延伸力的霸权铁掌。

李金铨很直接地，从理念与文献诠释下，将电视由一种外来自由经贸橱

窗的特权茁壮，居然可以任凭锱铢计较的唯利是图劣质，屹立不败之生态描摹出来。不受号称以儒家孔孟学说五千年的中华政权份子之挟制，屡番「国有化」意图都无法达成，反而常以感官与逸乐声色的提供，满足很多意淫的统治知识阶级，谈笑之间任理想灰飞烟灭，持续恶质输血电视肿瘤生长下去。

李金铨还还原一个更特殊的电视面貌，就是并非理性地寻求「经济最大化」。如果以语言与文化邻近性而言，节目应该采取更多台语与日本戏剧播出为取向。然而，居然持续压抑台语节目，并且限缩外语节目进口（日语根本不准）。其实，从经济而论，还是合理化（程宗明，1999），只是一种内在殖民的次系统繁衍在台湾，也就是创生更多忠诚份子的「传播公司」家族，以外包外制方式，让电视公司坐拥地租，这是电视公司职员的更大「合理化经济效益」，而政府只图换取他们死忠支持政权就好。李文是一种结构化语言，为台湾电视产业定命，馆藏在乎学术与政治评论之间的文化性杂志（cultural journal）论述下，成为典范。

李金铨在这篇论著中，并未提到如何从根本改变台湾商业主导电视体制，直等到 1992 年澄社发起的「解构广电媒体」计划进行到研究高峰之后，他开始撰写〈台湾的广播电视蓝图〉结论文。李氏言论在公共电视提议上，向来着眼大方向，而非小细节；管制在政治力的节制，而非群众运动与监督团体。过去，李文对于公共电视的憧憬，多半建立在英国、日本与荷兰，邻近的参照国家选择加拿大而非美国。在这个结论中，他很简明扼要提出筹划「公共电视」的要件：

- (一) 广电资源规划应孕育公共广电的发展
- (二) 培养社会多元社团的代表性
- (三) 维系以人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共识，让公共与商业制度在其中合理并行
- (四) 建立媒体工会制度，特别是保障新闻工作者的独立专业自主
- (五) 不受行政机关任何任命的拘束，安排在国会规范下的直接监督

以上言简意赅，为李金铨对于「公共电视」最大篇幅的立论，从今天来看，(2) (4) (5) 三项都如其理路，持续深化落实。但是遭逢网络媒体兴起，

何者是公共电视媒体的公共资源，此一义目前急速地变迁中，所谓宽带将取代频谱；而维系台湾整体人口的基本认同，更为艰辛挑战，这一部分正是李金铨于 1990 年将研究转移至两岸三地的新闻媒体研究一样重要，究竟在目前地缘政治动荡下，公共电视当协助全国人民建构如何保台民主的共识，仍有待被震荡，并期许有新生命共同体之建立。

肆、沉淀台湾之本土发展·春蚕吐丝「台湾模式」于全球社会

1987 年中以后，台湾迈入解严，媒体发展产生极大成长，也因民主开放，新兴媒体陆续准备申请合法经营，连同报禁之迟来开放，呈现媒体市场爆炸之五花八门景象。随着中研院客座的结束，但是这个身分的意义似乎并无结束，持续在台湾各种报刊杂志投稿与邀稿后出文，而且领域扩大，从媒体到两岸生态、中港媒体与政治皆有之。本文第三部分，要指出经过深入观察体验，逐渐沉淀出对于台湾这波民主化的媒体运动之思想，李金铨精心为台湾留下纪录，而且在世界舞台上发表，致力使台湾成为第三世界依附发展下的一个独特案例。这个行动，对于台湾传研学界立足于国际学术圈之舞台，极为重要。

这个第一次解严前后的媒体历史发展之回顾，投稿在著名的期刊书“Journalism Monographs”(1993 年 138 期，AEJMC 出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湾报业与民主变革的崎岖故事〉(Sparking a Fire) 为名。论者以为，此为定位台湾党外杂志历史的学术之作，而且是以全球观众为对象。

如这个特殊历史议题所限，李金铨在开章之处，阐述台湾发展难有奠基之作 (groundwork)，使得在地经验之收整，欠缺次级抽象化衍之文献探讨可对照。他指出，这样台湾时期研究之引领，如同博兰尼 (Michael Polanyi) 所言，希望靠赖一种「默会知识」架构之指引，奠基在众多各式各样的中文记载文献 (回忆录、访谈、新闻资料)，另外还有透过访谈新闻记者与政策管理执行单位，得来必须化名的综合说法。他还使用了「党政军」三合一的台湾著名统治结构，以英文所谓 triple allianc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来描绘。

之后，精彩的台湾言论抗争历史英文的回顾，就展现在眼前：有自由中国的橱窗与封镜、出版法修正案的紧箍咒、李万居《公论报》被倾覆、联合中时崛起与迅速收编、文星杂志的萧墙内抗斗与整肃、白色恐怖极盛中陈映真、崔小萍、李荊荪陆续施报复予监禁。一路的打击自由言论抗争，铺了蒋经国的登机之路，即至掌握权力，短暂给予《大学杂志》一个新时代的封官授勋，之后瓦解内部来收拢自由，却意外导出党外势力的先锋。自此，党外杂志时代启动了。

李文从此开始由学术论述方式，第一次为此一媒体定位，始自 1976 年的《台湾政论》，不同于前代自由主义志士争取，该杂志首次点出台湾化的本土运动，争取政权合法性危机的诠释位置。并且，杂志出版与政治选举贴近，亦步亦趋地发展壮大。另以《美丽岛》杂志社为例，本身也是一个政党动员的机关。

虽然美丽岛事件暂时止息第一股反对力量，但是党外杂志的兴起，让争取言论与政治自由的观众，扩展到知识分子以外的中产阶级与草根民众，同时也使主流报业不可导报的信息，流转 to 这些杂志有了替代性出版的意义，更形成不可取代之市场，即或政府警备总部努力查扣，也不能止息。

在八零年代的党外杂志市场，虽有《八十年代》作为领头，但是过度导向议会路线，亦使阵营内部产生激辩，另外生成群众路线的杂志，强调「鸡兔同笼」的荒谬，要求更激进的行动路线。

值此挑战，蒋经国的党羽王升成立刘少康办公室，意欲更集中火力打击民主抗争，结果于「陶百川围剿」事件踢铁板，被自由主义的报业反击，但是集结力量再围剿也使余纪忠的《美洲中国时报》掣羽而归。但是少康办公室接连出错，造就十信事件、刘宜良枪杀案、逮捕李亚频报老板案，都激怒美国势力，导致办公室瓦解。蒋经国认识到回归民主的必要，决定解严与解除报禁。1988 年逝世之后，台湾的确展开新页，党外杂志的追求目标虽达成，但是不择手段的报导出招，导致公信力下降，也因着开放逐渐丧失影响力，被新起的报刊集结到各种社会支持力，而逐渐没落，恢复主流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终被取代。

李文最后以四项主旨讨论，来定位这段台湾言论争取史。很值得延续辩证思考：

（一）小众媒体与社会运动一对比第三世界的游击队媒体或者激进媒体，台湾党外杂志能否作为一种替代性媒体制度，最后是促成民主的胜利成功，还是自身臃色腥的政治报导作为退场？而绿色小组的 ENG 节目，是否为第二阶段的主流广电媒体抗争的替代性主体？

（二）公共空间争夺竞争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以全盘政治化各领域，来操控人民，且动员人民积极政治演练；国民党以促使人民对政治冷感，投注心力聚敛经济财富为交换，换得自身政治威权二十年之稳固，但是至终经济发展下滴中产阶级之成功，缔造了政治变迁的动员吗？

（三）国民党统治下的主流媒体内在矛盾—主流报纸媒体中时与联合，长期的养士与作家团队，建立了知识与自由主义对威权政权的促兴与监督。甚至主流报纸的报导与党外杂志之间有共生的供应关系（symbiosis）。从历史观点来看，李老师似乎更是一个见证人，甚或参与者，在这个角度上，仍有相当空间可发挥吗？

（四）市场控制之外还有的挑战—虽说政治审查退位，经济的报团力量将成为下一个挑战，如首都早报与自立晚报都凋零下去。但是整体传播生态内外的改变，引来「国家认同与主权」的冲击，来自日本与中国媒体的影响力，似乎更值得重视吗？本文作者也认为，增加公共电视媒体的出现，似乎有带来本土的文化观与外来相抗衡吗？

顺着第二阶段言论自由之争取，所谓打破广电媒体之垄断，也是台湾自1980年媒体发展中一个延长赛局。然李老师也没有缺席，早在1999年发表于NHK文研的广电研究论文，七年前也如前文发表时期，写出了有线电视的本土发展定位。这篇由韩国资深传播学者康贤斗（Hyeon-Dew Kang）所征集，收录到《东北亚的国际新秩序与传播政策》专书中之文章，以〈颠覆电视台的控制—台湾的有线电视与国家〉为名。

表面上来看，解严后的报业开放市场，快速集团化排除了新进者，因此

民主抗争势力转向小众媒体或区域性有线广播电视，为一合理走向。然而，一时政治热情（包含立法院辩论、政治演讲、抗争现场纪录长期播放），但缺乏其他类型节目投资经营，终究导致收视疲劳，民主电视网的概念十分虚空，而被其他地下电视台文化所吞噬。然而，VCR 的小众摄影纪录的「绿色小组」纪录，也未能有效发展出商业发行，跟民主电视台之合作也不永续。李文凸显出更大的本地广电产业脉络问题，就是在解严后，并未实时转型国有至公共广电制度（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导致国民党威权不散，持续掌握寡占电视事业；而反对势力，以为奠基中产阶级经济，就能经营对抗之替代性有线电视产业（其实是需要自然独占的投资规模），终至失败，只能极化反对意识形态，而沦为政治性的言论机器。

图九：韩国学者康贤斗整合的文集（左）；日本 NHK Studies of Broadcasting（右，本册十分珍贵，因为台湾没有一个图书馆有此馆藏）

Hay Hyeon-Dew Kang (ed., 1992) *Changing Information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and Communication Advances* 317-321

19
Subverting Television Control : The State and Cable Technology in Taiwan

Chin-Chuan Le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ocument the way in which cable technology served to subvert state domination of television in Taiwan. I have examined elsewhere a parallel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of the press, in which political magazines (as a little medium) proved to be a mainpring of social dissent, a center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an indispensable wedge that finally opened the rupture of official ideology. They pushed political boundaries, broadened press coverage, and gradually chipped away at state ideological hegemony by being a standard yardstick of reality in times of confusion.¹⁾ Since more generally, big media tend to reinforce the status quo while little media may be more suitable to foster change at the margins.²⁾ Because of their low capital requirement and high flexibility, little media could well be the most potent (in some cases, the only) resources for waging

1) Chin-Chuan Lee, "Sparkl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orerun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in press).
2) I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paper to elaborate on this statement. Suffice it to add that there are uniqu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big media can be an agent of social change. For example: (a) When there is a popular revolt among media professionals (such as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during the protest movement against President Chun Doo-hwan's authoritarian rule in South Korea) who can stage strikes or disrupt signal transmission; (b) Because of the market function, even conservative media may gradually carry liberal ideas; and (c) When the big media have a credibility crisis du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little media, that the big media must seek change.

Studies of Broadcasting (English version) Japanese

The purpose of this annual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i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by introducing Japanese research on broadcasting to the world, and by publishing research papers from abroad.

Price:	No. 34 (1999) 2,300 yen
Edited by:	NHK Broadcasti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2-1-1, Atago, Minato-ku, Tokyo, Japan
	Phone No. (03) 340-4800
Published by:	MARKETTES Planning Network Co.,
	3-9-2, Nishi-Shinjuku, Chiyoda-ku,
	Tokyo 163-8244, Japan
	Phone No. (03) 3174-0609
Sales Agent:	MARKETTES Co., Ltd.
	3-9-2, Nishi-Shinjuku, Chiyoda-ku,
	Tokyo 163-8244, Japan
	Phone No. (03) 3172-0521
How to buy:	Please order at bookstores or sales agent.
	Please ask NHK Broadcasti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ssues before No.31.

1999 No.34 CONTENTS

● Special Issue: Reconstruction of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Age

■ Digital Broadcast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Public Sphere	Tatsuro Hamada
■ Future Options for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Context of Digitization	Geert C. Koopier
■ The Digital Broadcasting Debate: How to Harmonize Public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Mauro Iida
■ The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A Tentative Study of Fundamental Challenges	Toshitaka Hayashi
■ State Control,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Concerns: The Politics of Cable Television in Taiwan	Chin-Chuan Lee
■ Japanese Time Use in 1995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Division, NHK Broadcasti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李金铨于 1999 年再次将上文扩张篇幅，把有线电视合法化过程的内外因环境再一次定位，这次发表在 NHK 文研的英文刊物——“Studies of Broadcasting”（此处也是 E. Noelle Neumann 发表著名的沉默螺旋论文之处，

有很高学术价值)。首先，他增加了理论架构，定位国民党的国家机器，历史以来用威权—商业—科层文官架构来运转 (authoritarian commercial-bureaucratic state)。这种政治抓权，却在经济事务聚敛钱财上放权 (甚至放任)，这其实也说明了，国民党政府能在解严后仍然维持威权统治达十五年之久的依据，但是也使台湾媒体民主化变质了。

以有线电视来论，其合法化的要挟得逞，即在于不挑战政权，而尽力先播无授权的国外卫星频道与电影节目，同时竞逐原来无线电视的观众，从此逐渐坐大。然而，李文充分显示了国民党新闻局，无能力主导传播政策，对于非法有线电视一筹莫展，更无法抵挡美国 301 报复法案的要求，只得快速通过合法化流程，导致有线电视所有权集中化，并以低价串联成卖方托拉斯。本文最后，提出三大问题探讨，牵引出深度的传播政策质问：

(一) 国民党为何容忍地下有线电视之经营长达十五年？李文在此正式引述冯建三的文化贿赂一说 (cultural bribery theory)；但话锋转向认定，关键还是在于该产业无意挑战国民党威权所致。但是台湾社会声色犬马之影视放任，仍是国家统治中的罕见之例，国民党纵容逸乐取向，仍是有迹可循，急需给予理论化 (如纾解论 Theory of catharsis)，可乎？

(二) 大众媒体与小众媒体之互动。有线电视从小众起家，无政治影响力，国家无意国有化，地方性浓厚。但是合法化所有系统后，因缺乏管制，导致逐渐蚕食，依照经济规模导引，集中化成大媒体。但是真的没有国家的规划吗？本文论者认为这里需要回顾 1984 年时期，行政院成立有线电视工作小组的殒落有关 (何贻谋，2002)。当时因着政务委员费骅的意外过世后，小组失去主导权，未让电信事业接掌有线电视网络，而失去走向标准规模，产业的合理性介入失去杠杆，如此滋使地下有线电视猖獗，导引至与财团结合，共谋瓜分市场的腐化结局。

(三) 有线卫星产业发展，带来如何全球化与地方民主的影响？可见自 1990 年以后，地方有线与卫星下炼业者合作，引进诸多海外影视频道，以及部分国内卫星频道制作的政论节目，的确开阔视野，引入言论多元的氛围。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的效果，之后未有要求有线电视投资显著性节目生产，

长久接受外销的美日韩文化节目，以及低成本的谈话节目，似乎都拉低了电视产业链的产值，打压了媒体工作者的经济获利，弱化了产制能力，与观众一同弱智，这样的全球化低阶演出，似乎更糟地重演「老三台」的沦亡立场？结果，有何全球与本土文化的辩证发展？

上文最后，引述加拿大名言“the most wired nation” (Murphy, 1983)，但是指出当地有线电视也最疏通了美国文化君临该国的困境。李的评论，在这里似乎出现了博士论文第四章的加拿大影子，但是缺乏一个与台湾的比对。加拿大有线网络毕竟是 economic nationalism 国族主义下之产物 (Lorimer & McNulty, 1992)，如其 Rogers Cable 仍是一个正牌有分殊化的媒体集团，非台湾者为黑道地下经济的本质不辨，诤称自己是最待价而估之 Pledge Fund 眼中肥羊，此二境界仍是不能模拟。从加拿大边陲眼光，我有一点异议。但不减这 1999 年的力作，妥为台湾 90 年代解严后极盛兴的影视文化作注。

伍、结论：弱连结创生影响力

本文至此，归结出对于李金铨为言论世、更新教学的台湾现场，从 1980-1990 两个十年的言论轨迹中，力图整理出一个次级诠释之立论。最终，本文想推演的考察结论，以回溯到关键的养成阶段，就是他在高等教育时期接触到的影响人物，在他们所言所论中，找出并投射出后来类似的社会变迁脉络，做本文次级诠释架构。

李金铨自述，他根据实征资料发言，却不被实证主义同流 (empiricism)，他考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立，却不称自己为政治经济主义者 (political economist)，这种入乎其内，却也能出乎其上，颇具替代性 (alternative) 与力道 (robust) 之中庸性 (eclecticism) 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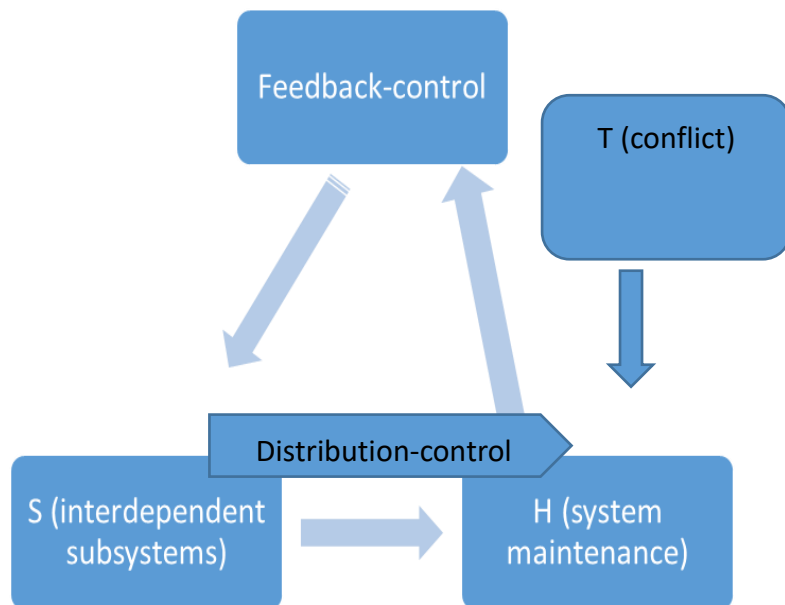
本文不禁想起李的业师，F. Gerald Kline (当年为密歇根大学大众传播与研究跨系际联合博士学位之主持人)。在一些关键的回忆中，都曾屡次提到 Gerald Kline 对他毕生成就的影响。而且就密大这个标准实证主义的传播研究 (心理动力效果论之大本营)，为何能出老师这种独特风格与本土实证的批判研究文献呢？的确，Gerald Kline 的包容与真知灼见，引导老师往自己生

命相关的议题前进，并且大胆采用国家发展与帝国主义的论证，将台湾与加拿大两个边陲案例纳入，成就一个对恒久辩论议题的驳证 (rebuttal and refinement)。

在此我尝试从 Gerald Kline 在当年学术观察与论证中，找寻一些线索，作为这个当年「李金铨现象」之次级演绎概念，成为指导架构。这里不得不提，当年 (1972) 那个惊人的出版：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ume 1, Sage Annual Review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这本通册第一篇，就是 Professor Kline 的论著“Theory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在这篇开山之论中，Kline 引述了大传效果研究的简史，发现心理动力模式讨论不断缠斗，各学派互有胜负；但是，近期的冲击，来自欧陆的 Jeremy Tunstall 及 James Halloran 的说法，带来二个值得注意的写照：(一) 历史性研究与描述性的议论，以学理方式导引出新闻学的高等教育进入职场的应用；(二) 较具先进之论，为博士论文的先锋之作，使用社会科学研究工具，发现新闻与传播现象，运作在媒体结构与阅听人特质上，造成的新风貌。

然后他以近期积累的新研究，重新为美国主流的传播思维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描摹一个动态图谱，值得在此一展：

图十：社会结构功能观点的系统变迁架构



传统以来，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以上”S“(社会次系统)To” H”(系统维运)是一个常存均衡状态，让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稳定前进，但是这是一个静态的过去；越多证据显示，以媒体的分殊化地成长力，逐渐掌握了 feedback-control 功能，导致次系统变迁，而同构型较高的次系统，会以分配性控制程序 (distribution-control)，进一步深化系统的维运。但是这只是一个理型，媒体未必占据在冲突发起角色，导引此一循环辩证。

当媒体资源被垄断时，更多的冲突因子，会由替代性的 agent，如 radical media 或高度分殊化建构的媒体制度，来启动重新的系统维运。为了冲破中央集权化的宰制，新媒体科技，无论透过经济特性、大型社会动员、或者是管制重新分配，都能将微小单位信息，填充给社会分殊化发展作动能。其实这种行动者，可能也拟似正式的在地媒介物，如透过意见领袖、有影响力的发言者、及联络处的信差 (liaison person) 而完成。

另外一个层次之观察 (出自同书作者 Peter Clarke)，将上图 H 作为体势平衡 Homeostasis 的依变项，而 T 就是一种压力，破坏原本的均衡互赖变项 (subsystems) 进入一个新的体势平衡。这种运动动向上，压力状态下的行动

者，产生两种关键行为，分别是信息的搜寻 (information-seeking, 有目的行为)，或者比较静态的信息分享 (information-sharing, 双方于均等机率近用信息)。进一步来论，冲突份子处于一个异质性 (heterogeneity) 高的环境，会更运用媒体达成信息搜寻的积极目的，同时也以更大量的回馈给次系统，造成原本体势平衡之变异，产生新的包容性平衡，或超越原本的异质性的内在冲突度。

最后，功能论期待异质性的消弭，虽然可以同化体系中的新成员，但是过度单方面期许的均衡状态，只会带来更冲突的取向，营造了社会变迁的新说法。

F. Gerald Kline 的理解，认为 70 年代起结构功能论的社会架构，也需接纳社会新发言成员，容许冲突搅动，更新系统维运。这时要有 liaison person，立于关键位置，有新科技或表现形式在手，突破同构型的垄断结构，发展动能，影响均衡状态，达成下一阶段的待变结构体。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为处于压力承载者或观察者位置立论。该者，如果处于一个非同质的结构中，会更大量透过媒体，找寻变迁机会的信息，消弭原本型态的表象，再次建构一个真有包容度的状态，虽说是很功能主义的说法，但是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一种期许理型。

两种层次的抽衍后的模式说法，概略地匡视本文研究对象（李金铨与其学说），在解严前后对台湾社会带来之冲击与再建构；也描摹了本文作者以观察行动之方案，在积极与研究对象之信息互动后，进入社会，寻求机会，消弭或解谜威权媒体文化之表象，期许建构一种更有容纳能力的民主传播新局。

本文无意对号入座，但本于解释此一传奇的李金铨学说，缘身于这个关键发展的台湾时代，此事应然有领导性传播理论作阶段性的投射与观察模拟，愿以这样收尾，有一点为惊异奇航之旅，带来风平浪静地回眸之广度与高度。

参考书目

何贻谋 (2002)。《台湾电视风云录》。台北：台湾商务。

程宗明 (1999)。〈「党政军退出三台」之后—从批判政治经济学思考无线电视制度的改造〉，《广播与电视》，13: 87-122。

Kline, F. G. (1972). Theory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Kline, F.G. and Tichenor, Philip J.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17-40).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rimer, R., & McNulty, J.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Toronto, Ontario* (2nd).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Murphy, B. (1983). *The World Wired up-Unscrambling the new communications puzzle*. London, UK: Routledge.

An Eyewitness on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Taiwan Mass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writings of Dr. Chin-Chuan Lee around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1982-1999)**

Hamilton C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onal encounter, this article structured a criticism on the media study by Chin-Chuan Lee following his theoretical landmark publication and its proliferations from his visiting scholarship in Taiwan. The influence of his book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should not be refrained from the teaching and study on campus. During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ovement nationwide, this lecture and other articles illuminated a new-born generation for engaging the politics and reform of Taiwan communication system. Aftermath, three critical reviews on the resistance and revolt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are addressed in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of communications study. His contribution into Taiwan media history is clearly categorized into publishing several topics, including press, political magazine, underground cable, satellite TV, video recording cassette, and public television.

Keywords: cable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public television

*Hamilton Cheng, Research Fellow,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email: RND6156@pts.org.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传播、民主与媒体环境的期待： 从李金铨〈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谈起

管中祥*

本文引用格式

管中祥 (2022)。〈传播、民主与媒体环境的期待从李金铨「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谈起〉，《传播、文化与政治》，16:115-138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31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 作者管中祥为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暨传播学系教授，e-mail: benlakuang@gmail.com

《摘要》

本文将以李金铨〈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一文为起点，扩及其在 1987 年出版的《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吞吞吐吐的文章：新闻圈与学术圈》、《传播帝国主义》三本着作，以及 1993 年李金铨发表于澄社出版的《解构广电媒体：建立广电新秩序》中的总结文章〈台湾广播电视蓝图〉，了解李金铨对「传播」的基本界定与主张，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有什么关连？党国体制对新闻自由及民主政治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媒体开放又该如何规范？

虽然这些论述大多是李金铨在报禁开放前的著作，他并不乐观地认为开放报禁之后，媒体操控问题就会从此消失，相反的，他更提醒，除了政治势力，资本集团是另一个垄断势力，若没有适度的规范，言论一样会遭到垄断，因此，除了新闻教育、媒体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透过法规，保障市场结构的多元性，维护不同社群的媒体近用权。

关键词：言论自由、媒体政策、报禁

李金铨教授的著作《大众传播理论》是我辈传播科系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必读之经典，其中有关传播与国家发展、现代化主义与依赖理论、传播与文化帝国主义等篇章，更是许多人认识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这些篇章有别于传统的行政主义与实证研究，不仅带领我们从权力、全球的角度认识传播，也开启了左翼社会学的视野，进而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关切庞大传播系统中的大大小小权力机制，以及其中的动态关系。

不过，李金铨并不是待在象牙塔钻研学术研究或者课堂教授知识的学者，在威权时代，更是少数勇于为文批评时政的传播学者。在其出版的《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1987）、《吞吞吐吐的文章：新闻圈与学术圈》（1987），甚至是较具学术味，探讨国际传播与跨国资本宰制的《传播帝国主义》（1987）等书，皆有不少针对当时台湾政治现象与媒体问题的评述，当然还有其它评论散见国内外报刊。

这三本着作出版于解除戒严那年，报禁尚未开放，书中的论著多在1987年之前发表于台湾、香港、海外等地的报章杂志。书中不但诸多对时政的批评与建言，更多的篇幅是在批判党国体制对媒体的控制，主张解除报禁维护言论与新闻自由，强调新闻自由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并提出媒体开放后的看法。如果李金铨当时是记者，他不仅会遵循应有的客观性意理，也会是「鼓吹者」，挑战权威，倡议民主。

李金铨成长的年代，媒体与传播教育是掌握在党国体制之手，对媒体的控制和在中国时期一样，一方面透过暴力的机制限制言论，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宣传通道，主要的作法包括（郑瑞城，1988，页39-40）：透过的法令与政策明白的赋予大众传播媒体特定的任务和目标；其次，国家机器对于媒介内容实施检查制度，同时对于媒介表现所给予惩处交由行政机关来认定，而非司法机关；另外，军事单位亦介入大众传播媒介的运作，除了投入媒介经营外，媒介内容的检查工作亦交付军事单位，如警备总部执行。

国民党在台湾对新闻教育的培养/控制一样不遗余力，首先是在台创建正规新闻教育的是政工干校。国民党迁台初期，痛感过去新闻宣传的失败，必须从头训练青年新闻人才。一方面提供军中与报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则为反共复国储备编采人员，造就下一代的反共报人。因此，民国四十年政

工干校成立之后，决定首先创设新闻组。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特别支持军中的新闻教育工作，创设新闻组也是他的重要指示（谢然之，1982，页17）。

而中央政治学校（政治大学前身）新闻系的设立，便是要培训为党、为国所用的新闻人才。政大新闻系早期的系主任中，部分由国民党第四组（文工会）及《中央日报》调任，部分则是来自行政系统的政府官员。中央党校新闻系也在民国四十三年复系，谢然之在拟定复系的教育宗旨上便指出，「政大新闻系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曾经有着优良的传统…我们信仰三民主义，忠爱民族国家…」，这样的宣示一方面是要承接过去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必须配合世界新闻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要适应我国特殊的国情与国家非常的处境（谢然之，1982，页27）。换句话说，在威权国家机器优于一切社会力量的时代，新闻科系的设立与建制，便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操作员」的架构下发展（管中祥、魏玟，2001，页47）。

在党国体制严密的控制下，政治行动者与知识分子仍接续发行党外杂志作为异议的出口，解严前夕的部分报刊有时也会出现异议之声，文人论政的传统找到了些许的发声的空间。虽然不少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在报刊上为文批评时政，但在相对保守的传学院中李金铨是其中的少数。除了是因为他的勇气与使命，也和其学术训练及对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的理念坚持有关。李金铨在《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的序文中便提到（李金铨，1987a，页XV）：

争取新闻自由是一种止于至善的精神，也是一种无止境的过程。
新闻愈自由，政治愈民主；政治愈民主，新闻也愈自由。我不敢说本书有何价值，但只要能充当新闻自由的踏脚石，于愿足以。

论述、写作是李金铨鼓吹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他在同一篇序文中也引用 Raymond. Williams 所言：鲜活的霸权恒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生产、保卫与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地受到它本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李金铨，1987a，页3）。事实上，社会总是充

满各种矛盾与冲突，有权力的地方必然有「反权力」（conterpower）。所谓的「反权力」就是社会行动者为了展现自己的价值观与利益，而挑战社会制度中既有权力的能力（Castells, 2015）。所有制度体系都会反应出权力关系，也会反映出这些权力关系在无尽的冲突及协商的历程中所产生的限制。无论是国家或是其它管理人民生活的机构，其构成方式都取决于权力与反权力之间不断的交互作用。对李金铨来说，民主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成品或静止状况；是不断追求的过程，不是一种「发现」，是要去争取，要去追求，在李金铨的诸多论著中便是展现这样的精神，并且鼓励知识分子应该要有所行动。

1980年代，台湾社运动风起云涌，民间社会躁动不安，虽然强控制的党国系统逐渐松动，但威权的幽灵仍有可能随时再起，上述李金铨三本着作在此时出版，更有其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李金铨〈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一文为起点，扩及其在1987年出版的《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吞吞吐吐的文章：新闻圈与学术圈》、《传播帝国主义》三本着作，以及1993年李金铨发表于澄社出版的《解构广电媒体：建立广电新秩序》中的总结文章〈台湾广播电视蓝图〉，了解李金铨对「传播」的基本界定与主张，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有什么关连？党国体制对新闻自由及民主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民间社会如何响应党国的媒介体制？媒体开放后又该如何规范？新闻教育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壹、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

台湾戒严长达三十八年，不过，「时代在变、潮流在变」，国际冷战局势虽然日渐缓解，但台湾在国际的地位却日日败退，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期待日渐高升，反对运动力度日更日益加大，原有的党国机器面临统治的正当性危机。1987年于7月15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戒严令。

虽然强控力体制宣告松绑，但限制言论与新闻自由的「报禁」仍未解除，李金铨在戒严令正式宣布解除之前，于1987年1月1日在《远见杂志》发表〈报禁的回顾与展望〉（收录《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书中，后更名

为〈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一文提及，政府愿意宣布解除戒严，向回归宪政迈出第一步，作为长治久安的打算值得喝采，但他也指出，戒严是国家紧急权的一种，其功用有如服猛烈无比的特效药，虽可救成痼，但万不可常吃久吃，否则必伤致命（李金铨，1987a，页 87）。

文章一开始，李金铨便指明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白保障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目的在于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与基本人权，但在〈出版法施行细则〉等行政法规却对言论自由严重伤害，他引用时任立委的成舍我质询指出，「以一份由行政官署制定的细则，许多地方，多与母法（出版法）的立法原则冲突。痛快的说，简直是违宪。」（李金铨，1987a，页 88）。

李金铨认为当时的台湾报禁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而〈出版法施行细则〉授权各省市府不须经司法程序便能以行政命令直接限制及妨害人民的出版自由，更为宪法所不许。他同时指出，以「节约（纸张）」为理由实施报禁，不仅违法，而且不合社会现实（李金铨，1987a，页 90）。因此，不论是就法论法，或是回到社会现实，报禁应随着解严而开放，没有存在的必要，才能回归民主宪政。不过，报纸、媒体在民主社会，或是国家发展中有什么重要呢？李金铨节录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报人的严复及梁启超的说法。

严复在〈国闻报缘起〉文中提到他办报的动机是「通上下之情」与「通中外之故」，而梁启超在《时务报》时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一文提到「觐国之强弱，则在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地天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李金铨，1987a，页 94）严复及梁启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报业在现代国家重要的角色--讯息的沟通者，不仅要「上」、「下」沟通，也要沟通「内」、「外」，而这也是李金铨认为传媒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威权体制不仅权力由上而下，讯息也是由上而下，从沟通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民众的声音无法自由表达、无法纳入决策系统，自然也无法成为民主与自由的社会。

进一步来看，民主与自由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而民主是保障自由、

体现自由的重要条件。李金铨在〈开创新闻自由的新局〉文章中指出，现代社会不能没有新闻媒介，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更是近世纪人类争取自由谱曲的中心旨趣。回到个人自由与个人权益之间具有辩证关系，没听说在那个新闻充分自由的社会里个人权益是不被保障的，也没听说那一个不保障私人权益的社会有充足新闻自由（李金铨，1987a，页 123-125）。

对李金铨来说，这样的法令不仅违反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也是违反人类追求自由的基本价值，因为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不可打折的终极价值，而言论自由更是人类自由中最中心的表现（李金铨，1987a，页 176）。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言论自由随着时代变化有两方面意义，消极的意义是要免于国家统治权的干预与压制；而积极的意则是以自由讨论为手段，目的在取得真理与最良善的结论，并能符合个人及社会福祉（李金铨，1987a，页 95）。

换句话说，民主社会中新闻媒体不单只是扮演监督角色的第四权，也是人民与政府沟通的中介，不过，更根本的对人权的基本保障，是话语权、传播权的展现，不但是免于极权压迫的民主展现，更是不同立场与价值的对话，以及人类追求民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具体实现，而当媒体及言论得以自由，也意味着真理得以论辩，社会有机会更好，而人民与媒体也有权力监督政治体制，民主才能落实。

不过，在主张报禁开放的同时，李金铨并非完成认同利伯维尔场的说法，他强调国家需要某种程度的介入管制。

他指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但开放报禁，即可能出现「大吃小」的垄断局面，当时台湾的大资本及跨国企业虽未成形，李金铨便主张应该及早以周密立法限制「托拉斯」，保障竞争管道通畅与公平，例如，把反托拉斯精神明白注入〈公平交易法〉中，严格执行（李金铨，1987a，页 113）。李金铨主张的是结构管制，要制定反垄断法限制所有权规模，但他也强调对发言权的保障（李金铨，1987a，页 140）。

即使如此，李金铨也在 1987 年 2 月在「自立晚报」发表的〈四十年来未有之变局〉一文中仍提醒，别期望解除报禁可以解决一切难题。解除报禁是迈向民主宪政的一大步，但争取新闻自由是不可须臾或忘的过程，不以报禁的解除为终结。因为即使开放报禁，也只能局部解决报业主权自由化竞争的

问题，剩下的相关问题是：那些人可以攀登媒介资源发言？目前只是「有权的」和「有钱的」，以及少数媒介认可的专家学者享有这种权利；一般被遗忘的沉默大众根本无缘。因此，媒介不但必须强调加强内部民主化，开放读者投书，进行自我批判与提升，更应该接受社会民众和各种中介团体之监督（李金铨，1987a，页 116-117）。

李金铨的〈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及相关论著，从传播、媒体的基本特质，及其在民主社会的角色与功能，以及台湾政治的发展等面向提出解除报禁的必要性，不过，李金铨虽然提出解除报禁的主张，但并不会乐观的认为社会就会因此变得美好，相反的，国家在其中仍要扮演一定的结构管制角色，保障言论的多元，另一方面，即使报禁开放，台湾的广电媒体仍受党国体制控制，其后的论著也会对此提出分析、批判与建言。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李金铨对「传播」的理念，以及媒体开放后的媒体环境的有什么样的期待？

贰、传播、媒体在民主社会的角色

在〈论解除报禁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提到严复与梁启超办报的理由，作为其论述开放报禁的重要基础（李金铨，1987a，页 94）。

严复在 1897 创办《国闻报》，除了是维新派重要的言论渠道，他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也提到成立该报的目的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这样的想法，也和梁启超提出《实务报》要「去塞求通」的创刊目的不谋而合。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如果无法通达，那么就会「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梁启超所谓的「耳目喉舌」是说强调是报纸的功能于促成上下沟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同时也能协助人们理解国内外的讯息，倘若无法如此，国家也难以强盛。

对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来说，办报的目的是要进行政治改革，寻求国家的富强，但同时也将办报视为知识分子的意见出口，但同时也将其视为为民权与民主的体现。

不过，「去塞求通」要去除的不单是只是政治体制讯息流通的障碍，以求上下通达，回到「Communication」的意义来，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意见表达的基本能力，与民间社会多元意见与价值的展现，与寻求共识的历程。

李金铨认为，若只将「传播」的概念认为是「媒介」，很容易让人以为媒体只是单向的传达讯息，相反的，「沟通」，就非常符合 Communication 的原始意义，也就是彼此共同「分享」经验、情感与意义，而沟通要有「对话」，不仅要能「接上头」(dialogue)，不能各说各话，同时也要能讲「对话」，和对方能产生共鸣(李金铨，1987a，页5)。

既然传播是一种「沟通」，那么双方是否能站在对等的位置便显得尤为重要，传播的参与者是否具有发声、表意的权利与能力必要的前提，亦即，当传播参与者站在一个平等的沟通基础上，才有进一步达成有效的沟通。

社会本来就是多元，不同的背景的群体对同一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沟通过程中有所冲突亦是某必然现象，如果回避争议或压抑异议，不是逃避问题，就是另一种威权主义。事实上，报纸竞争的自由化与社会多元力量互为表里，社会力量越多元，制衡功能越强，各种不同的声音也越能反应在媒介上面。对李金铨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而民意即是公共意见或舆论。媒体是沟通社会上下的纽带，让不同利益、背景、观点的人异中求同，人人畅所欲言，彼此以理性的态度相互沟通，凝聚公共意见或舆论。

不过，如同 Habermas 所言，沟通本身也存在着某些「规范性」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的沟通，李金铨也同样提醒，社会沟通与多元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多元团体及社群有解释「真理」的权利，有畅所欲言、免于恐怖和免于蒙蔽真相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爱、公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上下沟通，务求多元媒介建基在于价值共识之上(李金铨，1987a，页116)。

过去，人与人间透过面对面沟通，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理解，但随着媒介的日新月异，以及媒介讯息生产的组织化与集中化，原有面对面分享经验的口头文化逐渐式微，起而代之的是传播媒介大单向地灌输、扩散信息，即使社群媒体出现人际互动回到以往的双向互动，但其带起的同温层、网军等民粹式的沟通未来必能促成彼此更多理解。简单说，现代社会人际的关系与互动不若以往乡民社会互动频繁，传统面对面口语表达、分享信息的型态，随着日益殊异的人我关系而越来越低，反倒需要透过媒介使用才能进行沟通行动及建构社会意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媒体的使用延伸了语言的功能与特质，沟通的形式与工具逐渐从单纯的面对面的语言表达转向中介性的媒体使用（Stevenson, 1995）。

除了媒介形式的转变导致「平等沟通」更为困难外，另一方面，因着传播媒介迅速资本化，只有「有钱的」和「有权的」，以及媒介认可的少数专家学者才能攀登媒介去发言。但媒介又演成牟利的工具，内容全面庸俗化，受众只是推销消费品的对象，民众的发言管道越来越窄，媒介垄断越来越集中，以致与沟通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驰（李金铨，1987a，页7-8）。换句话说，理想上，传播是在平等前提下的对话过程，但现实上往往因结构性的权力差异使得沟通遭到扭曲，沟通的双方无法在对等的条件下进行互动。特别是现今大众传播媒体发达，传播媒介逐渐取代人们面对面的互动，成为沟通的中介，然而，政经力量对媒体公共领域的扭曲却也更为严重（管中祥，2002）。

李金铨直指新闻自由的威胁来自两大来源：一是政治的箝制，一是资本垄断（李金铨，1987a，页7-8）。即使台湾自从媒体朝向自由化的解禁方向，但媒体集中度却也越来越高，甚至少数媒体集团已垄断媒体产业，经营者考虑的是如何获利，而非多元意见与文化的形成。媒介工业已逐渐地被大规模的集团所控制，这些集团依据自己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产制方向，传播与信息体系日趋市场导向，愈来愈多的文化生产操控在大企业的手中，不仅产生了社会信息不平等的现象，媒介私有化的结果，也窄化甚至缩紧了多元意见的出口。

对李金铨来说，民意政治的基石是理性沟通。大家必须畅所欲言，有免于支配、恐怖的自由，因此，媒介必须开放，一方面打破垄断局面，一方面

反应社会上多采多姿的意见，让人知道真相、免于蒙蔽，以及有表达心声的权利。不过，威权时期的党国体制，不但使媒体发挥第四权的功能，同时也蒙蔽真相，让人民无法表达心声。

参、党国控制下的媒体问题与另类出口

从台湾的媒体控制史来看，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约有十二家的报纸因该事件倒闭或宣布停刊，致使报业市场骤然萎缩（祝萍、陈国祥，1987，页35），再加上党营及国营媒体大举在台创刊或复刊，迅速占领了报纸市场的主导地位，自此，台湾的大众媒体成为威权控制的次系统（廖素霞，1994，页52）。党国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王振寰，1993，页474-435），形成所谓的「官控商营」模式。因此，国民党统治期间，除了透过「压制型国家机器」掌控国家政经优势，另一方面则是掌握媒体、教育机构等「意识型态国家机器」，传输既定的意识型态，以维持统治的基础。

李金铨《解构广电媒体--建立广电新秩序》最后一章〈台湾的广播电视蓝图〉一文中总结了台湾党国时期的大众媒体政策，他指出有四点值得注意之处（李金铨，1993，页524-527）：

第一，国家机器对大众媒体的控制主要是依赖党政军的三头马车，而国家机器的目的是要让台湾民间社会无法团结，浇息民众的政治热情，并将人民的意向引往到经济领域发展。

第二，「枪杆子」与「笔杆子」并用，一方面用军警特打压异己，一方面用媒体塑造特定的世界观，而媒体既被纳入国家意理机器的一部分，也与政权的命运共生共荣，便会以效忠政权换取重大的政经利益。国民党在台实施二元权力结构，中央层级透过「侍从结构」由外

省菁英直接控制，地方层级由派系间控制，而媒体属中央层级的一环，也由亲近党国结构的外省籍菁英主导。

第三，媒体的控制有层级的差别，对广电媒体的控制较为严格，印刷媒体相对宽松。

第四，台湾广电特权是恶质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但报纸则是官民资本平分秋色，党政军经营的报刊占一半的家数，不过，私人资本的两大报，却囊括市场的三分之二。

李金铨认为，在蒋介石心中将大众媒体视为国民革命的喉舌，他的态度是一贯的，抗战时如此，剿共时如此，来台后亦加如此，例如，1964年蒋介石对第二次新闻工作会谈人员致词时，即要求新闻界以「国家、主义、责任」作为自己良知良能的标准。李金铨指出，蒋介石与蒋经国都是威权主义，只是「刚性」与「柔性」的差别，但虽刚柔互异，威权则无二致。在威权主义者心中只有上对下的灌输与控制，以及下对上的服从，而无上下沟通的观念。（李金铨，1993，页523-524）。这样的批评，也说明了李金铨何以会引用梁启等人「去塞求通」理念，作为主张解除报禁的理由，一贯地展现新闻自由、健全的沟通（传播）体制在民主社会的重要性。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李金铨指出，光开报馆、建电台，未必可以贡献现代化；要紧的媒介内容由谁控制？内容和国家发展有没有密切联系？证据显示，第三世界的媒介通常是达当权者意志的应声工具，是维护既得利益，很少鼓吹社会改革（李金铨，1987c，页169）。但当时仍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台湾，控制媒体的体制又有什么特殊性？

台湾的电视结合了党政军体系和私人商业势力，是典型的「官僚商业结合体」，具体而微地彰显了台湾若干产业的关系与形态，也包办了权力、财富和是非（李金铨，1987c，页187）。

李金铨指出，「官控商营」的双元形态让资本与党国相互合作，不仅掌握权力，控制了资本，商业导向的营运方式强调市场、娱乐，满足听众的感官，不但缺少媒体应该有的批判精神，也让党国意识型态在娱乐的掩护下，

大举灌输，界定社会的主流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强调大中国主义的党国意识，与此同时，更透过法规压抑台湾的本土语言与本土文化，巩固优势阶级的眼界与世界观，无疑是让「大中国意识」成为主宰。

李金铨将这样的现象置于当时台湾社会重要的「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辩中。他说，台湾的「身份认同政治，一直以「本省人」和「外省人」为分水岭，他们讲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其后几十年，省籍冲突为党外对抗国民党提供活力，也导致双方尖酸偏颇的言行。省籍鸿沟不只表现在政治领域，也横跨到文学领域（李金铨，2022，页 323）。

日治时代，有关台湾的主权定位及台湾意识的讨论已陆续出现，不过，1977-1978 年间，叶石涛、陈映真等人围绕着「台湾文学」所进行的乡土文学论战更为促发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辩论。随着党外运动及异议杂志的出现，「参战」者越来越多，逐渐带起了知识分子圈有关「台湾结」、「中国结」的论战。当时，这些发生在党外杂志上的中国结、台湾结论战，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首次在意见领域讨论「中国」、「台湾」的意涵与定位，也公开地就国/省（地方）基本区隔进行辩论。论战中的台湾意识论者破天荒地挑战了这个基本区隔，而这个挑战也象征着国民党政权下的国族认同符号系统已经正式地进入了转型期，象征着正统中国论受到了台湾意识者的根本挑战（池焕德 1997，76）。

虽然，知识界对「中国结」与「台湾结」讨论十分火热，但传播学界在此方面的讨论却相对少见，然而，李金铨不但分析「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纠葛与矛盾是如何展现在媒体政策上，甚至直接批判中国意识成了剥削体制。

中国意识变成一种剥削、支配与威胁，媒体成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上自主权结构的垄断，下至新闻政策的操纵，电视不能以公平公正的立场呈现旺盛的民间社会，总是以有色的眼镜看待台湾意识（李金铨，1987c，页 202）。

这样的说法在当时社会看似即将开放，国家权力却可能随时紧缩的解严

前夕，其实十分「大胆」，但李金铨仍在〈电视文化何处去——处在大陆政治与海洋经济的夹缝中〉，用三十页篇幅论述他的看法，不仅进行「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辩证，更分析了中国意识是如何限制民主与多元文化。

他在文中综观「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矛盾指出，历史上的纠缠固然错综复杂，其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主要还是台湾的政经分裂人格长期扭曲了文化面目，只是其中一环而已，过分膨胀的「中国结」肆无忌惮地压抑素朴的「台湾结」。这样的文化扭曲不只在文学论战，更深深展现在民主政治上。李金铨接着说，这两个结的矛盾基本上是「民主」的问题，也就是社会资源如何再分配的问题。「中国结」与「台湾结」原本是濡沫关系，变质为剥削关系，戒严体制更主宰、独占一切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凡追求真相、反应现实与思想的心灵活动，往往反被丑化成破坏团结的分歧份子（李金铨，1987c）。李金铨讨论的不只是省籍对立或国家认同的问题，他直指这些差异展现出权力的压迫，一种外来权力结构对台湾百年生成的政治权力进行的压迫，即使两者之间原本是存在着共存、共好、相濡以沫的可能。

这种权力关系的压迫也反应在传媒对公共事的报导，李金铨以「中正机场事件」为例指出中国意识如何伤害民主与多元、打压本土政治与论述，他说先不论该事件的是非得失，但媒介蒙蔽真相，小道消息猖獗，对支配性的意理霸权反而会产生不可预期的反效果。

1986 年，民进党成立，前桃园县长许信良计划跟建党委员会回到台湾，但其中有多名成员是海外「黑名单」无法入境，11 月 14 日上午，数百位支持前往接机，与警方发生冲突。11 月 30 日，许信良、谢聪敏等人再度闯关被阻，民进党发动了约一千余位支持者至桃园机场声援，遭警方以喷水车喷射加入红色色料驱离群众，并标记抗议群众的身份，群众也以石块反击，双方冲突不断，僵持了十个小时。不过，当时三家电视台报导此事件时，大量呈现民众扔掷石头的画面，并将抗议者称为暴民，主流媒体的片面报导让民众无法窥知事件的全貌及背后因素，相反的，当时的另类媒体「绿色小组」却拍下第一手画面，透过各样的管道传达有别于主流媒体的内容，和《自立晚报》联手颠覆了大众传播媒体的说法。

事实上，在看似严密的控制机制限制下，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并非没

有出口，随着台湾内部一连串政治改革运动的发展，连带的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管道的媒介因应而生，进而形成媒体与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持的现象，而异议的政论报刊便在执政者对政治性集会结社以及大众传播的严厉控制的氛围中，成了政治异议分子宣传政见、纠集民意、组织动员的唯一机关（李旺台，1993，页 28），不但政治运动走向杂志化，杂志也充满着政治的色彩。例如，「中国民主党」的新党运动中，有《自由中国》杂志作为言论的中心；《大学》集团的知识分子政治革新运动，本身就是以《大学》杂志为基地，并为台湾的政治运动储备及集结人才；而七〇年代兴起的党外运动中，也有《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杂志，以及其后各种五花八门的周刊鼓吹诸如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政治改革（李筱峰，1987，页 271）。

政论杂志成了社会上异见的水龙头，俨然是政治反抗中心，最后冲破官方意识型态的堤坝。他们扩张了言论自由，甚至促进了主流报纸的报导，逐渐挑战牢不可破的国家意识型态，人们在社会混乱的时刻倚重他们来摸索真相（李金铨，2022，页 306）。

在党外杂志之后，另类录像带、第四台、地下电台等另类电子媒体逐步兴起。另类电子媒体成本低廉、移动方便、操作简单与互动性高，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也让流通更为便利，于是，逐步取代了传统印刷媒体，成为另一种「小媒介」。

1970 年代，传播学界将媒介区分为「大媒介」与「小媒介」，自由派学者如 Lerner 等人强调「大媒介」是「移情（心理）能力奇妙的扩散者」，因此主张用大媒介为心理触媒，扩大人们的视野，增强改变现状的企图心，从而促进国家发展现代化，「大媒介」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要协助国家发展。不过，这样的说法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李金铨引用左翼学者 Enzensberger（1977）、Freire（1970）等人的说法指出，社会的主流媒介通常跟国家权力结构合流，以中产阶级为诉对象；而抗议团体位居社会弱势，资源匮乏，必须时刻躲藏当局的破害，只能利用小媒介从事边缘战斗（李金铨，2022，页 352-353）。

李金銓也以 Tunstall (1977)、Scharmn (1977) 等人的研究闡明, 「大媒介」的功能在於強固現狀, 並因為它對資金內容的大量需求, 無形中製造媒介對國家機器的依賴; 反而「小媒介」所需資金少, 機動性強, 容易在位置開拓變革, 故成為社會運動反抗國家言支配言論的重鎮 (李金銓, 2022, 頁 306)。

這裡「小媒介」指的就是另類媒體或替代性媒介, 李金銓在「是該重建媒介公信的時候了」一文中指出, 傳播研究常發現「大媒介」(亦即主流媒體) 缺乏公信, 則「小媒介」必應用而生。當時的國民黨全面控制了大媒介, 惟因小媒介的銷路有限, 當局估計政論雜誌無力威協及統治政治權威, 遂未把它劃歸報禁範圍。政治異見者無法接觸黨國控制的大媒介, 退而求其次, 利用邊緣的政論雜誌鼓吹他們的言論 (李金銓, 2022, 頁 306)。他以「中正機場事件」為例, 主流媒體的報導使得媒介的公信受到挑戰, 故「小媒介」的流行是遲早的事 (李金銓, 1987a, 頁 179-180), 李金銓不僅批評當時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的扭曲報導, 並強調另類媒體在民主政治, 以及媒體失衡的社會中將扮演的角色。

肆、大學與新聞教育

言論自由的限制與突破不僅發生傳媒市場, 在同屬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大學校園, 也發生言論的控制與衝突。

1980 年代的大學校園雖已成立不少異議性學生社團, 透過發行刊物倡議理念, 批判時政與校務, 但刊物的發行需通過層層的審查機制, 大學校園內的教官、訓導處, 甚至設有學生黨部嵌制學生的言論與思考, 校內發行的刊物也需經過校方行政體系的審核。當時校園內的學生刊物不能自主發行, 學生的言論自由及辦報自由受到限制, 大學里的異議社團或學生也發行地下刊物, 透過「小媒介」的非正式管道傳達自由思想或表達對時局的不滿, 因為這些不容於當局或校方的異議言論若想循正常管道進行公開討論, 便會受到校方的打壓。

李金銓對言論自由的關注, 不只是主張開放報禁, 或對黨國體制的批判,

针对当时的大学对言论自由限制他也提出诸多批评。1986年10月，李金铨在《自立晚报》发表「校园言论自由的一课」，声援当时台大的异议性学生社团「大学新闻社」。起因是「大学新闻社」有三篇文章未事先送审被勒停止活动一年，三位负责人分别被记过处分，台大十二个社团发表联合宣言声援。

他在书中举例，1983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也曾发生学生刊物《明尼苏达日报》被校方箝制言论，该报因而控告校方，获全体新闻系教授支持，最后校方败诉，并拨款一百万美元成立「第一修正案基金」，而这笔经费只能用来作为维护言论自由的活动（李金铨，1987a，页208）。李金铨以此强调大学自主的重要性，除了关注校园言论自由遭到侵害，也重新检讨校园的审稿制，希望校园刊物也能向新闻局登记为法人。

校园刊物的审查不仅是对言论自由及大学自主的限制，也透露出大学行政体制的家父长心态。李金铨批评当时大学的校园审查制度，只是墨守成规，并且不把大学生当作完整的成人看待。他说，何以大学生不能坦荡荡为自己的言行在法律前面负责，而必须接受「大人的保护」？有趣的是，李金铨话锋一转，将批判的焦点转移到大学的新闻教育，他直言：

为什么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内讲的是「新闻自由」的大道理，课堂外做是「小心一点」那一套？（李金铨，1987a，页214）

李金铨一方面批评大学校园的审稿制度，抹煞了大学校的宽容与批判精神，不仅与一般官僚组织无异，也会影响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也批评大学新闻教育的吊诡及伪善，虽然在教室里强调新闻自由，但现实中却充满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

这样的伪善也发在戒严时代的台湾，大学在行政、党务、军事体系联合监控下运作，但另一方面，也同时在大学的传播院校中为党培养文宣人才，突显了新闻教育的荒谬性，在大学课堂上对新闻自由侃侃而谈，在真实社会中，却对新闻自由处处限制。在新闻教育中，强调新闻媒体是民主社会的第四阶级，然而，这种自由主义报业的逻辑与当下的威权体制相互矛盾。

从台湾的历史发展来看，新闻传播相关科系有着特殊的位置，除了响应外在社会的变化与需求，发展初期深受党国体制的影响（管中祥、魏玓，2001，页 47）。在威权国家机器优于一切社会力量的时代，新闻科系的设立与建制，就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操作员」的架构下发展的（管中祥、魏玓，2001，页 47）。而这样的结构也使得台湾当时的新闻科系一方面在教室里大谈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但校园内却充满层层审查机制，新闻科系学生也只能在荒谬中学习生存或寻求突围。

李金铨在多篇文章点出大学教育的诸多问题，但他仍强调大学是学术的殿堂，社会的良心，不可轻言撤退寸土。他更指出大学是民主的摇篮，大学生在校内一定要接受民主的洗礼，养成讲真话就事论事的习惯，大学也是追求真理的社群，尽管大家对真理的理解不同，但每一份子的发言权都应该获得适当的尊重与保护，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李金铨，1987a，页 219）。李金铨以他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经验为例，说明什么是校园民主。他指出，有次明大新闻系主任出缺，除向全国征才，也组成九人遴选委员会，一位是外系教授，还有两位是大学生及研究生代表，其余是该系教授，兼顾级职及性别，并有同等的发言权与投票权，过程公开透明。对比现今台湾大学科系系主任的产生，部分是校方指派，或是由系所教师选举再由校方同意的作法，依旧缺乏学生民主参与的过程。

有趣的是，威权时期的大学教育不但受到党国体制的影响，也强调实用主义，李金铨也对针对大学教育过于强调与现实的接轨的倾向提出批评。李金铨明白表示，大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独立性，不必时时与社会的职业求黏得太紧（李金铨，1987b，页 101）。他反对将大学当作社会的「加油站」，亦即，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他说，新闻界实务对大学的期望很简单——要有立即可用的人才，最好一出校门就能派得上用场，但他认为，这种以「就业」、「实务」为导向的想法十足表现出「反智」精神，不惜以市场动向干扰大理想，相反的，大学在关键处应该顶住社会压力，不能自弃立场（李金铨，1987c，页 247）。

1980 年代中后期，党国体制逐渐松动，媒体环境也逐渐松绑，日渐走向私有化，传播科系也慢慢脱离党国的使命，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训练操作

员，逐渐为转成商营媒体机构及其它企业培养预备军，越来越多传播系所的设立，其中不少强调实用取向、与业界接轨，让传播教育陷入实用主义的牢笼（管中祥、魏玓，2001，页 47）。这个现象在近年来的传播科系，甚至整个大学里更为严重，教育部鼓励产学合作，重视学生的就业比例，并以此作为评鉴大学的标准，因而大学越偏向培养学生成为业界最爱用的「即战力」，大量开设实用性的科系，强调可以应用的课程。相对来看，李金铨在 1987 年发表的文字预先响应与提醒的现实趋向，显得格外珍贵。

至于新闻教育应该教什么？李金铨在 1981 年发表于香港《明报》的文章〈米苏里的教训〉中批评美国新闻教课程愈分愈细、愈枝节、愈技术化，反而把文史哲的修养抛诸脑后，加上社会学的训练不足，新闻科系学生的发展受到限制（李金铨，1987b，页 107）。因此他强调，新闻教育除了技巧与学识，培养通观通识，发展独立思考和创造应变能力外（李金铨，1987b，页 103），李金铨更引用成舍我的发言，强调新闻记者的「人格」更是新闻媒体能否发挥功能重要期待。所谓的人格是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为新闻事业着迷的人多是特立独行之士，以强烈的是非心参与社会、改造社会，但他也建议要回到中国记者群里努力「再发现」顶天立地的人格典型，以严谨的学术、深刻的文艺，还其真面目，不矫饰，不八股，需要了解更梁启超、张季鸾和陶百川，并不断刷新其时代的意义（李金铨，1987c，页 247）。

伍、结论：回到制度

1980 年代，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前夕，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学院知识分子为文论政，甚至走上街头。虽然政治环境看似即将开放，但党国的幽灵仍在上空环绕，肃杀之气并未真正消失。传播学者李金铨并非上街抗争的行动者，而是在政治气氛低压的年代在报章媒体上、在公共论坛上评论时政，他批判的不只是媒体乱象，更是背后操控媒体的党国体制，甚至直指以「中国结」形成的戒严体制，掌控了台湾整体的政治与生活，压抑、剥削了多元文化与言论自由。

李金铨倡议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分析了台湾政治势力对传媒的影响，他指出，台湾从 1949 到 1986 戒严期间，媒介受制于寡头结构的政治生态。国家政权及少数菁英结成侍从结构，寡头统治源自于政治垄断，而非靠资本在「自由」市场的累积与竞争。

解除戒严，新闻检查告终，媒体也逐步开放，台湾新闻自由名列亚洲前茅，言论也比过去更为自由、蓬勃，但媒体却仍未能成为社会有效沟通的公共领域，「有钱的」和「有权的」仍旧是主要的媒体拥有者，台湾完成了有缺陷的民主转型，媒介一如在其它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可以批判执政当局及其领导人，但私有大财团控制媒介所有权，公共电视边缘化（李金铨，2022，页 73）。李金铨指出，台湾的媒介在右翼资本主义专制政权统治下争取新闻自由，然而，受压制的市场能量解放之后，却反过来压抑财力较弱的新生声音，严重背离民主的理想。台湾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资本相互渗透，关系愈形错综复杂（李金铨，2022，页 65）。

回顾李金铨过去的论著，可以发现李金铨以言论自由为核心价值，以此批判当时的媒体环境，并对未来提出期待。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类自由中最中心的表现，这不是作为人的基本要件与期待，也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条件，社会民主才能使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得到保障，而有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社会才会更加民主，这也是李金铨主张解除报禁的重要原因。

不过，一如李金铨所指出的「台湾的媒介在右翼资本主义专制政权统治下争取新闻自由」，民间的媒体改革力量，却曾出现短暂的「左」、「右」路线之间。在 1995 年，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时，即有偏向利伯维尔场的「自由化」，主张以自由竞争、股权大众化解决媒体垄断的问题，以及，偏向左翼主要国家介入的结构管制「公共化」两种主张，但最终仍向解决市场管制的方向迈进。虽然部分学者及媒体改革团体至今一再强调建立公广集团，透过税制征收补贴小众及文化媒体，但效果仍然十分有限，即使蓝绿政府表面上都认同公共媒体的重要性，但资源分配仍属边缘。

简单说，控制面板湾媒体的力量从「有权的」转为「有钱的」，而「有钱的」仍然与「有权的」势力紧密结盟，媒体的问题仍然存在。有趣的是，李金铨三十多年前提出的响应媒体垄断策略仍十分具参考性，他一方面强调

「小媒介」的重要，指出「小媒介」是异议声音的出口，甚至可能是改变社会的力量，例如，近二十年来，台湾的另类媒体、独立媒体仍不断出现、挺立，越来越受到认同并成为重要的资讯来源；另一方面，李金铨也不断强调，在媒介政策要解除管制的同时，仍认为国家要适当的管制，防止媒体垄断、建造公共媒体、保障媒体工作者劳动权益，而这也是台湾媒体改革团体不断呼求的主张。

换句话说，虽然本文讨论的论述大多是李金铨在报禁开放前的著作，但他并不乐观地认为开放报禁之后，媒体操控问题就会从此消失，相反的，他早已提醒，除了政治势力，资本集团是另一个垄断势力，若没有适度的规范，言论一样会遭到垄断，因此，除了新闻教育、媒体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透过法规，保障市场结构的多元性，维护不同社群的媒体近用权。政府的角色一在维护竞争管道的通畅，一在保障人民知的权利；前者是针对所有权，后者针对发言权（李金铨，1987a，页 140）。他在《解构广电媒体》的总结中提出政府在媒体市场中的角色，他强调健全的传播政策必须体现民主精神，落实新闻自由，而媒体受公众信托，必须是以受到社会力量的监督。他在传播政策上提出以下建议（李金铨，1993，页 530-531）：

第一，政府应该制订并执行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维持自由竞争的管道，以求取市场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而垄断结构无疑自由竞争的敌人。政府要管的是架构不是实际内容与和具体经营。

第二，政府必须认媒体资源为社会公有，在传播政策上达成「公共服务」的目的。因此，在结构上促进媒体反应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团体的多元利益与观点，并更要以公权力扶持弱团体，使他们在媒体上能充分发言。

第三，文化立法必须坚持人文理想，毋使媒介全然物化或异化，这样媒体才能帮助扩充公共领域，建建立上下沟通，形成社会共识。

在制度之外，在报禁开放前，李金铨就强调媒介应强化其内在的民主化，以专业精神对抗媒介组织的权威结构，并受到独立新闻工会的保障（李金铨，

1987b, 页 113)。提出透过工会保障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权, 工会若充分落实, 或能成为与资方谈判的强大力量, 新闻工作人员若无能以工会集体力量争取新闻自由和工作自主权, 则不可能真正为公众所有, 也将维系反民主的威权政治传统(李金铨, 1993, 页 540)。

即使在媒介开放近三十五年的今天来看, 上述的主张仍然是重要且必要的。对李金铨来说, 媒介是社会公器, 属于社会公产, 新闻自由不只是老板的自由, 也是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自由, 更是草根声音的自由(李金铨, 1987a, 页 140)。这样的观念李金铨从一而终, 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出现。「自由、平等、公道」的基本价值贯穿到《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一书及相关的著作中, 这也是李金铨在新闻媒体与环境的基本理念, 他在《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代序」提到「自由、平等、公道」是「参与民主」的基本精神, 涵盖了三个相辅相成的层面。首先, 「新闻自由不止是报业经营者的自由」: 必须制定反垄断法, 以营造自由竞争的公平环境; 其次, 「新闻自由也是报业经营者的自由」, 必须刷新法律意义, 健全工会组织, 以保障记者编辑的权益及采访报导自主权; 最后则强调「新闻自由更是社会全民的自由」: 社会大众有知道真相、不被蒙闭真本、不被歪曲形像, 以及免于恐惧、畅所欲言的权利。

李金铨以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办报理念及传播基本的理论概念--沟通为基础, 主张要开放媒体, 政府要适度管制, 才能保障言论、追求真理、实践民主, 他提出的政策建言, 三十多年来, 屡屡出现在各样的媒体改革论述中, 至今仍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提醒。

参考书目

- 王震寰 (1993)。〈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 郑瑞城 (编) (1993), 《解构广电媒体》, 页 414-435。台北: 澄社。
- 李筱峰 (1987)。《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台北: 自立晚报。
- 李旺台 (1993)。《台湾反对势力——一九七六——一九八六》。高雄: 五千年

- 出版社。
- 李金銓 (1987a)。《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
- 李金銓 (1987b)。《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台北：久大文化。
- 李金銓 (1987c)。《傳播帝國主義》。台北：久大文化。
- 李金銓 (1993)。〈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鄭瑞城 (編) (1993)，《解構广电媒體》，頁 519-550。台北：澄社。
- 李金銓 (2022)。《新聞自由的幽靈》。台北：時報。
- 池煥德 (1997)。《台灣：一個符號鬥爭的場域：以台灣結 / 中國結論戰為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國祥、祝萍 (1987)。《台灣報業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廖素霞 (1994) 《台灣社會運動與另類录像帶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管中祥 (2002)。〈從 Habermas 的溝通觀再思考媒體傳播過程的權力意義〉，《中華傳播學刊》，2: 185-220。
- 管中祥、魏均 (2001)。〈「傳播學生斗陣」與媒體運動--社會、媒體與「傳播學生斗陣」〉，《當代》，162: 46-57。
- 謝然之 (1982)。〈台灣新聞報佇立開拓—從復興崗經木柵到華崗的創建歷程〉，《新聞教育與我》。台北：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 鄭瑞城 (1988)。《透視傳播媒體》。台北：天下。
- Stevenson N.(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UK:Sage

Commun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Expectations for Media System- an Analysis of Chin-Chuan Lee's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of Lifting the Press Ban"

Chung-Shiang K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n-Chuan Lee's essay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of Lifting the Press Ban" to understand his definition and proposi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on this basi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democracy? What negative impact does the single-party system have on them? How should media be regulated when communication rights could be exercised freely?

Although Lee had written most of these arguments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he did not think media manipulation would disappear with the lifting of the press ban. On the contrary, he reminded people that as political power is not only the cause of media monopoly but also commercial interference, we need proper regulations to prote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a result, in addition to media education and media self-regulation,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on protecting various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 right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 access media are more important.

Keywords: freedom of speech, media policy, press ban

* Chung-Shiang Kuang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benlakuang@gmail.com

台湾报纸受平台科技影响： 新闻与民主的警讯

林照真*

本文引用格式

林照真 (2022)。〈台湾报纸受平台科技影响：新闻与民主的警讯〉，《传播、文化与政治》，16:139-163。

投稿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8 月 1 日。

* 林照真为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e-mail:carolinelin@ntu.edu.tw

《摘要》

跨国平台挟强大的网络科技能力，成为主要的广告获利者。传统媒体中，以报纸影响最为严重。为厘清国内报纸新闻受到科技平台影响情形，本论文针对国内三家综合性报纸《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进行资料搜集与访谈，提出初步的研究发现。本论文指出：一、原本扮演台湾新闻主要提供者的传统报纸，出现地方新闻人力、国际外派新闻人力严重衰退现象，影响国内言论市场的多元性。二、台湾报纸数字广告成长 616%，传统纸版广告则衰退九成以上，广告收益已难维持优质内容。三、台湾报纸网络新闻半数以上（52%-58%）流量，来自 Google 和 Facebook 平台导流，可见报纸对平台的依赖。本论文期望政府与民众都能关注报纸没落的现象，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以挽救台湾的新闻与民主。

关键词:平台、民主、新闻、报纸、谷歌、脸书

壹、缘起

在传统新闻时代，印刷版的报纸媒体具有极高的特殊性。首先，平面报纸是新闻记者人数最多的媒体，所有记者透过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进行采访路线分配，以便掌握国内各地新闻。在大众生活中，阅读平面报纸一度是基层民众与社会精英共同的爱好，也因此增加报纸影响力。

由于报纸媒体聘雇最多的记者，始终在新闻传播中扮演领导角色。每日固定出刊的早报或晚报，都是电视与杂志等其他媒体必须参考的新闻素材。传统报纸并且聘雇国际特派记者，分别派驻全球重要城市。两岸经贸互动密切，报纸记者也经常前往大陆。此外，也有记者带着特定任务从台湾出发，到全球各处进行专题报导，这些都是报纸留给读者的记忆。

自《苹果日报》于 2003 年进入台湾后，台湾长期维持日报四足鼎立的局面。包括《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一直维持发行量与广告的激烈竞争，报纸内部以「流血竞争」来比喻情况，晚报首先受到冲击。《自立晚报》（2001 年），《中时晚报》（2005 年）陆续停刊后，最后一家晚报《联合晚报》声明：「受到读者阅读习惯改变、数字媒体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决定终止发行。」（李伊晴，2020 年 6 月 1 日）国内的晚报市场完全结束。

日报方面，在台湾四家综合性报纸中，《中国时报》于 2008 年易主；《苹果日报》则于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营运，报社进行缩编（叶冠妤，2020 年 6 月 19 日）；接着在 2021 年 5 月宣布停止平面报纸出刊。《苹果日报》说明停刊的原因包括：「网络发展彻底改变读者阅读习惯，数字洪流超乎想象，尤其是 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现改名为 Meta）等数字平台的垄断，造成广告资源大量流失，对纸媒不啻是沈痛打击。」（台湾苹果日报，2021 年 5 月 18 日）。

目前，台湾除《经济日报》、《工商时报》外，仅存《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三家综合性报纸，均在艰苦中经营。

其实，报纸经营受到电视等其他媒体影响，导致广告下跌，实为市场常态；却不像平台影响如此巨大，连生存命脉都受到威胁。数据显示，网络广

告的兴起与印刷广告的暴跌近乎对称，等于数位广告杀死了平面广告。又，网络广告空间无限、整体刊登价格更为便宜（Filloux, 2020, December 7）。全球媒体都注意到新闻记者遭大量解聘、新闻工作减少的现象。

有关平台宰制广告市场现象，「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公布《数字平台调查报告》（ACCC, July 26, 2019），报告内容特别关注搜索引擎、社群媒体平台（social media platform）和其他的内容集结平台（content aggregation platform）在媒体与广告市场的竞争情形，最主要关注对象即为谷歌和脸书。报告中并且提及澳洲传统媒体处于竞争劣势，媒体与平台之间的信息和权力均不对等。在2006-2016间，澳洲新闻相关工作少了9%；传统纸媒更少了26%。传统平面媒体人数却少了20%。同时，自2008-2018间，澳洲有106家地方性报纸关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公共新闻没有人报导，地方法院、医疗、科学新闻等，报导幅度都最是令人满意下滑趋势（江雅绮，2021年2月22日）。

在平台大量掠夺广告费、导致各国新闻媒体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危及民主时，脸书和谷歌同意各自用三亿美金来支持全球新闻，却引来不少质疑。有些批评认为这些经费是用来进行公关，或是作为反垄断的法律诉讼费，只是偶然的慈悲。谷歌说他们花了近两亿以提升质感新闻；脸书则说这三亿已经用完，其中半数是用在地方新闻上（Coster, 2021, Jun 10）。此外，谷歌也针对地方新闻受平台影响情形，提出具体说法。谷歌说明鼓励地方新闻（Cox, 2022, February 9）。2022年4月7日，谷歌并和斯洛伐克五家媒体签了Google News Showcase（Kulich, 2022, April 7）。

在平台影响媒体发展的讨论中，地方媒体受到的影响又比都会型报纸来得严重，也因此平台在讨论补偿等协助方案时，均以地方新闻为优先。基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新闻受平台影响的严重后果，本论文于是展开国内三家主要日报的研究。不同的是，台湾虽也有部分地方型媒体，长期来则是由大型国内报纸（部分来自电视新闻）发展地方新闻。

本论文关心报纸受平台影响问题，并先以地方记者和广告发行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采用深度访谈进行研究。

贰、理论文献

一、平台崛起

目前各国在讨论媒体问题时，都会先讨论平台崛起的相关现象，也因此须先认识平台。平台包括：（一）硬件的分层结构；（二）为了内容的支持；（3）财务交易的调节结构；且多数平台同时具有两种以上的类型（Steinberg, 2019, p. 7）。举例来说，Uber 或 Airbnb 为服务平台和搜寻者连结并提供服务，亚马逊为物品平台则和卖家连结；脸书和谷歌则为信息平台，和人群、广告主、其他信息链接（Culpepper & Thelen, 2020, p. 289），并慢慢建立以广告为主的商桌模式。

换言之，平台是科技演化的延续，主要目的为数字科技的资本化使用。（Mihailidis, 2019, p. 342）。数位平台可分为五种类型（typology）：（一）通达信息的平台（access to information）；（二）可获得个人资料与内容的通路，如社群网络；（三）可藉由第三方获得货品与服务（如网络市场：亚马逊书店、eBay 等）；（四）可获得劳动力、知识能力的通路（如 TaskRabbit, Upwork）；（五）可获得金钱、资本的群众募资网站（Strowel& Vergote, 2019, pp. 10-11）。其中，和新闻产业、媒体市场最为相关的则是第一类和第二类，谷歌和脸书尤其受人注目和议论。

媒体市场中，传统印刷媒体除了面临网络新媒体强烈冲击外，更主要的劲敌为争夺广告收益的平台业者。和媒体不同的是，平台并未直接生产内容，他们只提供通路（access）。在通路模型中，通路比所有权（ownership）更是个混淆不清的用语（buzzword）（Strowel& Vergote, 2019, p. 9）。遵循平台运作原理，平台因此创造独特的平台经济，也更加商品化和控制资本所得。平台权力愈大时，获利也愈多（Mihailidis, 2019, p. 343）。如今，网络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已引发全球学界关注（Steinberg, 2019, p. 22）。平台很快确定以数字广告为主要获利模式，却不愿被当成传统媒体（Gillespie, 2010, p. 359）看待，也因此，平台的问责与该承担的义务，一直与获利不成正比。

1990 年代或是更早之前，新闻产业间进行新闻竞争，宣称「内容为王」

(content is king) ; 约是 2005 年左右, 情况出现改变, 注意力开始转至平台上, 要靠平台传递来整合内容生产, 内容不再是王。如今, 苹果 (Apple)、谷歌、亚马逊 (Amazon)、Netflix 等公司, 都已陆续宣告「平台为王」(platform is king), 并在封闭的平台系统内传递内容 (Steinberg, 2019, pp. 69-70)。

在《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 一书中, 便指出平台为获得资本, 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 扮演跨媒体 (intermediary) 的数字基础建设, 由平台促使不同的团体与个人互动, 并把消费者和用户的数据提供给广告主。(二) 平台体现网络效益, 可协助团体发展成更大基础的规模, 并且可以掌握潜在的群众。(三) 平台采用补贴政策 (subsidization), 免费提供特定的产质量与服务, 帮助用户扩大规模。(四) 平台强调实时的使用者参与, 并会不断透过技术提炼提供更多引人注目的信息以交换注意力, 并让既有的使用者持续带进新的用户一同进入此生态系统 (Srnicsek, 2017, p. 43)。

由于平台的方便性, 导致消费者养成依赖性, 进而在平台形成的虚拟小区中交友与分享情感 (Culpepper & Thelen, 2020)。以 YouTube 为例来说, YouTube 是个集结影音内容的平台, 而不是内容提供商, 它是形上生意 (meta-business), 是靠原始生产者提供信息以获利的商业模式。同时, YouTube 也不是真正做影音生意, 它主要建构一个方便与稳定的平台, 进行网络分享的生意 (Burgess & Green, 2009, p. 4)。同样的模式也可用来说明脸书、谷歌等大型社群平台。

从经济层面而言, 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 这类公司大部分未满 25 年, 拥有的权力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 但政治科学研究却追不上它们转换的过程。平台公司有着不同于传统商业的赚钱模式, 并创造大量的数据数据, 足以进行市场交易 (Culpepper & Thelen, 2020, p. 289)。科技并且帮助平台公司削减劳力成本与避开管制措施 (Rahman & Thelen, 2019, p. 183)。

以脸书来说, 脸书获利的想法, 就是把人们日常的社会关系, 进行财务评价, 和传统需要生产商品的逻辑正好相反 (Arvidsson, 2016)。因此, 脸书选择的标准自然和传统编辑不同 (DeVito, 2016)。同时, 数字网络允许潜在的广告主可以直接接触到阅听人, 以致网络广告集中在谷歌、脸书等少

数科技巨人身上 (Brake, 2017, pp. 25-26)。科技帮助使用者轻松且免费使用平台，接着平台公司便从使用者身上获利。用户只要他们在网络或手机上活动，科技平台提供搜索引擎、地图、部落格、影音串流等节目，因为可与使用者互动者，就可以获得有关用户的数据与数据 (Simpson, 2016, p. 155)。

换言之，平台尝试建立一个科技可以进行判断的标准，并发明名词让使用者想象。随着平台逐渐发展成数字垄断经济时，已引起政府忧心。现在美国国会，就连共和党都认同平台经济已造成过于庞大的数字垄断 (digital monopolies)，政府必须介入 (Picard, 2020, p. 125)。我国立法院委员也已多次提出质询，要求关注平台影响媒体的现象 (林育瑄, 2021 年 4 月 14 日)

二、平台贩卖用户数据

目前出版商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数字收入明显比报纸少那么多？因此，我们必须探究，是什么机制使某些隐藏的信息，可以被带到使用者眼前 (Schou & Farkas, 2016)？最主要原因在于数字广告中介 (intermedianies)、数字广告成本较低导致 (Dwyer & Martin, 2019, p. 289)。其中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平台具有掌握用户数据的高超能力。平台愈能锁定使用者，就可以持续追踪用户更多的数据 (Pariser, 2011)。

平台采取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提供广告业者前所未有的服务，并因此成为最大获利者。以脸书来说，脸书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收益，是因为脸书创造衍生物的社会逻辑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指的就是算法 (Arvidsson, 2016)。算法是一套规则去了解所有行为的结果，因此包含处理资料、计算行为表现或自动做决定 (decision-making) 的过程。社群媒体的算法会考虑什么是影响民众更有力的价值，然后在分析用户各种数据时，就把这个价值的优先性设定先于其他价值 (Bossio, 2017, p. 92)。算法的意涵比「软件」更广，指的是奠基于特定算法的制码过程。平台还能掌握有关使用者个人的地区、连结、分享与观看等。脸书也会了解使用者多常与朋友、粉丝页或公众人物互动，他们有多少个赞、分享与评论。动态墙还可以让用户没看到的贴文，在其他人与这贴文互动后，再次出现在你的动态墙

上。脸书就是要完成它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做法就是让你一直参与其中。脸书的研究者也发现，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脸书可以从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多的用户中得到信息，并且可以测量文字与分享链接的影响力(O'Neil, 2016, p. 180)。不只脸书，谷歌、苹果、微软(Microsoft)、亚马逊与手机供货商等有很多公司，都拥有很多和人有关的大数据，以达到赚钱的目的。

谷歌跟脸书的大量数据有两个用途。对用户来说，这些数据是提供个性化相关新闻与结果的重要参考。对广告主来说，这个数据是发现可能买主的关键。平台可以使用这些个人化的数据，赚到广告主的金钱(Pariser, 2011, p. 40)。谷歌和脸书都是借着目标营销(target marketing)的机会，去证明网络平台具有广告主需要的数据潜能。这时的数据指的就是把网络上的个人特征(personal characteristics)转变成消费者信息(consumer information)。也就是说，公司贩卖的数据可以是常态取样而来，也可能是透过困难的预测取得非常态的数据。不同的数据，自然会有不同的售价标准(Simpson, 2016, p. 157)。

包括谷歌、脸书、苹果还有微软，都在进行一项竞争，就是尽可能去了解使用者。使用者可以得到免费的服务，代价就是付出关于用户个人的所有信息(Pariser, 2011, p. 6)。Gmail跟脸书都是很有用的免费工具，他们也同样是一种萃取引擎(Extraction engine)，我们在其中倒入很多我们生活中的细节。苹果手机知道使用者今天去了哪里，读了什么。当用户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时，又会有一些特定公司像是 BlueKau 或是 Acxiom，可以导出具有高利润的个人信息。

社群平台借着网络行为搜集得来的数据，进而创造用户类目，用的就是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Cohen, 2018, p. 140)。所谓的行为市场(behavior market)，每一个个人创造的点击(click signal)都是商品(commodity)(Pariser, 2011, p. 7)。平台并不生产内容，而是生产单一的阅听人商品，就直接卖给广告主。在真实世界里，谷歌绝对有能力就各种议题进行信息控制，像是决定网络搜寻的先后顺序，以便提高某些竞争者的经济利益。这时，进行点阅的使用者，自然是跟着这个商业步骤的信息再现，最先看到的，必然是已经

付费的广告主 (Noble, 2018, p. 24)。

谷歌、脸书创造大数据等衍生物而带来财富；相较下，新闻媒体则是奉行媒体经济学的「双元产品市场」(dual product market)，指的是媒体须同时面对两个消费者，并且卖两个产品给两名完全不同的买主；即他们卖内容给消费者，同时把消费者卖给广告主 (Croteau & Hoynes, 2006, p. 28)。媒体之所以可以获得广告支持，是因为媒体把通往观众的通路卖给了广告主 (Picard, 1989, p. 18)。从「媒体双元市场」观点来看，媒体生产内容就是为了吸引广告主需要的消费者。媒体和广告两个产业，则在同一场域中互惠与交易。

然而，这个经济观点使商业媒体受到极大的批判。商业性质的大众媒体，依广告主需要的人口特性设立内容；传统媒体创造「阅听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 (Smyth, 1977)。媒体并不是为阅听人带来获得广告主支持的新闻与各种特写故事；相反地，商业媒体挟带新闻、特写与娱乐，目的是为广告主掌握阅听人 (McQueen, 1977；转引自 Smythe, 1978, p. 124)。政经学派严厉批评媒体，媒体生产内容不是为服务阅听众，只是想把阅听众卖给广告主。因此，媒体内容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免费的午餐」(Meehan, 1984, p. 219)。阅听人劳动是为大众媒体，节目是他们的薪水；如果没有节目，他们是不会看电视的。他们劳动不是为广告主，但阅听人劳动却成了「阅听人商品」的一部分 (Jhally, 1982, pp. 207-208)。媒体当权时代，广告主必须依靠媒体才能接触到用户。

到了网络时代，谷歌和脸书等平台已经不再奉行双元市场原则，却出现更多的市场竞争不透明等问题。平台让广告主可以直接接触到使用者，不再需要透过新闻内容，商业模式和传统媒体全然不同 (Brake, 2017, pp. 25-26)。脸书扮演的是科技公司的角色，它的工作是透过大数据分析，营销广告主需要的客户数据。由于谷歌和脸书创造了有关阅听人商品的各式数据，再利用算法直接提供给需要的广告主购买，实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

参、研究方法

为掌握国内报纸发展的相关情形，本论文先拟好题纲，再和三家媒体主管约好时间面谈，并且取得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为避免研究为媒体带来困扰，本论文采匿名制，并尽可能避免可识别的报纸特征。研究问卷如下：

一、有关地方新闻（1996 年至今）：

(1) 请以数量说明：请问地方新闻消失的情形；如报纸地方版面减少的数量；地方中心裁撤过程；地方记者减少人数。

(2) 请以文字描述说明：请问地方新闻消失对地方人才培育的影响；有哪几类的地方新闻消失不见？地方新闻消失对社会的影响。

二、有关国际新闻的采访报导（1996 年至今）：

(1) 请以数量说明：请问国际新闻以翻译取代国际特派员的情形；目前国际特派员人数；国内采访组出国制作专题经费、人力减少情形。

(2) 请以文字描述说明：请问特派员减少，对报社新闻质量的影响为何；请说明国内记者出国制作专题减少，对新闻质量的影响。

三、有关报纸广告（1996 年至今）：

(1) 请以数量说明：请问报纸（印刷平面）广告金额的变化；请问报纸数位广告收入变化；分类广告消失的影响。

(2) 请以文字描述说明：请问报纸版面中，有哪些主要类型的广告消失？请问报纸消失的分类广告是否出面在报纸的网络广告中？

四、有关谷歌（Google）：

(1) 请以数量说明：请问谷歌的流量带动重要新闻出现的具体情形（如关键词）；请问谷歌流量是否和营收一定成正比。

(2) 请以文字描述说明：请问重要的新闻却无谷歌流量，会出现什么

样的后果；请问为什么谷歌流量未必能带来广告营收。

五、有关脸书（Facebook）：

（1）请以数量说明：请问脸书的流量带动重要新闻出现的具体情形（如买脸书流量）；请问流量是否和营收一定成正比。

（2）请以文字描述说明：请问重要的新闻在脸书却无流量，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请问为什么脸书流量未必能带来广告营收。

本论文并与三家报社、合计共九名编转部、广告部主管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如下：

表一：受访者人员与名单

报纸名称	访谈对象	访谈时间
联合报	编辑部、广告部主管	2021年12月29日
自由时报	编辑部、广告部主管	2022年1月20日
中国时报	编辑部主管	2022年1月26日

本论文与媒体主管进行访谈的同时、或是之后，取得与访谈内容有关的资料，由于各报提供的资料形式不一，有的年份也不够完整。本论文尽可能整合三家报纸数据进行研究。

肆、研究发现

一、地方新闻人力严重衰退

综合三家报纸提供之地方新闻人力数字可发现，在报纸面临收入不敷成本时，地方新闻编辑与记者经常成为裁员对象。由于地方新闻关注台湾不同县市报导，地方新闻人力减少也不易查觉，更显示地方新闻衰退的严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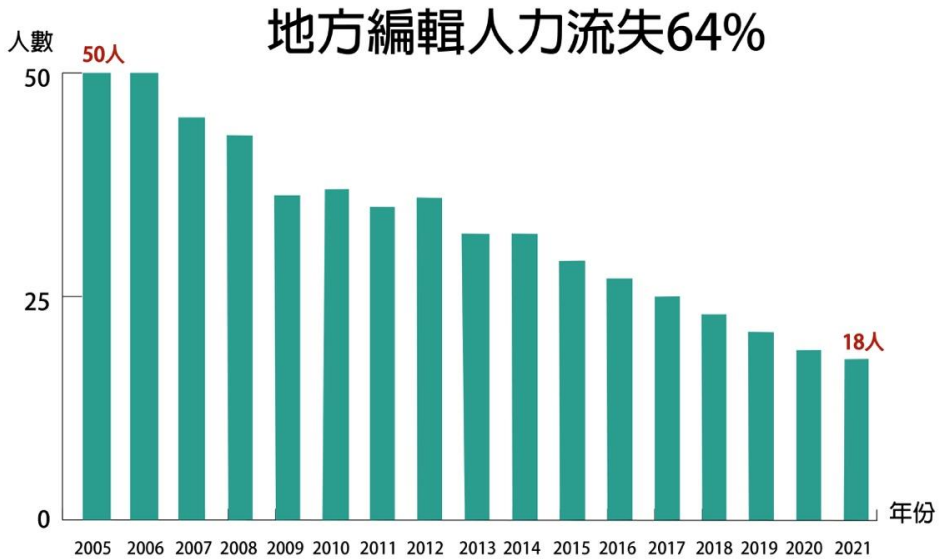
1996年时，国内每家报纸地方编辑与新闻记者约有300余人，三家报社

合计地方编辑与记者人力约为一千人。两年后，根据一家报社 1998 年《同仁通讯簿》可知，当年该报社全台外勤地方记者总数为 221 人，北、中、南三个地方中心内勤编辑为 78 人，两者合计为 299 人，隐约已有若干消退迹象出现。

由于三家报社提供的数据年份不一，也有遗漏，检视 2003 年的资料后，已可看出地方新闻严重衰退。一家报社从 1996 年尚有三百余名地方记者与编辑；2003 年时，地方编辑与新闻记者合计已锐减为 180 人。两年后、2005 年地方编辑与记者又减为 174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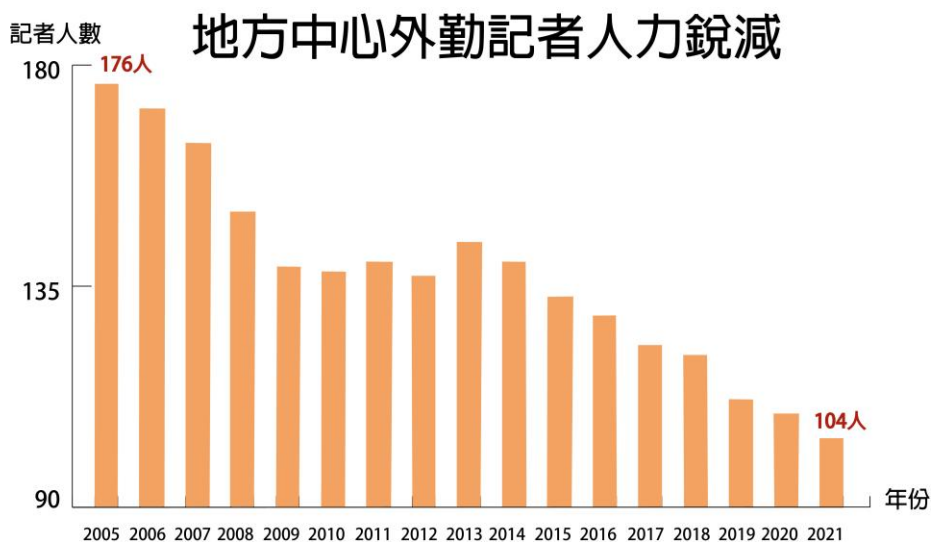
虽然三家报社地方记者人数不一，却同样呈现大幅衰退的现象。就个别报社来看，报社 A 提供的数据中，2005 年的编辑与记者人数合计还有 226 人，人力减少超过 25%。若单独以编辑人数来看，2005 年时，地方新闻编辑人员为 50 人，之后人数一直递减，2021 年时仅剩 18 名编辑人员。地方编辑人员人数缩减 32 人，缩减比率为 64%，亦即流失 64% 的编辑人员（图一）。

图一：A 报社编辑人力分布图（2005-2021）



报社 A 的地方新闻记者在 2005 年时，全台地方记者人数为 176 人。17 年来不断减少，2021 年仅剩 104 人。工作人力少了 72 人，缩减比率为 41%，亦即流失超过四成的地方记者。如果将编辑与记者合起来计算，2005 年时，地方记者与编辑共 226 人，2021 年时合计 122 人，流失共 104 人，比率为 46%（图二）。

图二：A 报社记者人力分布图（2005-2021）



报社 B 提供的资料指出，1996 年时，地方编辑与新闻记者合计共 300 余人。2003 年时，地方编辑与新闻记者合计已锐减为 180 人。至 2005 年仍可维持 174 人，但到 2018 年仅剩 128 人，2020 年更减为 110 人。共计流失至少 190 名、63% 地方记者与编辑人员。

报社 C 单以地方记者计算，1998 年的地方记者人数约为 221 人，2022 年的地方记者人数为 78 人。流失记者人数达 143 人，流失率为 65%，等于目前仅维持 1/3 的地方记者人数。

综合三家报纸提供的数字，可约略估算，台湾地方记者与编辑的流失情形严重。报纸进行数字转型期间，地方新闻记者与编辑成为裁员的主要对象，编辑与记者人数减少半数以上，地方新闻元气大伤。

图三：三家报社地方编辑人力变化趋势图（1996-2021）



合计三家报社至 2021 年，地方新闻中心编辑与记者人力共锐减 62%，严重影响地方新闻的质量与数量（图三）。

回想国内报纸在 1996 年数字转型前，因有一定的地方编辑与记者人力，每天出版至少 30 个属于地方新闻的版面。原有的地方版以县（包括台北市政）为单位，一个县至少一个版。从台北县、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花莲等，就连澎湖、金门等离岛都有地方记者。地方记者从社会基层挖掘重要新闻，只要议题够重要，就会放在全国版。更多的地方版面，则可呈现地方人物、地方志以及地方民众关心的村里大小事。

这些地方版又可透过「换版」运作，让在地读者可以同时看到其他县市的地方新闻报导。一时间，全国都可以感受到，台湾的地方社会力旺盛，民间充满活力。

遗憾的是，数字转型、报社财务恶化后，目前地方新闻版面能并则并。个别报社最多仅存 11 个地方版，有的报纸每天只有 7 个地方版，地方新闻版面已经减少 20 个以上。

一名报社编辑很感慨地说，在报社转型、广告资源大量流失时，报纸只要想要降低成本，第一个考虑的都是从地方版与地方人力着手。地方新闻编

辑采访人力，已经一年比一年少。

地方新闻人力不足造成台湾民间新闻消失的严重后果，地方文史工作者、地方环保新闻等地方要闻，已经很难像传统纸本时代进行报导。也有地方新闻主管说，在地方新闻受到报社重视时，除了县市单位外，记者可以报导乡、镇、村、里等基层的地方新闻。以桃园来说，龟山乡、复兴乡、杨梅镇都可以是报导重点。又或者报导到宜兰时，也会提到头城、员山、壮围、五结、大同、南澳等。如今这些地方新闻现在都要放弃，各地特殊的地名很难在报纸上出现，也已经看不到「记者/杨梅报导」、「记者/员山报导」；都是「记者/桃园报导」「记者/宜兰报导」了。

同时，现在的原住民新闻更少了。一名报社主管说，以前报社有钱，可以让记者去做关怀原住民、关怀弱势的报导。现在报社自己就是弱势，地方记者已经无法照顾了。

国内的地方新闻版面减少后，造成新闻大量集中于县府新闻的结果。县市首长成为报导重点，记者根本无法照顾乡、镇、村、市地方自治层级、地方文史哲，偏远的原住民聚落等，都已无暇照顾。地方新闻失去多样性，内容也渐渐缺乏趣味，无法从报纸版面中看到地方活力。一家地方新闻主管就说，台湾的地方新闻已经公报化，影响实在太太。

地方记者人力不足，也会影响地方选举相关报导，对地方民主有很大影响。就以 2018 年和 2022 年的地方新闻人力来看，2022 年地方报导人力，预估又将比 2018 下降，报导人力将更加吃紧，已经对台湾的地方民主造成极大影响。

二、国际驻外记者仅零星存在

国内报纸除了地方新闻人力萎缩外，另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即为报社驻外记者。台湾报纸原本驻外人员包括华府、东京、伦敦、柏林、巴黎、曼谷、首尔、香港、里约（巴西首都）等大余个国际城市。目前台湾报纸因为财务吃紧，驻外记者几乎成为新闻学的历史名词。

本论文访谈后得知，早期国内传统报社聘请十余个驻外记者，均属常见；

现在驻外特派员只有零星存在。一家报社仅保留一名华府记者；一家报社仅剩日本东京记者；一家报社则有十余名的驻外记者，现在则是连一个驻外记者都没了。

表二：目前三家报社驻外记者人数

	报社 A	报社 B	报社 C
驻外特派员人数	1	1	0

数据源：各报社提供数据

三家报纸虽然仍然订有通讯社外电，可以报导国际新闻，但没有自己的驻外记者，就难有长期的国际观察报导。除此之外，国内记者出国采访，也因经费紧缩，情况不如早期。一家报社主管说，过去每年都有「台湾要加入 WHO」的宣达团，远赴瑞士 WHO 大会前抗议，以表达台湾希望加入国际卫生组织的立场。

这家报社主管表示，虽然 WHO 能采访的素材并不多，报社以往都还是会派记者前去采访。现今，已有五年没有派记者前去采访了。

三、广告大幅下跌，数字广告转移至两大平台，报纸难生存

为了因应数位转型，三家报社只能另新增数位新闻网，用另一种思维来经营新闻网站，内容不同于传统新闻的严格把关，目的在于增加网络新闻的流量，以赚取广告费。「没有流量，就没有广告。」报社主管说，这是传统报纸的体会。目的就是希望能在报纸广告收入外，新增数字广告收入。

从报社提供的数据可知，必须承认，数字时代来临后，两大平台协助台湾报纸从百万读者的传统报纸规模，一跃为「年点阅」超过 25 亿、甚至 30 亿次网页浏览的数字媒体，合计有 52%-58% 的流量是来自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导流，其中谷歌的比重更高于脸书。

一家报社数据显示，一年中有约 38.2% 的使用者是因谷歌导流，脸书则是 14.34%。若以不重复的使用者计算，谷歌导流的使用者占 44.53%，脸书

则为 10.66%。除其他导流外，直接造访新闻网站的仅 21.36%。

另一家报社用流量前十名的新闻和流量后十名的新闻进行统计比较，发现谷歌的占比分别为 31%、43%；脸书则为 27%、15%，可见这两大平台的算法，各有不同的新闻选择标准。除其他来源的导流外，直接造访该新闻台网站的比率仅为 12%-17%。

由上述数据可知，媒体近六成的用户，是因谷歌和脸书来增加流量，由此可知，报纸的新闻网站对平台已有相当高的依赖性。报纸的数字新闻网顺应不同平台的算法，目的在于增加自己的流量，并因此提高自己的数字广告收入。根据一家报社的数据显示，报纸的数字广告则是成长 616%，由此可窥见台湾报纸大致的广告收入结构。然而，数字广告版位贩卖金额极低，并无法弥补传统广告的流失。

从营收数据来看，台湾报纸经历数字转型，报纸生存的难题因此形成。一名报社主管说，就广告收入来看，1996 年时，台湾广告约 460 亿（新台币），报纸媒体的广告量约达 110 亿。2020 年时，台湾的广告量约是 600 亿，却大量转到数字广告（482.56 亿），台湾报纸广告收入合计只剩 11 亿。2021 年媒体调查，报纸的收入已经跌破 11 亿了，只能用「雪崩」来形成报纸的现状。

如今，三家报纸也努力争取数字广告，却发现两大平台公司谷歌和脸书分食数字广告，目前台湾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提出两大跨国平台数字广告的具体占比，一般估计平台约占数字广告的八成左右。

然而，数字广告牵涉复杂的程序购买，不论是英国、澳洲的数字报告，都指出程序化购买过程与定价不透明的问题。数字广告机制除造成平台垄断、媒体无法议价的问题外，更主要原因是因为谷歌和脸书在未对新闻内容进行付费的情况下，大量使用报纸新闻内容，藉此获得大量用户数据数据，再使用这些数据获得广告收益。

媒体数字转型后，大量新闻网络化，又以报纸受到的冲击最大。在谷歌推出搜索引擎、脸书建立社群媒体后，民众开始上网搜寻新闻、或是上脸书阅读朋友推荐的新闻。这两个平台为了留住使用者，以便藉此收集使用者更多的个人资料，然后卖给广告主，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大量使用新闻。

谷歌和脸书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使用媒体的标题供用户搜寻与阅读，报纸的标题因此受到平台无偿使用。又或者，报纸媒体的照片遭缩小为姆指大小，配合标题供搜寻与分享，这样的商业行为完全不须付费给提供内容的媒体。也因此，报导新闻数量最多的报纸，在媒体中受害最深。

换言之，谷歌和脸书两大跨国平台从未聘请任何一个记者来往产内容，却是目前台湾民众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他们不但未曾因为使用媒体内容而付费，还能因为平台的导流作用，与报纸等媒体分润。

一家报社的内部资料指出，在 2013 年以前，实体报纸的广告年收入超过二十亿，数字化后开始减少收入，2015 年仅剩 14 亿，数字广告却只增加 0.8 亿。2018 年实体广告只剩 8 亿，比 2013 年前损失 12 亿以上，数字广告却只增加 2.5 亿。到 2021 年时，数字广告增加到 3.2 亿，实体报纸广告却只剩 3.5 亿了。

表三：国内报纸广告与数字广告消长现况（以一家报社为例）

年份	印刷报纸广告收入	数位广告收入	合计
2013	20 亿以上	0	20 亿以上
2014	18 亿	0	18 亿
2015	14 亿	0.8 亿	14.8 亿
2016	12 亿	1.3 亿	13.3 亿
2017	9.8 亿	1.8 亿	11.6 亿
2018	8 亿	2.5 亿	10.5 亿
2019	6.5 亿	3 亿	9.5 亿
2020	4.5 亿	3 亿	7.5 亿
2021	3.5 亿	3.2 亿	6.7 亿

数据源：报社提供

有报社指出，报纸广告从 2006 年到 2021 年平均衰退 86%。其中，房地产业从 2006 年到 2021 年衰退 96%；汽车业同期间同样衰退 96%；金融业衰

退 93%；3C 家电业衰退 92%；文教唱片业衰退 88%。

网络流量很像传统报纸发行的概念，最主要目的其实在于获得用户数据。谷歌自 2000 年开始进行关键词广告，2006 年关键词结合人口学数据，2009 年结合个人兴趣，2011 年结合地区，这些资料成为广告主歌颂的「精准广告」。

脸书社群媒体强调实名制，透过使用者注册、设备和地区细节配对，结合观看和分享的数据，再结合其他内容关键词，便可自动化为程序，这些数据可以确认用户和他们的研究背景，另外也有软件来解析数据，都可提供给广告主。广告主更相信谷歌和脸书的广告力量，报纸等新闻媒体几乎失去民众的关注。

由于这样，报纸即使努力进行数字转型，仍无法有效增加报纸收入。广告大量衰竭后，报纸已无法扮演聘请最多记者、提供多元新闻的传统新闻使命。如此一来，不但台湾的新闻发展受到影响，国内辛苦建立的民主基础，也可能因为缺少记者的报导，形成信息传达失能而出现警讯。

如今，全球的广告市场因此向谷歌和脸书大量倾斜，媒体成为主要受害者。为了避免新闻民主基础动摇，欧盟、澳洲等国家先后立法保护新闻媒体，再与平台展开协商。台湾必须迈出第一步，协助媒体在法律基础上，得以要求平台为使用的新闻内容，付出合理的费用。

伍、结论

本论文以国内报纸地方记者、国际特派记者消退、广告经费严重下滑等情形。在这样的前提下，新闻媒体对平台的依赖却愈来愈深，说明平台和新闻媒体产业间的复杂关系。

然而，本论文之所以关注这个议题，并非因为报纸产业的利益受损，而是如果台湾失去报纸媒体，台湾很可能将失去提供重要讯息与公共言论的空间，将造成民主社会新闻自由、民主监督的功能失调。

传统媒体的逻辑和社群媒体不同。传统媒体为了大众能接受，以中立 (neutral) 为主要目标。大众媒体在强调独立与客观的前提下形塑真实，并

且因为群众不在新闻现场，而取得报导者的发言位置，并被当成公共领域（van Dijck, & Poell, 2013, pp. 3-5）。这样的新闻媒体，一直是以生产有质量的内容为主要目标，也形塑长期来「内容为王」的商业模式。媒体多元性（media diversity）是民主社会对媒体角色的想象，同时，媒体也必须反映异质社会的需求（Helberger, 2018, p. 155）。媒体和多元、民主参与两个概念紧密相连，也说明媒体在社会立足的必要性。

当然，本论文也了解，国内新闻媒体之所以失去竞争优势，未必都与平台有关。新闻媒体追求网络流量，造成内容浅碟化、政治极化；更有若干传统新闻媒体使用未经查证的平台内容，导致传统媒体和社群媒体界线模糊。

让人忧心的是，新闻媒体因为生存困难，已经失去产制优良质量的动力。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商业模式时，对台湾的民主和社会成长，不可能没有影响。现在已有研究指出，社群平台算法与数据已经改变政治市场，甚至改变了民主（Hughes, 2018, p. 87），这才是值得众人关心的。也因此，不能让平台形成言论宰制的后果，传统媒体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新闻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澳洲政府立法起头后，国内相关政府机构亦应正视平台对台湾新闻媒体的严重影响，进而协助新闻机构和平台对等协商与议价，新闻媒体同时积极寻找可以生存的商业模式；此外，平台在台湾市场取得如此多的广告资源，更应该为台湾这块土地尽力。台湾社会大众也可要求平台赞助公共新闻报导，因为这类报导民众未必点阅、却是民主需要的新闻内容。如此，应可协助重要的新闻产业得以复苏。

参考书目

- 台湾苹果日报 (2021 年 5 月 18 日)。〈《台湾苹果日报》给读者的一封信：忍痛决定本月 18 日起停刊〉，《苹果新闻网》。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10514/C7SRK6HJQZGZJEJAAGHZMAF6JY/>
- 江雅绮 (2021 年 2 月 22 日)。〈「新闻有价」之战，脸书祭封杀、Google 为何愿意对澳洲让步〉，《报导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why-google-caved-to-australia-news-media-bargaining-code>
- 李伊晴 (2020 年 6 月 1 日)。〈台湾最后一份晚报掰掰！创刊 32 年 联合晚报明起停刊〉，《今周刊》。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732/post/202006010008>
- 林育瑄 (2021 年 4 月 14 日)。〈公平会：媒体议价法牵涉广泛 需跨部会讨论〉，《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104140187.aspx>
- 叶冠妤 (2020 年 6 月 19 日)。〈纸媒撑不住·苹果日报将裁员 员工爆：至少砍 70 到 100 人〉，《联合新闻网》。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646958>
- ACCC(2020).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digital-platforms/news-media-bargaining-code>
- Arvidsson, A.(2016). Facebook and finance: On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6), 3–23.
- Bossio, D.(2017). Big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etrics of social media news. *Journalism and Social Media*.89-109
DOI 10.1007/978-3-319-65472-0_5
- Brake, D.R.(2017). The invisible hand of unaccountable algorithm: How Google , Facebook and other tech companies are changing journalism. In J. Tong and S.H.Lo(Eds.),*Digital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pp.25-46).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urgess, J.& Green, J.(2009).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 Cohen, J.N.(2018).Exploring echo-systems: How algorithms shape immersive media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10 (2), 139 -151.
- Coster, H.(2021, Jun 10).Google, Facebook pledged millions for local news. Was it enough?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google-facebook-pledged->

- Cox, A.(2022, February 9).Dive deeper into local news with News Showcase.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google/products/news/local-news-showcase-product-updates/>
- Croteau, D., & Hoynes, W. (2006). *The business of media: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Culpepper, P.D. & Thelen, K.(2020). Are we all amazon primed? Consu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2), 288-318.
- DeVito, M.A.(2016).From editors to algorithms: 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tory selec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 *Digital Journalism*, 5(6), 753-773.
- Dwyer, T., & Martin, F.(2019).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in a sharing ecology. In F.Maryin., & T. Dwyer (Eds.), *Sharing news online: Commendary cultures and social media news ecologies*(pp. 285-304). ebook. Palgrave Macmillan.
- Filloux, F.(2020, December 7).Did Google and Facebook kill the media revenue model? Monday Note. Retrieved from
<https://mondaynote.com/did-google-and-facebook-kill-the-media-revenue-model-7aa86c425c4a>
- Gillespie, T.(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12(3) , 347-364.
- Helberger, N.(2018). Challenging diversity-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a new conception of media diversity. In M. Moore & A.D. Tambini(Eds.), *Digital dominance:The power of Google, Amazon , Facebook and Apple* (pp.153-175).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ghes, A.(2018).Market driven political advertising: Social, digital and mobile marketing, (eBook),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hally, S. (1982). Probing the blindspo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6(1-2), 204-210.
- Kulich, R.(2022). News showcase is launching in Slovakia..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google/around-the-globe/google-europe/news-showcase-launching-slovakia/>
- McQueen, H. (1977). *Australia's media monopolies*. Melbourne, Australia: Widescope
- Meehan, E. R. (1984).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216-225.
- Mihailidis, P.(2019). Normalizing fake news in an age of platform. In M. Zimdars & K. Mcleod(Eds.), *Fake news: Understanding media and mis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pp.341-349). London, UK: The MIT Press.
- Noble, S.U.(2018). *Algorithms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Neil,C.(2016).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New York, N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 Pariser, E.(2011).*The filter bubble: How the new personalized web is changing what we read and how we think*. New York, NY : Penguin Books.
- Picard, R. G. (1989). *Media economics: Concepts and iss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Picard, V. (2020).Confronting the misinformation society: Facebook’s”fake news” is a symptom of unaccountable monopoly power. In M.Zimdars & K. Mcleod(Eds.), *Fake news: Understanding media and mis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pp.123-132). London, UK: The MIT Press.
- Rahman, K.S. & Thelen, K.(2019).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47(2), 177-204.
- Schou, J.& Farkas, J.(2016). Algorithms, interfa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terrogating the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s of Facebook. *KOME*, 4 (1), p.36-49.
- Simpson, D.(Ed.).(2016). *The use of big data: Benefits, risks, and differential pricing issues*. New York, NY : Nova Publishers.
- Smythe, D.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27.
- Smythe, D.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20-129.
- Srnicek, N.(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Steinberg, M.(2019). *The platform economy: How Japan transformed the consumer internet*.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rowel,A., & Vergote, W.(2019).Digital platforms: To regulate or not to regulate? Message to regulators: get the economics right first, then focus on the right regulation. In B. Devolder (Ed.),*The platform economy : unravelling the legal status of online intermediaries*(pp.3-30).Cambridge, UK: Intersentia.
- van Dijck, J., & Poell, T. (2013).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2-14.

Negative Impact from Platforms on Print Newspaper: The Alert for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Chao Chen Lin

ABSTRACT

Due to the power of online technology, the cross-nations-platforms have the benefits of advertisings. The legacy media, especially newspapers were affected mos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this paper interviewed three main newspapers to figure out the adverse impact from the platforms. This article found: first, the local journalists and foreign corresponds of newspapers have decreased seriously, the freedom of market place is hurt. Second, the online advertising developed 616%, the print advertising declined over 90%. The low income for newspapers is hard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Third, More Than half (52%-58%) traffic of online news websites are from Google and Facebook. The dependency on platform is obvious in the business of newspapers. This paper argues the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decline of newspapers for Taiwa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o concern and adopt some ways to save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Keywords: platforms, democracy, journalism, newspaper, Google , Facebook

* Chao Chen, Li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当代公共知识分子： 杭士基 (Chomsky) 座谈会

與談人 (依发言顺序)：

馮建三 政治大学新聞系教授

李泳泉 台北艺术大学兼任教授

李行德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榮譽教授、通識教育部主任

傅大为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榮譽教授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主持人：

郭力昕 政治大学廣播電視學系兼任教授

本文引用格式

傅大为、冯建三、李泳泉、李行德、汪宏倫 (与谈)、郭力昕 (主持) (2022)。

〈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杭士基(Chomsky)座谈会〉，《传播、文化与政治》，16:165-224。

投稿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通过日期：2022 年 11 月 10 日。

杭士基座谈会缘起

傅大为

这个座谈会缘起于我的科技部的专书写作计划，研究基进知识分子的行动轨迹，以杭士基、傅科二人为主。它有经费举办一两个小型的座谈会，分别讨论杭士基与傅科二人。今年春末，我与平日常讨论杭士基与媒体的郭力昕与冯建三联络，希望能够一起筹办一个半公开的杭士基座谈会。后来我们分别推了两三位引言人，一共五位，并请政大传播学院院长郭力昕为座谈会的主持人。同时我们引言人等也分别邀了一些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座谈会的自由讨论。结果大家讨论的十分热烈，部分也是因为在今年二月俄乌战争以来，杭士基多年来对国际政治与美国世界霸权的分析，更形重要。后来这个座谈会文字的出版联系，要感谢冯建三的居中联络。而座谈会逐字稿的完成与校定，乃至多方联络，要特别感谢我的计划助理王佩莹与吴奕臻。

郭力昕：基进知识分子的行动典范，今日也许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我们了解

与参照。在学术量化生产与评鉴机制规训着这个世代的学者、严重失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基进行动者之气力与热情的时代，深入讨论杭士基、傅科或扎伊尔德这样的典范，也许是重新凝聚行动之决心与勇气的必要工作。

傅大为教授研究杭士基与傅科的专书计划，邀冯建三与我为此计划之杭士基研讨会推荐引言人选。建三除了推荐人选，也能贡献杭士基对美国 / 西方主流媒体与政治的意见；我的主要贡献是推荐了熟悉杭士基语言学专业成就及其政治评论写作的语言学家、也是我的大学老师李行德教授，参与此研讨会。大为特别邀我主持此次会议，让皮毛地了解杭士基的我十分心虚，只能勉力担任一个串场的角色。

我是政大广电系兼任教授郭力昕。今天谢谢大家上线，共襄傅大为老师此研究计划中的研讨座谈活动。我很快介绍几位今天的引言人。今天的引言顺序是先由冯建三老师开始。冯建三是政大新闻系教授，研究领域是媒体的政治经济学、电影政策，以至于拉丁美洲政治历史研究。他也是台湾公共媒体政策的重要推手，以及台湾媒体改造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冯建三会介绍英文出版品响应《制造共识》这本书 34 年来的种种。

接下来是李泳泉老师。他从世新大学退休，目前是台北艺术大学兼任教师。他是纪录片的资深研究者与创作者。李泳泉会以《制造共识》这一本书为借镜来看台湾的媒体。

第三位讲者是李行德教授，他是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的荣誉教授，目前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部主任。他的学术领域在语言与认知，语言获得或者是语言可习性的问题。特别提一下：2010 年杭士基访问台北跟北京进行演讲时，两地使用的介绍杭士基的手册是由李行德组稿；手册里关于杭士基谈知识分子责任，或者是批判主流媒体的这些相关文章，也是由他挑选。在 2019 年，行德就香港政治反对运动的一些问题，曾与杭士基有过几次电邮的交流。李行德今天将谈杭士基论知识分子之责任这个题目。

第四位引言人是傅大为教授，他是阳明交大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荣誉教授。1990 年傅大为出版了《基进笔记》以及接续的《知识与权力的空间》等书，超过 30 年前就提出基进这个词，并讨论知识分子的责任。傅大为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性别与医疗，甚至台湾近代

文化史等等。傅大为今天要谈杭士基谈大学及其时代功能。

最后一位引言人是社会学家汪宏伦教授。汪宏伦是中研院社会所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是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他的研究成果现在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研究，以及战争与和平，或和解的社会学。汪宏伦要从社会学视角管窥杭士基的公共论述。

现在请冯建三先开始发言 10 分钟。

冯建三：谢谢大为推动，让我有了机会与动力，寻找并整理资料，准备这次引言。购入赫曼（Edward Herman）与杭士基合着的《制造共识》英文本将近 30 年，却至最近两年多，我才认真阅读、细作笔记。该书的 1988、2002 与 2008 年版本，正文相同，2002 年新添两位作者的导论，经验材料增加至 1999 年，2008 年再由赫曼另撰「跋文」检视美英入侵伊拉克后至 2008 年 7 月的媒介表现。北京大学中译版在 2011 年问世，去年底是台北的野人文化译本，都用 2002 年版。

这本经典著作有理论、有个案研究。理论是「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 PM），它说，生活在美国的人，通过「五个过滤器」得知外界事务：媒介的产权及其利润导向、以广告作为主要财源、大众传媒新闻的消息来源、重炮抨击，以及，反共意识形态。这五个「制造共识」的元素，先前的论者都已个别提及，但合并观察，并以丰富个案论证，应该首见于本书。对于美国人来说，本书用以检视模式者，都是海外事件与新闻，但杭士基主张，PM 不仅适用于国际新闻的分析，用在自由体制的国内要闻，同样可信，后文将再举例。

五个过滤器当中，前三个容易理解，「重炮抨击」则指当新闻不利于权势集团之时，后者会通过智库、游说、捐款、投书、活动或法律诉讼……等等手段，淡化或反击该类新闻。因此，烟草商曾经散播消息，说科学研究指抽烟致癌并非定论；石化产业用力资助智库，表示暖化是否为真、是否肇因于排碳，科学界还有争论……等等。「反共意识」在「苏东波」（「苏联与东欧非共化」）之后，变装继续存在，从利伯维尔场的意识形态，一直到反恐、专制与威权国家的威胁……等等，都是制造敌人的新要求。

《制造共识》出版当年，《纽约时报》的书评说：「通过极为细致的…系列个案研究…本书比对原始资料，提出令人信服的指控，认为新闻媒体掩饰过失也在欺瞒…」，但两位作者「有时言过其实，减弱了论点」的说服力。《洛杉矶时报》则说，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来自各个案研究，单就这些部分来说，各大新闻及公共事务学院所要培养的未来海外特派员及国际版编辑，应该都将这部作品列为必读」。

次（1989）年，美国的学院新闻旗舰刊物 *Journalism Quarterly* 只有第一句「这是一本重要的学术作品」是好话，其他则数落方法，暗指不客观。同年，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刊物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评论五本著作，认为该书「高度是决定性观点」、「认定菁英的内部争论是枝微末节」，没有分析经济的动态过程对传媒的作用。因此，PM 模式「可以当作起点，但没有必然要…是结论」。

美国传播领域的旗舰季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在 1990 年刊登 4 页书评说本书「很多材料具有说服力，有些会有争论，另有些让人质疑」，但作者「沉溺在…刺耳的道德宣告，只能破坏作者在很多读者心中的公信力。」该文担心，两位作者的写作风格使然，最能从该书受益的学生与新闻人，可能为之却步；「不过，主流社会科学若就此…将这本书当作稻草人来摧毁，指这就是左派传媒批评，那么，这就很不幸。整体说来，本书的各论点与发现，值得所有研究大众传媒与政治的学者认真对待，虽要批判观之。」

毫无保留而完全赞赏《制造共识》的两篇书评，都不在新闻传播领域。《当代社会学》说，该书以政治经济学解释大众传播，「这是定本」、「新闻与传播及社会学，还有政治科系，探究政府与企业财团与传媒的复杂关系，都应该必读」。《当代亚洲》盛赞「这是一本高度可读，引人入胜的书，手法与研究无懈可击…这份丰盛的成就，是两位学者在过去三十年来的汹涌年代，所有相关作品的综合。」

书出四年，书评 10 篇，3 篇报章，7 篇学术。2 篇完全赞赏，肯定多于负评 2 篇，彻底负评 1 篇，负评多于肯定 4 篇，正反各半亦有 1 篇。有人认为《制造共识》的 PM 模式遭致「边缘化、冷淡对待」，特别是最可能，或最应该将该书列为教材的（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而指其机械化等

等。

这里，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一）负面评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二）十篇评论是否仍然是边缘化？这得看比较的标准，也要用时间检验。

时间所限，无法申述负评是否成立，仅须强调，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发现（特别是最后一章），两位作者对于认真的记者、另类媒体与公共媒介，是有肯定，即便对其局限，心知肚明。赫曼与杭士基无不勤奋，要指他们无视于群众的反抗潜能与行动之重要性，就太奇怪了。《制造共识》提及但没有就此特别着墨，是书的性质所限制。

第二类问题，何以直至 2010 年，都有《制造共识》的支持者搜集证据，打抱不平，抨击（传播及人文社会）学界没有更多、更有效地推广该书的证据与论点，甚至将该书边缘化、「打入冷宫」？

两个可能的答案。一个是支持者拉高标准。第二个是，支持者认为《制造共识》即便已经处理了传统与批判理论的差别、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野，结构限制与人之动因等等问题，但如同两位作者的预期、也如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预期：「批判理论…与流行的思考习惯逆向而行…也就让人觉得它有偏见也不公正」，于是接纳既少也慢。

这两个答案是否让人满意，是一回事。但随时间推移，另一个看法会是，《制造共识》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支持，杭士基最慢在本世纪第一年或上世纪末，在回答提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述：「累计至现在，已经有其他人以很多类似材料，数以千页计，通过图书或论文确认了 PM 模式。我甘冒风险这样说：PM 是社会科学得到最多确认的论证之一。」这是真的，不是杭士基的夫子自道。

非正式的统计，从 2002 至 2021 年，不含引述，而是讨论 PM 模式或涉及《制造共识》一书的期刊文章最少应该有 30 余篇（甚至有一篇来自商学院，要「解释品牌说服与制造消费者共识……」!）。另有电视频道在该书出版 25 年与 30 年，制作了三支回顾与推广的影片。从 2013 至 2021 年，至少又有四本书，从其书名，可以推知这些作者是向赫曼与杭士基致敬，是在肯定《制造共识》的分析架构，它固然需要更新与调整，但价值长青。四本书依序是《在二十一世纪重启赫曼与杭士基的宣传模式》（2013）、《今日宣传

模式：筛选意识与注意力》(2018)、《信息时代的宣传：仍然制造共识》(2019)，以及，《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传媒宣传：再访与修正制造共识》(2021)。美国政治学者狄玛吉欧 (Anthony DiMaggio) 从 2008 至 2020 年出版的五本书，书名虽然无法看出，但以美国国内议题为主的经验研究与论证，大量引述 (158 次) 也支持两人著作的论点，尚未列入前述计算。最后，查询 google scholar，在新闻传播领域引述较多的十一本图书，《制造共识》高居第一 (查询日期：2022 年 6 月 21 日)：

Manufacturing consent*得到 11221 次引述，后十名依序是_____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9125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824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565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4414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2551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2340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2184

Digital capitalism： 2005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 1778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 445

*指在台湾有中文译本。

这个愈来愈多支持的意义，怎么理解？

是现实不变或变本加厉，使得当年对美国一时一地的检视与反省及批评，扩及于更多地方更多议题，从而是一种无法让人欣慰的发展，如同有犯罪才有警察，犯罪多警察多，警察不会欣喜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比喻不妥，先请见谅）。或者，不宜这样看待，这是显示日积月累，知识与洞见从来没有不见天日，并且愈来愈普及，早就从边缘突破，已经进入更多领域，得到更有效的推广学习，有益人心，从而是纠正世道的重要环节，逐渐打通？

在不同地方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从而可能会有不

同的答案。在台湾，若是容许我以自己作为例子，则必须承认，尽管我如同很多人，知道也推崇并读了杭士基与赫曼的著作，但必须反省，何以我只是搜藏英文本三十年、中文简体版十一年，却直至五、六年前才开始列《制造共识》为参考？细读该书也才仅是两年多以前？直到去年底繁体中文版问世，今年才第一次将《制造共识》列为教科书。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自己在这个领域教研三十年的人，这么晚才以本书作为教科书？可能的原因还须检讨，但明确知道的是，促使我从闻其名、敬重其人、赞同其主张，但没有更进一步探讨杭士基与《制造共识》，再至近年来有了觉悟，以相对多一些的时间阅读《制造共识》等著述，是因为两岸关系的变化使然，使得杭士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见与他对传媒的解剖，更加有必要推广，增加学子与世人接触的机会。

郭力昕：谢谢建三，每位引言人准备的内容很丰富，时间不够的话可留到第二轮。接下来请李泳泉。

李泳泉：以「制造共识」为镜，探看台湾媒体。很荣幸有机会在空中跟大家平起平坐。今天我要借镜《制造共识》的理念，来探看台湾媒体的一些现象。基本上是属于过去的，而且也算不上是我们最核心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是有参考价值。

在《制造共识》中，Chomsky 用力解构、批判《纽约时报》。我们知道，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纽约时报》是最具代表性或者最有公信力的媒体之一。如果连这样的媒体，都还这样不堪检验，是以，Chomsky 就很自然地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将触角延伸往另类媒体。在《制造共识》中，在电影和文章里 Chomsky 都谈到了，他做了一个比较：《纽约时报》在 1970 年代后半，对于红色高棉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在柬埔寨和东帝汶的大屠杀。事实上，媒体对这两个事件的处理极为悬殊。Chomsky 用这个案例来探讨其中的结构性影响机制，让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变成可以理解。依此类推，其他的媒体，甚至是非常软性，看似无害的媒体，其实也都可以算是广义的共犯。在当年美国创造了「杀戮战场」这样的说法，指涉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同时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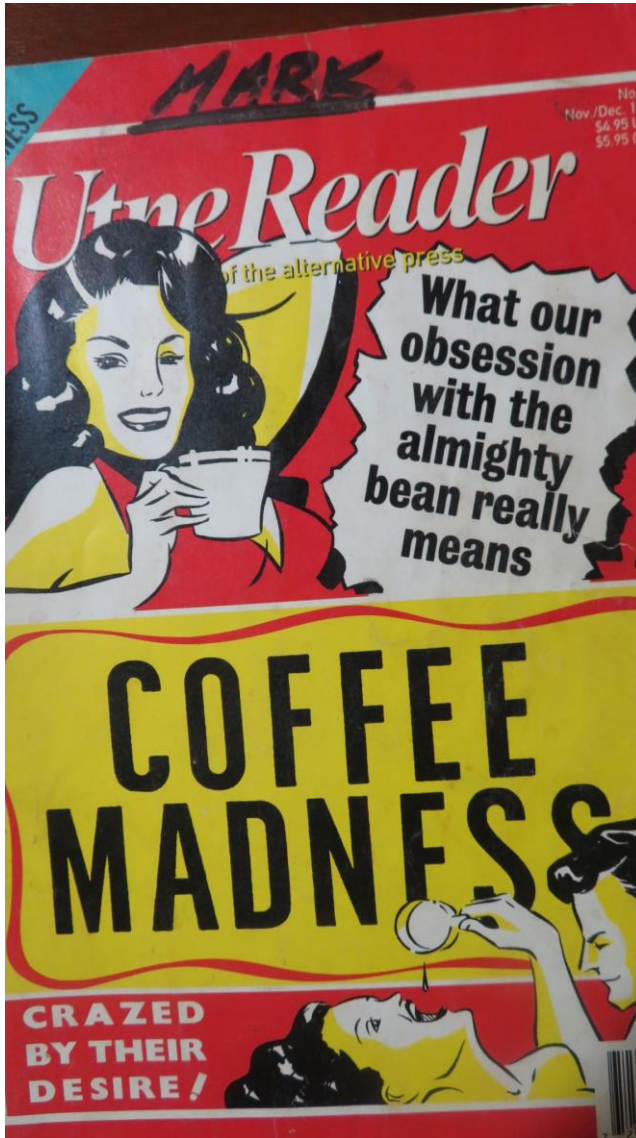
推《杀戮战场》这部电影。



《杀戮战场》电影彰显了美国记者的大爱，然后顺势转移了美国轰炸所造成的伤害。1997年5月中文版《读者文摘》登了这一篇〈杀戮场遗事〉，以非常温馨感伤的调性，报导电影《杀戮战场》中的狄潘本人，吊唁影片中饰演他的演员吴汉。用这样的方式，非常软性地，再度提醒我们那不堪回首的「杀戮战场」。这只是众多美国的「主流共识」，如何不着痕迹地渗透在各种媒体里面的一个例子。

接下来我要借用 Chomsky 的比较方式，来谈一个对照组：其一个 *Utne Reader* 这一份在美国发行的另类杂志。1994年11-12月号，有一个专题企划，叫做〈COFFEE MADNESS〉。这个单元对于咖啡发展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产业变迁、健康影响、生态冲击、国际经济链各方面的结构性的介绍和析论，非常具体清楚，文笔生猛活泼，搭配各种图示边栏，宏观且有细节的举例，那是一套非常容易进去整个结构性的题的介绍。其中所使用的各种标题，例如 *Muddy Waters*，又如以 *Coffee Time* 此一 title 来讲述咖啡发展简史，*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则善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的题目，以星巴克为例，

阐释其空间所创造出来的氛围，那种中产阶级的况味，这一些都是幽默双关而且意有所指。他用这样的方式，可以非常结构性地将咖啡议题的各个面向呈现出来。





反观《诚品好读》在 2003 年第 33 期有一个单元叫〈咖啡道 vs 茶功夫〉，关于茶跟咖啡的发展，这个单元是休闲的、旅游的、消费的、文化的、布尔乔亚风的介绍，其作者群包括叶怡兰、舒国治、韩良露等，以及对广告名人许舜英等的访谈等等。总体上，整个单元就是优雅中产的散文风格。事实上，我们知道，「诚品」多少代表着国内知识菁英的品味，其去政治的惯性却相当成熟、不着痕迹，反映出台湾长久的威权统治，导致很多人害怕涉入政治，怯于批判的、保守消极的文化。

1990 年代，台湾好不容易出现一份「另类周报」《破》。很多年下来，我的确从《破》上读到一些在其他媒体不容易看到的好东西；可是，长期观察下来，《破》的缺点却还是远远超过它有限的优点。底下的这几点是，我对《破》的一部分观察。

《破》的最主要的缺点，第一个部分是重在表态。很多作者编辑要表示自己很左、很进步，却常常显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那种任性；可是在文章里面，你会发现无心也无力求真，无法作理性的析论。在 2004 到 05 年之间，连续很多期《破》强力报导「抢救乐生运动」。事实上，这个课题是值得报导，但是如果仔细读进去的话，发现其中充满激情却很少论理，几乎一概都以「周肥」来称呼当时的台北县长周锡玮等等。对于 2008 年开始的「野草莓运动」，表面上并不是非常盛大，可是它其实影响深远，

包括「反国光石化」、「反迫迁运动」，甚至「太阳花运动」都受其影响；可是对于这个运动却完全不置一词。所以可以明显看出其严重偏颇。另外，我们如果仔细看《破》的每一篇〈编辑手记〉。大部分都会接近「自嗨式的呓语」，轻佻而且不知所云。譬如，复刊第 767 号的〈编辑手记〉，我念一段：「……下半年摇摇晃晃不安，例行必须排予脊椎整建、失眠焦虑不留情地袭来。多数用键盘打字，不时落入困挫陷阱客气礼貌催稿联系偶尔词汇联想而脚下急踱步显露，不成优雅调度的妈妈桑送往迎来……」以上是 editorial 的一段，整篇都是这样的写法。

再者，在 2001 年评江文瑜的小说《山地门之女——台湾第一位女画家陈进和她的女弟子》那篇书评〈谁眼底的陈进？〉中，作者写道：「……江文瑜近年来的许多活动，都彰显了她旗帜分明的政治立场，诸如她采访并撰写《阿妈的故事》、《消失中的台湾阿妈》……既谈阿妈为何一定要『台湾』？如果我们只是要透过历尽沧桑的老年女性见证历史……并让我们从他们生命中看似平凡却动人的奋斗中获取养分，那么是不是『台湾的』阿嬷有什么关系？……江文瑜毫不带批判或保留陈进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对樱花精神的憧憬，却忽略了同时有多少日本年轻人怀抱着这种樱花般短暂美丽的精神屠杀、破坏、奔向死亡，又有多少台湾的年轻人死在幽暗的南洋雨林里……」从这些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来，所谓书评，于此，显然聚焦在书评者对原书作者的政治立场的反感，而不是对这本着作的检视、导读或批判。

这些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来，尽管《破》很努力的要走出一条独立的、另类的路，但其问题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之多。后来印行《破》报的世新大学，以年年亏损为由停办。当然，台湾长久扭曲的媒体环境下，要办一份进步的周报，委实非常不容易。我们期待它越来越好，可是它却倏然消失了。就此观之，台湾长久以来的威权统治与近 40 年的戒严，基本上造就了太多乖乖读书，谨小慎微的学子。当我们终于争取到民主自由，过去的高官还大言不惭：「没有戒严，哪来自由民主？」「戒严只影响了不到 1% 的人」等等。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长久的报禁底下，台湾的媒体多半沦为传声筒或者化妆师。台湾的媒体生态本来就很脆弱，近年来网络媒体席卷而来，假消息更难杜绝，也难免充斥着非理性的谩骂与发泄，这部分当然令人担忧……

最后的部分，我想提一下最近几个月来最令人焦虑的俄乌战争；我一直觉得无法从平面、电子或网络媒体上，得到大致具体的图像。所以想要请教各位，大家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或者大家认为 Chomsky 如何看待普丁？Chomsky 如何批判俄国？会不会如他批判美国那般严厉？

谢谢，我们先到这里，谢谢。

郭力昕：谢谢泳泉。刚才冯建三针对《制造共识》一书过去以来各方的一些评价，跟它的影响，帮我们做勾勒。那么李泳泉就通过《制造共识》里面的媒体批判，检视了台湾媒体的一些实务和文化现象。接下来换个方向，请李行德老师从 Chomsky 关切知识分子的责任谈起。

李行德：首先谢谢大为老师邀请我参加这个研讨会，非常感谢有机会向大家请教，也谢谢刚刚力昕老师的介绍。我说明一下，刚刚提到 2010 年 Chomsky 访问台北和北京，很高兴那次负责统筹整个 Chomsky 台湾跟大陆访问的黄正德老师今天也在场，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他的筹划，做了一部分工作。

我想今天主要是一个读书报告，〈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篇文章以前看过两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完，或只是看其中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待会我介绍了，大家会比较清楚。这次我是认真的读了。这篇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 ppt 四个部分前面两个，有时间的话再谈第三和第四部分。

首先介绍 Chomsky 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几篇论述，这里介绍三篇，当然最主要的是 1969 年的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我原来不知道有没有中译本，后来查了一下，202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The Essential Chomsky*,⁵ Anthony Arrove 编的，整本翻译了，也翻译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 1966 年初 Chomsky 在哈佛大学一个学生聚会上的讲稿。最初刊登在一个学生刊物 *Mosaic*，接着 1967 年刊登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然后 1968 年收录到 Theodore Roszak 主编的 *The dissenting academy* 一书，随后 1969

⁵ 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68 [2021] 《喬姆斯基精粹》(美) 安東尼·阿諾夫 (Anthony Arrove) 編；李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收进 Chomsky 自己的文集,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这是一篇宏文, 59 段都没有空话, 都有很多信息。1969 年的版本 43 页、42 个附注, 英文本我算了一下 15,000 words, 中译本大概两万字。但是中译本不完整, 附注没有翻出来, 然后有一些敏感的地方, 比如说里面提到 Chinese totalitarianism 一词, 就省略了。译文本身文字也不是太好, 希望今后会有一个更好的版本。

然后另外一篇是他 2016 年在 *Who rules the world* 里面的一篇文章,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redux*。里面谈到, 这也是他一贯的观点, 就是他注意到两类知识分子。美国对敌对国跟受美国支配的国家里面受迫害的分歧分子, 是两种浑然不同的态度, 刚刚冯建三老师也提到。比如说 Chomsky 对哈维尔 (Václav Havel)、萨哈罗夫 (Andrei Sakharov) 等异见分子, 其实并不是太瞧得起的, 对他们评价不高。但是对于拉丁美洲那些受迫害的神父, 他有非常高的评价。最后一篇是很短的 2 页文字, 介绍了他 1969 年〈责任〉一文的历史背景。这是我发言的第 1 部分。

第 2 部分我详细讲这篇文章的特点, 这是一篇不容易看懂的长文, 如果对文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不熟悉, 读起来会显得沉闷。其中铿锵有力的文字, 也只能在这种历史背景底下才能更好的领会。他很精彩的一些论述, 在相关历史背景底下就显得非常精辟。文章一开始讲的, 主要是两部分的历史事件, 一个是 30 年代跟 40 年代的历史大事件。Chomsky 对那些历史事件不是一点点了解, 而是有学者般的、专家式的深入了解。不单是这篇文章, 比如他其他文章谈西班牙内战, 对文献的掌握是惊人的。提到的历史事件包括经济大萧条、日本占领东三省、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及西班牙内战、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纳粹的罪行、美军原子弹投广岛长崎等事件。他文章一开头就说, 你要想象我作为一个大学生, 经历了 1930、40 年代, 那种对我的深刻影响。这就是前提。

第二部分历史事件, 都跟二战后冷战局面有关。他在文章里面谈到很多 1950、60 年代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历史事件, 比如古巴革命、美国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的猪湾 (Bay of Pigs) 事件, 美国 1965 年初对北越的空袭, 美国想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展的骨牌理论, 围堵中国政策的论证, 1962 年的中

印边界武装冲突等。这些你要看他的附注，比如说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附注，Chomsky 对事实的掌握是相当清晰的，以前没看附注没注意到。还有〈责任〉这篇文章的论述，是通过对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社会科学权威的一系列批判来进行的。这些权威包括什么人呢？都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例如经济学家 Thomas Schelling，他的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0) 是很重要的著作。另外，Chomsky 谈了很多 1966 年美国国会关于亚洲局势听证会里面的记录，他文章响应这些人的发言。因为 PowerPoint 大家都有，我就只略提几点。

对他来讲，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呢？当然第一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谎言。另外，他觉得知识分子地位优越，所享受的资源 and 保护比一般老百姓多，因此比一般民众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三，知识分子对本国政府的对外侵略行为应该予以谴责、抵制，拒绝为共谋。这点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知识分子分两类，一种就是基本上是向政府献策的技术官僚和政策导向专家 (technocratic and policy-oriented intellectuals)，另外就是批判政府和权威、以价值为导向的知识分子 (value-oriented intellectuals)。Chomsky 在〈责任〉一文谈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但这些分类标签在 2016 年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文章里面，表述得更为清楚。前一类知识分子一般只谈现实政治利益，谈策略优劣，而不会挑战政策背后的基本理念或原则；后一类知识分子，敢于挑战政府政策背后的原则和基本假设，也敢于思考怎么建立理想社会。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第二类角色。他还有一个观点也是比较特别的，强调知识分子分析问题应该有历史的角度。我的理解是，因为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要揭露各种权威论述背后的真相，帮助群众来消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这需要采用历史的角度。好，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郭力昕：谢谢行德为我们扼要地整理几篇有关知识分子责任的作品。李行德的投影片还有两个部分，希望下半场还有时间，可以请他分享知识分子这个议题的其他内容。接下来我们请傅大为老师。

傅大为：我这题目 Chomsky 谈大学及其时代功能，主要是来自于他在 1969

年的一篇文章“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a Time of Crisis”，就是〈危机时代的大学功能〉这篇文章。那个时代是越战的高峰时代，Chomsky 那个时候也积极地参与各式各样的反越战等等之类的运动。美国各地都有很多的学生运动，但不止美国，法国、日本啊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这我想大家都知道过去那样的一个时代。我当然也参考了其他几篇文章。

杭士基（Chomsky）首先觉得，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在过去，其实大家都不太管它。在美国的话，当年大学这个名号其实只是关于足球、关于兄弟会等他们比较关心的一些东西，但是大家对大学这个东西，并不是很重视。主要是也许大学里面有些有趣的老师、有趣的同学，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到了五、六零年代，五零年代麦加锡时代，他认为那时整个美国的社会是 depoliticize，就是去政治化，只有一种政治存在，其他都被排除掉。那么同时呢，因为越战还有冷战的发展，使得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大学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intellectual center，也是一种 intellectual struggle，一种斗争的时代。很多的意识形态、很多的反抗，通常都在当年的大学产生的。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也是因为，我目前的研究是 Chomsky，他自己作为一个 intellectual，「如何是一个 radical intellectual」这个题目。所以我对于他前后时期里的活动都会注意到，特别也是关于他在谈这个六零年代的大学，那个时候也是他刚开始积极投入政治的时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谈的那个大学，特别是我等一下要谈到是关于大学里面接受的，比如说当时美国的国防部，给予很多的 contract，我们叫作赞助计划，要求很多大学里面的教授来做国防部的武器，就引起了许多校园里运动学生与其他教授的质疑，要求校方检查校园武器化的歪风。这跟我自己过去做 STS 的一些研究很相关。

事实上，可以有很多相关联的东西存在。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对那个时候 Chomsky 怎么来谈这个问题，有相当的兴趣。因为我自己过去也做过一些研究来谈这些赞助计划，我们在科学史上很有名一个学者叫 Thomas Kuhn，他在 1970 年是在 Princeton 大学教书，当时就受命来检查 Princeton 那个大学的赞助计划。而 Chomsky 是在 1968、1969 年的时候，他是参与检查 MIT 的

赞助计划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这也可以做一些比较。

另外我也提一下，他讲那个时代的大学，及其时代的功能，当然 Chomsky 主要谈的是在 60 年代。但是其实呢，他在 21 世纪大概 2010 年的时候，在 2013、2014 那時候又重新开始再谈大学。而且他用了一个比较耸动的一个题目叫做「大学的死亡」(“the death of university”)，但是他那个时候所碰到的问题，其实跟他在六零年代所讲到问题其实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公司，corporation，那这家公司里面，董事会具有非常主宰性的功能。在这个情况里面，大学传统的、作为一个知性发展功能，越来越少。所以，在 21 世纪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说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其实也是非常类似（公私立大学也类似，甚至影响到教育部的运作逻辑）。Chomsky 说董事会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来治理大学。大学的行政组织，变得非常肥大，里面的人给非常多的钱。然后不断地扩大大学里面的兼任老师跟非专任老师。我们台湾有的时候说项目老师这样的编制，造成学生、老师们的不安全感。

在美国有个更严重的问题，在台湾（也许我不知道）也许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那就是学生贷款 (student debt)，学生贷款非常严重。美国很多很多学生会被这个贷款压垮，而且贷款跟这一般资本家不一样，资本家你生意做不下去，你可以宣告破产。可是，学生贷款不能宣布破产，它跟着你一生，当初学生运动时，美国政客就开始利用这种方式来箝制学生。这些东西在 21 世纪的时候更形严重，对美国大学进一步的发展造成很大很大的压力！无论是教授跟学生，都受到这种箝制比以前要大很多，一直到最近拜登总统才开始来处理。

回到六零年代 Chomsky 谈大学功能的时代，延续刚才行德老师谈到 Chomsky 对很多的所谓的自由派的学者 (liberal scholarship)，做了很严厉的批评。他后来在一些另外的文章，如 “The Menace of Liberal Scholarship” (1969)，就是自由派学者的威胁，里面又对当时更多的自由派学者言论做了批评。他说，在这些自由派的学者的眼中，大学只是为了制造新一代、新一群的，为权力跟国家服务的国家精英。

这些所谓的 new mandarin (新的国家学官)，对国内维护中上阶级的既

有建制跟利益，对国际则遂行美国霸权的侵略暴行跟压迫。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必看这个细节，但是他的确把当时这个社会科学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这种跟政府有关联的、在政府里面做事这些很多很多的 liberal scholar 一个一个批评，把他们的文章拿出来批判。

那 Chomsky 自己比较喜欢的大学理念是什么东西呢？他主要是来自于他常引用的 Wilhelm von Humboldt，我们说「洪堡德」，18 世纪他对于大学的理念：

“Nothing other than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ose human beings who are moved by external leisure or internal pressure toward learning and research.”

Chomsky 也知道在经济上，大学机构本身是寄生于社会对大学理念或价值或功能的支持。所以，大学无法只是一个理想型，它是个处于理想跟现实彼此不断争夺的场域跟机构。大学无可避免的会反映社会现实，所以我们当讨论大学的时候，必须要放在大学如果「能够改变社会」的脉络来分析它，而不只是把大学自己变成一个很不错的机构就好。

Chomsky 当年肯定美国的学生运动。他认为的确对大学机构产生了深刻的反省，但是结果是什么？如果说这个反省只是改变大学的制度，甚至它的制度民主化，那他觉得这些是非常表面的。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在课程的内容、师生的关联，还有教学的实作等等。甚至，可以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跟反省，这样子才足够。他特别评论了学生运动批判的重点之一，前面提到，就是对大学里面，以理工科为主的，受政府及军方委托赞助计划的批判，并且要求那些计划甚至是军方的实验室要离开大学。

但是，Chomsky 对此流行的看法，并不同意。后来有人 (Chris Knight) 发现他当年曾在 MIT 旁的军火公司 MITRE 里作顾问，MIT 也被广泛认为是当年美国武器制造的大本营，而据说他则在其中努力反抗 MIT 对他的宰制与利用。但 Chomsky 说这是神话。说当年的 MIT 重视学术自由，它既不干涉制造武器的科学家，也不干涉 Chomsky 进行反越战运动，更不强迫他用语言学专才来研发军令的自动化翻译，当年他工作的大实验室 (RLE) 反而是反

越战的联络中心。何况他作 MITRE 顾问并无做为，且很快就离开，专心反战。总之，他一直对理工科学家，有比较同情的态度，对他们的知识尊敬也较高。认为他们的自主性也比较高，不易受到国防部赞助计划的影响。反之，他对过去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则诸多鄙夷，认为其毫无理论，其文字所显示出的意识形态、可议之处极为明显。社会科学家们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只是要维护自己在大学中的阶层地位而已。

所以，真正大学的改变，是朝向改变社会的改变，不在于切断与社会的关系。所以，是否把国防部的这些赞助计划把它推到学校外面去？他甚至不认为，他认为其实那些东西可以留到学校里面。留到学校里面的话，比如说干脆成立叫「死亡系」，把制造武器的那些科学家，通通放入到那个死亡系去。这样子，大家都可以集中来监督，你把它推到学校外面去，大家反而不知道那些实验室在干什么。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改革大学行政制度，不在于攻击校方的行政，而在于学生跟教授本身是否真的有意志来分析与思考改变社会，不要受主流奖励的诱惑，不要怕被主流边缘化的压力，进而形成有效的政治。比如说科学家们可以联合起来抗拒，不接受任何制造武器的计划。那学生运动除了批评之外，应该增加自己的智能、知识跟理性，在知识视野中进行颠覆，进而发展出有效的政治，而非只是在校园中以挑衅为事。

所以大学应该是一个对所有理念跟理论保持中立跟交流的场地，叫 free market of ideas，应该要真正的保持中立跟不默认价值的提倡，包括如何支持越共进行游击战的研究、如何支持中南美洲反 CIA 颠覆的研究等等。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郭力昕：谢谢大为。最后请汪宏伦老师。

汪宏伦：大家好。首先，十分感谢傅大为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很有意思的座谈会。刚才力昕老师介绍的时候提到，我的专业领域在社会学，过去做的研究跟民族主义、国家建构、战争暴力与现代性等方面的议题有关，所以或多或少涉猎过 Chomsky 的一些政治评论。2010 年 Chomsky

第一次受邀到台湾来访问，邀请单位之一是我所任职的中央研究院。当时院里面要编一本专刊，需要有人写一篇介绍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找到我的头上来。我接下这个任务之后，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大量阅读了他语言学以外的一些公共论述作品，后来写了一篇〈值得从杭士基学习的十件事〉，登在专刊上，后来也在《自由副刊》发表。我还记得黄正德老师当时看了这篇文字非常高兴，私下特别称赞我了一番。没想到十多年后，大为因为这篇文字找上了我，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我想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跟杭士基「再续前缘」，谈谈我在十几年前的文章里面没有谈到的一些看法。

我把题目定为「从社会学的视角管窥杭士基的公共论述」，用「管窥」这个词绝对不是自谦或夸张，而是因为 Chomsky 公共论述太多，涵盖的议题太广，我并没有全部掌握。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的守备范围太广了，从本垒到外野他都可以包办。我没有他那么厉害，他所评论的事物，有很多是我没有能力评论的，例如以巴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军事行动等等。所以我只能从我的专业出发，就我比较熟悉的领域来谈谈我的看法。我的题目虽说是「社会学」，但有的时候我指的是比较广义的社会科学。

我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 Chomsky 本人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第二个部分是社会学 / 社会科学如何看待 Chomsky。

刚刚大为已经提到，Chomsky 对社会科学的评价不高，甚至很排斥。他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真的科学，学院里的社会科学很多都只是在为当权者服务，甚至制造出一些「伪专业」，藉由看起来艰深难懂的专业术语来排除大众的参与，反而阻碍了公众知的权利与思考探究的机会。他说的情形当然存在，我们很难否认，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如他所说的那个样子，他似乎有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

以社会学为例，Chomsky 对社会学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那是现代化理论与行为主义科学盛行的年代，很多建制化的社会科学主流还是很保守，所以他的批判与反感，我们不难理解。但是，自从 197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不知道已经走到哪里去了，不但很多左派理论与激进思潮被带进学院，社会学自己内部也有很多自我反思与提升，研究视野

更是扩大许多, Chomsky 还在用当年的标准来批判社会科学, 其实不太公允。例如他一直到最近还在说, 现在的大学都没有学科在教导学生如何批判地思考他所关注的那些问题, 像是气候变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等, 他甚至还举社会学为例, 说社会学只关心贫民区的贫穷、失业与不平等问题, 无法教导学生思考这些宏观的问题。我想很多社会学家如果听到他这么说, 可能很不服气, 觉得 Chomsky 也未免太看不起社会学家了。

好, 在这里, 我们就碰触到我想谈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如何看待 Chomsky 的公共论述? Chomsky 的公共论述, 数量已经多到远远超出他在语言学上面的论著, 几乎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专业。我刚说他的守备范围非常广, 他对大学与建制学科的批评, 我觉得有道理, 也予以尊重, 毕竟我们也都在大学里面, 也知道他所谈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是, 他所处理的很多现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 例如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霸权、帝国主义、恐怖主义、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战争与和平等问题, 其实很多建制学科也都在研究, 例如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我就很好奇, 这些学科的研究者如何看待 Chomsky 的这些评论或论述?

我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以几个主要的英文社会学期刊为范围做了一些搜寻, 结果发现, 大部分的主流期刊, 如果有引用到 Chomsky, 大多是引用他在语言学、认知科学或人类心灵方面的作品, 但除此之外, 他有关公共议题的讨论, 其实非常少被引用或讨论——当然, 还是有一些比较左倾的学者会引用到他, 但是比例非常非常低, 也不是主流。我们大可以说, 他的这些公共论述都不是学术著作, 主要的受众也不是学界, 而是一般读者。不过, 他针对这些公共议题所生产出来的海量的论述, 却几乎完全被学界忽视, 这也有点令人好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 全球化、美国霸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战争与国家暴力, 这些问题在社会学界都有很多人研究, 我随便举几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大咖学者, 例如 Immanuel Wallerstein、Michael Mann、Charles Tilly, 欧洲的 Anthony Giddens、Pierre Bourdieu 等, 他们也都关心并且研究这些问题, 但他们的著作几乎不曾提到 Chomsky, 而 Chomsky 当然也不会引用他们的著作, 除了极为少数的例外。我曾经在 Wallerstein 的一两篇著作里面看到他提到 Chomsky 的名字,

Wallerstein 是知名的左派學者，但是他的提法是一種 Disapproving 的提法，顯然對 Chomsky 不以為然。幾年前我在美國 Boston 訪問的時候，也曾經在某些場合跟社會學者聊到這個問題，他們認為 Chomsky 的政治與社會評論不值得引用，甚至覺得引用會貶低自己的學術作品的價值。所以，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 Chomsky，他所關心與評論的很多議題，其實有一大群專業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做研究，但是他們彼此沒把對方放在眼裡，甚至都瞧不起對方。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要理解這個現象，其實有一個線索，這是他自己提供的。Chomsky 在《語言與責任》的訪談裡面說，他在政治與社會評論方面講的東西其實都非常簡單，只要有足夠的信息，運用我們的理性，保持開放的心靈，就可以做出這些分析與判斷。要了解並批評這些政治與社會問題，根本不需要什麼專業，也沒什麼深奧的學問可言；所謂的「深度」都是社會科學的學者專家所製造出來的幻象，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用來呼撓大眾，讓大眾覺得問題過於複雜，缺乏專業知識就無法參與。

我想 99% 以上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这样的话，大概都会跳起来，因为 Chomsky 认为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专业的学者来研究。Chomsky 不但否定了他们的专业，而且还认为这些专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他们的存在只是掩饰问题、模糊问题、甚至制造更多问题，包括欺瞒大众等等。

由于 Chomsky 认为这些问题不需要专业，所以他的政治评论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其实是一种「(非专业)素人的政治观」，虽然他做了非常多功课，下了非常多努力与功夫搜集大量的珍贵材料，但他所提出的评论意见，从他所瞧不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看，似乎少了一些什么。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Chomsky 有一本书叫《海盗与皇帝》，他在很多地方都喜欢讲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抓到一个海盗，质问他道：「你怎么胆敢在海上兴风作浪？」海盗回答说：「那你又为什么敢在海上兴风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称为海盗，你有一支庞大的海军，所以被称为皇帝。」

Chomsky 的言下之意是说，美国扮演世界警察，正义使者，在全球打击流氓国家与恐怖主义，但其实最大的流氓与恐怖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其他国家因为不够强大，所以被当成海盗，美国因为够强够大，所以就认为自己

是皇帝。他的公共评论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批评美国这个流氓国家，制造恐怖主义文化，就是要戳破这个皇帝的谎言。

他在很多地方都喜欢讲这个故事，但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就想到历史社会学家 Charles Tilly。Tilly 曾经研究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过程，他形容现代国家是最大的流氓黑帮组织，国家不断制造战争，垄断暴力，然后恐吓人民，跟人民收保护费（也就是征税），然后透过垄断暴力与资本的累积，形成了现代国家的形态。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的政治集团，这是从韦伯以来政治学与社会学对国家的基本理解与出发点。Chomsky 喜欢讲「海盗与皇帝」的寓言，但这对研究国家的人来说其实是老生常谈。当然，有的国家比较流氓，比较值得批评，这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 Hypocrisy，伪善。Chomsky 花了很多力气批评美国双重标准、伪善，这些批评我都非常同意。但这同样让我想起政治学者 Steven Krasner 写的一本分析主权的书，书名叫 Organized Hypocrisy，组织化的伪善。Krasner 的论点是说，其实整个主权的概念，包括国际体系的运作，本身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伪善体系，Krasner 区分四种主权，分析这些伪善的体系如何运作，包括台湾的国家主权，也被他拿出来作为虽具西发利亚主权（Westphalian sovereignty）却缺乏国际法理主权的伪善例子。我们身为台湾人，每年光是看 WHO、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怎么对待台湾，我们就非常切身感受到国际体系有多么伪善。当然，美国的伪善和国际体系的伪善是两回事，但政治的运作中充满了伪善，这并不是什么太新奇的论点或发现。

我举国家垄断合法暴力，以及政治运作当中的组织化伪善的例子，并不是要正当化这些现象，也不是认为这些是合理应该接受的。暴力跟伪善应该被批判，有些国家特别暴力、特别伪善，需要监督与批评，这些我也都同意。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总是希望理解这些被垄断的暴力与伪善体系是如何形成、如何运作，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比较知道要如何解消这些现象。这些问题，其实社会科学界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掌握这些问题，但是 Chomsky 好像就是不把这些研究放在眼里。他看不起社会科学，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也有其时代背景。他经常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太清楚他的理想世界的蓝图是什么，但是我们眼前的

事实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有国家、有政府的世界，国家的垄断暴力与伪善当然非常值得批判，但是如何让这个体系可以运作得好一点、减少一些不公不义的现象，好像不是光靠批评，或是揭露这些信息就好。美国的流氓与伪善事迹太多了，讲都讲不完，但你搜集各种证据，一天到晚指责它很流氓、很伪善，好像也解决不了问题。当然，从唤醒公民意识来监督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当然还是有意义，但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总希望能多一点，或是 go beyond that.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他在公共论述方面的努力。从公民社会或公民运动的角度来看，我还是非常肯定他长年来的努力，肯定他唤醒公民意识；对国家权力、暴力的行使的监督，对伪善不义的批评，都是必要的，他的付出也值得尊敬。这些赞美的话，我在十几年前〈值得从杭士基学习的十件事〉里面都已经说过了，所以我想这次应该换个角度，讲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总结一句话来说，我总觉得他和社会科学界之间彼此相互轻忽，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是有点可惜、也有点遗憾的事情。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李行德回应：我想响应一下汪宏伦老师，您的观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说，Chomsky 好像对整个社会科学是非常蔑视的。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把社会科学的要求定的很高，要求像自然科学一样。那当然社会科学达不到自然科学的标准，其中真的有规律性的东西不多。但是，社会科学丰富我们的知识面，它创造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概念，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这些创新都是不简单的。弗洛伊德也好、马克思也好，Chomsky 都不屑一顾，觉得都不行。我最近读 Chomsky 的一个发言记录 (Understanding China-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2002)，谈马克思，他觉得马克思的理论他看不懂，完全没有规律性。我觉得社会科学当然达不到他心目中的那种接近自然科学的规律性，但是社会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

傅大为回应：我也回应一下汪宏伦讲的，因为之前我在 email 里面有跟他稍微讨论过一下。就我看过的 Chomsky 讨论的所谓的社会科学，其实他大部分

讲的是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据我所知他很少讲到 Sociology, Anthropology 他也很少谈到。那当然你把他看作是整个社会科学, 他有的时候讲话 sweeping 非常具涵盖性, 就是讲整个社会科学。因为我自己做科技与社会研究, 对自然科学我想比 Chomsky 要批判多了, 所以他对于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这样的区分, 其实我的意见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真正的长处。他对于政治科学、政治学, 做了很多批评。我们今天所举的例子, 比如说行德或者我所举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六七零年代他所讨论的东西。在七八零年代以后, 他开始注重媒体, 注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中美洲、南美洲、东欧的一些国家, 他花很多精力在那个上面。我觉得那是, 起码我自己个人过去没有办法涵盖的这个领域。他对于拉丁美洲跟中美洲的这些政府或反抗人士的联系, 还有到他们那边去演讲之多, 简直是令人惊讶。我们世界上一流的学者, 很少人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 he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另外我举个例子, 这个话说起来其实可以很多。最近关于俄乌战争, 有一些 alternative media 举办了一些座谈会。座谈会 Chomsky 是其中一个, 可是另外有一堆这种比如说 *New Left review* 一大堆各式各样的, 其他这些学者或者做运动的, 大家都在一堂里面讨论, 所以我大概并没有觉得, 他跟这些社会研究者好像会区别开。那你讲的比如说 Immanuel Wallerstein, Charles Tilly, 这些人就我过去的理解, 他们是做欧洲的历史, 那他们对当代, 比如说拉丁美洲或者是当代二十世纪的, 他们有多少研究? 假如说他们对拉丁美洲有很多的研究, 比如说智利的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的暗杀事件前后等等之类, 假如说他们有很多研究, 那么的确是可以跟 Chomsky 做很多的讨论; 但如果说他们没有, 他们只研究过去历史的, 比如说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等等之类, 那么的确他们可能的交集就不多了。

最后, 我想讲一点 Chomsky 在社会科学上,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研究者, 他是一个 public intellectual。他花很多的时间跟小学老师、不认识的陌生人写 email。大致上写 email 大家都可以跟他联系, 都可以 (跟他) 讨论。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跟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人, 跟一般的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怎么样能够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谢谢。

汪宏伦回应：我简单响应一下，其实我知道我刚刚说的东西会有点 provocative，有些可能听了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因为大为把我放在最后一个，我就担心自己的发言可能会造成有点所谓「反高潮」的味道效果。我 10 多年前那篇〈值得从杭士基学习的 10 件事〉，写了非常多推崇他的话，所以我想这次我想换一个角度，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也就是我所读到他比较不是那么同意的地方东西。那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像是全盘在否定他，或对他很不敬，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关于刚刚行德老师提到的，他「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这真的就是牵涉牵扯到社会科学，或者是科学哲学里面有非常多的讨论，包括我想在场的傅大为老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到底怎么样才算科学？这是这一个值得去 debate（的问题），但他直接就否定说社会科学是不值得存在的，或者它不是科学，我觉得这样是有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回到刚刚那个大为说的，没有错，你说 Charles Tilly、Immanuel Wallerstein 他们是研究欧洲史，但是比如说 Wallerstein 其实他后来研究的不只是欧洲史，而是世界史，谈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且他后来其实也做了一些针对时事发表不少的评论。那我再举一个（例子），Michael Mann - 历史社会学的（学者） - 他做的是世界史，他的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开始写起，规模非常大。他写过一本书 - *Incoherent Empire* -， exactly 就是在批评 911 之后的美国。把他的这本书跟那个 Chomsky 的 *The Failed State* 这本书来做一个对比，两本书都在批评眼前当下的美国，但他们批评视角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想我同意刚刚大为说 Chomsky 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关于社会学，我要再补充他到底怎么看社会学。我特别去搜寻了一下，刚刚引的例子，说社会学者只在关心 Ghetto 里面的 inequality 跟 poverty，这是他在最近的访谈里面讲的，我觉得很多社会学者一定看了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完全同意他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他是一个实践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很具有高度热忱的、很诚心地的来 practice 实践他相信的东西，这一点我完全没有否认。我的意思是，他跟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彼此的忽视，或者彼此没有对话，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冯建三回应：宏伦刚刚所讲，指社会学科有不少领域的人，尽管关注的主题相通，但彼此少有对话。这个情况在《制造共识》出版数年间，同样存在于新闻与传播领域。但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 10 多年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除了引言稿所说，这里再补充两个例子。一是美国的 Robert McChesney 在 1995 年就曾访问杭士基，提及他与记者的关系。杭士基说，他自己与不少记者的关系其实不错，这些记者私下联络时，都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只是不太方便公开讲述。杭士基的这个现身说法，显然与不少批评者的认知不同，书评者指他傲慢、行文严厉，对记者不假词色云云。因此，我自己的理解是，杭士基不是否定记者，是知道记者无法完全自主，不说确实是有不少记者即便自主，想法也经常受制于或服膺主流想法。但若找到努力的记者，应该还是不少。第二个是英国的 Colin Sparks，他与 McChesney 相同，都从基进传播政治取向研究新闻传播，差别可能是《制造共识》一出版，McChesney 还是从实务界转入学院的资深博士生，但初读的时候，他已经大为受用也认同该书的精神与内容。Sparks 则在 2007 年才撰长文给予该书及 PM 模式很大的肯定。然后，如同常见的行文，他也给予建议，期待后来者能够检视菁英的冲突所挤压出来的求变动力，使纳入从而让 PM 模式的解释更为全面。他的第二个建议也是集中在记者，希望为「专业义理」(professionalism) 争取空间，即便他知道客观公正平衡经常成为化妆师或意识形态，但 Sparks 希望纳入对记者的研究以使 PM 更有说服力，他认为或说希望，「大多数记者并无意与宣传共谋，而是潜在的盟友，能够为建立更好的世界，尽一份心力。」

【讨论与响应】

郭力昕：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或者很资深的教授们在在线，另外也有一些传播领域比较年轻一辈的学者。这些都是具批判性的精彩学者，非常欢迎。我想先问看看有没有哪一位要响应刚才我们第一阶段的发言？请朱元鸿老师。

朱元鸿：因为发言的时间满短的，我大概有一个稍微长一点讨论，是李行德

讨论的问题。另外就是对傅大为和汪宏伦，大概有比较短的 remark，我也可以变成等到第 2 或 3 次发言也可以。宏伦大概两天前寄邀请给我，当时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我以为是你们把那位 93 岁的老先生请来了，所以说有一个跟他的座谈会。我就发想，我关心的什么问题，可能可以问的。

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前美国的知识分子，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前所未有的分裂，Polarize，所以说我想请他评论这个现象，以及这个状况的展望。结果，李行德寄来的那两篇文章，我读了以后发觉到，其实他间接的提供了这些问题许多很好的空间。建三一开始的时候介绍就讲说，Chomsky 的贡献其实在于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可能最有价值，我完全同意。我自己受惠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能够撷取或借用，引述他某个特殊观点的脉络之下的个案研究，这对我来讲是满有价值的。我读的这两篇，其实很有意思。他大概从一战开始，还不是李行德刚讲的是说到三、四十年代以后，事实上他谈到这些知识分子的分化，是从一战时候开始的。他分类，一种是为各自的 nation state 发言，另一种则不是 in line with the state, dissident 的发言。这些我读来为什么会觉得还满爽的？读 Chomsky 有一个作用，他的取材在历史上的广和细，很快地能够把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像我刚才想这个问题，马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化的历史文化脉络，这对我来讲很受用。

那关于傅大为，我一并提个比较短的 remark。傅大为他介绍到，特别是 the death of university 的时候，很多的批评，比方说 university 跟企业的相似性，以及对于成员的某些规制，特别是经济上的规制。其实这些批评，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对于 neoliberalism 的批评。当然我自己没有读到那些内容，比方说对于 liberal scholarship 的批评，其实是当前许多保守主义的批评重点。我后来看了一下他的这篇文章，是 2014 年。2014 年时，关于 neoliberal 的论述，已经完全展开，所以我不太清楚，他有用像 neoliberalism 这个标签做批评吗？还是他有独自的脉络？然后他对 liberal scholarship 的批评，跟最近这几年涌现的一些批评差别在哪里？我因为没有读到，我只是问一下大为。

最后一个 remark 是关于宏伦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宏伦刚刚提到了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里面，左派学者对于 Chomsky，甚至对于引述 Chomsky，有一些顾忌，觉得好像会减损了某些可尊敬度或可信度。听到这个，因为我真

的不知道在英语世界里面的左派是这样，我自己是在 2006 年的时候，在法国巴黎参加一场 Historical Denials 的研讨会，论文上面引用了 Chomsky 2003 年出版的新书，*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那本书是刚出版，特别讨论到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还有把它跟纽伦堡大审判违反和平的动作相提并论。我引述这个不觉得有问题，但后来他们帮我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法文，在编辑出书的这个时候，我据说编辑里面，其实有表达比较保留的意见，就是为什么我在这边引述 Chomsky？事实上他们这个脉络，也是法国左派的这个脉络，就像宏伦刚才讲的那样。其实我不知道细节，我不知道到底他们反感的是什么，甚至于我曾猜想跟早期与 Foucault 的论辩有没有关联？我都不太知道。只是这个状况相应于宏伦所提的，似乎确有这么一回事。好了，谢谢，我的 3 个发言都交代完了。

郭力昕：谢谢元鸿。请 3 位鸿响应的讲者简短一点的发言。等一下再请行德，把上半场没有机会讲到的一些观点提出来。大为要回应吗？

傅大为：我简单说一下，刚才元鸿提到的 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y, Chomsky 在很多地方都提到新自由主义，批评的很厉害。我知道批评新自由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社会科学或者社会学，左派批评非常多。所以我的理解是 Chomsky 在这个地方，我想基本上是跟大家差不多，他也是反对这样的东西，但是他批评的非常早，在 1960 年代。那另外补充一点，元鸿提到在法国的经验，我想提一下，后来有一本法国人出的书叫 *Chomsky Notebook*，那个年份是到底是哪一年？应该是你讲的那个后面发生，⁶他完全是在讲法国跟 Chomsky 的关系。Chomsky 因为之前他支持一位法国纳粹的否定者 (denier) Robert Faurisson, Chomsky 根本没有读他的书，但是就愿意支持他，(认为) 他有言论自由。那位学者被法国赶出学院之外，Chomsky 认为这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看到 Chomsky 竟然写这样的东西，在法国引起非常大的反感。之后，法国左派很多知识分子，对 Chomsky 没有什么好印

⁶ 編按：該書為 2010 年，由 Jean Bricmont & Julie Franck 所編，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象。那大概是我刚才讲那个 *Chomsky Notebook* 那本书之后，法国人重新觉得 Chomsky 有些正面东西，也愿意接受。所以 *Chomsky Notebook* 里面，有提到很多过程，我建议也许可以参考，提供 Chomsky 在法国的脉络，我就讲到这边。

汪宏伦：我也简单响应一下，非常感谢元鸿抽出时间来参加，因为我是前两天才把这个 link 寄给他，因为他说他的计算机有技术问题，我想他可能没有空来，非常感谢他来，而且还提供响应意见。其实我对元鸿所提的法国例子，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刚大为说的，他帮一个法国所谓的 holocaust denier R.Faurisson 背书，所以就引发不小的争议。我想元鸿所提的这个法国的例子，其实也是更进一步去证明，Chomsky 在某些学界，除了英语学界，还包括法文学界里面是有争议或被排挤。我觉得有争议是没有关系，因为你针对那么多的事情发表意见，要不犯错、或者不去惹怒别人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因为他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全盘否定的味道。我这一次是比较认真地去查看他的这些关于社会科学的评论，我想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科学、认真在做研究的人，看到他那样的评论可能都不会觉得舒服。所以我还是回到刚刚讲，这两个东西其实有可以互补的地方，但是他们相互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我是觉得是满可惜的。我就先补充到这里。

郭力昕：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卢倩仪老师发言。

卢倩仪：我是中研院欧美所卢倩仪，我做的是气候变迁跟新自由主义。我是政治学背景，我想我的意见跟几位老师可能都有关系，所以我就一起（响应）。我倒不觉得 Chomsky 对社会科学本身批判或者是全盘否认，我不觉得。我觉得他的批评的点是现在主流，重点是「主流」，就是有一个安全的主流，比较靠中间那个主流，他对于那个「主流」有很大的意见。这个东西，就连回最开始冯老师讲的那个宣传或者是媒体。就好像在讲《制造共识》的时候，有那个 flak，很像你要有一个规约、规制的力量，有胡萝卜跟棒子，那在现在学术界、社会科学界，非常的明显。包括刚刚我们几次讲到引用，我们现

在每个人都很重视 SSCI, Chomsky 有很多次都讲到, 如果你要在那个菁英知识人的主流, 你就要有一个行为的样子, 或者表现你的样子, 可能穿某些衣服。那些对于主流知识阶级所造成的「约束」, 就如他多次提到当年的 Adam Smith 曾说: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being to be”。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主流的、学院派, 然后你就有某种写文章的引用谁不引用谁, 引用谁可以多被引用等等。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这么乖乖牌, 在学院里头都那么乖乖牌, 这个东西是失职。这就连到刚刚讲知识分子的责任, 他说若我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是有那个 privilege, 是社会给了资源, 我们是在某一个岗位上, 是要帮这个社会去看危险的东西, 去看事实或者去分析什么。其实, 现在的学院里头的学者, 所谓的「学者」, 特别是一些智库, 像新自由主义智库, 他的目的本来就不在那。现在的学者, 主流的学者, 我们都有一个评鉴、升等、引用、impact factor 这些胡萝卜跟棒子, 都有一个那种安全的、隐而不宣的行为准则, 那个东西很伤, 我觉得他批评的是这个东西。

他在讲政治学的时候, 引用一个人叫做 Harold Lasswell, 他被称作现代政治学之父。那个人 (Lasswell) 事实上主张, 政治学的角色应该是宣传, 他是一个良善的那种觉得政治学是要教育或是要宣传, 把人弄成什么样子。Chomsky 非常反对这个, 因为 Harold Lasswell 把政治学等于是开了一个口, 所以后来政治学非常的脆弱, 对新自由主义的入侵非常的脆弱。从经济学、涓滴经济、新自由主义、新的古典经济学这些, 要入侵政治学非常简单, 就是 (透过) 量化, 一大堆的模型, 那样的分析叫「科学」。这个东西的问题本来就很大, 要操作非常的容易, 那时候所有的新自由主义,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 全部都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本身就有问题, 它也是规训的一部分, 胡萝卜棒子跟威权、权威的一部分。然后政治学就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引导成非常机械式、非常量化, 其实那些工具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 量化或者是科学什么都 OK, 可是问题是, 那是一个工具。当你用那个工具的时候, 好像你有钳子、螺丝起子、铁锤, 你永远都是只用那一个工具, 那个其实是新自由主义他们要的。所以 Chomsky 他会觉得, social science, 或是政治学, 反而把政治清洗掉了, 把它清洗的很干净, 一切都是专家来, 一切都是专家, 「我是专业的, 然后我来分析给你听。」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在美国或在台湾的大学、学界，其实很明显，新自由主义化各式各样的 science，你看现在大学，而且不光是刚刚好像是傅老师讲的那个私校的董事会的问题。就算没有私校董事会，国立大学也是一样，选校长要选什么？要选会募款的。所以大学受制于大企业的现象太普遍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就是大学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好像永远都是教育出企业可以用的学生。好像我们现在大学的角色，就是帮企业去训练人才。这些其实都可以 fit 到《制造共识》那本书，虽然说《制造共识》那本书他讲的是媒体，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小的 cosmos，把媒体再放大，他可以用到教育，可以用到大学，可以用到整个社会。他就把学者或是知识分子原来的那个角色，让大家乖乖的去做，就是去集你的点数、SSCI 你的 citation，你不要真正看到，不要那么诚实去看事情，就好像记者要被训练成不要是 Julian Assange 那个样子。Julian Assange 的事情，有一个叫做 Assange defense 的 committee 中，Chomsky 是 cochair，他非常强烈的在挺 Assange 的新闻自由。在新闻，新闻传播新自由主义，要记者不要像 Assange 那样子；同样的道理，新自由主义也希望社会学者不要像 Chomsky 那么犀利那么诚实，然后看到那么丑恶的全都讲出来，不要，大家乖一点，我觉得新自由主义这一套非常的成功。

郭力昕：好，谢谢卢老师的意见，有没有哪位要立刻做响应，对刚才卢老师的一些观点？大为拍手，我其实也是想要拍手。因为刚才卢老师讲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传播学界是非常清楚的。量化这个方法，这个工具本身不是罪恶，但他被专断的认为变成是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绝对的一个方法，就垄断了很多事情。我想我们在线许多传媒学界，比较年轻的一些学者，应该是深有同感。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继续，请大家把握时间。

张小虹：我想提两个问题，也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 public intellectual 的那个“public”。我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个字，是因为譬如我们面临到全球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看，比如说 Judith Butler 怎么说？Slavoj Zizek 怎么说？阿冈本怎么说？有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指标型的，所谓的 public intellectual，他们一定会说出一些对我们有启发的话语。就好像俄乌战

争的时候，我们会去看 Chomsky 怎么说。我这边的想要提的问题是，在一个所谓的后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的 public intellectual，或是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 的那个 public 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Chomsky 有在反省，比如说 3、40 年前他讲话的方式，以及他现在讲话的方式（有所不同）。当然他还是会有议题他一定会讲，只是说那个的影响力，那个的 impact 到底在哪里？这个部分，是我比较好奇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觉得具有代表性的这些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他们在针对当下的世界议题发言的时候，到底他们的 impact 在哪里？还是说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还是在用我们熟悉的那套方式，继续去想象有一个 public 存在？

第二个问题是 American left 那个“left”，所谓「左翼」的这个关键词。也就是说，我刚刚在听的过程中，我觉得似乎我们不好好的去处理 Chomsky 左翼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世界蓝图到底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为什么汲汲营营的，比如说不断的在跑拉（丁）美（洲），那个世界蓝图是什么？大概是非常重要的，也必须被谈出来。在谈出来的同时，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去问的是，像刚刚大为讲到，法国左派对 Chomsky 的一些反感，那法国左派跟美国左派，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在哪里？同时我们甚至要去问的，Chomsky 来台北、来北京，他也公开的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假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于所谓的中国左派的一些看法，以及我们台湾左派的脉络，怎么能够跟 Chomsky 的左派脉络，产生一些对话？因为在刚刚的发言里，我看到唯一被提出来的的是《破》报，可是《破》报基本上是被评论的一文不值。所以我就比较好奇，左派的这个脉络，有没有办法能够被谈得比较清楚？以致于大为日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毕竟我们是在台湾做 Chomsky（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台湾的左派脉络谈的比较清楚，以致于说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老先生汲汲营营的，对所有的议题都在发牢骚，谢谢。

郭力昕：谢谢小虹两个提问。第一个是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 的 public 在哪里？impact 在什么地方？行德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李行德：好的，或者我就趁这个机会说一下，2019 年我电邮请教 Chomsky

一些问题，引起我很多思考。Chomsky 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但我总在想，就是说你对一个别的地方，不是很熟悉的，你去采取很强的一种立场，是不是合适？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发达、监控手段越来越多，国际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操弄方法越来越隐秘，那你怎么能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真相，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是一直我觉得很困惑的。刚刚冯建三老师也提到，conspiracy theory，社会科学一般觉得不应该用阴谋论；但 Chomsky 在很多访谈里面都说，要研究权力怎能不研究它的动机？

我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熟悉的 Gene Sharp 的一本书叫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iberation*。Gene Sharp 是一个老右派，60 年代大家都不大知道他，但后来却越来越有影响力，里面的附录有 200 个步骤教你怎么去颠覆一个政权。他不是社会主义，完全是从右派的角度。颜色革命很多基本上那个套路，就是一步一步的去颠覆一个政权。我也请教过 Chomsky，你对颜色革命怎么看？他没有正面回答。2019 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引用 Chomsky 的话，说他支持该运动。那时我看的有点疑惑，就电邮请教他，Chomsky 说的确是他原意，没有歪曲。后来他有一个谴责香港警方滥用暴力的（联署），Steven Pinker 也参加了。但是我的困惑是，从现在看，香港 2019 这个反修例运动，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自发性的、地缘政治的力量，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社会运动的领袖，如黎智英这样具争议性的人物，去美国都是 Nancy Pelosi、Mike Pompeo 这些权贵接见的，跟美国的权力完全紧密配合，我就问 Chomsky，这不是跟你 Manufacturing Consent 完全相反吗？你怎么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运动？他说不大了解黎智英这个人。当然，国际左派也有另外一些看法，如前年去世原籍俄罗斯籍的记者 Andre Vltchek，他跟 Chomsky 有一本书叫 *On Western Terrorism*，他对香港 2019 年的社会运动则持另外一种比较复杂的观点。

后来我也问起，如何看待香港反修例运动那种很极端的暴力行为，这点 Chomsky 讲得很清楚，他反对极端的暴力行为，他说这些事就好像越战时代那些搞炸弹的「气象人」(Weatherman)，是送给极右派的最好的礼物。那时越南运动的中心人物跟他说，你千万要教学生走温和的、非暴力的和平路线，

不然就只会把事情搞坏。对越南社会运动来讲，他们行动所关注的是生命；对那些美国学生来讲，只是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Chomsky 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凡是群众运动，我觉得他总的倾向支持群众的，但也不一定详细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但态度是开放的，你提供不同观点的材料给他，他会看，也会很直率表达一些想法。我就补充到这里，谢谢。

郭力昕：谢谢行德，小虹老师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Chomsky 左派的位置，是不是台湾的左派应该跟其他地区的左派做一些对照跟异同。这个部分建三要不要先回应看看？然后元鸿也可以。

冯建三：对于 global public，Chomsky 一定有一些粉丝、跟随者。最近几个月，他还是经常接受访问，影音上传后，大多数都有上万人点击，我的关心是，这一群人一直都存在，但会不会只是同温层？同温层是比较小、封闭些，但有没另一种同温层，有潜能往开放型发展？当然，若是后面这种，也许用同温层命名，就不妥当。有些人批评杭士基，常说他没有讲媒介效果，亦即，就算他指证的媒介内容确实是那样，但到底有没有效果？然而，我们关切的效果本来就很难测量，你何从测量呢，对吧？小虹讲的 global public，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你在 30 年前不可能想象，海外事情一发生，大为读了〈杭士基谈俄国入侵乌克兰：它的起源、如何应对、与人类历史的关键〉，数日内就将该文中译后，由不同管道转传海内外包括对岸。那么，众人共读这篇文章，至少在那一时刻，不也是一种 global public 的存在？我看到大陆的朋友，即便是亲俄或者对中共很有负面评价而亲美的人，对于 Chomsky 这篇文章所呈现的事实与论点，似乎也能接受。我觉得这样就产生了 public 范围的扩大，即便包括了很多原先同温层的人，但很有可能，另一些人，即便基础不同，在通过朋友或无意间所看到的信息如大为翻译的杭士基文章，有可能会是一个开始，慢慢就使得这类论述得以扩充。我大概是从这个方式理解 global public 这个概念。至于要说多详细去讲，一来超出我的能力，二来这估计也不太容易。好，谢谢。

郭力昕：谢谢建三补充关于 global public 的意义，元鸿要不要回应一下小虹刚讲的左派的问题？

朱元鸿：问题太大，太复杂，不太好响应，不过我试着提几个看法。比方，我会区分 career leftist，他们形成某些学术群体，相互援引、相互纠集，一起开 conference，一起办刊物。在学院里面，甚至所有的聘任人员相互援引，这个是所谓的 career leftist。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找到 career feminists。我这个区分其实是 Jean Baudrillard 有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他不是 career leftist，因为他完全不需要这个名分。但我觉得可能 Chomsky 比较不属于 career leftist。这种不是 career leftists 的，有时会是 career leftist 非常 bitter 的 enemy，或者是他们首先去中伤或讨厌的对象。

关于世界上的左派，跟中国的左派，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我留意中国的左派，特别是他们（在大陆脉络下）跟自由派相对立的左派，几乎都是 statist，国家主义的。事实上他们有的时候援引或邀请 Alain Badiou、Slavoj Zizek 这些人来的时候，都会有些扞格不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些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很相呼应，但是这些人没有办法呼应中国左派的国家主义。我觉得台湾的左派其实也好像有点复杂，不过感觉上在某些议题上，他们的观点的和语言语汇的萃取，常常也从中国的左派那边沿用，这是我的感觉。

最后关于那个 global public，我以前大概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这跟我们讲 global civil society 里，比方说组织 NGO 的能力，还有在 Internet 上发声的那个能力（有关）。其实在这方面，global public，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我们会记得像 Walter Lippmann 这些人他在怀疑 Phantom Public。Public 是非常难界定的，但如果说有 global public，他的出现和议题的取向，会倾向于在 civil society 里，这些使用 Internet 发表意见能力非常强的，可能是西方和东亚的社会。这点可能是可以注意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发声对于在地的，比方说像颜色革命，有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反挫的。他的支持、他的声援，其实可能会引起在地 local 的、nation 里面对于这方面的反挫。OK，好，谢谢。

傅大为：我也响应一下小虹刚才提到关于 public 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满有意思，跟我关切 Chomsky 的一些问题，其实有连接。不过我先讲一下，像看到关于俄乌战争，Chomsky 写的文章的时候，这个 public 感觉是怎么样。我们通常看到俄乌战争的报导，大概就是最近几年，来批评俄国，批评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这是我们所注意到，一般主流媒体所注意的东西，大概就是跟着美国主流观点跑。可是 Chomsky，比如刚才讲说从 60 年代，甚至更早，一直到现在，美国所做的许多事情，跟现在世界所看到的许多事情，然后再把俄乌战争，放到巨观的当代史或者是近代史的脉络里面来看，我觉得那给我的一种 public 的感觉，非常不一样。这也是让我们感觉是，原来不只是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国家，世界上好几个国家都在不同的时段进行侵略，war criminal 一大堆，只是这边的 war criminal 说那边的 war criminal 是 criminal。常常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大概是我第一个部分的感觉。

刚才建三提到，是不是我们看 Chomsky 的东西，就是同温层上面的一些人？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其实 Chomsky 跟人的沟通，我觉得有个 legendary 的地步。大家知道，世界上的名人里，哪一个人最容易跟他沟通、跟他讨论的？我想大概就是 Chomsky。你写 email 给他，要跟他访谈，他可以说他三个月之后给你访谈，这个访谈一定可以达到。你写 email 给他，好像行德说过你的儿子等，都跟他 email 联络过，对不对？我是没有，因为我目前没有觉得有这个需要。很多人跟他从来不认识，然后有问题跟他联络，他都会花时间跟你联络、讨论。我想这可能就不是刚才建三所讲的一个同温层，而是说他有一种跟庶民大众、普通的中下阶层，常常互相交流、互相谈话。这让我感觉到另外一种 public 的印象。他可以注意到很多事情的细节，是我们一般研究者或学者不会注意到的，因为我们学者反而是比较是在同温层里面。

第三个，我想讲关于 public 的问题。我以为小虹要讲 private，private 跟 public 这两个字常常是相生儿。我自己想研究 Chomsky 作为一个 radical intellectual，我不是讲他个人的历史，那已被人家写过很多遍了。我想讲他的行动、他的实作，到底是什么？我觉得 Chomsky 很有意思一点是，他很不

喜欢谈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他的工作状态、他的办公室、他跟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等等之类，我那时候曾经跟蔡维天请教过。他的 public 是如此的庞大，至于他的 private 则小心谨慎的把它守起来，但问题是，我们这个 public 跟 private 总要有一种安排的方式，使得 public 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那这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 radical intellectual，可以借镜的地方。关于这个部分，我能够看到的很少，顶多是一些很有名的文章，谈他的办公室怎么样杂乱，他平常衣着看来像个年纪大的老学生等，但其他方面的东西就很少了。当然我也不愿意窥人隐私，只是说他作为一个 intellectual 他这种身体的温度是怎样？怎样能够亲炙到这样的一个 intellectual？这是我比较是一直感兴趣的。好，谢谢。

蔡维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听一些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 Chomsky 的面向，也很感谢傅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我在听大家的评论时，感觉如果是从语言学本身的脉络去看，他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神秘。他的治学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科学方法。所以很多事情讲求证据，听其言观其行。他有些很出名的政治论点，我是毕业以后才慢慢发现。而在听他做这些评论、演讲的时候，有一种熟悉感，好像回到课堂上他讲分析语言一样。讲到政治，感觉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由他来做评论的时候，就像一把刀直指人心，血淋淋的剖析事件的本质。所以我想有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他很多事情都推到极端。像刚才汪老师讲说他觉得社会科学不是科学，其实我们以前也常常会对他一些 remarks 感到很惊讶，像是他说认知科学不是科学。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不晓得，语言学在美国是很弱势的，你若要找语言学的书，必须去 cognitive science 底下去找，没有语言学这个科目的。那他自己反而说 cognitive science 不是 science，你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你论证方式从这个科学的方式来检验，到底成不成立？所以我完全不惊讶他这种 categorical 式的 comment。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治学观点是「吾道一以贯之」，他无论在看语言，还是看政治，其实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刚才很多老师也提到，他是自我完全的诚实。所以当他在对人的时候，是非常 liberal，像对学生，他从来不去干涉你写的论文题目，然后口试委员自己挑，

基本上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提到学术、政治，他就完全不留情面，包括对他自己在内。所以我常有个感觉，他要做到真真正正的诚实。所以他也不断革自己的命，而且这个革命是一生一世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所以我们看整个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史，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革行为学派的命，发动所谓的 Chomskyan revolution。到 70 年代在他跟一批学生分道扬镳，甚至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 linguistics war。直到 80 年代、90 年代，都主导了语法理论革命性的进展（分别为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ramework 及 Minimalist Program）。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贯彻始终都是如此。MIT 系庆时一位学长对他的评论就是 relentless，一直到现在 90 几岁，还是在网上跟同学们讨论、回答问题，还是接受电视台访谈，批评俄乌战争、以巴冲突这些时事。这一点我觉得真是非常令人敬佩，谢谢。

郭力昕：谢谢蔡老师，行德要不要回应刚才蔡维天老师提到 Chomsky 认为认知科学不是科学？以及他的这种不留情面的，不管对人或对己的批评，可能也可以响应到刚刚大为讲，作为一个基进知识分子的温度在哪里？这重不重要？会影响什么？

李行德：因为蔡维天老师是 Chomsky 的嫡系学生，这方面最有发言权，我完全同意。语言学是一个实证的学科，要有一些客观的证据，理论也要实证的基础。所以我没有什么补充。倒是我另外觉得很有启发的是，刚刚大为老师讲的 public。的确，他把自己那么无私的跟一般老百姓（对话），就是他 make himself available，我想不出另外还有谁能这样做。因为实际上他年纪那么大，时间不应该花在那里，但是他可能就像刚刚蔡维天老师说，他想贯彻这个理念。我了解很多学生也不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写信（给他），他也会回复，往往是他自己的原则。这个真的很难得，因为他那么忙的人。至于 Cognitive science 是不是 science？跟自然科学比，我不知道蔡维天老师是不是同意，Chomsky 好像比较悲观。现在大脑科学那么发达，即使知道你做什么行为时大脑在哪里启动，但是怎么整合理论和实验数据？Chomsky 很关注这个理论的建设，大概非常不容易，往往他更多指出这方面的困难。

蔡維天：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方法论上的一个坚持，就是他很多事情是推到极端。在所有的语法理论的建构里，革自己命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他都推到极端。所以，我觉得这跟他这些评论也有关系，因为他基本上是个科学方法，不推到极端，没办法讲出来这到底能极限到什么地方。那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还没那么多的比如说认知科学，还是说我们现在讲脑神经语言学，有这么多新的突破可以去参考。所以，或许他现在会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也说不定，谢谢。

郭力昕：请问杨儒宾教授是不是还在在线？杨老师听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响应，或者是评论意见？

杨儒宾：不敢哦，我是得到傅大为的这个免费入场券来听，理论上是不需要响应，我也没有资格响应。但是既然被点了，也要发声一下。我比较好奇，就是大为为什么要办这个会啊？而且看起来好像会继续推动下去。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刚刚在座的朋友也提到了，Chomsky 毫无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全球的影响力；但是，通常我们也会自我要求，自己不太熟的，或者你没有能力去涉及的，我们会自己要求，要有分寸。我想到最近的另外一个知识分子的例子，从各位的观点，或者一般的观点来看，这样比喻是非常不成比例的比喻，但是也许可以做个对照，我想到林正弘老师。林正弘老师刚过世，他关心的范围基本上就是在台湾哲学的范围，但是他有个极大的长处，就是哲学界只要是任何人来找他帮忙，他这方面跟 Chomsky 一样，他都一定帮忙，而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也很尽力，我听到很多的例子。老实讲，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感动，也不能不帮他。很多事情对我而言可能基本上是损失，但因为林正弘老师，他自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我有义务要支持他。林正弘老师对哲学界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他在台湾哲学界里的影响，就很深远。我就想到 Chomsky，刚刚也有人提到，可能是李（行德）先生提到他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到底他能够支持到什么程度？而他的支持到底是正面或负面？我想可能是可以质疑的。我在反

送中的时候刚好在香港，老实讲，那一种勇武的情况，我不相信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那个社会可以容许。但我想香港问题一定很复杂，我也不敢说定。

我再说先前的一个例子，蔡维天也在场，大概还记得一点始末。就是 Chomsky 12 年前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当时在清大中文系，想要提一个案子，颁给陈映真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因为当时陈映真已经身体很糟糕，不能再等了。我当然知道他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争议又怎么样？他有很大的那一种爆发的能量，代表一种非常非主流的观点。我觉得台湾应该给他一个公道，所以我当时是希望能够为他在清大提出荣誉博士案，能不能过，我想很难讲，我知道这个头衔竞争很激烈，但是至少我去尝试。当时跟中文系讲了，也间接地得到陈映真亲人的同意。后来我知道语言所要提 Chomsky 当荣誉博士，这个案子就不用讲了，一定不可能跟他竞争，荣誉博士的荣誉是要锦上添花的，后来果然 Chomsky 得到了荣誉博士。我非常好奇，他到了亚洲，好不容易到了台湾，到了中国大陆，获颁清华大学的荣誉博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啊？我想对他可能没有多大的作用，对整个国际的运动圈我认为帮助也不大。对台湾就很难讲，也许清大有人认为这会增加清大的光荣，增加台湾的光荣，因为跟 Chomsky 这样大的咖连接上了，极难得。但是，这种连接是什么意思？至少从我的观点来看，Chomsky 得到一个荣誉博士，远远比不上陈映真得到荣誉博士学位的意义。因为陈映真得到荣誉博士学位，他跟清华跟台湾会有个独特的连结，表示陈映真路线被看到了，但是这种作用在 Chomsky 就找不到。

我的意思是，一个这么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当然要为更大的人群服务，但是他的发言权可能也要自我限制一下的。他对中东或欧洲的影响跟对东亚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类型的影响，他对东亚够了解吗？也许要分析一下。我的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大为提出来的，我知道大为对这种问题一定都有比较独特的想法，所以我等于也是跟大为请教。Chomsky 当然不是你引进来，但是你现在规模搞得这么大，你希望他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我估计，他对东亚的历史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能够提供哪种帮助呢？如果是跟沟口雄三或者岛田虔

次、竹内好这些人所能提供的帮助相较，是哪一种类型的不同？对不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傅大为：我先从刚刚建三提到一个事情，你说 Manufacturing Consent 你教媒体政治经济学这么多年了，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用到这本书。其实我满惊讶的，怎么会这么晚？我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很早就接触过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那些电影等等之类这样的东西。当然我的领域不一样，我之前在忙着像科技与社会（STS）之类的东西，退休不再教书后才比较有机会来做一些跟我原来领域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 Chomsky 在你们领域，或者是力昕，在媒体（这个领域）。为什么这么晚？也许可以请建三来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知道建三接触很多 alternative media, 我常常也收到你一些 email, 我对 alternative media 的一点了解常常还是从你的 email, 进一步再传过来。

回到那个儒宾的问题，我对 Chomsky 有兴趣，除了因为我想研究一下 radical intellectual 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想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概念的意义。其实我的那个计划里面，我想写另外一个人是 Michel Foucault, 但是我先来研究 Chomsky, 然后来比较一下他们这两个人。大家知道，Chomsky 跟 Foucault 有过一次的对谈。在 Chomsky 这个研究程序里面，因为我的计划，本来就是要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这哪里大？一点都不大，这比起 2010 年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小多了，而且也没有公开宣传。而且，有些朋友来也是以为是老 Chomsky 会出现了，那我真的是，是靠他来吸引一些人来座谈这样（笑）。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政治跟思想上面，我自己个人常常觉得碰到一些死结，或者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东西，那么我知道像宏伦讲说有很多研究者，有很多新的东西研究出来，但是这个东西社会听不到，你们也许有讲出来，但是我没有听到就是了。我们在政治，在台湾的现实政治、以及思想、行动上，知识分子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倒是 Chomsky 的一些做法跟 Chomsky 的一些风格、一种典范，反而是在现在台湾，我们现在目前碰到的这些问题上，可能是还满需要的一种类型。你看俄乌战争一打，全世界

开始搜寻海峡两岸以后会怎么样？我们没有其他的 perspective，可是 Chomsky 从头到尾所呈现出来一种 perspective，可能是我们台湾还满需要的。即使是他对于社会科学许多新的研究，他不见得清楚，但是他的立场，跟他对于台湾、中国，对于欧美，特别是对于南方国家的观点，的确值得参考。

我觉得我们台湾，对南方国家真的是几乎毫无所知，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东西来自于南方国家，我们想进入联合国，那几乎大都是南方国家在那里，而美国是其中的特例，除了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国际社群」那少数几个欧美国家外，它是联合国中连结最少、最孤立的国家。在联合国的一些议题里，例如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多次要求美国撤销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美国简直是个莫名其妙的国家（不断行使安理会否决权，而且只有以色列一国跟随），甚至可以这么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台湾真的需要这个观点。我们一天到晚想被世界看到，其实我们只是想被美国看到而已。世界根本看不到我们，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想要让世界看到。但是像这个问题，当然很讽刺地是我们还是常需要美国的管道，因为我们跟拉丁美洲直接联系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透过 Chomsky 还有其他英文的另类媒体，才可以给我们一些有趣的、可以效法的一些观点。好，谢谢。

冯建三：我也讲一下，刚因为大为提到，我自己在反省自己。虽然杭士基如雷贯耳、我在 1993 年购入《制造共识》，在台出版的多本杭士基中译图书，我写过一篇书介、一篇导言，但没有进入他的媒介与美国外交研究领域，有两个大原因。一个是被制约，这部份我得再作整理。第二个，便宜的讲法就是忙着读其他的东西，忙不过来。

比较重要的是，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我才开始细读《制造共识》？一是对古巴等拉丁美洲与南方国家的关注。二是「两岸关系」，先前我不认真关注，在读杨儒宾老师 2015 年的《1949 礼赞》时，甚至反感，后来转为接受。回想自己 7、8 年来这种变化，从不太在意两岸关系，慢慢产生感觉，台湾再这样下去，会有危险，不利两岸，也不利世界和平。如果蒋渭水在日本殖民体制下，1925 年就大有气魄，写下台湾人应该成为日华的和平使者。当前我们若是秉持相同信念，自任中美和平使者，提出第三种两岸关系而彼

此接受，不就是两岸和平，从而也就是贡献世界和平吗？这对台湾对大陆，都是好事情，对世界当然也是好事情。要厘定这个在台湾已经有前辈讲了四、五十年的第三种两岸关系，必须对美国的「国际观」有个深刻的认识。杭士基在此钻研与发言五、六十年，让人尊敬乃至崇拜。以前，我是相对抽象地反对美国的国际行径，细读《制造共识》，既强化这个意见，也让自己有「知其所以然」的丰富。知道、远距离的认知是一回事，深入阅读可以让这个认知，更成为自己的构成部分。

过去，我的认知确实是抽象的，模模糊糊的认识，细读之后，产生了具体也更深入的理解。国人太过于依附美国视野，如大为所说，台湾常说要被世人看到，其实是在说要被某些美国人看到，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来说，是有 140 个多个国家谴责俄罗斯，但真正响应美欧、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大概就 30、40 几个。我们习惯用美国眼睛看世界，对此不自觉。近年来，我希望将杭士基的著作当作教材，先前仅列为参考，今年因为《制造共识》在台另有中译本，是第一次用作教科书。以前，我很少用教科书，这应该是第一次，从中，也观察学生的反应。现在虽然即将退休，但还是得继续推进认识杭士基及其人文理念与关怀的工作。谢谢大为提供这个机会，让我整理这些想法。谢谢。

郭力昕：谢谢建三回应。我们时间有点接近尾声，不过还有一些传播学界的朋友还有机会评论或讨论。念萱请。

方念萱：我在博班有两篇跟着老师的研究计划、采用 propaganda model 完成的论文，2002 年发表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期刊上。我们分析 1983 年 human rights violations，主要是阿根廷的总统 Alfonsín 上任，我们以 Herman 与 Chomsky 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以 pair examples，基本上是针对不同阵营国家，捉对比较的概念，我们以 1983 年大概加起来有 60 个国家，主要是苏联阵营跟美国阵营，以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里各个国家违反人权的年度资料，比对《纽约时报》当年对各个国家违反人权的相关新闻报导，一个一个国家比较。从 propaganda model

的角度出发,《纽约时报》在冷战时期对于与美同样阵营的国家,纽时这个之为国家喉舌的媒体,是不是淡化这些同盟国家的人权戕害记录?对于敌对阵营的国家,是否大事报导违背人权的状况?所以我只是响应一下,就是在传播学界当时在我自己在博班的时候,来看 Manufacturing Consent,其实已经是个相当多人关注的 model、取经。只是我那时候做出来的结果,有关 propaganda model 有其值得深究之处,因为我们采量化跟质化的方式,他的书中有关于的这个 friendly 跟 enemy 的 client 的 definition,我们当时觉得其实是应该要再去思考。因为我们主要当时用的是冷战的时候的实证为数据,以这 model 检视资料。我只是补充一下。我几乎忘记了 20 年前的作品,当时确实就是采用这 model 进行研究这样,OK,谢谢。

郭力昕:谢谢念萱,方念萱是政大新闻系的同事,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元鸿请。

朱元鸿:我也提供我早期接触 Chomsky 的机缘。我大概是在美国读书的第二学期,也就是担任助教的第一个学期。那个时候担任助教的课程是 **nuclear armament**,是德州大学一个菁英的课程,大概 150 个学生左右。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后冷战,而就是冷战期间,讨论的是冷战还有 **nuclear armament 如何深度地**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经济体制还有社会心理体制。那个时候我带着读 Noam Chomsky, 1982 年刚出来的 *Towards a New Cold War*,相当厚的一本书。那个是大概 1984 年春,所以这里可能跟我们传播学界的同事,要点可能又有一点不同。

郭力昕:好,谢谢元鸿,各位、时间接近尾声,就请许家馨先发言。

许家馨:谢谢宏伦的邀请。虽然我对 Chomsky 没有太多的研究,很多时候都是擦身而过。但就从今天各位先进的讨论里提出一个想法就教于大家。当我们在谈所谓 radical intellectuals 的时候,radical 似乎有两种理解的方式,一个是 radical as opposed to the authority。The authority 可以是 government,也可以是某种学术建制,甚至是比如说军工产业混合体等等,意指这个社会或者

是某一个领域掌握权力的那一群人或者其文化。另外一个意思，radical 原始的意义，其实就是刨根啦，就是对于任何意识形态或任何可能影响着这个社会朝向一个可能更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个根处去挖掘。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你批判的对象未必都是权威。可能是在某一种大众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某一种现在相当主流的，可能是一个文化的，甚至是某一种民粹，或者不是民粹而可能是自以为进步的这一个文化，都可以成为 radical 批判的对象。我之所说要特别这样讲，是因为我会回到制度上面的反省。

从 Chomsky 在六七零年代，他这些所谓的 radical intellectuals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某种程度来讲，是在拆解那个时候的、你可以说是美国政治上面、在意识形态上一个很权威的体制。时到今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你从美国的政治结构来讲，比如说当时政府参与越战，是因为当时美国的政党结构其实还是相当的菁英。

就比如说他们的候选人整个产生的方式，就总统候选人产生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党大佬关起门来来决定，近年来在关于政治衰退或是民主衰退的讨论，有特别指出一点，就是过去菁英好像很容易被批判，可是现在完全的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政治结构相当民主化了，就是一定程度来讲，都是透过初选、透过选票。很多人也在开始反省说，民主化的结构真的比较好吗？

当年大家可以批判权威，但是权威被你批判成功了之后呢？川普的现象其实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产生出来。这在政治学界尤其在研究民主化或民主衰退的，最近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于是我们陷入一个 dilemma，当你的 radical 只是主张在批判权威的时候，当然这个社会已经、结构已经相当程度也分散了权威，权威也分散化了。所以福山（Fukuyama）有在讲 vetocracy，因为每个人都有 veto Power。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都有 veto power，都可以 veto 你的政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真的要 radical 的话，反而不是批判权威，而是你如何建造权威？你如何重新去把一个社会重新去结构、甚至是如何制造共识。回到他那本书。如何让一个高度分化、高度极化的社会重新再有共识出来？那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要 radical 的话，当年他的处境跟我们的处境，有多大的不一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不同的方法来面对？这是我好奇的地方。

郭力昕：好，谢谢许家馨。请卢倩仪老师。

卢倩仪：我是针对刚刚杨老师提到，Chomsky 不是东亚的专家，他是不是不适合说这么多？但我觉得，虽然 Chomsky 讲的不是他专业的东西，但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他都没有说过的那个世界，我觉得还满可怕的。Chomsky 很多时候演讲，大家对他的介绍就是，类似就说他是这个世界上被 cite 过、被引用过最多的一个人，他的东西他虽然不是在一些 SSCI 那种 citation，他的影响力几乎毋庸置疑。那我觉得不是他要插手去管东亚的政治那些，他从早期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那很不幸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全世界，我觉得他那个批判美帝的方法不是用那种马克思那种、可能一开始就会让人听了就不想再听的那种方法。他有他非常诚恳，然后非常独特然后也很多证据，而且很多（证据）感觉上是情治单位才有的，然后他的信息量很大，他的脑容量特别大。所以他对美帝美国称霸世界造成伤害那部分的批评。那个是他为什么我觉得他要去讲南美、中美及讲东亚，这部分我都觉得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事实上。几十年下来为什么他影响力一直在，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么久下来，你再回头去看他之前的担忧，他之前的批评其实都被印证。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快要完蛋了。

他最近的演讲最常提到的三个大危险，一个就是核战，可是这个核战是他多年来一直在讲它，现在又居然几乎要被他说中，乌俄战争让核战那个问题再次出现，然后气候变迁。气候变迁讲了多年，他说 1970 年代在 MIT 的时候，就同一个礼拜之内一个 MIT 的科学家、一个哈佛科学家打电话跟他讲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多年来讲气候变迁，他一直讲一直讲就是整个全球 scale 的事情，所以这里头美国的角色太大，所以他又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角度去关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不能想象一个他说过的那些东西没有被说的世界，

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太重要。他讲的第三个危险的东西就是民主的崩解，就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reason，没有办法理性，不是那种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那种理性，他说真的理性，没有办法就是因为 propaganda 就是媒体。所以，

我知道杨老师觉得陈映真被他挤下来很难过。可是我会觉得最后也是所谓的「公共」，前面在讲说公共知识分子，那个「公共」。那个公共并不是说「他反对专业」，但我们想象一个世界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他是哪一个专业，他就只在那个专业说话，比如 Chomsky 只能讲语言学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郭力昕：谢谢倩仪老师。现在时间大概已经是 5 点多一点，我想我们可以整理一下今天的讨论。

傅大为：最后可能是不是请那个黄正德老师，如果他在的话可以请他讲几句话。

黄正德：不好意思，我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学了很多。谢谢傅老师的邀请。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点个人的经验好了。没什么特别深入的东西。

第一点是关于杭士基如何在 linguistics 跟 politics 两方面都有很多著作。他自己曾经说，他从事 linguistic 研究要花不少时间去思考，提出来的想法只是一种假设。假设不一定是对的，要慢慢去推理、求证并与人讨论。他也期待学生对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能适度地持疑并进一步检验、反驳或修正它。在 politics 方面，Chomsky 的出版比 linguistics 方面还多了许多，可是他说在这一方面不要花多少时间。他说他只是凭借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就好了，不需要语言学研究一样地观察、假设、求证。他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完全不虚伪地把话给讲出来就好了。他的政论演讲一般都会引述有关的事实、数字和报导来的作为左证。可是他说，他不需要很多时间来准备，只要把他的心里话讲出来就可以。

另外一点，是跟大家分享我亲眼目睹 Chomsky 在教学工作的同时关心政治问题的经验。我 1978 年到 MIT 留学的时候，越战已经过了，他已不谈越战。当时他最忙着关心（原葡属）东帝汶的情况。东帝汶于 1975 年从葡属殖民地独立之后不到 10 天，就遭到印度尼西亚入侵，其后 20 余年间其人民连续遭到印度尼西亚军政府的迫害，死亡不计其数。1978 年间

Chomsky 从自己的消息来源频频收到东帝汶人被杀害的案件,但查看全美国的主流媒体却看不到明显的报导,也看不到美国政府出面干涉或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施压(美国当时甚至是印度尼西亚军火的重要供应来源)。我记得那几年他为了要给东帝汶人伸张正义而忙得不可开交。在 MIT,一大半的研究生要他指导,除了上课以外还需要跟他面谈。研究生面谈时间通常排在星期二或星期五,几乎每天的面谈时刻表都排的满满的,他就利用前后换人的中间 10 分钟休息时间忙着打电话,跟主要新闻媒体联络,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与各电视媒体。打电话的目的是将在东帝汶发生的事实一一转告给这些媒体,但令他气愤的是他所提供的信息却常常如石沉大海没得到媒体或者政府的响应。他在 *Manufacturing Consent* 这本书(与 Herman 合着)里面所批评的就是媒体。他批评媒体和政府的大咖们常常因为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是财团的商业利益以及个人的政治利益)不惜隐藏或者篡改重要事实来替人民制造所谓的共识,因此而致世界上的许多暴行得以延续。(东帝汶在遭受了 20 几年的生灵涂炭之后,终于在联合国与西方国家的协助下于 2002 年完全独立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Chomsky 在东帝汶显然有许多朋友和粉丝。2010 年我们邀请 Chomsky 到台湾与中国访问之时,他原来准备受邀顺道前往东帝汶访问,但因为行程过于紧凑劳累而作罢。这一点值得在此一注。)

Chomsky 认为这种媒体与其他利益团体为人民所制造出来的「共识」是在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里常见的一种暴力,不同于军事政权或威权政府下显而易见的暴力,这种隐性的暴力更应该予以揭发与谴责。

郭力昕: 谢谢黄老师,可不可以请几位引言人三分钟,就今天的一个讨论做一些总结、响应?

汪宏伦: 我先提一下,刚刚提问的许家馨老师是我们中研院法律所的副研究员,我也非常高兴他来参加,因为他的专业跟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稍微有点不一样。他自己本身除了关心言论自由,主要研究领域是在法哲学方面。他除了关心很多具体的像废除死刑、言论自由问题之外,对于所谓的公共知识分

子的这个问题，他其实也满关心，所以我来邀请他参加。他刚刚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满严肃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可能等一下请大为总结的时候，可以稍微提一下，因为刚刚家馨所提的那个 radical，就是大为把它翻成那个基进的、基础的基，其实跟刚刚家馨所讲的很类似，但是就像家馨刚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跟 Chomsky 当年的那个情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做为 intellectual、或 intellectual 应该做些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可能等一下可以请大为响应，因为这正好也是你办这个研讨会要谈的主题。我另外有两点。要不然就等一下回答，如果还有这个总结时间，我再来讲。

郭力昕：好，是不是请大为发言？

傅大为：对不起，我就想回应一下刚刚许家馨的那个 comment，但是后来还是觉得黄正德老师可以先讲一讲。我想许老师你谈的一些现象，我可能不完全同意。你说现在权威都已经分散成很厉害的这样子，你说一个太阳花运动一下占领立法院然后改变了很多事情，那你就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情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那即使有的话，大概也是在太阳花运动那个短的时间里面，大概是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谈到说像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台湾解严的时候，台湾解严那段时间里面，就是说，其实权威的确是相当地分散，那个很多很多不同的新的团体、各式各样东西跳出来。那个时代我有经验、我经历过。但是那个时代其实后来就过去了，很多朋友就是缅怀那个时代，但是后来那个时代已经不是这个样子。那又比如说像我们今天、那个俄乌战争，Chomsky 常常就是骂这个普丁还有俄国，他们这些笨蛋，为什么呢？你侵略乌克兰等于是把这个大好的机会、大好的礼物送给美国，把欧洲整个推到美国那边去，他常是用这样的分析来说这个事情，其实俄国前阵子如果不侵略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而且已经做了一半，然后到后来竟然变成这个样子。那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台湾我们现在的情况，像俄乌战争一边倒的论述、或者像防疫的问题，前阵子我相当注意防疫的问题，我们指挥中心的权威是非常强的，即使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不满，也只能

挫折而已，到最近选举来了，对指挥中心的不满才透过选举的杠杆，重新浮现。然后从这个你讲的太阳花运动，是绿阵营上台之前的事情，而绿阵营上台之后，我们整个的、社会的权威是怎么样的状况呢？绿营现在大概很少人还会想起当年「谦卑、谦卑、再谦卑」的话了。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事实分析的问题，所以我大概不是很赞同你的事实认定，但是如果如你所说权威是非常分散的话，就有点像比如说当年解严之后的情况，那的确是有很多新的团体、新的、小的东西出来的话，在那个时候的话，新的问题也不见得是——就 radical 的团体来讲的话，来「制造共识」，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我大概不会用这个名字来描述那个时代。而是那个时代，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好像是说来批判国民党、批判主流权威、批判那个在戒严前的时代。可是到后来呢，我前阵子的反省是，我们后来那个基进的 politics，事实上是垮掉了，很多当年的这些互相合作的、互相抗争的这些团体，事实上彼此之间互相已经不信任、或者吵架、或很多类似的现象发生，刚刚元鸿好像也有提到说，世界很多左派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值得进一步来思考的问题啦。我同意你讲那个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对事实的认定呢，可能有不太一样的看法，谢谢。

郭力昕：谢谢大为回应。许家馨老师有要再进一步回应吗？

许家馨：谢谢傅大为老师，很荣幸。其实我想关于事实的部分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再多谈。那我刚刚举太阳花的例子其实只是去说明我在谈这个所谓的 political fragmentation，还有 vetocracy，这个现象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就背后并没有要去说他是好或坏的问题，我只是想要描述这个现象。那我对这个现象会比较敏感，是因为在宪法的领域，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说，权力分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结构。那他目前越来越容易，以美国来讲，越来越容易陷入所谓的 deadlock，越来越容易陷入僵局，然后公共政策越来越难推行，所以，这里头跟权力的碎裂化，确实是有有一个有很多的探讨这样子。当然台湾可能还没有走到那地步，如何避免走到那地步，或许是我想要提出来的、一

个请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

郭力昕：好，谢谢家馨，是不是就请几位引言人分别用3分钟左右的时间，稍微对今天的讨论做一些补充思考、响应？先请行德。

李行德：好的，谢谢力昕。今天听到很多著作，以后有机会要去学习的。刚刚有些老师谈到 Chomsky 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这一点我是有保留的。我的看法是这样，他在什么意义上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是说，他不是引用某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的主流范式来进行研究，这种意义上的研究者。但是我感觉他的专业的知识，在他涉猎不同的领域的专业知识时，是相当惊人的。我这里讲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我这几天看他的另外一篇在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里面讲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他的附注里面，谈到西班牙内战里面的一些群众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它里面提到中国土改的一个名著、个案研究，William Hinton 的《翻身》。研究中国历史的、或者当代历史一般都知道。我很惊讶！他在那个时候就看得很仔细，而且都有评论。另外一个我想到，很多年前，有一个语言学家、写语言学史的 Frederick Newmeyer，他在中文大学那个《21 世纪》期刊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前有人挑战 Chomsky、说他批评资本主义，那不如跟同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 Paul Samuelson 去辩论一下。他接受挑战，并且进行了辩论，按照 Newmeyer 说，当时参加的听众并不觉得 Chomsky 占下风。我估计 Chomsky 不是跟 Samuelson 讨论经济学的某一些理论，而是在更高的层面去挑战 Samuelson。就这个是我的感觉，我觉得 Chomsky 是严肃的研究者，只不过他不是在用主流的学术范式来进行研究。

另外一点，就是我想响应那个刚刚杨儒宾老师提到很重要一点，我这个没怎么想过，就是说 Chomsky 对亚洲知识分子有什么 relevance、有什么意义？就是你现在今天了解他、今天读他，有何意义？那我想试着回应一下。刚刚大为老师也说，Chomsky 是一种世界性的、跨种族国界的一种思想。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在亚洲，怎么去思考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肯定是跟美国不一样的。但是他提出了刚刚讲的「知识分子的责任」里面的几种要求。

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你要参加建制里面的一些工作。另一方面，又需要跟建制保持一些距离，提出原则性的批判。那到底怎么去承担这种责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Chomsky 体现一种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国际主义、应有的普世关怀，对世界上各地违反公义的事件应该有所回应。但是做起来相当不容易。特别如果是进行反对和抗争，比如说假如今天自己的国家有扩张的倾向，真的有一些不公义的行为，那你怎么去回应？

另外，也想回应刚刚卢老师。我感觉 Chomsky 对我的意义，就是说他挑战各个领域的顶尖学阀、学术权威。他敢于去挑战，不是说随便挑战，而是真正是用你的论述去挑战。而且其实很多论述都非常有道理。那有可能是因为政治科学这一方面是比较不如，比如社会学，还有其他，成就那么多。比如说，他在〈知识分子的责任〉里面，批判 Herman Kahn 的“Thermonuclear War”。我记得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这些都是政治科学的经典。但是在 Chomsky 这里，他就敢说，这种理论没有什么客观性。他说“Kahn proposes no theory, no explanations, no empirical assumptions that can be tested against their consequences”。就是说，他真的把 Kahn 批得一文不值。但是你今天回头过来看，可能 Chomsky 是对的。我记得 Chomsky 上课就这样讲，他说有一些范式，例如心理学行为主义，你回过头来看，真的是一点保存的真理价值都没有。社会科学，我觉得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最后一个我就想指出，这一次重读〈知识分子的责任〉，很大的启发就是它让我更深刻了解了什么叫「冷战思维」。比如它里面提到 1966 年一些冷战思维的反人道论述。它里面就谈到 Professor Rowe，他是一个在 1960 年代耶鲁大学有名的政治科学家。他就主张用饥饿的策略来抵制中国、越南这些共产国家。Chomsky 举这个例子，说我们的学术权威怎么会想出这么一种方法，而且觉得非常有道理？在〈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篇文章里，他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他不仅仅说美国双标，而是说你连建立标准的资格都没有，西方国家没有资格充当民主制度的导师。他针对当时非常流行，而且被接受的社会学家 Daniel Bell 的著作，“The End of Ideology”展开批判。这里我引用一点，Bell 是说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透过社会福利而不是威权 authoritarian 的方

法建立民主制度。Chomsky 就指出，西方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充满专制、暴力和血腥。他认为，相应于美国社会这种发达的程度，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是相当不足的。完全没有好的民主经验可以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我觉得很深刻。他认为，讲什么输出两党制的民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度的毫无意义，“a monstrous irrelevance”。Chomsky 如果没有对于专业著作的相当深刻的专家认识，是不能提出这种与众不同的观点。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郭力昕：好，谢谢行德。很高兴行德有机会把 PpowerPoint 里面没有机会分享的、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这部份补充完。接下来请建三。

冯建三：其实我没什么结论，不过，刚刚听到有关权威的讨论，也许可以就此再次谈谈「两岸关系」这个大议题。最近这几个月，我与大为就俄乌战争的消息，有较多的联系，这就观察到由来已久的问题，亦即近几个月的新闻，让人有怪异的感觉。我是说，环绕「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样的话语，反映在舆论，似乎变成仅在谈两岸会不会发生武装冲突？如果发生，台湾能不能撑得够久？美国会不会来？这不是很奇怪，让人担心吗？这难道不是有某种不知其名的「权威」，在「指挥」整个议题的走向吗？按理，没人希望有战争。那么，更值得、必须讨论的议题，难道不包括要怎么不让战争爆发吗？现在，这个议题似乎变成一个 non-issue。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搞清楚状况吗？无论如何，得坦白承认，我是有些焦虑，虽然可能还是远虑，不太相信会发生？化解这个焦虑与两岸和平，仍然还是谈两岸关系是不是有第三方案。就此来说，政大选研中心三十多年来的民意调查，有贡献但也有误导，它的选项大致是一国两制的「统一」，及不惜与对岸为敌的「独」，然后就是「维持现状」这个应该不能算是第三方案的拖字诀。这就等于将民意限制在二选一，偏偏二者应该都不理想之外，也不能说已经穷尽其他可能。但长期以来，二选一的民调已经形成，这就坐视诡异也很危险的格局持续渗透与扩张，最后变成九成的人不愿意对岸界定的「一国两制」之统，这就注定这个方案必须排除，「与对岸为敌的独」也就变成唯一的选项。然后，就是表面

上没有说，实质上对岸却认定此间的主要趋势是「倚美谋独」。也许，如今仅谈两岸会不会开战、台湾能不能撑得够久、美国会不会派兵，就成为可怕、但国人除此之外，不再努力营造第三案的原因？但台湾能开战吗？乌克兰在欧洲，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将近台湾十七倍而人口不到台湾两倍。并且，2014年以来，美国与北约的强力军事援助及军事训练乌克兰，加上现在欧美的强力军火运送，都无法吓阻俄罗斯，那么，我们真认为美国永远可以吓阻对岸，让现状永远持续吗？我们真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自助就有人助吗？如果真是让对岸认定我们在「倚美谋独」，对岸会等到我们宣布独立才动手吗？提出这些可怕的可能，就是不爱台、就是投降派，就是在为对岸张目吗？拉拉杂杂说这些，不算结论，就是把握最后的机会，再次重申一些想法。谢谢。

郭力昕：谢谢建三，再来请汪宏伦老师。

汪宏伦：OK，我想我也简单谈一下刚刚听了非常多的朋友的分享跟发言之后的一些想法。刚刚听到蔡维天老师提到他作为 Chomsky 的学生，亲身观察到的他的一些治学或者是为人的一些特色，我觉得满同意的。其中有几点，其实我在刚提到的十几年前写的〈值得从 Chomsky 学习的十件事〉里面，大概也有写到。虽然我先前跟他素昧平生，但是从他的著作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很多他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是作为我们谈所谓的 public intellectual 的时候必须要有的。包括比如说对于 integrity 的坚持，或是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但是与此同时，我刚刚听了蔡维天老师的分享，也让我恍然大悟一件事。刚刚他提到 Chomsky 在方法论上的坚持，他觉得是对的，他会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推到极端。我觉得他的评论恐怕也是非常受到这样的性格影响，所以他的一些想法，有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讲过头了。比如说像刚刚李行德老师秀的那些 PowerPoint 里面，其实非常具体地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批判社会科学。我刚讲那个有他的时代背景，他所批评的那些人跟学说的确都存在，也都值得批评。可是社会科学不是只有他所讲的那个样子，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样态，他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些保守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保守的言论，就会把它推到极端，有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我觉得是满可惜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相信刚提到，比如说像华勒斯坦这么老牌的左派学者对 Chomsky 其实也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你如果看到 Chomsky 讲这样的话之后，我想任何从事专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大概心里面大概都不会太舒服。这是我今天我讲的重点之一。但是他做为一个 public intellectual 可以学习的地方还是满多的。另外，我也想要响应一下刚刚张小红老师所提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在引言的时候提到的，就是 Chomsky 的世界蓝图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困惑：「到底你的世界蓝图是什么？」很多人把 Chomsky 当成是左派的知识分子，问题是很多左派的也对他非常批评、无法接受；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也非常批评也不接受它，也不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所谓的 Marxism。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他说自己是所谓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但即使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也有很多论述在谈到底怎么世界是比较合理的，我却比较少看到他在这方面的铺陈。到底他的那个世界蓝图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困惑，所以其实张小红老师提到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厘清的问题。厘清这些事情可能是大为的工作，他办这个研讨会，然后他想要写关于 Chomsky 的书的时候，可能可以进一步帮我们去厘清这个问题。

李泳泉：今天听到很多好大家都这个精彩的见解，相形之下我的那个引言基本上是走在路上的这个所见所闻。总体上，我觉得 Chomsky 的这个重要之处，对台湾如果说的是启发的话，其中一部分是他的正义感跟行动力，这部分应该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么，譬如说刚刚我的这个比较 Unit 的那个专题跟这个《诚品好读》专题来看的话，那当然整个专题的整个结构性、细腻等这个思考性非常的完整，诚品的话呢至少它还是清楚的表达，这个浪漫对实用性的这个功能，所以我后来在感叹台湾非常难得出现的另类周刊的消失，这部分我觉得说正好他就是缺少那种的时间力，哪一种作为另类声音的这个时间力而不是挂在嘴上。这个破（报）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不够务实、不够责任跟理性的不足。所以这个部分正好是这个 Chomsky 在谈到制造共识也好，知识分子责任也好，如果你的那个心思够集中、决心够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在台湾的很弱的这个媒体的体质生态上面，勇敢跨出那一步，可是

那个基本并没有做得好、比较不足，这也是刚刚张小虹唯一提到的《破报》的一文不值，我是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年代花很多时间去读过《破》报的过程，对它真的有期待结果是非常的失望，大概是做点这样补充，今天从大家学到很多，谢谢。

朱元鸿：一个很短的 remark，今天宏伦带出来的主题比方说他跟社会科学、比方说政治学之间的互相的陌生或乖离。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他刚刚讲说这是傅大为应该去处理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个主题一点重要性都没有。我觉得其实我们讲说人生海海，这些学者他 Focus 在哪一个 continent 或者是哪一个 atmosphere，其实像这样子的状况很多，这种人物其实满多的，你说他的教职或研究职位是在社会学，但社会学里面的人对他也搞不清楚，他的影响力完全是在不同层次。所以我的感觉是这种情形常见，而且没什么重要性，就是没有什么一定要去把它解释出来，就这点意见。

汪宏伦：我响应一下，刚刚元鸿说我把他跟社会科学之间的乖离丢给傅大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说的是说他的世界蓝图、那个愿景是什么？我是说这个是大为可以去思考东西。至于说，他跟社会科学的乖离，我同意就是说像刚刚元鸿说的，其实很多人在自己的学科没被认可或是在其他领域得到认可，这问题有没有重要，我觉得这是一回事。但是，我刚说的重点是，他们之间有相互可以借镜的地方，但是却相互没有看到对方的优点，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事情。

郭力昕：我们就请大为作总结。

傅大为：不好意思，这不是总结，而只是暂时的一个休止符。我觉得刚刚那个汪宏伦讲的那个关于蓝图的事情，小虹也提到，我倒是觉得蓝图好像不是那么重要这样子。Chomsky 在很多地方有讲过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他有讲啦，就说因为做这个计划要搜寻比较多的东西，但其实我不是那么认真，因为最后的蓝图这个东西，我比较从傅柯的角度来看，那个东西可能用处不大，

比较有用之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展示出来一些做法、一些风格、一些特质这些东西，虽然可能有些不同的目的，但我们可以学习的是那些东西。很多听众会问他说你的无政府主义是什么，他一时也说不出个的名堂，因为这世界上实在没有太多这样的历史，他顶多说以前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革命，你去看那个东西，里面有非常仔细的描述等等这样子。当然，像我们办这个座谈会，我觉得主要目的不是为我的写书，我从大家学很多，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能够引起大家对于 Chomsky 进一步的兴趣，对于 Chomsky 的政治在台湾或者是东亚、亚洲，他所可能有的意义能够进一步去思考。那大家从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最后希望是这样。

最后，其实我要谢谢比如宏伦一开始提到社会科学，Chomsky 跟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其实这问题我自己满有兴趣，因为我对这个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比较熟悉，为什么 Chomsky 会这样想？的确是有很多东西他没有读过，或者是像刚才行德举的那篇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文章，那是 1967 文章，所以在那个地方里面，他所举的就是那些人，现在后来的人当然很多很多，但同时，等到后来的时候 Chomsky 已经够大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再去来一一阅读说你们社会科学到底做了些什么好东西出来，他有更急迫的事需要做、或者与更广泛的民众交流（不过他也常说，如果有好东西，请告诉他，他愿意听一听）。还有，我看他的书，我常满惊讶他常举出近年来，哪个人在社会科学领域、哪个人写了一本很好的书，与他正在谈的问题密切相关。他常常在 interview 会提到这些事，我很惊讶他经常把人家的 first name 通通讲出来，这人的记忆简直不可思议，我现在已经常常忘掉人家名字，他常常举出人文社会科学好的著作、说这个东西这个题目他是专家可以看等。我觉得这个部分他是用零星星的方式在他讨论的脉络中表现出来，而没有拿一整篇文章说今天的社会科学的 overview，这已经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重点，而且他写出来人家也不会看，整个情况已经不一样。

反过来讲，我其实今天本来想有机会想要进一步谈的，但是因为没时间，就是 Chomsky 跟自然科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也很有兴趣。比如说蔡维天一开始就说 Chomsky 就是科学、是方法。其实看他的背景，他自称他是

Cartesianism, 笛卡尔主义者, 强调理性、强调科学这些东西, 但这一套东西我们怎么讲, 就是说在我们的领域或者我想在很多的人文社会领域, 其实 70 - 80 年代以后, 从后结构主义, Thomas Kuhn 等之后的发展, 他已经跟这个新方向连结得很少, 反之, 他反对与批评后现代主义也是出名的。我感到好奇的是他的研究所, 其实跟 Thomas Kuhn 是同一个研究所, 可是他们似乎很少交谈。

我去搜寻他写的东西, 人家访问他说 Thomas Kuhn 提出科学革命的重要性, 你有什么看法? 他就有点随便讲几句话就跳过去。我觉得他也是他够大, 他不需要再去忧虑这些事情, 他有更急切、他觉得更重大的事情他要来处理。一个人一生有很多阶段, 你某些阶段你会注意的很多事情, 在另一个阶段时那些事情你已经没办法触及到了, 我常常感觉 Chomsky 也是这样, 从这里我觉得说他对科学是有一种, 当然他的语言学、科学是他成名的, 真正扬名立万在学术界的, 所以他对于科学有非常强的信心, 对于他的直观对他这个东西有非常强的这种直觉、这种信心, 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构成, 就是很多事情他一下子就做判断,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他跟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不太容易有进一步的交流。当然他的朋友很多, 他 radical 的朋友非常多, 其实我有时候也在追那些人, 从许多早年的学生辈、到大咖例如 Said, Herman, Zinn 等人, 但是他跟更广泛的学界知识分子合作则不容易, 我想如宏伦说这样很可惜, 他能做得很少。我也了解这已经不是他的工作了, 一天到晚有无数的人, 想要问他这个问题、问他那个问题, 他觉得他可以接触更多不受学界保守思考惯性所束缚的普通平民、接触街道与小镇上的人民, 并以此为傲, 我想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 我觉得他有一种对科学的信心, 他对 MIT 一直很维护, 因为很多学生运动对 MIT 作为一个战争机器, 有非常多的批评, 可是他一直维护 MIT 与赞助计划的关系。但他的一些讲法中我的确觉得是有些小问题, 跟 Kuhn 后来在 Princeton 所讲的东西不太一样。他对 MIT 的科学家, 相当尊敬, 但细节这边没有办法多讲, 所以我觉得他的风格, 有时是来自于一种科学的权威, 但这个科学的权威, 我觉得我们其他人不需要有。我们可以学习他的长处, 我们的科学成就没有像他这么高, 我们也不会像他有这种科学的自信心与直觉,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跟他的不同。最后,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各方面对 Chomsky 有兴趣的朋友互相交流，包括杭士基的两位资深学生教授，我自己学习到很多，非常谢谢。

订 阅

零售：每期新台币 500 元

个人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机构订阅：国内一年两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两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挂号邮资

邮政划拨户名 社团法人媒体改造学社

邮政划拨账号 50313103

Communication, Culture, & Politics

Journal published by CMR, Taipei, Taiwan

December 2022 Issue 16

2 issues a year, in June and December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On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 Contrapuntal Rereading Chin-Chuan Lee's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 *Intellectuals and Clientelism:
C. C. Lee's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 *The beautiful accident of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Marxism walking the middle way without guarantee*
- *An Eyewitness on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Taiwan Mass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writings of Dr. Chin-Chuan Lee around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1982-1999)*
- *Commun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Expectations for Media System-
an Analysis of Chin-Chuan Lee's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of Lifting the Press Ban"*

Research Notes

- *Negative Impact from Platforms on Print Newspaper:
The Alert for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Past and Present

- *Chomsky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a Panel Discussion*